

重慶抗戰紀事

(1937—1945)





重慶出版社

重庆文史资料丛刊

重庆抗战纪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八月

责任编辑　杨耀健
封面设计　邵大维

重庆抗战纪事（平装本）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发行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插页4　字数306千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3114·24　定价：2.00 元

要想着收咱失地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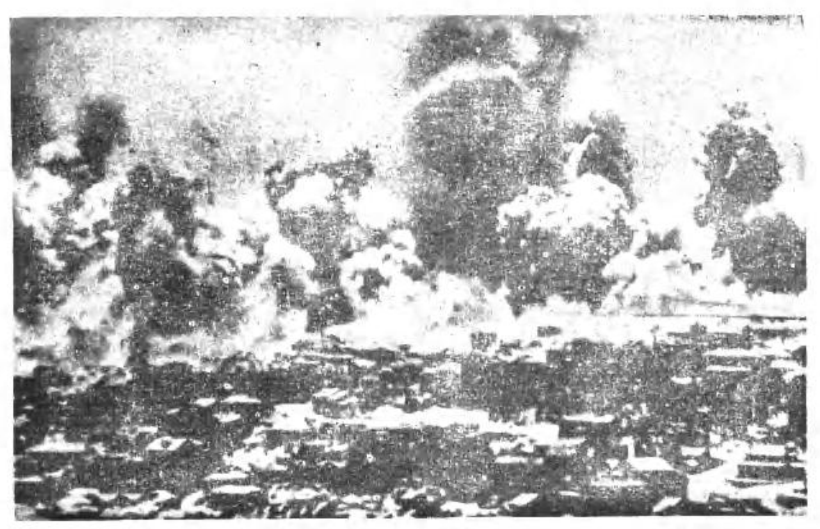
忘了還我河山

馮玉祥

三一、五、一九

冯玉祥为汉藏教理院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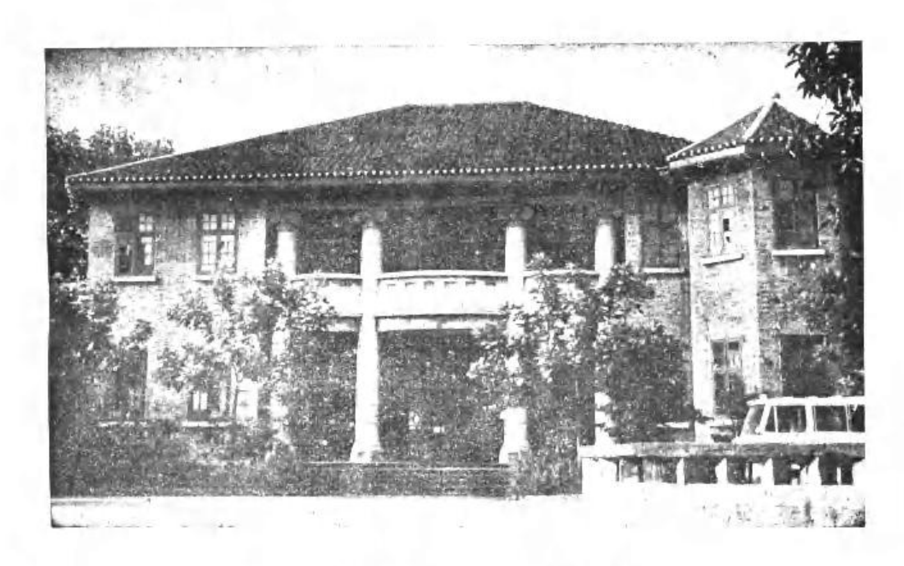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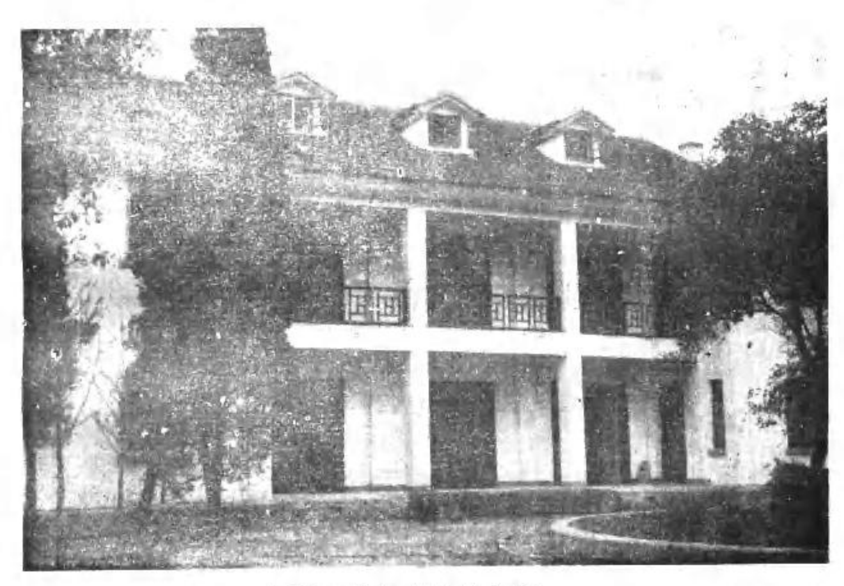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八十六架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大轰炸，重庆城区一片火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本飞机对重庆大轰炸，造成重庆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市民死伤惨重。



曾家岩德安里一〇一号蒋介石住宅



林园二号楼宋美龄住宅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鲁崇义在重庆各界人士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四十五周年大会上讲话。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



重庆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及张自忠将军亲属在纪念会上。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

目　　录

献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为《重庆抗战纪事》而作

魏 传 统

天府四川，
经历了八年抗战，
山城重庆，
承受了一切灾难。

日军大轰炸，
带来无穷的悲痛和辛酸。
大隧道的窒息，
千古仅有，惨绝人寰。

回顾四十年中
在雾都的岁月，
曾向张自忠将军献过挽联。
对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
我们从内心发出真挚的赞言！

《新华日报》开天窗，

---

* 魏传统，四川达县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解放前曾在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

报童遭毒打……
顽固派的荒唐行径，
难阻揭露皖南奇冤。

《升官图》发出讥笑和冷嘲，
社会沸腾展示了《屈原》。
人心所向，
激励文坛。

国民政府的陪都，
四大盟国的远东首府，
为了抗日救国，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中共中央南方局
鼓励山城儿女，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要既如重峦，
更胜温泉，
大智大勇气如磐。

一切海内外的正义人士，
一切爱国侨胞，
在那极端困难的时刻，
深深感谢他们热情支援。

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争取胜利，一往无前。
坚持正义保卫和平，
没有忘记昨天，
也是为了今天和明天。

永远闪烁着光辉，
历史的经验。
压迫、奴役、无耻贪婪，
那穷凶极恶的轴心
东条英机、希特勒、墨索里尼，
终于沉沦孽海，遗臭万年。

勿须篡改那雄辩的史实，
不要把罪行当作美谈。
丢掉幻想，放弃蜡炬残。
中日两国人民，
只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才能共赏
百花鲜，
霁后岚。

统一祖国，大势所趋，
在逆流中旋转，
只能是刺骨寒。
寄希望于人民，
海峡两岸

骨肉同胞盼团圆。

天府四川，
山城重庆，
而今你又展开笑颜，
奋发写新篇。
永远留在人们心间，
上清寺、化龙桥、周公馆、
红岩那自由的解放区，
却是平凡而又非凡。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重庆与八年抗战

刘敬坤

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重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谱写了最为悲壮和光辉的篇章。提起重庆，人们不禁会回忆起八年抗战；提起八年抗战，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在那艰苦岁月中的重庆。当年经过抗战、如今年满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乎都和重庆有过或多或少的关系。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重庆人民的光荣。重庆在八年抗战中的艰苦历程，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回溯历史，在中华民族各个时期对外来入侵势力的斗争中，总的趋势是自北而南。每当入侵势力"南下牧马"、中原板荡之际，汉族国家总是南徙江淮，凭着江河险阻立国江南。因此，史书在谈及我国的历代国防形势时，有"守河"（黄河）、"守淮"（淮河）、"守江"（长江）之论。汉族国家的这种"衣冠南渡"，延续和发展了先进的汉族文化传统，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作用。

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防形势，则和我国历史上迥然不同。我国历史上的国防形势总是自北而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防形势，则变为自东而西。在历史上，我国遭遇外来势力入侵时，是"衣冠南渡"，抗日战争时期，则改变为"衣冠西渡"。在八年

抗日战争中，我国的国家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沿海地带逐步向西部山区转移；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游击战争，则是从华北进入日军占领区后方，发展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根据地。在我国重心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山区转移中，四川成为我国抗战期间立国的基地，重庆则成为抗战时期的首都。

据估计，在抗日战争中，沿海及沿江地区有近一千万人迁移至西南和西北，其中有七百万人迁移至四川，有一百万以上人员迁移到重庆及其附近沿江地区。迁移到大后方的这一千万“中原父老”，都是中华民族的精华。重庆在这次中华民族的“衣冠西渡”中，也顿然由我国西南部的一个商业城市及水运中心，成为我国战时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工业及交通运输中心，并为领导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长期抗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次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三月六日，国民政府决议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十一月，国民政府自洛阳还都南京，但仍积极进行建设西京的筹备工作。对此，蒋介石曾经指出：“战时以努力经营长江流域，掌握陇海路为第一要旨。”由于这时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还未解决，国民政府是把我国的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来经营的，诸如“筑成了渭北灌溉工程，将陇海路向西延长，修筑西兰公路直达兰州；西荆公路经过河南的紫荆关通到了湖北的襄樊；川陕公路已跨越了秦岭，经过汉中到了成都和重庆。在惨淡经营下，西京陪都已有了规模。”①除此而外，国民政府已开始注意把经济建设与国防中心加以配合，避免在沿海城市兴建新的

大型工业，开辟我国东部通达西部的交通干线，考虑解决战时海岸遭受封锁后的对外联系问题。

一九三五年，随着我国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开始逐渐将国防中心由西北转向西南。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蒋介石由汉口飞到重庆；四日，他在总理纪念周讲演时第一次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② 国民政府当时已经建都南京，自然也就是立国在以南京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蒋介石在此处所说的以四川为"立国的根据地"，显然是指发生对外战争时说的。同年七月，蒋介石面对即将来临的中日战争时，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同年十月六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的建校。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是天津张伯苓毕生惨淡经营的教育事业。何廉原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蒋廷黻亦曾任过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蒋介石在战前任行政院长期间，经行政院秘书兼教育部次长钱昌照的推荐，何廉、蒋廷黻、翁文灏等即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工作。一九三五年由何廉担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期间，正是南开中学在沙坪坝建校的时期，也正是华北局势紧张的时期。该处校址原为南开大学南迁校址，后因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原建于沙坪坝的校址，改设南开中

①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三二九页。台湾综合月刊社一九七三年版。

学。从南开中学一九三五年在重庆沙坪坝的建校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于一九三五年已考虑以四川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已处于不利形势，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演。同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决定迁至重庆办公；三十一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并电知前线将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海军军舰溯江西上，在南京的党政机关亦陆续出发。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办公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②《大公报》亦发表社评，谓："此次抗战，本来要长期，国府在任何地点发号施令，都是一样贯彻于全国。重庆是庆祝复兴，我们谨祝此宣言为中华复兴之开篇。"二十一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战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算终自我操。"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施行疯狂大屠杀。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③

南京陷落，举国震惊，蒋介石当即辞去行政院长及一切

①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四一〇页。台湾综合月刊社一九七三年版。

③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六十四页。台湾综合月刊社一九七三年版。

有关政治职务，专门负责军事指挥。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国民政府机关均由南京迁至重庆，军事及外交部门则驻武汉办公，武汉此时实际是我国的临时首都。同年七月武汉会战开始后，我国西迁途经武汉及设于武汉的工厂、学校、文教机关、政府机关开始向重庆疏散。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重庆即成为抗战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教育的中心，为时达八年之久，直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政府才还都南京。

二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下游以及滨海地区，为我国精华之所在，是我国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活动与人口集中的地区。上海滨邻长江入海口处，自一八四二年开埠以来，几近百年，很快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也是我国接触西方近代文化的窗口。抗战以前，上海一地所设的工厂，除少数为国营外，大中小私营工厂约五千余家；有全国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有全国规模最大与最有影响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出上海版），有全国大型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也是全国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高等学校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著名的中等学校有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西女中等。抗战开始后，上海及江南各地迁出工厂有二百余家，少数厂商迁往香港，《大公报》迁至武汉，继迁重庆继续出版；复旦大学迁往重庆北碚夏坝，大夏大学初迁庐山，继迁贵阳，交通大学及上海中学等著名学校迁至租界开学上课；《申报》、《新闻报》等在租界继续出版，后为汪伪组织接收。

北平、天津为我国北部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但因平津沦陷较

早，除了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天津的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分别迁往西北及西南地区外，工厂几乎没有迁出。青岛、济南、石家庄等地亦仅迁出少量工厂；由太原和郑州迁出的工厂，多集中于陕西境内。

除上海迁出的工厂具有多种性外，内迁工厂之中，多为纺织厂和兵工厂。华北迁出的多为纺织厂、纱厂；我国原设于济南、太原、巩县的兵工厂及上海高昌庙兵工厂全部迁至重庆近郊（南京金陵兵工厂亦迁重庆）。

"七七"事变发生后，资源委员会① 于七月二十八日派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召集机械及化学工业会议，提出上海工厂内迁问题。二十九日，林继庸由南京到上海，与工业界的胡厥文、吴蕴初、支秉渊等商量迁厂办法；次日，与上海机器五金业同业公会商定迁厂原则。八月十日，行政院令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十二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该会委员均为上海工业界知名人士，即以身作则，率先迁移其个人所经营之工厂。监督委员会决定，先将上海拆迁工厂之机器及材料由水路运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再决定何者西运宜昌转重庆，何者南运湖南转湘西或广西桂林、柳州。此时，当局以湖南作为沿海内迁的中途转运站，尽先将一部分人、物、财抢运至暂时不会受战火波及的湖南，然后再分别转移至他处；一部分则直接溯江西上入川。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南京沦陷后，由上海迁出的民营工厂共一百四十六家，运达武汉的机器及材料重达一万四千六百余吨，技术工人两千五百余人。其中机器五金业六十六家，造船业四家，炼钢工业一家，电气及无线电业十八家，玻璃陶瓷业二十

① 资源委员会原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翁文灏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五家，化学工业十九家，文化印刷业十四家，纺织及染纺业二十七家，食品工业六家，其他工业六家。这些工厂迁到武汉后，仅有小部分工厂于一九三八年初复工生产。此时，武汉除大型的汉阳兵工厂及汉冶萍钢铁厂外，稍具规模的机器厂仅有三家，其他一百余家为纺纱、织布、打包及面粉等工厂。

一九三八年八月，当日军迫近武汉外围时，外地迁汉的一百七十余家工厂的机器及材料，悉数沿江西运迁川。武汉原有的一百五十多家工厂，共有机件一万二千余吨，均大部迁川，部分迁湘，工人亦多随厂西迁、南迁。汉阳兵工厂及华中水泥厂则迁往湘西辰谿设厂生产；汉冶萍钢铁厂小型部件拆迁至重庆。

在武汉撤退时，从上海、南京、芜湖、九江以及武汉溯江西运的工厂机件和物资，估计总量在二十万吨以上，辗转迁徙，历时半年有余，均集中于宜昌一地，待转船西运入川。此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业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工人，亦集中宜昌候船西上。全国国营的兵工业、航空工业以及重工业器材，亦堆集宜昌待运。宜昌这时成为我国内迁的中转总站。

这时，撤退至宜昌的航行于长江的轮船共二百余艘，均因吨位较大，不适于川江航行，停泊在宜。川江引水业同业公会发扬高度爱国热忱，公推川江引水权威数人，登上大型轮船“江安”、“江华”、“江新”及南京下关至浦口轮渡“澄平”号，破浪鼓轮入峡，竟奇迹般的把四艘巨轮引水驶抵重庆下游江面唐家沱停泊。在抗战期间，这四条船因吨位过大，无法在川江行驶，停泊于唐家沱江面隐蔽处，改作水上仓库，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始整修启航东下。停泊在宜昌的船只，部分拆除了机器零件，船体大部遭受日机轰炸而损毁。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交通部航政局开始在青滩、洩滩、兴

隆滩等险要处建机械绞滩设备。此时，航行于宜万和渝宜间特制双蒸汽机之钢壳船体浅水轮船，共二十四艘，民生实业公司占二十二艘。该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慨然以国事为重，先行在宜装运兵工及航空器材至万县。所有民营工厂之器材、机件，一律用木船装运；共用木船八百五十余艘，运输器材、机件二万五千余吨，在急流险滩失事中损失机件约一千二百余吨。

沿江及沿海工业内迁后，分别在西北和西南建立了如下新的工业区。

一、以湖南沅陵、辰谿为中心的工业区（包括安江、榆树湾），建立了发电、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工业。

二、在湖南衡阳兴办一个轻工业小区，在四川酉阳龙潭镇兴办一个汽车修理、装配与炼油业工业小区。

三、在四川万县、长寿、涪陵一带，建立了水电、榨油工业。

四、以陕西的西安、宝鸡为中心，建立了发电、纺织、机械工业。

五、在四川的沱江及岷江流域（即在泸县、内江、五通桥、自流井地区），建立了发电、酒精、制酸、制碱、造纸、炼油、炼焦等工业。

六、在云南昆明建立了发电、机器制造、电工器材、冶炼等工业。

七、在甘肃开采玉门油矿。

八、在广西桂林、柳州及全县，建立了发电、纺织及机械工业。

九、最为重要与最为集中的，是重庆工业区。沿长江东起唐家沱，西至大渡口；沿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桥；沿川黔公路南

至綦江，构成了我国抗战时期的工业命脉。这是当时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区，以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作为这个综合工业区的骨干。各工厂在距重庆沿江四五十里河谷隐蔽之处，开山凿岩建厂。如豫丰、裕华等纱厂，大鑫机器厂，资渝、资蜀炼钢厂，都是用人力填平山谷，或开山凿岩进行建厂的。特别是设在磁器口、相国寺和唐家沱等地的兵工厂，把生产车间设置于人工开凿的隧道之中，构成坑道生产自动线网，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全部图纸均系战前购自德国），且不受日机轰炸威胁。沿江一带，灯火通明，机械转动之声轰鸣于高山大川之间，堪称壮观。至今在重庆犹有旧迹可寻。

在沿长江东起长寿，西至江津；沿嘉陵江北至合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地区，成为我国抗战时期的金三角。在这个三角地区内，有长江和嘉陵江的便利水运条件，有较多的电源供给，有较多的知识技术力量，有较丰富的材料储备，有战时居于全国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所以迁到重庆的工厂为最多，总数约占全部内迁工厂三分之一（迁川工厂约占全部内迁工厂的百分之六十）。到一九四二年，国营钢铁厂八家，兵工厂二十余家，多数均设于重庆工业区。重庆计有兵工、炼钢、炼铜、机械、电器、制酸、水泥、玻璃陶瓷、造纸、化工、烟草、面粉、炼油等工业，成为我国微弱的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

抗战前，我国有航空线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六公里；政府西迁重庆后，重庆遂为我国的航空中心，初仅有航线二千二百九十三公里。一九四一年时，我国航空线增至一万四千八百零三公里，先后开辟有重庆—香港、重庆—仰光、重庆—河内以及中印、中苏航空线。

宜昌沦陷后，长江、嘉陵江航运以重庆为中心。轮船沿长江

上驶至宜宾、泸县，下驶至三斗坪；沿嘉陵江上驶至合川。湖南、湖北两省的棉花以及部分粮食，通过日军封锁线集中到三斗坪，西运入川；经由安徽漯河、界首偷运入境的医药、注射针头以及其他后方不能生产的奇缺物资，经长途陆路人力运输过河南、鄂西抵达三斗坪后也转船入川。川省兵源的东下，重庆生产的军火武器之运抵战区，川省食盐（产于自贡市）之东运湘、鄂，都靠长江这条唯一的水上运输线了。重庆正是这条东西转运、战区与后方联系的中心。所以有人说："抗战时，国民政府选重庆这个地方，算是选对了。"

在万般艰难的抗战时期，以我国残破微弱的近代工业生产，能够供给前方迫切需要的军火武器（我国当时只能生产迫击炮以下轻武器），能够维持庞大的兵员供给（全国兵员当时每年约为四百万至五百万），能够维持起码的民用工业生产，能够进行最低度的国民经济生活活动，应当说，重庆曾起了重大的作用，对抗战作出了最可贵的贡献。

三

重庆是个山城，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市区狭窄，分为上半城与下半城两部分，市区仅限于朝天门至两路口之间。国民政府及所属各机关迁至重庆后，整修马路，开辟市区，拓建中山一路、中山二路、中山三路、中山四路至曾家岩、牛角沱；市区也因之扩展至上清寺，郊区扩展至磁器口、歌乐山一带。

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政府机关及市区人口疏散至歌乐山、青木关与北碚之间，遂定此区为"迁建区"（主要在巴县范围，也包括璧山一部分）。

国民政府设在市中区上清寺国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亦设上

清寺，军事委员会设在下半城储奇门原重庆行营。其它各院、部、会、局等机构，后因轰炸关系，多数迁至郊区和迁建区，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行政院迁至歌乐山乡间，立法院及司法院迁至北碚附近歇马场，监察院迁至金刚坡，考试院迁至中梁山华岩寺，教育部迁至青木关（在两路口川东师范设有办事处），内政部迁至青木关附近陈家桥，蒙藏委员会迁至歌乐山等等。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官邸设山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驻市区曾家岩德安里一〇一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分设在曾家岩、红岩村。

这些政府机关迁至迁建区村镇之后，或利用庙宇祠堂，或利用民间空房，或搭盖茅草棚屋，条件极为简陋，仅避风雨而已。教育部设于青木关北侧山间松林丛中，以致发生过猎豹进入办公室夜宿之事。

当时，重庆市区仅有公共汽车一路，由朝天门的过街楼，经小什字、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中一路、中二路、中三路，达于上清寺、曾家岩。郊区公共汽车四路，一路由两路口开往青木关、北碚；一路由牛角沱开往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一路由牛角沱开往小龙坎—高滩岩—山洞—歌乐山；南岸仅有海棠溪至南温泉一路。重庆市区当时有人口七十万，连郊区及迁建区在内，总人口约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九四〇年九月，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属行政院直辖市（抗战时，只重庆一地为行政院直辖市），吴国桢担任重庆市长职务较长；刘峙、王缵绪二人先后任重庆卫戍司令。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我国，在重庆对日宣战（宣战宣言由国府主席签署，五院院长副署）；并同时宣布对德意志与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中国列为同盟国四

强之一。一九四二年元月二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任最高统帅，美国史迪威任统帅部参谋长。同年十月十日，蒋介石在“精神堡垒”集会，宣布英美两国自动取消在华不平等条约；次年元月十一日，中英平等新约在重庆签字，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国民政府为此发表宣言。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逝世。同年十月十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重庆沉浸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之中。九月三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受降时，重庆举行空前大游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副委员长冯玉祥同乘敞蓬车，检阅群众游行队伍。

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政府明令还都南京，重庆仍称陪都，隶行政院直辖市。

四

抗战以前，我国共有高等学校一百零八所，多分布于平、津、沪、宁等沿海地区。一九三五年，华北局势紧张，清华大学在长沙岳麓山营建校舍新址。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八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天津的南开大学三校，在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下，在南京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处；九月底，临时大学在长沙小吴门外圣经书院正式成立。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九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云南昆明，四月底全部迁昆，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七月十五日，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由校长罗家伦动员迁校。该校早已于一九三五年将学校的图书仪器装运重庆，校址选定在重庆大学附近松林坡。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中大沙坪坝新校舍落成，全部师生迁渝上课。

在我国战前一百零八所高等学校中，迁至后方的五十二所，迁入上海租界及香港的二十五所，停办的十七所。设在平津的学校，除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外，其余均迁往陕西、甘肃境内。设于苏、浙、皖三省及沪、宁两市的学校，分别迁至湖南、四川两省，迁至重庆一地的又占多数。

抗战前，我国共有专科以上学校在校学生四万余人，一九三七年因迁校关系，减少学生一万人。但自一九三八年后，在校学生人数又逐渐增加，一九四五年竟增至八万余人。在校就读学生中，除籍贯隶大后方各省的(如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外，其余籍隶沦陷区（如河北）与半沦陷区（如安徽）各省的，一律实行公费制度。教育部更在全国各地设立国立中学四十八所（包括国立华侨中学及国立中山中学），亦全部实行公费。其他尚有为数不计的各种军事学校，亦皆实行公费制度。在抗战时期，我国在各类学校(包括中学、大学及军事学校，不计保育院)在校就读学生，每年约有二十万至三十万人。我国教育史上之实行公费制度，即始于抗战时期。

在抗战以前，重庆共有两所大学，一所是设在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初仅理、工两个学院，后增加商学院；一所为设在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自一九三七年后，陆续迁到重庆的有下列各学校：

中央大学。原设于南京，迁至沙坪坝松林坡，与重庆大学为邻，共有文、理、法、农、工、医、师范七个学院，当时是国内学生最多、系科最完备的大学；新生院设磁器口上游嘉陵江畔的柏溪，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设成都。

中央政治学校（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后改称中央政治大学，系四年制单科大学）。原设南京，后辗转迁至重庆

南温泉，设有政治、法律、外交、新闻、经济、地政六系。

复旦大学。原设上海江湾，私立，初与大夏大学联合迁至庐山，后迁贵阳，两校遂分别复校。大夏大学留贵阳，复旦大学迁重庆北碚夏坝，设有文、理、商、农四个学院，后增设法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

交通大学。原设上海，上海沦陷时，迁入租界上课；一九四〇年，部分师生由沪辗转至渝，初在沙坪坝中渡口复校，后迁九龙坡扩大建校，有理、工、管理三个学院。

陆军大学。由南京迁重庆山洞。

兵工学校。为四年制兵工单科大学，设磁器口小杨公桥，该校学生人数较少，但质量较高。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抗战前筹建于南京，后在璧山（属迁建区）正式建院，设有社会教育、图书馆博物学、新闻学三系。

国立音乐学院。抗战前筹建于南京，后在青木关正式建院。

国立江苏医学院。抗战前设江苏省会镇江，省立，后辗转迁至北碚，改为国立。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由杭州艺专及其他艺术院校迁校合组而成，辗转迁至青木关，后迁沙坪坝对岸磐溪。

国立上海医学院。原设上海，迁至歌乐山复校；后长沙湘雅医学院由贵阳迁渝，与上海医学院合校上课。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原设南京，后迁至重庆歌乐山。

私立朝阳学院。原设北平，后迁重庆附近兴隆场，改为国立。

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设沙坪坝，系五年制专科学校，所设学科甚多。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由武昌迁重庆南岸。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由武昌迁至曾家岩求精中学内，后迁江北相国寺。

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校址在北碚歇马场。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苏州东吴大学法商学院、上海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均在重庆市区内复校。

除上述各高等学校外，合川有国立第二中学（由江苏部分省立中学迁川组成）；长寿有国立第十二中学（由湖北部分省立中学迁川组成）；江津德感坝有国立第九中学（由安徽部分省立中学迁川组成），江津某乡场有国立华侨中学，德感坝另有江苏丹阳迁川的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白沙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部特设的大学先修班、国立第十七中学和国立编译馆；青木关有国立第十四中学（后改为中央大学附中）；永川有国立第十六中学；沙坪坝有抗战时设备最为完善的南开中学；江安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南溪李庄有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同济大学（原设上海，初为私立，后改为国立）；万县有私立上海法学院等。

重庆北碚对岸的夏坝，小龙坎、磁器口之间的沙坪坝，江津县属的白沙镇，合称为重庆的三个学校文化区。

内迁的文化机关中，国立中央图书馆抗战前筹建于南京，初迁白沙，后迁重庆两浮支路正式建馆。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初运重庆，后迁至乐山乡间。重庆在抗战时期，只有一个中央电影制片厂，但因缺乏材料，改演话剧，简称“中电”；另有中国艺术剧社，简称“中艺”。两剧社在重庆演出名剧有《屈原》、《孔雀胆》、《家》、《万世师表》、《清明前后》、《重庆屋檐下》、《升官图》等，为抗战时期重庆的话剧运动作了重要贡

献。另有张大千、张善孖兄弟，徐悲鸿、陈树人、关山月等名画家的画展，马思聪的提琴独奏，刘大钧的琵琶独奏，新疆康巴尔汗和管夫人的民歌演唱，都为抗战时期的重庆生色不少。

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的重庆，又是一个人才荟萃的中心。

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报纸，有由南京迁来的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有由武汉迁来的《扫荡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改为《和平日报》)、有由天津和上海迁来的《大公报》、有由武汉迁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此外，还有《时事新报》（由上海迁至重庆）、《国民公报》、《新蜀报》、《商务日报》。一九四五年初，又增添了由北平迁渝复刊的《世界日报》，后又出刊了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晚报有《大公晚报》、《新民报晚刊》、《南京晚报》，英文报纸仅有《自由西报》一种。还有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文化出版事业，是重庆在抗战时期所作的另一重要贡献。当时只能用土纸出书，但出版界仍尽最大努力，出版各种著作，保持了我国文化传统。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虽用土纸，但印刷精良。中华书局出版了少量的我国古典文史书籍。正中书局为国民党官方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及国民党政治书籍。生活书店及其后的三联书店，出版进步文学、哲学及社会科学书籍。其他中小出版社甚多。

四十个年头过去了，二次大战的硝烟早已随风飘散，但山城重庆的名字，却早已同神圣的抗战事业联系在一起，牢牢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抗战是重庆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周　祖　義

重庆，是中国抗战的陪都，中国政府指挥抗战的中心，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它的名字，和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辉煌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一起，载入史册。

一、重庆，国民政府指挥抗战的中心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两千年彩色绚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但是，日本从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积极扩军，向外侵略。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侵略我国东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又在芦沟桥点燃战火。由于日本的长期准备，战争一开始，它的兵力大大强于中国，骄横气盛。日本的现役军人有三十八万,加上预备役和后备役为二百万人。第一、第二线的补充兵二百四十八万，总共兵力四百四十八万。海军军舰一百九十多万吨。空军飞机二千二百七十余架。我国的总兵力(不包括红军)为一百七十多万，补充兵约五十万。海军军舰十一万吨。空军战斗机三百零五架。虽然陆军有一百八十二个师，除了战时维护治安外，拿到第一线作战的只有八十个师，九个独立师，九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十六个独立旅。

日本的现代工业也远比我国发达，因此日军的武器装备也优于我国。日军按师团编制，一个师团的官兵约二万二千人，马五千八百匹，步骑枪约九千支，轻重机枪六百余挺，各式大炮一百零八门，坦克二十四辆。我国按一九三七年的制编师计，一个师的官兵一万一千人，步骑枪三千八百支，轻重机枪三百二十八挺，各式炮和迫击炮四十六门(其中迫击炮三十门)，掷弹筒二百四十三枚。预定到一九三七年底编制好六十个师，但远远没有完成，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没有经过编制的师，不仅人员少，武器装备更差，战斗力很弱，大多数没有受过现代化作战训练。所以一开战，日军就长驱直入，七月三十日相继占领平津。八月十三日，日本海陆空三军一齐出动进攻上海，虽然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付出了十万的伤亡，但是十一月十三日中国军撤离上海后，日军又分两路直逼南京。十一月十七日，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到重庆领导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率官员登上永丰舰入川，于二十六日到达重庆，并于十二月一日在重庆开始办公。但是国民政府的重心还在武汉。只是在日军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攻陷武汉，蒋介石率统帅部在湖南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后，于十二月八日到了重庆，重庆才真正成了中国政府指挥抗战的中心。

重庆，位于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之中，地形险要，是最理想的抗战大后方。它背靠青藏高原，北东南三面，又为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的大娄山环绕。这些一千至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是绝好的天然屏障。二百零四公里长的三峡，峭壁耸立，滩险流急，这是军事家最忌讳的去处。当年冈村宁次率十一军溯江而上打武汉，在九江碰到了山地，就十分头痛。他说："我认为在三百米以下的高地进击与平地无大差别，超过这一高度则

相当困难”，部队行动不便，通讯联络失灵，坦克大炮拖不动，“战斗很难进展。”“精锐部队……用一天时间才能攻下一个山头”，“突破庐山南麓和鄱阳湖间狭隘阵地，一共费了一个多月。”攻占庐山，冈村宁次不得不借助高射炮。他自我解嘲说，创造了一个古今中外未有过的“异常的战例”。他的一位幕僚请他写字留念，他写下了无可奈何的哀叹：“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九江的山头，比起那云遮雾绕的巫山、大巴山，还只能算是小孩子玩的积木。

与重庆并存的另一个指挥抗战的中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它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袭击敌人据点，破坏交通，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不折不挠的斗争。

中国军的战斗意志越战越强

日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付出了四十万军队的代价，才攻陷武汉。虽然占领了中国半壁江山，但只是点和线而已，广阔的地区还在中国军队手里。而日军占领的点又多被包围，漫长的线又被寸断。并且占日军三分之二的一百多万兵力，已深深陷入战争的泥沼，它一时很难再抽出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了。留在日本本土的仅有一个近卫师团，驻在朝鲜的也只有一个师团，配置在东北虽有关东军八个师团，但苏联在远东有二十八个狙击师和十八个航空兵团，兵力远远超过日本。因此早在日军攻打武汉、广州之前（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日本大本营就作了两手准备：“攻占武汉和广州后，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时，帝国就以它作为一个政权，使之合并于新兴中央政府（指傀儡政权）之下”；“不屈服时，帝国即不急于直接依靠武力解决事变，而要促进新兴中央政权（傀儡政权）的扩大和加强。同时，主要从外交、经济、思想

方面对中国现政府施加压力，以期采取政治及谋略手段使之崩溃。”

冈村宁次很清楚，中国军是主动撤离武汉的，主力没有被打垮。一百多万中国军驻在武汉四周，东南边（苏南、皖南、浙闽）是第三战区顾祝同的二十二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其他特种步队；东北边（皖西、鄂北、豫南）是李宗仁第五战区的二十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特种部队、保安部队；南边（长江以南的鄂南和湖南省）是陈诚（薛岳代）第九战区的五十二个步兵师、特种部队和游击部队。而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两岸的冈村宁次第十一军只有七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处于这种不利态势，冈村宁次如坐针毡。他后来回忆说："四周的敌人重新作了休整训练，特别是以武汉为中心在长江南北地区大肆活动。我军如果只固守中央阵地而无所事事，则有可能招来难以应付的被动局面。"冈村宁次还认为，"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部队。"所以，冈村宁次打击的矛头，对准蒋氏的嫡系中央军。重庆统帅部发动一九三九年春季攻势中，兵力集结最多的是第九战区的南昌外围和第五战区的鄂北随、枣一带，对武汉日军造成极大的威胁。侵华日军乃发动南昌战役和随、枣战役，妄图围歼这两个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中国军队凭借有利的地形，不断打击和消耗日军。日军的攻势受挫，目的没有达到。

冈村宁次仍不死心，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下旬，调动十万兵力攻击长沙的中国军队，发动第一次长沙战役。湖北日军盲目深入，中国军队按预定计划利用阵地逐次阻击转移，把重兵置于两翼。当日军锐气挫尽，中国军队突起侧击，将日军包围，激战三昼夜，重创日军。日军向北突围，中国军队分头追击，十月八日

恢复汨罗江、新墙河各阵地。

自上海、天津、福州、广州等沿海口岸相继沦陷后，南宁至越南海防是我国唯一的对外交通线。日本认为它是我国进口战略物资的主要通道，企图切断它，以破坏我国战斗力的恢复和增长。于是，日本集结海陆空军十余万人，航空母舰两艘，舰艇五十余艘及飞机百余架，在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在钦州湾登陆，通过十万大山，偷渡郁江，二十四日攻陷南宁。

中国军队为反攻南宁，集结十五万兵力，以杜聿明的第五军作为昆仑关的主攻部队。第五军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武器装备和日军相等。这时，日军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的十二旅团已侵占昆仑关，十二月十八日凌晨，第五军以重炮猛轰昆仑关周围日军阵地；夜间，中国军队在坦克掩护下夜袭，日军施放毒气，展开肉搏。中国军队以猛烈攻势压倒日军，收复昆仑关。日军赶紧增援，又占昆仑关。第五军再度反攻昆仑关，同时以邱清泉的新编二十二师切断南宁至昆仑关的公路，昆仑关的日军被围，弹尽粮绝，增援部队被阻击，激战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军终于克复昆仑关。

战后，日本公布昆仑关战役阵亡士兵四千余人，班长以上军官阵亡百分之八十五。阵亡的指挥官有中村少将、四十二联队长坂田元一、二十一联队长三木吉之助、二十一联队副队长生田滕一、第一大队长杵平作、第二大队长宫本得、第三大队长森本宫。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日军以近卫师团和台湾旅团固守南宁周围阵地，以第五师团余部沿邕龙公路攻打龙州。七月二日，占龙州，被中国军队围攻。至十一月十七日，桂南日军全部被驱逐

出境。

日军深陷在广阔的中国战场上，兵力不敷分配。重庆国民政府曾于一九三九年发动冬季攻势，全面出击。统帅部将直辖的整训部队，分别加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各战区的序列，担任反攻主力。第一、第四、第八、鲁苏、冀察各战区，以现有兵力对敌佯攻牵制，使敌不能转调兵力，互相增援。

中国军北自包头，南到昆仑关，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反攻，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底止，奋战一百多天，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中国军这次大规模反攻，震惊了日本。冈村宁次说："关于敌人的冬季攻势，天皇陛下曾有训示赐与参谋总长及军令部长。在接获这一内容的来电后，（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军司令部全体举行了奉读仪式。这时，我才得知敌人的冬季攻势已引起圣上虑念，并使中央不安。"

这个侵略中国的日军主将冈村宁次，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转任军事参议官，三月十七日对各兵团长告别回日本，致词时不禁泪下。他忧伤地说："唯一的遗憾未能摧毁敌人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

中国军队的冬季大反攻给武汉日军压力最大，特别是中国军队进入大洪、桐柏山区后，就不仅是威胁着武汉，连江汉平原这个粮仓也难保。于是，日军决定攻打枣阳、宜昌，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发动枣宜战役，六月八日六路日军攻陷枣阳。坚守枣阳的中国军队第一七三师师长钟毅以身殉国。

五月十日，六路日军的六个师团被中国军包围在枣阳以南，伤亡惨重，于十一日晚沿襄河南撤，又被第三十三集团军拦击。总司令张自忠亲率特务营和七十四师在襄阳南瓜店堵截，紧紧咬

住，造成超越追击，不幸负伤，于五月十六日中午壮烈殉国。

日军占领宜昌后，截断了四川和湖南间的水路运输，两湖的粮食不能西运，对重庆的压力很大。中国军队依山坚守，给宜昌日军以很大威胁。

日本急于解决中日战争，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至六月上旬，连续发动豫南、上高、晋南战役，均未得逞，计划成为泡影。

一九四一年夏，美日开始谈判，日本企图通过外交途径，阻止美国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为了增加谈判的砝码，日本大本营要求中国派遣军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出动兵舰二十余艘，汽艇百余只，飞机百余架，总兵力共十二万，由十一军司令官阿南维畿指挥这次战役。另外征集民伕十余万，民船六百条。

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国投入的兵力达二十余万，大获全胜，日本近卫内阁因此下台，东条上台执政。日本原想以胜利之威增加谈判桌上的要价，结果因长沙战役失败，美国态度更加强硬，日本的阴谋破产。

重庆在狂轰滥炸中巍然屹立

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施加的另一个军事压力，就是对中国后方的狂轰滥炸，以动摇中国的战斗意志，破坏经济，扰乱治安，妄图迫使中国屈服。

从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日机轰炸重庆、兰州，其中以三十六架重轰炸机把兰州的中心繁荣地带夷为平地。这远距离的试探性攻击获得成功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轰炸，不仅遍及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各省的军略要地外，许多中心城镇亦不能幸免。四川的宜宾就挨了一千多枚炸弹。但

是轰炸的重点是重庆。

重庆遭受轰炸损失最严重的，是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三日和四日两天，那时防空洞尚未充分挖好，又缺乏空军迎战，高射炮的数量也不多。一百多架敌机，第一天就丢下一、二百个重五百磅的炸弹。第二天的轰炸，还夹杂着燃烧弹，整个重庆淹没在火海之中。自来水管被炸断，无水救火，房屋毁了一千多幢，八千多人伤亡。五月九日，日机以“疲劳轰炸”来折磨、困扰、瘫痪中国的抗战中枢。日机分成数十批轮流入侵，警报长达五天六夜。疲劳轰炸最长的是其后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次，达七昼夜之久，日机出动一千多架次，空袭时间加起来是一百五十小时。总计一九三九年这一年，中国后方各地被空袭二千六百多次。

一九四〇年，重庆被炸得比较厉害的是五月二十六日和六月十一日，来袭的日机都在一百架以上。八月十九、二十日这两天，重庆市区遭到惨炸，人心惶惶不安。九月六日，国民政府命令，正式定重庆为陪都，以安民心，坚定抗战大业。

一九四一年夏天（六月五日夜间），日机空袭重庆酿成五里长的公共防空洞近万人窒息死亡的大惨案。原因是空袭时间长，防空洞内的避难者因人多而空气稀薄，守门卫兵又把洞口的铁栏关上。这一年日机空袭川、甘、陕、滇、黔、湘、桂各省达一千八百七十八次，出动飞机一万二千三百余架次，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尤以四川最为严重，其中重庆的损失最巨。

日机如此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主要是中国空军力量薄弱。抗战前，日本拥有的飞机远远超过中国，并且中国不能制造飞机，而日本可以年产八百架。开战三个月后，中国空军协助华北陆军、华南海军及京沪地区作战，飞机损失殆尽。

一九三八年，中国向苏联、英国购买了轰炸机八十八架，战

斗机二百三十二架，而日军在华的飞机为五百五十架，仍占优势。这一年，中国飞机出击二千零十六架次，击落和炸毁日机一百七十二架，炸沉日舰艇二十三艘。中国飞机损失一百九十七架。

一九三九年，日军企图以“政略轰炸”，屈服重庆国民政府，在华经常保持飞机九百架左右。中国年初只有飞机一百七十四架，陆续购买到一百三十七架，共三百一十一架，但实际上可用的飞机只有一半。日机保持了绝对优势，照旧狂轰滥炸中国后方城镇。中国飞机只是偶而出击，全年击落和炸毁日机一百一十多架，中国飞机损失五十四架。

一九四〇年，日机继续大轰炸，在华的飞机达一千余架。中国没有得到新机补充，修复损伤的旧机，只有一百五十二架，加上飞机性能落后，每次空战击落日机不超过四架。九月十三日，中国战斗机在璧山上空集合，不意被隐蔽在高空的日机袭击，二十分钟的空战，中国飞机损失二十四架。自此之后，中国空军已没有大规模进行空战的能力了。日机有绝对的制空权，便肆无忌惮地大肆轰炸中国后方。

一九四一年，在华的日机仍然超过一千架。九月以后，日本准备进攻南洋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华日机抽走了一部分，但仍有九百架左右。中国购得苏联轰炸机一百架，战斗机一百五十架，连同旧机约二百八十架，在东飞转移机场时不断受损失，实有飞机二百五十架。飞机性能和以前一样劣于日机。三月十四日，日机空袭成都，中国飞机起飞三十架迎战，被击落一半。从此，中国飞机避免决战。六月，中国购得美国飞机一百架，拨给八月一日成立的陈纳德领导的美国空军志愿队使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昆明首次与日机空战，获得了胜利。

一九四二年，在华日机因太平洋战事大批调走，只保留二百七十架左右。虽然日本驻缅甸、泰国、越南的四百架飞机，不时骚扰中国西南，但是，中国空军已大大加强，制空权开始逐渐逆转。年初，中国购得苏联飞机一百零八架。八月至年底，获得美国A29型轰炸机十九架，P40型战斗机二十七架，P43型四十一架，P66型八十一架，共二百七十六架，数量上和质量上开始超过日本。这一年，只有少数零星日机侵扰中国后方，但是，一遇到中国飞机拦截，日机便望风遁逃。日机的“政略轰炸”开始破产！重庆——中国政府抗战指挥中心依旧巍然屹立，没有被炸垮。相反，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掌握制空权后，不仅在中国战场袭击日军，寻找日机决战，还远征日本，轰炸日本本土，轰炸满洲工业基地和日本至南洋的海上交通线。日本感到巨大威胁，专门命令陆军发动几次战役，破坏中国飞机起飞轰炸日本的机场。但没能实现，日本就投降了。

挫败日本的外交攻势

通过外交途径，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和阻挠友邦援华，是日寇迫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要手段。

（一） 窒息不了重庆的国际交通线

日军封锁了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沿海港口后，重庆对外的交通线只剩下三条。它们十分重要，可以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如猪鬃、桐油（可作涂料和绝缘材料）、锡、钨砂等，以争取外汇，购回军需和建设的物资，增强国力，支持抗战。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一九四〇年推断，每月中国进口的补给品，越南路线一万五千吨，滇缅路一万吨，来自苏联的西北路线五百吨，偷越日本海军封锁而运抵中国沿海的七千五百吨，总共每月约三万三

千吨以上。

占输入量三分之一的越南线，原有一条滇越铁路，海外物资从海防港上岸，由列车可以运达昆明。但是，从昆明到陪都重庆和到达前线要地，路途遥远，又为崇山峻岭所阻，远水不解近渴。因此，大多数物资从海防港由铁路经河内、谅山到同登，然后以卡车接运，经南宁转内地。日本政府趁德军浩浩荡荡开进巴黎，法国行将投降之际，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向法国驻日本大使安里提出抗议，不准军用物资经越南输入中国。日本还要派监视团实地监督。二十日，法国被威迫接受了这个要求，封闭滇越铁路，由同登经南宁转内地的公路运输也中断。日本派出以西原一策少将为团长的监视团四十人到达河内，进行监督。

滇越铁路停运四天后(二十四日)，日本要求英国封锁滇缅公路，禁止军用物资输入中国。那时英军大败，从法国敦刻尔克撤退，德国扬言强渡英吉利海峡，英国岌岌可危，既不敢顶日本，又不愿直接得罪中国，便通过新加坡的广播说，英国“正为解决中日问题而努力，并避免助长战争之行动。”

对于英国貌似公允，实则贻害中国的言行，七月十六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警告英国：“如果以滇缅路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即无异英国帮助日本，迫中国对日屈服，其结果必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牺牲英国在远东之地位……如英国果有此种行动，余可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不测祸害。如英国视为停止滇缅路运输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美国国务院挽救滇缅路的危机。美国务院告诉胡适：“正考虑有效之挽救办法。”但是，“英国为本身生死存亡斗争的时候，不能顾及对中国的义务。”(邱吉尔语）十七日，英

国政府宣布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美国关切世界各地通商大道开放，并认为关闭滇缅路对世界商业是不当的阻碍。

滇缅路关闭后，中国对外交通只剩下西北的中苏间的甘新公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全力抵抗，已自顾不暇。十月四日，苏联通知停止援华。

在这期间，中国不断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开放滇缅路。加上英国后来看到美国采取强硬手段，制裁日本，也就不顾日本的一再强求，于十月十八日重新开放滇缅路。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入侵缅甸，四月二日滇缅路被截断。但是，由于中国外交的成功，和中英美并肩对日作战，六天后（八日），中国空军由印度利多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成功，汽油等军用物资源源输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中美英三方共同自印度利多修筑的中印公路，一日三班昼夜赶工，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首次通车，首批车队五百辆满载物资于二月四日抵达昆明。口径为四英寸的输油管也告建成。

日本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切断中国国际交通线，屈服重庆国民政府的迷梦破产了。

（二） 日本阻扰友邦援华的阴谋破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向外相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寻求解决中日战争的途径。日本参谋本部从战略考虑，很赞成这个主张，切断了援蒋的西北路线，可以导致解决中日战争。改组后的日本外务省，不同意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而同意缔结日苏中立条约。一九四〇年七月，东乡茂德大使向苏联提出缔约。因为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和苏联订

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中国抗战，所以对于日本要求苏联停止援助重庆国民政府的问题，不予理睬。日本没有达到目的。

日本进行外交的主要对象是美国。战争初起的时候，美国严守中立主义。这个中立主义，是首届总统华盛顿提出来的。第三届总统杰弗逊在就职演说中，进一步宣布美国"不与任何国家缔结纠缠的同盟"。中国把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作为外交的重点，经过宋子文、胡适、宋美龄等人的努力，美国总统罗斯福逐渐同情中国抗战，使美国逐渐摆脱中立主义，不断给予贷款。一九三九年一月，美国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中国以桐油偿还。一九四〇年四月，再给中国贷款二千万美元，以云南的锡偿还。

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国国会通过《军火租借法案》，中国也享有该项法案的权利。这一法案，原系邱吉尔要求美国无偿提供军火所制订的。与此同时，美国从经济上逐渐加强对日本的制裁。虽然，美日于一九一一年订有通商航海条约，但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开始，美国禁止向日本输出飞机和器材。二月，美国禁止对日信用贷款。七月二十六日，美国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对日本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不仅妨碍它对华战争，还关系着它的经济崩溃和国家的存亡，因为日本大部分的战略物资都来自美国。日本面临这严峻的时刻，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用与罗斯福总统结识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进行日美谈判，阻止美国援华，以迫使中国屈服。一九四一年四月开始谈判，日本提出了日美谅解方案，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四项原则，双方的条件差距很大，未达成协议。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提出最后提案，遭到美国的拒绝。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宋美龄在电台对美国广播，呼吁美

国不要轻率地和日本妥协。因为当时美国国务院有不少人主张与日本缔结临时协定，以争取对日作战的准备时间。罗斯福受此影响，倾向作三个月至六个月的临时协定。十一月二十二日，赫尔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出示临时协定草案，胡适即报告蒋介石，蒋氏复电指示，严正反对美日签订临时协定。认为美国若与日本妥协，“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

蒋介石并电在美的宋子文，向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转达：“任何放松对日经济压迫的措施，都将严重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蒋氏又电邱吉尔，要求他严正反对美日签订临时协定。邱吉尔致电罗斯福说：“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重庆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活动结果，美国终于放弃签订临时协定的打算。二十六日夜晚，美国提出强硬的“和平方案”，即赫尔备忘录。美国承诺了中国取得完全平等的国际地位，要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撤退和否定了汪伪政权。而且不仅“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乃至中华民国建国前列强侵略的所有的问题，都要作根本解决。日本企图通过外交手段，阻扰友邦援华，以迫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阴谋遂告破产。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胜利！

挫败日本的政略进攻

日本占领武汉后，被迫改变了征服中国的方针，认为“仅依靠进攻作战，决难解决事变，今后应重视政略进攻，培植和加强伪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衰落”（见《日军在中国作战纪录》）。

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在重庆办公，就碰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出现，这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

多诚一少将泡制的傀儡政权。国民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在日本军队占领之北平或其他地方发现任何伪政治组织，皆为日本侵犯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为，对内对外当然无效。"

重庆国民政府更明令通缉傀儡政权的头目王克敏、汤尔和、董康、江朝宗、高凌霨、王揖唐、朱深、齐燮元等人。通缉令说："凡在日军非法占领区域，甘心附敌，参加伪组织者，决按汉奸罪条例查明通缉严办。"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本又在南京扶植汉奸梁鸿志等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发表宣言，义正辞严，揭露日本的险恶用心，声讨汉奸之无耻行径。

日本看到王克敏、梁鸿志等组织的傀儡政府，没有起到日本所期望的作用，企图物色"中国第一流人物"另组傀儡政权。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又是"抗战必败"论者，就成为日本网罗的对象。

经过日本与汪精卫的秘密勾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携妻子陈璧君及曾仲鸣、周佛海等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十二月二十九日给国民党中央发出"艳电"，劝国民党与日本和谈，"共同防共"。

一九三九年元旦，国民党召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重庆和大后方的人民纷纷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的罪行，各地报纸强烈申斥汪逆的无耻。六月八日，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九月十五日，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

成立伪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早在汪精卫发表“还都典礼”宣言的时候（三月二十三日），照会各国驻华使节：“日本所捏造的南京伪组织完全无效。”并明令通缉汪政府的陈公博等七十七人。

经过重庆国民政府与各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系列的斗争，尽管汪记的傀儡政权在南京成立了，但十分孤立，就连在重庆原来是汪系的人都没有一个脱离重庆国民政府，追随他去当汉奸的。

日本对重庆的政略进攻，卵育了汪伪政权，并没有达到使重庆国民政府和抗日阵线崩溃、衰败的目的。

二、重庆，二次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

在赫尔提出强硬的和平方案当天，由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联合舰队机动部队，从南千岛群岛的择捉岛单冠港悄悄出发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一时（中国时间），日本海军袭击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击沉主力舰四艘，重伤四艘，击毁击伤飞机二百三十架。同时，威克岛、关岛、马尼拉、新加坡、香港也遭受日本空军的攻击。英国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却敌号沉没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

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召见美、英、苏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决不避任何牺牲，与各友邦共同作战，促使德意日轴心国家崩溃。

十二月九日下午七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对德意两国处于战争状态。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中日战争的质变。“七七”事变到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进行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把亚洲的战争和欧洲的战争联结在一起。中国参加了世界民主阵营反对德意日轴心国，进行的是反法西斯战争。

从此以后，中国的对日战争就不是孤立的了，而是纳入了世界大战的范畴，受世界大战的制约。

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中国对德意日宣战的当天(十二月九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中国坚持抗战四年半重申敬意，并呼吁共同努力打倒日本。

十一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提议在反轴心国的各国间组织联合军事会议。蒋氏并于十日、十一日两次邀请美、英等国大使及武官，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并请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麦格鲁准将，电告罗斯福提出四点建议。罗斯福接受这一建议，十六日复电蒋介石，建议中国于十二月十七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南亚战区最有效的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盟国。

邱吉尔也复电赞成组织联合军事会议，斯大林表示一时不能对日宣战。他说："苏联现负对德抗战的主要任务，苏联的胜利即系英、美、中国对轴心集团的共同胜利。本人认为苏联目前不宜将力量分散于远东。"因此，苏联未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

十二月二十三日，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的有美国代表勃里德，英国代表是印度军总司令魏非尔。

中、美、英三国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创举！

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的同时，邱吉尔与罗斯福在华盛顿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起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十二月二十五日，罗斯福和邱吉尔拟订《联合国宣言》，于一九四二年元旦发表。加盟的共有二十六个国家，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其余二十二国则按国名字母依次签署。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中国签字后，罗斯福对他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我国各民族浴血抗战四年半，不惜巨大牺牲，无比英勇抗击凶猛而残暴的日军所赢得的崇高荣誉。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担任中国、泰国、越南地区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设在重庆，这是重庆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

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独立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和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一日，英国政府三次公开声明：一俟远东敌对行为结束，英国即和中国谈判，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其他在华的特权。美国也两次发表这样的声明。

美国建议美英两国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九日同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约见中国大使，用绝对机密的口头方式，告诉几个月以来，美英会商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经过。

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上午十时（中国时间是十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向中国大使魏道明宣读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的文告，然后将它交给魏道明。美国最高法院院长为中华民国国庆节，在费勒得斐亚独立厅前发表最亲切的祝词，并鸣自由

钟三十一响。

蒋介石十月十日下午四时（重庆时间），在重庆“精神堡垒”（今解放碑）广场检阅青年团及国民兵时，宣布美英两国自动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蒋介石并勉励国人说：“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重庆各报出了号外，全市群情欢腾。这一喜讯传出，也使全国同胞精神为之一振。

当天，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表示感谢，说全中国国民都因美国这一行动欢欣鼓舞，费城独立厅自由钟为祝福中华民国国庆日而敲响，更使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亲善友好有共鸣感觉。这些献礼对于中国军民继续抗战的鼓励，是没有其他任何事物可以相提并论的。罗斯福复电说：“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是美国政府及我个人多年的心愿。……中国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斗令人敬佩。”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宋子文在重庆和美英两国分别谈判新约。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平等新约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在重庆签字。第二天(十二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又宣布了这一喜讯。

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是中华各民族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结果。重庆，作为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中国独立的地方，是值得自豪的。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了同盟国中国战区的组成部分，设在重庆的中国战区统帅部指挥的中国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

（一） 同盟国中国战区的第一次胜利

中国对日宣战的当天(十二月九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各战区发动全面游击战，牵制日军，不让它去逐利南洋。并令第四战区攻击广州方面的日军，策应英军守卫香港。同时调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入缅作战。守御武汉的日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维畿，为了策应华南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进攻香港及南方作战，遂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阿南维畿率十二万日军（由华北调来第九独立混成旅团），企图一举打通粤汉线。结果遭到中国军的围歼，日军伤亡惨重，败回临湘、岳阳原防。

这次长沙战役，是珍珠港后同盟国在太平洋一连串失败中，第一次获得的胜利。英美舆论纷纷赞扬，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二）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的战果

由仰光北上到云南昆明的滇缅路，每月运送两万吨军用物资，是我国最大的补给线，日军力图切断它。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饭田祥二郎中将率领的十五军，越过泰国，侵入缅甸，英国要求中国政府派兵援助。中国派罗卓英率领由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的远征军，从云南南下驰援，由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

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半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壮烈牺牲，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日军在缅甸的四个师团，减轻了其他地区盟军的压力，并使日军不敢贸然进犯印度，同盟国赢得时间准备反攻。

这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也叫滇缅路作战。第二次叫缅北作战。中国自一九四三年春便积极准备，逐步加强我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兵力，争取盟军在印缅作战的共同胜利，并打通了中印公路。

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历时一年半，牵制日军三个师团，策应英、印军作战，克服缅北大小城镇五十多个，攻击线路长达一千五百余英里，占领公路六百四十六英里，铁路一百六十英里，收复日军占领土地五万平方英里，缴获步枪机枪九千六百五十四支，各种大炮四百零九门，坦克二十六辆，飞机两架，汽车八百六十一辆，火车四百七十二节，马六百六十匹。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收复缅甸，粉碎了日、德会师中东的企图。

（三） 中国夺得了制空权

一九四二年八月底，中国空军得到美国供应的新式飞机A-29型轰炸机十九架，P-40型战斗机二十七架，P-43型四十架，P-66型八十一架，加上年初从苏联购得飞机一百零八架，空军新增飞机二百七十五架，数量上和质量上超过日本，制空权开始逆转。这一年，仅少数日机零星侵扰我后方，遇到中国飞机拦截，便望风而逃。

一九四三年，中国空军换用美国飞机，大大加强了战斗力。本年度日军在华飞机三百五十架，七月末，又调来飞机四百多架，发动所谓“航空决战攻势”。经中美空军协同反击，敌机损失惨重，不到十天就全部溃败。一九四三年秋季以后，中美空军联合远征日本本土，猛烈轰炸。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于十一月开始作战起，至年底止，共出动二百一十五架次，击落敌机四十一架，炸沉敌舰船五艘。

一九四四年，在华日机约五百架，于四月间发动攻势，被中

美空军袭击，损失惨重。本年度中美空军占绝对优势，广泛出击。

一九四五年，中国空军有战斗大队四个，轰炸大队三个，侦察中队一个，参与作战的飞机约四百余架。从一月起到日本宣布投降的七个半月，中美空军联合出动飞机八千二百六十七架次，为抗战以来各年的最高纪录。

（四） 日军“一号作战方案”的破产

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侵华日军拟就了“一号作战方案”。企图：(一)毁灭中国西南空军基地，避免中美空军空袭日本本土。(二)打通大陆铁路线，确保南洋方面军的陆上交通。(三)摧毁中国军继续抗战的意志。

为了发动“一号作战”，日本国内大动员，大肆征兵，编成了十四个步兵旅团、七个野战补充队（相当步兵联队）。另外，还从东北抽调关东军和国内兵力来增强“一号作战”。

日军用十六万兵力首先进攻河南；其后，战争在湖南进行。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日本资料统计，仅进攻衡阳时，日军就伤亡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人，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虽然大陆交通线被日军打通了，但始终没有全线通车。中国的抗战意志越来越坚强，日军的“一号作战方案”宣告破产，例如日军明知芷江飞机场起飞的飞机不断轰炸日本，也无可奈何。

日 本 投 降

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急遽下降，一九四五年初夏中国军开始大反攻。

从昆明编训装备的新军，源源开进广西。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于四月二十七日展开攻势，五月二十七日收复南宁，追击紧急

北逃的日军。汤恩伯指挥的第三方面军，五月十九日攻克河池，六月十四日克复宜山。第二、第三方面军协同作战，六月二十九日攻进柳州，七月二十八日收复桂林。第九战区收复湖南永兴、新宁，江西的信丰、大庾、南康、赣州、宜丰、上高。第三战区收复福建长汀、连江，浙江的永嘉。第七战区收复广东化县、南雄。第一战区收复河南内乡。第十战区收复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

在中国军节节胜利之际，八月六日，美国B-29飞机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九日，长崎挨了第二颗原子弹。苏联又分三路攻入东北。八月十四日，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八月十五日，中、美、英、苏正式宣布，接受日本投降。八月二十一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代表今井武夫等飞抵芷江，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洽投降。九月二日上午十时，日本投降典礼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军舰上举行。首先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及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九国代表依次签字。九月三日，联合国各国一致庆祝“胜利日”。

悼念张自忠将军

编者按：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一九四〇年五月，他奉命率部截击日寇，与数倍之敌血战于湖北宜城南瓜店，壮烈牺牲，葬于重庆北碚梅花山。今值张自忠将军殉国四十五周年，本刊特辑录当年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张自忠将军生前友好撰写的悼念诗词，以资纪念。

挽　　联

朱　德　彭德怀

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
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贵在朝野团结图存。

吊荩忱将军

董必武

今岁中原战役，倭势仍张，国军竟莫能抗，感时抚事，辄令人想念将军于不置也。民纪卅三年九月

男儿抗日死沙场，青史名垂姓字香。
中原倘有英灵护，争让倭奴乱逞狂。

题　　词

郭沫若

云山贵乎惇惇之嘉名，以修能重其内美，自有取舍进退之权衡。曾举世非之，而未尝加阻；纵举世誉之，亦何所溢乎其风声！日月失其耀，雷霆失其鸣，泰岱失其高，金石失其贞，更何有于雕虫小技之营营！余惟知寇犹未灭，毅魄必常附旗旌，直向目标迈进，偕国旗而永生。

荩忱将军千古

民纪卅年六月廿日

郭沫若　赞

诔　　辞

于右任

其立志也坚，

其志行也烈，

初啮齿于危疆，

终受命于前敌，

身死功成，

永为民族之光荣，

是军人之圭臬。

悼张自忠将军

冯玉祥

古时有张巡，忠胆义照人，

民国张自忠，抗战大将军。

受伤不后退，忠勇更坚贞，
倭寇每闻名，丧胆又落魂。
集团三十三，世界久闻名，
同盟五十国，将军第一人。
日本已投降，缴械很驯顺，
台湾五十年，回来靠美军。
东北十四军，回来尽良民，
父老和兄弟，加倍又相亲。
所以能如此，皆由吾国能振奋，
振奋大表现，将军能献身，
还吾山河成大功。

挽　诗

张治中

裹革沙场骨尚温，捐糜顶踵为生存。
黄河浩荡流奇气，襄水斑烂洒血痕。
风雨中原恢汉土，衣冠此日认黄孙。
忠贞已足昭千载，我欲狂歌民族魂。

满　江　红

邵力子

澒洞烽烟，听鼙鼓，声声未歇。惆怅忆，将军百战，死绥壮烈。叱咤恍闻戈指日，光明共见心如月。叹中原、父老望旌旗，同悲切。

寇患亟，仇待血；殁犹视，恨未灭！问谁能忍恝，金瓯残缺。

黄土萋萋宿草泪，沙场汩汩军人血。是丈夫、皆应继风徽，收京阙。

挽诗二首

张群

百战山河鼙鼓哀，前军忽报七星颓。
勋名一代高铜柱，哀诔千秋纪骨台。
裹革终酬新息愿，筹边未尽赞皇才。
摩笄更有房敖侣，会驾云车杀敌来。

疆圻敭历矢孤忠，危局撑撑见苦衷。
保障襄樊功最懋，策勋耿邓事难同。
岘山泪坠穹碑在，海澨魂归甲帐空。
料得九京难瞑目，及身未得靚平戎。

挽诗

孙科

将军百战奋雄师，犹记当年极盛时。
胜敌早标喜峰口，铭勋今见岘山碑。
精忠不朽辉青史，灵爽还看照大旗。
部曲痛传南店事，载瞻遗象使人悲。

诔辞

李济深

原野尘飞，烽火湘楚，
大军四临，聚歼丑虏。

沙虫委化，狼豕奔突，
公怒益张，轻骑追逐。
劲弩千钧，伤于腐鼠，
马革尸还，万流同哭。
金石褒忠，缥湘纪武，
烈烈威灵，永垂千古。

挽　　诗

程　潜

忍辱丹心苦，奇才绝等夷，孟明辞晋日，随会渡河时。直圣神灵痛，终酬国士知，郑州临别语，披沥释群疑。一战摧强虏，徐淮服姓名，韬铃追颇牧，勇毅迈宫彭。唾手无三岛，盟心属九京，裹尸还葬耳，此语熟平生。江汉波胜沸，将军气不挠，还营盛袖血，入阵佩靴刀。蕲水收功捷，天门积甲高，兵多非所贵，制胜有龙韬。荆襄南纪重，熊虎恃当关，但使传峰静，庸辞溅血殷。胆涂蚡冒土，星陨鹿门山，他日丰碑下，行人涕泪潸。临风酬一戬，倍觉意辛酸，信士来君叔，奇男韦孝宽。交期泉路尽，壮烈古人看，万里云天黯，招魂托羽翰。

挽　　诗

陈铭枢

昔有张睢阳，死难何忠烈，至今读唐书，犹觉肝肠热。遥遥千载后，将军相继起，搏敌十百次，转战千万里。每战必居士卒先，冲锋陷阵勇难拟。一战勍敌覆，再战名城归，三战四战功巍巍。方谓匡复功，将由将军建，振旅入金陵，策动颁铁券，耻令越甲鸣，竟免先轸胄。孤提一旅薄敌营，十荡十决挺身斗，敌兵敌将

簇如云，锋刃咸指张将军。矢尽援绝敌益悍，将军犹复创裹誓，众浴血交锋，一以当千杀敌至无算。天日为凄悲，鬼神为警欢，寡众不敌卒成仁，敌众罗拜称神人。大将慷慨捐躯此巨擘，永为抗战史上之伟绩，香花千古祀英雄，巍峨铜象矗山春。

张上将自忠殉国三周年纪念歌

陶行知

一、招魂

巍巍上将，正气之英。

一年一度，招公之灵。

灵之所悦，三杯水情。

魂兮归来，永住我心。

二、感功

纪公之功，保障喜峰。

血战临沂，出没犹龙。

台儿庄前，溃敌西东。

襄樊震敌，群唤关公。

三、明德

颂公之德，精忠报国。

甘苦与共，拚先士卒。

纪律严明，以身作则。

取义成仁，提高国格。

四、送神

小我肯死，国族乃生。

收复山河，胜利是争。

鸭绿江边，期慰公灵。

自由幸福，中华长存。

挽　　诗

田　汉

从北碚归渝过双柏树，陶行知先生从车窗指点张荩忱将军埋骨处，感而成此以志敬悼。

柳江热泪尚沾襟，[1] 又见元戎哭荩忱。
纵马不辞临敌险，　拔刀犹念受恩深。[2]
以身为弹军人份，　和血吞牙国士心。
又过北碚双柏树，　羡他黄土覆真金。

诔　　辞

周谷城

杀贼救国，敌忾同伸，
将军战死，民族永生。
抚今思昔，应念典型，
史增新页，为写殊功。

挽　　诗

兰可桢

烽烟忆昔起芦沟，欲扫欃枪据上游。
伯约宁意亡汉耻，鸱夷誓雪沼吴仇。

---

① 宾阳之役，第九军郑作民将军死亡，舆榇至柳州中山公园公祭，予偕陈石经将军等祭之，令抗剧九队唱挽歌，情绪悲壮，不觉泪下。

② 豫鄂之战，荩忱将军率部追敌，遇其反斗，受伤不退，自午迄来，愈来愈勇。及胸部中弹，乃拔委员长所赠短剑欲自裁，为副官所夺，慨然告左右谓对国家民族、对长官、对自己良心，都得安慰，愿大家努力杀敌云。

至今战士长埋骨，自古将军只顾头。
故垒阴森凭吊处，萧萧风雨汉江秋。

荩忱上将殉国难三年矣防次追怀案诗代哭

冯治安

百战摧强敌，威名薄海知。
精忠期报国，大义重攘夷。
蓟北金城固，淮南玉帐奇。
痛心枭毁室，立愿豹留皮。
壮士皆明耻，将军竞死绥。
襄樊思伟烈，韩岳仰英规。
共喋鸡坛血，先归马革尸。
张骞争寸土，酬酒奠崇祠。
继志原吾事，收京在此时。
肺肝如可语，涕泪不徒垂。
廿载同舟感，三年宿草悲。
所求无愧怍，遥寄一篇诗。

挽　诗

何基沣

横戈若战汉江浔，取义成仁是本心。
日贯长虹饮壮烈，风摧大树感萧森。
帐中韬略劳亲授，匣里遗规忍重寻。
遥向墓门酬杯酒，杜鹃声里泪沾襟。

挽　诗

张克侠

昔年单骑出重围，卷土仍挥上将旗。
一战沂徐寒贼胆，长驱随枣振军威。
睢阳誓死魂为厉，先轸如生元得归。
此日中原遗憾在，愿凭精爽茯戎衣。

梅花山上吊英烈

——纪念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殉国四十五周年

朱敬平　杨耀健

暮春时节，杂花生树，飞鸟穿林，著名的北碚风景区更显得绮丽多姿。梅花山麓，从早上起，人流、车辆就源源而来。今天——五日十六日，是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殉国四十五周年，重庆市各界人士将在这里集会隆重纪念。

张自忠将军的陵墓耸立在茂林修竹之中，庄严肃穆。陵园上空横挂着"纪念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殉国四十五周年"的横幅，墓碑前安放着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率孙辈等敬献的花圈。墓的两侧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重庆市、北碚区党、政机关等单位和张将军的旧部送的花圈。

上午九时半，举行纪念仪式。与会数百人面对张将军墓三鞠躬，深表悼念之情，接着由亲属开始分别敬献花圈。常年打扫烈士陵园的梅花山小学少先队张自忠中队和朝阳小学少先队，敲着队鼓，吹着铜号，齐声朗诵了缅怀张自忠将军的悼诗。祖国新一代决心继承先烈遗志的朗朗誓词，回荡在松涛群山之间。各方面的代表和张将军的亲属在纪念会上致词，缅怀张将军的英雄业绩。

八十七岁高龄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鲁崇义，曾同张将军共事多年，他在讲话中指出，

张将军一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的一生是忠心爱国的一生，是廉洁奉公的一生。张将军在抗日战争中创建的业绩，震惊中外。鲁崇义说，支持张将军爱国行动的，就是他经常讲的，“只有国仇，没有自己，只有牺牲，才能救亡。”鲁崇义说，我们今天纪念张将军，就是要学习他为国家、为民族死而后已的精神，要以这种精神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纪念仪式结束后，参加纪念会的各界人士参观了新建的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面对展出的近两百幅有关张自忠将军生平的图片和资料，一些老同志深有感受地说，仿佛又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又见到了敬爱的张自忠将军。四十五年前的今天，正当大半个中国沦陷于日寇之手，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湖北宜城前线指挥作战的张自忠将军受伤不退，冲锋不止，最后以身殉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正气歌。

张自忠将军字荩忱，一八九一年出生在山东临清县，在临清高等小学堂毕业后，先后到天津和济南法政专门学校继续求学。其时我国国势积弱，内忧外患连绵不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横行无忌，激起了张自忠救国雪耻，奋发图强的决心。他认为只有投军，才能报国，乃于一九一四年秋投笔从戎。

他先在陆军二十镇车震部当兵，后来经车震介绍到冯玉祥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军官学校校长等职务，参加过国民军起义及北伐诸战役。一九二九年北伐军会师北平，彻底铲除了北洋军阀，张自忠被擢升为二十五师师长。那时部队粮饷衣物均缺，张自忠在此艰苦环境下，寝不解衣，食不分饮，与士卒共甘苦，因而深得兵心。他知人善任，信赏必罚，严格要求，

严格训练，将所部操成一支善战的劲旅。

一九三一年，日寇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委屈求全，致使东北藩篱尽撤，平津危殆。时张自忠隶二十九军，任三十八师师长，尝以收复河山勉励所部。日军继而进犯华北，并将国民政府派驻北平的嫡系何应钦等部逼出平津，气焰十分嚣张。

此时，二十九军奉命进驻华北，处境十分险恶。张自忠临危不惧，反而摩拳擦掌，枕戈待旦，对日军的行动一直有所警惕。他那时经常对部属说：“人生在世，怎么都是死，打日本鬼子死了，这才死得其所。”

当日寇侵占热河，又向长城进犯时，张自忠部正由山西移防河北，于喜峰口遭遇日军铃木服部。张自忠率部主动出击，在七昼夜的血战中，歼敌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大队，缴获敌坦克数十辆。喜峰口战役是“七七事变”前华北抗战第一次光荣的战绩，声震中外。

一九三五年，张自忠主持察哈尔省政，旋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时日寇谋我冀察正亟，天津首当其冲。而当时华北局势日趋恶化，张自忠身任艰巨，折冲樽俎，力持危局，颇费了一番心血。

芦沟桥事变后，张自忠奉命留平津虚与日寇周旋，希望能暂时阻止敌人的进攻。那时有许多人不了解张自忠的苦衷，舆论哗然。但张自忠忍辱负重，曾无一语以自明，唯暗下决心以碧血丹忱宣示于国人。

中国全面抗战后，张自忠见时机已至，振臂奋袂，愿为前驱，千方百计脱离虎口，奔赴抗日前线。一九三八年初，张自忠升任五十九军军长，二月初调往五战区。二月十日淮河北岸吃

紧，张自忠部奉命增援，首战却敌于淝水，恢复友军淮北原阵地。这是张自忠任军长后取得的首次战绩，从此声威大振。

随后，日寇以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向临沂进犯，张自忠又奉命援助守军。当时，日军地上有机械化部队配合，天空有飞机助战，敌我双方火器悬殊。但张自忠毫不畏惧，一昼夜行军达一百八十里，亲自督战，血战八天将顽敌击溃，开抗战胜利之新纪录。临沂之战振作了中国军队的士气，遂有台儿庄之大捷，使战局改观，并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九三八年四月徐州会战后，我方大军奉命西撤，日寇突将西面铁路截断，意欲合围我军。张自忠奉命以一师的兵力掩护大军退却，使我军得以突出重围。这时徐州已陷，张自忠率部向西南转进，沿途都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时有战斗。然而，张自忠却将车辆让给伤员，自己步行在后，虽脚破血流，他却没有道半个苦字。张自忠还且行且歌，鼓励士兵前进，最后率所部突破了封锁线。

武汉会战之前，张自忠奉命守潢川十二天，两百里内无一友军。他率孤军布置好梯形阵地，以逸待劳。从九月六日开始，激战十一昼夜，完成了任务。日军承认这次遇到了最坚强的抵抗。潢川之役后，张自忠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

一九三九年三月，张自忠部参加京山、锺祥之役，毙敌六千余。五月，日寇以三个师团进窥随、枣地区，在襄河与大洪山之间突入。我守军东西分散，不易联络，张自忠率两个团渡河截击，大破敌军于田家集。是年冬，张自忠部奉命出击，屡以奇兵克敌，毙敌联队长三，伤师团长一，斩获甚众。

一九四〇年四月，日寇为了早定中原，从各线抽调十多万兵

力，向襄樊、南阳一线猛攻。此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张自忠所指挥的右翼兵团。

大敌当前，张自忠给五十九军各级军官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他在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信中又说：“我等应再下一次决心，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

五月三日，敌军突破一点，长驱直入。张自忠于五月七日夜间率七十四师从宜城渡过襄河，亲自督战。渡河前，张自忠在留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信中表明了决死奋战的心迹。信中写道：“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渡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九九师取得联络，即率领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向吾人最终之目标‘死’字，向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自忠率七十四师渡襄河的当天，便在新街与日军遭遇，开始战斗。五月十日奉命东向追击敌军于枣阳之南。十四日拂晓，张自忠部遇敌主力于方家集，遥见山坡下有日军数千人向南退走，乃分兵堵截。结果敌人不仅未退，反而增援上万人，从南北两路合围。张自忠亦调回截击部队，于十五日激战一整天，卒击破大洪山西麓之敌，伏尸山积。

五月十六日，日军又增兵一万余人，陷张自忠部于重围。如果张自忠此时后撤，仍能避免牺牲，但他仍坚守阵地，并将部队移

至宜城十里长山南瓜店后山的高岗上。中午时分，张自忠左臂中弹，不肯包扎，用手按了按继续督战。不久，阵地完全陷入敌人炮火射程中，左右以寡不敌众，劝张自忠稍退。但他却说："我是奉命截击敌人，岂有自行退却之理。此我成仁之日也，有死无退！"到下午二时，因我军伤亡过重，渐渐向后退移，但张自忠反而赶上前去督战，腰部又受了机枪伤。下午四时左右，张自忠又连中机枪弹数发，腹为之穿，犹振臂高呼："杀敌！"声慑敌寇，无敢进。临终前，张自忠告左右说："吾力战死，自审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都可告无愧。尔曹当努力杀敌，勿负吾志。"

一代民族英雄张自忠，就这样气贯长虹地完成了他的崇高抱负，在保卫祖国的英勇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五十岁。

张自忠殉国后，遗体由三十八军运回总部，在当地祭悼三天，随即将灵柩运回陪都重庆。因张自忠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将领中牺牲的第一个高级指挥官，他的灵柩到渝之日，蒋介石先生亲率国民政府高级文武官员到朝天门码头迎灵。五月二十八日，在北碚梅花山举行权厝。

张自忠的英勇牺牲，不仅为抗日将士树立了榜样，而且发扬了中华民族至大至刚，生死不苟的崇高气节。据此，国民政府特追晋张自忠为陆军上将，并于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发布褒扬令说："故张上将自忠，久膺军寄，夙著忠贞。芦沟桥事变后转战前方，屡建奇勋。方冀干城永寄，翊成复兴大业。乃以鄂中战役，亲当前锋，抱成仁取义之决心，奋勇截敌，重创喋血，犹复猛进不已。并谆谆以效忠国家民族，雪耻复仇，勗勉部众。终因伤重殉职，全军感痛。政府追怀壮烈，轸悼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卹，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示国家笃念

忠勋之至意。”

中国共产党对张自忠将军的丰功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张将军逝世后，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分别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和“为国捐躯”挽词。在公祭大会的祭文中写到：“将军之伟绩，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全国人民同声哀悼！将军之英勇奋战，足以打击那班贪生怕死之徒；将军之为国牺牲，足以打击那班妥协投降之辈。”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在《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指出：“张将军对抗战立功极大，今并以身殉国，将其最后一滴血给了抗战，既成功又成仁，的确配称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张将军殉难三周年时，重庆《新华日报》出了纪念专刊，周恩来副主席专为《新华日报》写了题为《追念张荩忱上将》的“代论”。文章说：“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张上将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借用扬州史可法衣冠墓的故事，亲笔题写“梅花山”三字，刻石立于埋葬张自忠忠骨的北碚梅花山麓陵墓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人民政府多次拨专款对张自忠陵园进行整修，新建了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并将其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指派专人看管。重庆市的各界人士，每年清明节和张将军殉国纪念日，都要在此举行祭扫活动。

一九八〇年张自忠殉国四十周年时，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

云，曾率各地亲属专程来重庆扫墓，并带来了她珍藏多年的、一九四七年编辑出版的《张上将自忠画传》，和台湾“圣哲先贤馆”中陈列的张自忠彩色蜡像的照片。她说：“从画传中看到许多先父的老同事、老部属，他们今天还在台湾，使人怀念不已。”张廉云表示，她非常盼望先父的同仁能够有机会回大陆观光；并希望有机会能到台湾去拜会与先父同时的老前辈，到圣哲先贤馆去瞻仰先父的肖像。

“烈士回眸应笑慰，擎旗还有后来人。”今年是张自忠将军殉国四十五周年纪念日，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张自忠将军用热血拱卫过的中华大地，已结出璀璨的“四化”之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张自忠将军的爱国壮志和英雄业绩，已经载入神圣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彪炳人寰，永垂青史！

重庆八章

崔敬伯

辞家赴国难

一

烽火照神州，江河日夜流。

日寇恣侵略，晓月忆芦沟。

二

老母频传语，群儿数问归。

燕云犹在望，无计复迟迴。

三

莫道来今雨，应悲去故乡。

稷园池上柏，犹自发孤芳。

四

朝遇玉蝀桥，夕坐五龙亭。

泉声与塔影，犹在梦魂中。

五

碧瓦丽朱垣，巍峨北海边。

---

* 崔敬伯，河北宁河人，现年八十七岁，任中央财经学院顾问。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川康直接税局局长、直接税署副署长。这组诗作有的曾以“天籁”的笔名，刊登在重庆《大公报》、《新民报》上，其中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图书千万卷，何日复嫏嬛！

六

失土不抵抗，万里弃封疆。
人民齐奋起，血债必须偿。

辞家赴国难弄笔

七七炮响震芦沟，日寇侵华是国仇，
我亦曾参救国会，辞家辗转到渝州。
我来蜀中近三载，报国功微徒自慨，
山月西悬客影只，江帆东下无缘买。
翻转家书慰寂寥，登临徒自苦迢迢，
遥知沦陷区中隐，奉母携儿事畜劳。
嗣遭老母归天去，善后安排一身寄，
事毕料理牵群儿，跋涉山川劳心力。
艰难辛苦到渝州，相见应欢还成泣！
情深谊重怎能忘，且喜群儿能树立。

防空洞中得句

洞中石壁荧荧烛，座上顽躯耿耿心，
时艰未肯悠悠遣，兴至犹堪苦苦吟。

大轰炸记事

一弹一弹复一弹，抛向渝州谁肯见。
出洞遥看失口呼，数弹适近吾庐畔。
宇寰灰飞户牖斜，几椅杯盘俱凌乱。
天窗洞辟纵目观，瓦砾横堆任足践。

惟有壁钟未停摆，尚与吾辈神思贯。
复员善后事最急，首为饥军谋饭健。
公廨权作集中营，竖卧横陈战友伴。
倔强还是女同仁，岗位坚持不肯换。
收拾几案整窗棂，工作照常未肯断。
英年奋勇各争先，砺刃扬鞭且再战！

斥　逃　资

调寄《长相思》

南海游，西海游，海天寥阔足遨游，荒江寂钓舟。
念悠悠，恨悠悠，游资逃避几时休？看你不回头。

斥压制学潮

调寄《蝶恋花》

热血方升自腾沸；活水源头，荡涤人间路。丑浊如斯谁之误，哪堪更把防川筑！

原野日荒城日蹙；老树低垂，喜看新枝拂。茁长扶疏资雨路，斧斤莫向屈头树！

斥中统与军统

调寄《蝶恋花》

蔓绕藤攀岩上树，展纵繁枝，花被繁枝误。倚势凌空天在外，空余弱舞草迷路。

缓步城狐驰社鼠，狐鼠凭依，城社哪堪语。创剧直同疽附骨，人间何日挥神斧。

日寇投降喜赋

川康八载办税，归来两袖清风；
只知抗战卫国，死生一任天公。

曾历千山万水，几经花谢花开；
地道勤劳本色，天然潇洒襟怀。

蒋管区所谓的大后方

调寄《沁园春》

一夕风横，八年抗战，万里萍飘。恨敌骑到处，惟余榛莽；衣冠重睹，仍是滔滔。米共珠殊，薪同桂贵，故与天公欲比高。抬望眼，盼山河收复，忍见妖娆。

名城依旧多娇，引多少“接收”竞折腰。惜蒿里鹑衣，无情点缀；泥犂沟壑，未解兵骚。天予良时，稍纵即逝，苦恨颓梁不可雕。沧桑改，念今朝如此，还看明朝！

雾都岁月

程思远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在李宗仁召集的广西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上，对桂南会战中广西政局表现不好的情况，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黄旭初虽然容忍下来，但他对我极不高兴。刚巧这个时候，黄同仇从重庆返抵桂林，他将辞去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前往安徽工作，离渝前见到新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张治中，张托他向我致意，希望我去重庆一谈。因此，我于二月二十五日从桂林飞渝，不料此一去，就在雾都呆了下来。

一、到重庆任职

我到重庆以后，住在枣子岚垭包华国的家里，还没有去看望张治中，不料先见到蒋介石。

一天，我要到上清寺去看第五战区驻渝办事处处长杨忆祖，刚从国府路转入上清寺，就看到侍从室秘书肖自诚从中四路漫步走来。他问我："几时到的？"我答以前天。他又问："要不要去见委员长？"我说："还没有这个打算。"他说："还是去看看他罢，我给你安排时间。"

---

* 程思远，广西宾阳人，现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解放前长期担任李宗仁政治秘书，在新桂系和国民党中央历任要职。本文为他写的回忆录《政坛回忆》中的一章，收入本书时文字略有删节。

这样，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下午三时，我便按照侍从室交际科通知，去上清寺中四路一〇四号官邸见蒋介石。蒋走进客厅时，后面跟着李惟果和肖自诚。蒋见到我似乎显得很高兴，他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来得正好，现在我们编组远征军进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已由罗卓英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我要派你当远征军政治部主任。"

我不经考虑就答复说："我不认识罗卓英，这个工作我恐怕难以胜任。"

"这个，这个，你干得了，我要张部长给你安排一切。"他不让我有考虑余地，于是我只好走出来。

过了两天，张治中要我去看他，他给我看蒋给他的一张"手令"(实际上是红铅笔写的一张条子，由侍从室编号转给他)：

"派程思远为远征军政治部主任　中正"。

张治中接着对我说："罗卓英对你挡驾，远征军去不成了。我在电话中答复了委员长，后来他又给我一张手令。"同时递给我另一张条子：

"改派程思远为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并约其参加官邸党政会报　中正"。

张治中又说："照我看来，常务干事对你不恰当，你年纪还轻嘛，应当干一些实际工作。现在我任书记长兼督导室主任，我要向团长报告，让这个督导室主任给你来当。你照样参加官邸党政会报。室主任较处长地位高一些，刘建群那样老资格，还不过是编审室主任。如果你同意，我就这样签上去了。"

我说："文白先生，我从来不挑选工作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自此以后，我就开始参加蒋介石的官邸党政会报。这个所谓

党政会报，参加的有：张群、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王世杰、吴铁城、蒋廷黻、陈布雷、张厉生、何浩若、黄少谷、倪文亚、袁守谦、郑彦棻等等。举行时由蒋亲自主持，通常总是一两周召集一次，有时蒋令各部门简略报告工作，有时只是问："各方面有什么特别情况？"有一次，戴笠来了，我看到他剑眉突眼，脸色黝黑，一副杀人王的面相，但只有这一次，以后他就不再来。

四月初一次党政会报上，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从香港回到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很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建议，对于这些自海外归来的文化人，应设法收容在一个组织中，使他们就当前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随时研讨，提出建议。他们既有机会发挥所见，自可与政府和衷共济，彼此相安。中央常会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请总裁指示。蒋沉吟一下，然后断然说："这些人如果在桂林随便说话，可使他们到重庆来。"但没有人吭声，蒋就宣布散会。

过了两天，蒋介石忽然召见我。我到后同李惟果谈了一会儿，蒋就同陈布雷走进来，蒋说：

"我要你去桂林一趟，代表中央邀请桂林文化界人士到重庆来。"

"可是我同桂林文化界人士并没有什么来往，他们都是由李重毅先生招呼的。"我说时面有难色。

"你的任务很简单，只要把我的这封信交给李重毅先生就行了。"蒋说时从陈布雷手里拿一封信交给我。看来他早有了准备。

这封信是陈布雷的笔迹，但后面有蒋的签名。内容只是说："中央对在桂林文化界人士，深表关怀，深盼他们来渝安居，到

时自予以适当照顾。希代致拳拳之意”云云。

我到桂林以后，把蒋函交给了李任仁先生。此行没有任何结果。

五月十一日，CC分子刘百闵又以延揽桂林文化界人士为名到了桂林。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由李济深、黄旭初出面邀请桂林文化界人士六十余人到乐群社举行集会，席上李、黄介绍刘百闵与文化界人士见面。刘即席发言，代表国民党中央宣达慰问之意，并希望他们到重庆去工作。可是也没有引起热烈的响应。

八月初，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由湖南经桂林返渝，在党政会报中对蒋介石说：七月二十九日，得到黄旭初的安排，他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与桂林文化界人士五十多人举行茶会，彼此开诚相见，谈得很好，就他个人理解，桂林文化界人士的言论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自此之后，据我所知，就再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提到这个问题了。

二、对蒋经国的回顾

一九四三年二月，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蒋经国电重庆中央团部，说该支团在三月初举行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请派员前来监选。张治中批给我办理，于是我决定亲往赣州一行。

我过曲江时，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女士对我说，她自己要陪我到赣州去。这位李夫人长袖善舞，活动力很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甚至对我戏呼她为“菊老”，可见其享誉之盛。她有此盛意，我自不便固辞，这样我们便乘小汽车出发，当天便到达了。蒋经国想不到我顺路邀来这位不速之客，款待至为周到。

原来在桂林师专教书的高理文，现在当了蒋经国的机要秘

书。去年（一九四二年）一月我陪同韦永成夫妇访问赣州时，就整天同他混在一起，这一次旧地重游，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我们谈来谈去，总离不开两个主题：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在赣州的一些作法。下面是我在赣州所了解的关于蒋经国的情况。

一九〇九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蒋经国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丰镐房，他的母亲毛福美女士，自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后，即以茹素念佛度其余年，不幸于日机袭浙时被炸毙命。这一悲剧的阴影，永远笼罩在他们父子之间。

蒋经国从六岁起在溪口念了五年的私塾，一九二二年到上海，进万竹小学，在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珊的监护下，学习“中文读书写字之法”。据蒋经国自述：“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1]看来蒋介石精心计划要把蒋经国训练成一个曾纪泽第二；但曾纪泽究竟比曾国藩气度开朗、手法灵活一些，而蒋经国后来的所作所为，则不及曾纪泽远矣！

一九二五年，在国共合作的高潮推动下，国民党大员纷纷送他们的子女去苏联留学，蒋介石也不例外。是年十月十九日，蒋经国由广州搭俄轮去海参威转搭火车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进入列宁格勒的托卡玛红军军事政治学校。一九三〇年十月，入狄拿大电气工厂当一名学徒。其后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重型机械厂作技术工人。在那里，他认识了一名女工Faina，随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与她结婚，此妇取了一个中国的名字，叫蒋方良。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蒋经国结束了十四年的留苏生

---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七十七页。台北幼狮书局发行。

活，带着俄国老婆和儿子蒋孝文回到祖国，那时他已经是二十八岁。一九三七年的复天，蒋经国带着妻儿从溪口雪窦寺到相量岗避暑。相量岗离雪窦寺有二十多里路，岗上有一所五间的平顶洋房，自成一组院落。在那里，有他的旧友高理文伴着他。这位高先生，个子却很矮，湖北人，说话很尖很急。在三十年代初期，王公度罗致他到广西工作，有人怀疑他是"托派"，王公度死后，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

抗战爆发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办了一个战时工作训练团，任蒋经国为该团训导处副处长，后来熊将该团交还中央，改成军委会战干三团，才调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一九三八年，熊又将蒋经国调到赣州，任为江西全省新兵督练处处长。据说熊有一种想法，希望蒋经国运用苏联的办法，训练江西全省新兵。是年二月，蒋方良生了一个女儿，蒋经国依照他父亲的电示："命名为孝章。"一九三九年五月，熊又任蒋经国为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后者所拟的《新赣南提纲草案》，提出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的口号。表面看来，很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但他做了四年的行政督察专员，竟没有什么成就。

帮助蒋经国起家的是三青团。一九三九年春，三青团中央团部仰承他父亲的意旨，任蒋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处主任。蒋经国奉命后，从战干三团选调了学员四十多人，由黄埔四期生胡轨带到赣州。学员中有王升、李焕、江国栋等人，蒋经国在虎岗（后改名复兴岗）办了一个"青干班"，再给他们以短期的训练，后来这成了他的赣南帮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从三青团一大到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礼堂召开，会后成立中央干事会以代替过去的临时干事会。蒋介石为加强党团联系，特派陈立夫、张厉生、谷正纲、朱家骅为常务干事。并借此以冲淡三青团是黄埔系一手把持的局面。

三青团中央团部各处人事也重新进行了调整：我从督导室主任改为服务处处长；秘书处处长原为CC派的项定荣，现改由张治中的亲信刘孟纯接充；组织处处长康泽照旧不动；宣传处处长由洪瑞钊改为郑彦棻；训练处处长调浙江支团干事长倪文亚担任；经济处处长为黄宇人；女青年处处长为宋美龄的心腹助手张霭真。

蒋介石为了加强三青团的政治地位，故意把他的"官邸党政会报"移到两浮支路通惠中学三青团中央团部举行。即使他采取了这样一项措施，但实际上仍无助于消除CC派与黄埔系的尖锐对立。

由于在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有一部分地方代表指责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贪污无能，特别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紧急撤退，孔的老婆宋霭龄包了专机，连洋狗、马桶都带上，但却置一些爱国人士的安危于不顾。人言啧啧，舆论哗然。这样一个行政首脑，不孚众望，如不罢免，怎么可以振奋人心，争取抗战胜利？当时大会曾作出决议，将此问题交由中央干事会处理。

因此在大会闭幕不久，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邀了部分属于黄埔系的常务干事和中央团部处长级干部到北温泉数帆楼住了几

天，对时局和团务交换意见。在漫谈中，张治中鼓励众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时主要发言，还是集中批评蒋介石的领导作风问题。

有人说，蒋囿于成见，自以为是，不愿听逆耳之言。部属对他有所陈述，事前总要揣摩他的想法，然后投其所好，承欢固宠，真理泯灭，正义消沉。善于取巧的政学系，如张群、熊式辉、吴铁城等人对他提出建议，也要准备甲乙两案，而不敢坚持正确意见。从而阿谀奉承，蔚然成风，政风败坏，悉以此为始基。

有人说，蒋对待部下，惯以私恩私惠市人，而不是使他们奉公守法。如他第一天批准枪决一个失职将领，第二天又私自开恩释放；一个干部向他要钱，首先挨骂，其后又得到几万元以至几十万元的特支款。这种做法，目的在使部属对他个人感恩戴德，而不知有国家民族，以致法纪荡然，人心离散。

有人说，蒋在组织上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徒有形式，毫无实效。如国民党以党领政，既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三九年又要成立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的领导，这样一来任何机构都不能起其应有的作用。以此类推，不胜枚举。

关于孔祥熙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孔既无才德，又缺威望，徒以裙带关系，当了行政首长，应联名上书向蒋建议，免孔氏行政院长一职，以肃政风，而振人心。可是签呈上去以后，好似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大家以为蒋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了。直到八月一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才给蒋以重新调整人事的机会。

回顾林森所以当上国府主席，那只是际缘时会，因人成事。“九一八”事件以后，国内掀起了“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呼

声。后经一系列的接触，宁、粤双方的代表在上海进行和谈。当时粤方代表为防蒋再起独裁，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特别坚持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由中央全会选举"年高德劭"者任之。林森在国民党内，一贯没有政治野心，"年高德劭"，真是当之无愧，于是就被选为国府主席。他当了十二年有职无权的元首，曾自嘲为"监印官"。事实上的确如此。

由于林森之死，蒋介石特于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五届第十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我们中央团部各处处长接到"中央秘书处"通知，得列席此次全会。会上，首先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掌握全国一切军政大权，随后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

此次全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国民党法无定规，权从人转。蒋介石不当国府主席，那个职位就是虚位元首，蒋一当国府主席，立刻就负政治上实际责任。这样还算得什么"法治"呢？

在此次全会上，蒋介石宣布要和共产党谈判，"采取政治解决方针"。原来依靠中国人民抗战的声誉，蒋出席了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上，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达成了下面的协议："双方同意关于增强国内团结的初步协定，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期与延安方面握手。"①

四、平汉南线、湘桂线的溃败

抗战进入一九四四年，是国民党当局最不好过的一年。

---

① 伊特奥特·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刊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纽约《展望》半月刊。

这一年，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于四月间开始对平汉线南段发动攻势，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等主力四十万人，不战而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县市相继沦陷。这样，日军以打通平汉路南段为目标的中原会战，到一九四四年五月上旬已经基本结束。

五月二十七日，日寇又在湘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时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黄绍竑、黄旭初都来渝出席。一天，白崇禧约我和他们两人到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家里会商时局。大家关心桑梓，缜密研议，认为敌人为了支援南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必然要打通粤汉路，桂林、柳州也可能成为他们的进攻目标，广西必须预谋应付。白崇禧劝黄旭初早日返桂。因此六月四日，黄旭初便由重庆飞返桂林。

六月七日，黄旭初电白崇禧云："桂林市面人心浮动。由于中原会战我军不战而溃，对于此次湘北会战也不敢过于乐观。省府召集有关机关会商两次，决定：如敌情紧急，省府必须迁移时，应以百色为宜。"

六月十五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柳州召集广西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决定桂林、柳州都应及早疏散。当时长官部所得的情报，敌在湘江右岸有六个半师团，湘江左岸也有两个师团。六月十六日，白崇禧打电话给黄旭初，主张桂林及早疏散。

六月十八日，长沙失守了。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要他飞返桂林，指挥第四、第九两个战区。白总结他当桂林行营主任时的历史经验，认识到第四战区张发奎可与他合作无间，但第九战区薛岳却非他所能调度，因表示辞谢，但愿负奔走传达最高统帅意旨的任务。

六月二十二日，白崇禧从重庆飞返桂林，二十三日，指定人

员研究发动民众协助军事的办法。二十四日，白与张发奎召集广西党政军负责人讨论备战事宜。二十五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派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司令。但当时广西部队只有两个军的兵力，即：贺维珍第三十一军，辖阚维雍第一三一师，颜僧武第一三五师，海竞强第一八八师；黎行恕第四十六军，辖罗活新十九师，许高阳第一七〇师，甘成城第一七五师。白、张决定，以第三十一军守桂林，第四十六军守柳州。这样分散兵力使用，所谓防守桂林，只能是象征性的了。因此六月二十六日敌军占领衡阳机场以后，桂林就开始疏散。

当时桂林疏散的方向，要么南下漓江，要么西向柳州。漓江民船很小，船只也不多；至于去柳州却有火车和公路可通，并且到柳州以后还可以转乘黔桂路火车前往贵阳、重庆或昆明。由于有这种方便，于是疏散的人群便象百川汇海一般涌向火车站。万头攒动，黑漆一团，争先恐后，蜂拥向前，秩序混乱极了。

白崇禧离渝飞桂以前，我曾向他建议，为使桂林疏散工作顺利进行，应在桂林成立一个水陆交通总指挥部，统一管理车船运输和安排机关、市民疏散事宜。但白不采纳。

广西情报是不灵通的，省政府的行动也是举棋不定的。七月三日，黄旭初已令省府委员孙仁林率领第一批省府工作人员从桂林乘火车撤退到宜山。七月七日，广西绥署忽得情报，说在湖南境内日军已开始后撤。因此，已经撤到宜山的省府人员，又在七月九日晚乘火车返桂林。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七月十四日，白崇禧由桂林去湖南前线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他的意图是要薛岳在将来衡阳万一失守时，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应部署在湘桂铁路两侧，以利于随时侧击敌军，切断敌人的交通，使其不敢深入我西南后方。但薛

岳坚持把他的部队撤往湘东一带，即粤汉铁路以东地区，以利于就地给养。七月十七日，白崇禧以劝薛任务失败，怀着郁抑的心情回到桂林。他还告诉广西军政人员一个不好的消息：敌军仅调走了第三十四师团，其余的都在湖南境内，且正以重炮、野炮猛攻衡阳，于是桂林又紧张起来了。

在此时期，蒋介石在重庆也很不好过。八月十二日，我忽然接到国府总务局交际科通知，要我于当天下午三时到"林园"官邸一叙。我以为又要举行官邸党政会报，商量什么军国大事。等我到达以后，发现到来的党政大员很多，是一个前所罕见的盛会。移时那个身材高大的总务局长陈希曾邀我们入座。在"T"字形长方桌上，设有茶点招待。我们方坐定，蒋介石夫妇入来了。蒋介石点头对我们招呼，嗫嚅着说："好！好！"宋美龄板着面孔，好似刚才同人吵架似的。下面是蒋在茶会中的发言(大意)：

各位同志：

最近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瞒着蒋夫人，同一位所谓陈女士在这里秘密同居。

实际上并没有这一桩事，那完全是国内敌人对我个人的造谣污蔑，目的在破坏我们国民党的威信，使抗战受到不利的影响。如果我们听信这种谣言，那就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须知我与蒋夫人是神圣的结合，革命的伴侣，十七年来，我们为着革命大业，为着北伐与抗战，并肩战斗，艰苦备尝，屡经险阻，矢志不移。我们的亲密合作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久而弥笃，天日可表。当前局面非常严重，今年是抗战中最险恶的一年，我与蒋夫人临危不惧，必将淬励奋起，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努力奋斗，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听了这一席话，深觉莫明其妙！即使蒋同陈女士有这种暧

昧关系，用得着在这种场合公开坦白吗？看来举行此次集会，是出于宋美龄的要求，因为第二天她就赴美求援去了。

五、湘桂大撤退

在湘桂大撤退中，国民党发动了一个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我原来以为：国民党当局看到这半年来国民党部队从中原会战到湘桂战役每战必败，要在军队中注入一些新血液，以增强其战斗力，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运动同蒋经国有什么关系。

一天，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有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的座谈会，我注意到有蒋经国在座。我即席发言说，这一次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它实际上与当年的黄埔建军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黄埔建军以后，我们即取得东征和北伐的胜利。这一次发动知识青年运动，如果我们做得很好，也可以保证抗战建国的成功。我建议：对此运动应当有一个宣传纲领，并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

当天晚上，蒋经国到菜园坝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办事处来看我。他说："你今天的话说得很好，总裁要你写一个关于发动青年从军的计划。"次日，我就把计划写好交给蒋经国。过了两天，蒋经国又对我说："总裁要你回广西去，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我暗忖道，广西目前正在兵荒马乱，学校都疏散了，我到哪里去发动青年从军呢？但我不便畏难而退，所以只能说："一定去，等我准备好就走。"

正当我整装待发的时候，白崇禧于十月三十日从柳州飞返重庆，我去看他时注意到他心情沉重，这意味着广西局势的急剧恶化。下面是他所说的湘桂情况：

敌军围衡阳后，其右翼在湘乡，左翼在安仁。我第六十二、

七十九两军往解衡阳之围，未能达成任务，守城部队第十军方先觉部坚持到八月八日，衡阳终于沦陷。此次湘战失利，一是战略上的错误，零碎使用兵力，为敌各个击破；一是战术上的错误，最高统帅直接从重庆以电报、电话指挥师、团长作战，使各上级指挥机构陷于瘫痪。

敌陷衡阳后不到一个月，即于九月初开始向湘桂路进攻。九月三日，白崇禧商准蒋介石，以第九十三军推进全州固守，同时向蒋建议：以杨森兵团由湖南九战区取道零陵入广西，准备参加桂柳决战；以李玉堂兵团进入湘桂路沿线，侧击敌人，掩护全州侧翼。可是杨、李两兵团，后来均未能如期进入指定地点，显然此项部署，未能得到蒋介石的坚决支持。九月十三日晚，白崇禧召集张发奎、夏威、韦云淞、贺维珍、黎行恕等在他的桂林公馆举行会议，决定变更桂柳的兵力部署：以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及第四十六军的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山炮一营、重炮一连，集结桂林；第四十六军的一七五师、新一九师、及第三十一军的一八八师则集结柳州附近，机动使用。当晚第九十三军放弃全县，撤退时焚弃子弹一百五十万发和粮米一大批，由此该军军长陈牧农被捕正法，改以甘丽初担任军长。

白崇禧在广西调兵遣将无所作为，但作了几项临时措施以期增强战区的作战力量。

一、将广西绥署四个独立团组成第一、第二纵队，编入第四战区战斗序列，由张发奎指挥。

二、请四战区长官部加委各行政专员为民团指挥官，武装人民，就地对付敌人。

三、令各县组织民团自卫队，维持地方治安，并相机阻碍敌人。

作了这些决定以后，白崇禧赴平乐、柳州、南宁各地视察，指示各县长如何组织地方武力。他于九月二十五日去宜山召集党政军联席会议。当时他看到黄旭初患十二指肠病甚重，特强邀黄去柳州同机返渝，转往成都就医。

白崇禧认为，广西境内有十个军，只有一个军是未经使用过的。如果我们要确保桂林、柳州，必须做到下面两点：(一)必须七、九两战区在粤北湘南不断加强对敌侧背的压力，使其不敢冒然深入广西境内；(二)必须加派生力军入桂。

白崇禧原定在抵渝的次日去看蒋介石，但因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八岁生日，前往“林园”避寿，拒不见客。十一月一日才能见蒋。白当晚对我说，蒋因美、英决定“先欧后亚”的作战方针，对其所处的危境坐视不救，深感愤懑。所以白对他提出关于挽救桂局的上述两项建议，没有立即采取坚决措施。

蒋介石此次派我回桂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我明知大敌当前，桂、柳危急，此行必无结果，但又不能不去。十一月三日，我从重庆飞抵柳州，刚刚碰到湘桂撤退进入高潮的时刻，那时桂林敌临城下，危在旦夕，柳州正在进行紧急疏散。我在柳州乐群社见到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以及韦赞唐夫妇，韦夫人黄士耀，在桂、柳撤退前夕，顿感前路茫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同韦赞唐在一起，以后她就去渝转往海外，结果不知所终。

我在柳州市区走了一转，发现街边空地上尽是一些“地摊”。原来桂林疏散的人潮涌到柳州以后，有的一时走不了，而行李又带得太多，于是就把一些旧衣服和工具变卖换钱，以利轻装长途逃难。火车站停着许多列满载难民的列车，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而开车没有确定的时刻，人们包围着铁路员工，大吵大闹。

看到此种情况，不禁使人泛起世纪末日的感触。

张任民邀我乘他的小汽车去宜山，同住在宜山县政府里。在那里，我看到陈良佐和孙仁林以及其他省府委员、厅长。陈良佐是我的宾阳小同乡，现在他是新任的民政厅长（接替朱朝森）兼代行省政府主席职务。他对我说，省府现借住宜山路工纪念学校，将迁往百色办公，估计形势发展，桂、柳失陷以后，邕梧也将不守，这样敌人会把广西割为四块，加以占领。为适应此一发展，在黄旭初离宜山飞渝前已派省府委员梁朝玑为省府第一行署主任，驻桂东南；尹承纲为第二行署主任，驻桂北，以便在辖境割裂的情况下代行省府职权。

孙仁林谈起此次桂林疏散情况混乱，主要是车船不足，管理欠周。有些交通机关如船舶管理所都乘机勒索，发国难财。黄旭初身为省府主席，六月二十五日，他的夫人宋绿蕉和儿子黄永良、儿媳党树珍等以及女儿黄华同一家由桂林疏散赴柳，与火车站交涉多次，才定得列车上两个房间。那时车站乱哄哄的，火车开离月台很远的地方，才让他们上车，主要担心在车站等车疏散的人们一哄而上。九月十四日，广西省府最后一批撤退人员上了火车两日，还不能开行，直到第三天，才驶离桂林。省府专车尚且如此，一个普通市民遭到的困难就更不难想象了。

几天以后，省府派车送我到都匀，我从那里去榕江，对疏散到那里的广西大学学生作了一次关于发动知识青年从军的讲话，并同西大校长李运华商量进行步骤。但西大员生自撤离桂林良丰以后，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万山环抱的异乡，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还有谁鼓得起热情来投笔从戎呢？

我于十二月初回到重庆时，桂柳失守将近一月了。后宜山、金城江、河池、南丹先后沦陷。十二月三日，日寇前锋从广西境

内进陷独山。蒋急令何应钦、张治中、汤恩伯在贵阳成立指挥所，由一、八两战区抽调五个军，集结在贵阳、马场坪、都匀等地区，以确保贵阳，巩固陪都门户。必要时准备"放弃贵阳，固守乌江"。幸而敌军并未北进，他才松了一口气。蒋对桂林弃守，很不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工事坚强，粮弹充足，所有通信与装备，皆尽用于此。而未经一日战斗，即崩溃，可痛之至。"①

蒋介石所谓"未经一日战斗"，未免言过其实。据我后来了解，桂柳会战经过如下：

十一月一日，湘桂路正面敌军第五八师团毛利末广所部进击兴安附近，同时敌第三师团（山本三男）与第十三师团（赤鹿理）并陷龙虎关；西江方面之敌第一〇四、第二二师团与怀集敌第一九独立旅团会合以后，进迫平南、丹竹，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桂林、柳州。

此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乃令玉林区指挥官罗活，率广西绥靖公署的第一、第二纵队，及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五师（颜僧武）、第六十四军第一五五师（张显岐）于平南、桂平附近，竭力阻止西进之敌，以第九十三军于恭城大榕江阻击湘桂路正面之敌，集结杨森兵团及第四十六军于平乐、荔浦、阳朔间地区，目的在阻止龙虎关深入之敌而击破之。

可是正当各兵团作新部署之际，天雨连绵，山洪暴发，我地面部队行动深感困难，盟机也无法予以协助，致在修仁、荔浦方面的杨森所部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受敌牵制攻击，无法脱离；这样，夏威、杨森两集团就不能紧密配合，并肩作战，而被敌各个击破。十一月十日，桂林守军，因被敌重炮轰击，阵地全

---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三十七页。台北幼狮书局发行。

毁，死亡枕藉；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殉职，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军部参谋长吴旃蒙，均壮烈牺牲。至是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第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及炮兵团长王作宾等乃奉令突围。

西江方面的邓龙光集团，正撤到柳江红水河布防之时，敌亦紧蹑而至，且一部在柳州东及象县附近，渡河成功。十一月十一日，柳州被敌突入，我第二十六军丁治磐部损失重大，旋告不守。

桂林、柳州未能久守，归咎于国民党统帅部未能集中兵力，发挥优势；而由七、九两战区调用的部队，如杨森兵团、李玉堂兵团以及邓龙光集团，均经连月苦战，兵力不及原编制四分之一；且因交通不便，行动迟缓，未能在桂、柳外围地区进击敌人，致使敌乘隙深入。由于没有后备兵力，更谈不上进行积极防御了。

六、六全大会波澜

一九四五年一月，蒋经国辞掉赣州专员，他的"主要职务全在于渝"（见蒋介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致蒋经国电）。那时他是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军政治部主任，青年军政工班主任，一身数职，忙得他分不开身来。

不久，蒋介石忽令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康泽赴美考察。我们最初闻此消息都莫明其妙，后来知道蒋经国来接任康泽的职务，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为了安排传子，煞费苦心，两年来积极部署，不遗余力，康泽的出国，只不过是为了给蒋经国让开道路而已。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美军登陆吕宋，消息传来，人心振

奋。二月，美国为谋早日解决远东战争，答应以美械装备国民党在西南的三十八个步兵师；并准备在装备完毕后，以中国陆军配合美国海军在西南沿海地区展开攻势。三月，何应钦在昆明就中国陆军总司令职，所属有四个方面军，以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分任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司令官，并规定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如下：以滇越铁路属第一方面军；桂西、桂南、粤西地区属第二方面军；黔桂铁路沿线属第三方面军；湘西方面属第四方面军。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由第四战区于四月一日在百色改组成立。原第十六集团军、三十五集团军两个番号撤销。夏威、邓龙光改任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官。第三十一、三十七两军也撤销，只保留以韩炼成为军长的第四十六军，以黄涛为军长的第六十二军，和以张驰为军长的第六十四军。为纪念第三十一军守桂林殉职的阚维雍师长，军委会特保留第一三一师番号，隶属于第六十四军。第二方面军和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均准备在适当时期对在桂敌军进行反攻。

为了迎接此一新的形势，国民党定五月初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广西出席代表九人，其名单为：雷殷、陈克文、阳叔葆、程思远、阳永芳(女)、周可法、雷沛鸿、黄昆山、尹治。还有军队代表夏威，三青团广西支团代表韦赞唐。黄旭初方于二月中治好肠病回到广西白色，接电又于五月一日经由昆明飞渝。李宗仁也出席此次六大，他住在李子坝八号白崇禧公馆。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五月五日在浮图关中央干部学校礼堂开幕。当日一贯对蒋小骂大帮忙的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评说，国民党有下面三大缺点：(一)政治不修明；(二)未认真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三)精神倾向倒退复古，因而未能

领导全国迈步前进。

此次大会，首先是听取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政治报告，代理参谋总长程潜的军事报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以及“中共问题”报告等。依照议事日程，出席代表可在听取各项报告后进行讨论。

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在听取军事报告后提出质询说：“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正视听，明是非，否则就无以激励士气、振奋人心。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去年八月八日衡阳沦陷时，曾发出了‘来生再见’的电报，意味着他要与衡阳共存亡，语气至为明显。军事委员会对此曾经明令嘉奖，并准备举行追悼会，以彰忠烈。但后来他忽然被俘了，不久又在重庆出现，据说他负有一种特殊使命。人言啬啬，谣诼纷兴，究竟真相如何，深望统帅部报告人有以解释。”王提出质询的方式是对的，而语气也是平和的。象这样一个问题，由军事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出来答复就行了。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蒋介石次日到大会讲话，竟对王昆仑臭骂一顿，激动至于拍案。人们都认为他失态，不是一个领导人应有的气度。

在讨论边疆提案时，中央委员麦斯武德说，新疆在盛世才的残酷统治下，人民被杀害者几万人，流离失所的二十多万人，中央应当对他追究责任。时有人高呼：“开除盛世才出席大会的资格！”又有人提议：把盛世才交付惩戒。次日（即五月十七日）蒋在大会纪念周讲话时说：“盛世才来重庆，是我叫他来的。他的一切都由我负责。”又说：“盛同志（盛世才）带来了五万两黄金给中央，试问民国以来，有这样好的人吗？”这就是蒋对人评价的标准，给他献金便是“好人”。

在大会上，陈立夫、程天放、徐恩曾等五十九个CC分子仰

承蒋的意旨，提议总裁应改为终身制，因为："每开代表大会一次，即须选举总裁一次，殊非尊重领袖之道。"此案一提出来，邹鲁首先反对，他说："总裁终身制，即等于君主专制。"结果没有通过，尽管大会仍选蒋连任总裁。

大会对中共问题，决定继续谋求政治解决之方针。可是蒋介石却于五月十八日在会上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大会最后一幕是选举中央委员。为了预防CC在选举中委中操纵把持，白崇禧、张治中、陈诚、朱家骅、吴铁城、熊式辉成立了一个"六人小组"，表示互相支持，反对CC垄断，并曾指定我和袁守谦、王启江为联络员。

当六全大会开会之初，蒋介石曾召集陈果夫、陈诚、吴铁城、陈庆云、张治中等五人举行会商，研讨六届中委选举办法，初步决定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共为二百五十人，候选人由国民党总裁、中央常会及出席代表分别介绍。此项选举办法提请大会通过后，五人小组先将五届中委（不足二百人）及各方面推介的人选列成一张共有二百七十四人的名单，超出了预定名额二十四人。而且有CC中委二十人未曾列入，因此陈果夫签呈蒋介石，说这些中委追随"领袖"多年，忠贞不渝，虽无殊功，却多劳绩。若在此抗战胜利即将来临之时，予以淘汰，则他们情何以堪，陈果夫要求蒋准将这二十位中委一并列入六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以示体恤之意。蒋介石批可。张群、吴铁城闻讯，也急起直追，向蒋提出了一些政学系骨干分子为候选人。陈果夫得知其事，又追加了一批，这样六届中委名单在三数日间就超出三百人以上，而且涨势未已，与日俱增。

后来CC又玩弄一套手法，他们联合五届中委和代表三百人上书蒋介石，自称他们一向服从"领袖"，关于六届中委的选举，愿意将他们的选举权奉献给蒋。三青团的代表们知道了这一情况，也联名上书给蒋，表示异议，认为选举权不能私相授受。不料蒋更进一步决定变更选举办法，这就是只能在他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圈选，不得另选名单以外的人。这样一来，六届中委即无异由蒋一手指派，所谓选举，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法罢了。

五月十九日下午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并提出选举办法如下：

一、中委名额增为四百八十人。

二、总裁介绍候选人五百名。

三、代表选举时，在候选人名单中叉去二十人。计算选票时，被叉最多之二十人作落选论；其余四百八十人均为当选。

这一以叉去代替选举的奇怪办法一经宣读，许多代表相顾失色。蒋介石说，已有三百名代表把选举权给他支配，所以这个办法不容反对。语毕，径付表决，他喊道："赞成本案者请起立！"坐在前排的都应声起立，坐在后排的则零零落落地继之，蒋不令人清点人数，即宣布："大多数赞成通过。"

接着便分发选票(即是一张印有五百人的名单)，有的代表将候选人名单的前二十名叉去(第一名就是蒋介石)；有的叉去最后的二十人；有的打一个大"×"表示要把全体候选人都一律叉去。开票以后，究竟被叉最多的二十人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因为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六届中委名单经过蒋介石亲自审定调整，已非庐山真面目了。

新增中委人数，实际上是CC和陈诚平分。白崇禧对我说，

“六人小组”提高了陈诚向CC讨价还价的地位。自经此次大会，他对陈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至于三青团中央团部各处处长，包括我在内，都沾了蒋经国的光，通通当了中委。

蒋介石在六全大会的表现，失尽人心，党内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有人在背后批评他：“中正不正，总裁独裁。”一时传遍了整个会场。五月二十一日，蒋宴请出席大会的六百名代表，到场的不到三分之一，气得蒋跳起来说：“要查清不到者名单，予以相当处罚。”

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六届一中全会，准蒋介石、孔祥熙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另选宋子文、翁文灏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即闭幕。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年底，我被派参加桂、粤、湘、沪、宁视察团，离开重庆到南京，结束了我的雾都生活。

张治中在重庆

余 湛 邦

张治中在重庆，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六年中，巴山字水印下了他的不平凡的足迹。他除了热心参与和谈外，还有好些重要活动。从这段历史时期里，我们可以窥见这个人物的一个侧影。

侍从室生活

正是仲春时节，山城早已披上嫩绿的新装，作为蒋介石的侍从室位于曾家岩附近的"尧庐"，也已含蕾绽蕊，粉蝶纷飞，来迎接新的主人。这位新主人就是刚从湖南卸任到渝的张治中省主席。

张治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充满矛盾。他一方面跟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既一贯主张联俄联共，又为蒋介石服务，而且忠心耿耿，一片赤诚。

张治中一到任，就首先为自己立下约法三章：明识大体，不存私心；严守机密，寡言少主张；协和各方，为领袖分劳分忧。并言明"侍从室居内府地位，责任重大。勉试三月，如不胜

* 余湛邦，字春山，广东顺德人，现任国务院参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担任张治中的机要秘书。

任，愿请调换”。张治中这种对上忠心耿耿的态度，自然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张治中在职一年半，夙夜匪懈，兢兢业业。他从清早上班，深夜才回家，侍从室中大小事务，事必躬亲。对蒋介石交办事项，一般从不过夜。有时为了传达蒋介石的重要命令，张治中守候电话机旁，不完成任务就不食不息。

一九三九年冬，日军曾集中十万大军在广东的北海、钦州一带登陆，直趋南宁，妄图往西推进，切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昆仑关一役是重点，日军虽蒙受一定损失，但终于占领南宁。中国军队集中十五万人，由五个战区合力，结果仍然大败。消息传来，全国震动，中外交责。蒋介石为此亲赴柳州处理善后，在机械化兵学校的大山洞中开了三天军事会议。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严明赏罚，才能平息民愤，激励士气。张治中有见及此，就约同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代参谋总长林蔚等，提出应自请处分，并严厉处分一批高级将领，得到大家同意。张即拟出方案：白、陈、林降级，其余如张发奎、叶肇、区寿年等直接负责将领，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革职、记过、交付军法裁判等不同处分，向蒋介石建议。蒋介石大为赞赏，在会议闭幕前即席宣布。中国军队全军震动，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各地行营本来是军委会的派出机构，一方面既要代表最高统帅指挥前方作战；但另一方面对所辖部队所提出的意见、请求等却无权决定，不得不向最高统帅提出，因此处在两难的地位。昆仑关之役便很说明问题。再加上蒋介石向来习惯直接指挥军、师，有时甚至到团，事情更不好办。张治中为此向蒋介石提出裁撤行营的建议，蒋介石接受了。于是西南（桂林）和西北（西安）两

个行营（西北行营主任是程潜）同时裁撤。

蒋介石一贯大权独揽，处处独裁，身兼无数领导职务，全国各类军事学校的校长都是他兼任，有一段时间竟兼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甚至要兼军委会下面的运输统制局局长。张治中对此极力反对，理由是：第一、政府设官分职，犹如社会分工，各有所专，岂能集百工于一身？第二、个人时间精力有限，兼职过多，非顾此失彼不可。第三、体制有碍。你是领袖，兼了四川省主席，行政院怎能领导你和四川省政府？第四、事情办好，理所当然，事情办不好，首当其冲；遥领职务而不负责，于心不安；认真管了，又为时间精力所不许可。

实在说，张治中的话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地位和威信。可是蒋介石说：现在没有人能管得了四川，只好由我兼。四川省政府在成都，蒋介石不得不由重庆去。张治中笑着说：你如以四川省主席地位去，我们是侍从室人员，同去是“师出无名”；如你以委员长地位去，到成都处理的是四川政务，这不是矛盾吗？蒋介石不听。但仅去了成都两次，以后就不再兼四川省主席，改由张群负责了。至于运输统制局长一职，张治中建议由何应钦兼。蒋介石同意了，但何应钦不愿。张治中劝何应钦说：你如不兼，委员长就要自己兼。以最高统帅兼运输统制局长，不成体制，贻笑中外。何应钦答应了。以后这个局弊病百出，弄得天怒人怨，责任归何应钦不归蒋介石，张治中是维护了蒋介石的威信。

张治中对蒋介石竭智尽忠，时刻以蒋介石的安全为己任。他考虑到，日机经常轰炸重庆，万一“尧庐”官邸被炸怎办？于是专门为蒋介石在郊外山洞修一别墅。后来蒋介石知道了，问明原委，并不责怪，只说：“可以多盖几栋小房子，让老先生们（按指国民党元老）来住住。”但盖好之后，蒋介石忽不愿住，让给

林森主席。林森去世后，蒋介石才去住，多数是在周末或星期天。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曾住了两次。

侍从室主任在蒋介石去外地时是要陪同的。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到柳州开军事会议，由于行踪不密，为敌谍侦知。上午开会时，警报器响了，会址在一个大岩洞里，很安全，大家都没注意。中午散会时，大家忘了警报未解除，正吃午饭，忽听上空飞机声音既急且大，一会儿就到达头顶。原来敌机来了五、六十架之多，每九架为一编队，分批轮番轰炸。蒋介石住羊角山，来不及进防空洞，附近有一个高丈许深亦丈许的石洞，张治中急请蒋介石进洞躲避。前后左右落弹数百枚，连洞内的泥土都被震得翻起来，蒋、张身上满是泥土，有的随从人员被泥土掩盖，幸无伤亡。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工作很满意。一九四〇年九月就任命张治中为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

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张治中到政治部和三青团之初，很想干一番事业，所以在政治部搞了个政工改制，订颁政工纲领、政工典范，全部调整了部队和军校政工的领导；在三青团搞了个党团关系处理方案，举办团员总甄别等。但一经接触实际，张治中就感到派系斗争复杂，遇事诸多掣肘，自知无能为力，所以几乎每年都请求辞职一次，无心恋栈。同时，他向来感兴趣的是国共两党关系，从大革命起，他就以两党调停人自居。在重庆的六年中，他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在国共和谈上面。我们在背后常笑话他这个部长、书记长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尽管张治中对政治部和三青团不感兴趣，但个人活动还是繁

忙而紧张的。国共和谈，他几乎无役不从。这方面的活动，已详见拙稿《和平将军张治中》（《人物》杂志一九八三年四、五期）和《回忆桂园》（《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这里不重复。其他突出的活动有如下一些：

早在一九四〇年，蒋介石就蓄意消灭江南新四军，暗地作了各种准备，并多次提到军委会议讨论。张治中发现气氛不对，认为将导致国共合作的分裂，不利于抗战，所以他对当时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军委的会议常由他主持）说："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爱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

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进攻，从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开始，十三日结束。新四军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项英死难。蒋介石即令军令部拟具处理新四军方案呈阅。何应钦于十五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军令部提出的甲乙两案。甲案主张明令撤消新四军番号，乙案主张不撤消番号，任其渡江北上，观其动态再作处理。讨论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发言，极力主张采用甲案，撤消新四军番号。张治中则主张采用乙案。理由是：如照甲案办理，将引起两党分裂。现在大敌当前，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内部分裂为形势所不许。白、张二人来回争辩，至于面红耳赤，气氛极为紧张。最后张治中说：如意见不能统一，可否将甲、乙两案同时呈请统帅核夺？白崇禧闻此拍案起立，大声呵斥："你身为政治部长，怎能说出这些话！"张看白已冲动到极点，便不再言。解放后，张治中对笔者说：在保定军校时，白崇禧和我同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关系至为密切，入仕以后，政治主张上分道扬镳，南辕北辙，真正志同道合的人是很难求的。往后写回忆录时还一再对笔者说：人要有远见定见，不可随波逐流，作

墙头草。

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到达延安以后，延安逐渐成为抗战的灯塔，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蒋介石忧心如捣，为了同中共争夺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战干团的设立就是其中之一。按名义是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为了培训抗战干部，而实际上是收罗青年知识分子，有不甘心被其所用的前进分子则暗中加以杀害。一九四〇年的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更是骇人听闻的大案。

原来蒋介石由南京到武汉后，一九三八年春就成立了四个战干团，分设在武昌、山西、江西、西安四地，都由蒋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桂永清任教育长。武汉沦陷时，第一团由武昌迁四川綦江，学员数千人，绝大多数是流亡学生、华侨青年。该团条件恶劣，设备简陋，学员经常吃不饱，睡不暖，多数面黄肌瘦，染上痢疾疟疾，内心异常不满，常常发生抢饭吃事件。领导人根据特务谎报，说其中混进了大批共产党，其首领女扮男装，潜伏附近居民家中，要策动暴动等语。于是从一九四〇年四月上旬开始，特务先后拘捕了大批学员，关在暗室，用电刑、棍棒等严拷毒打逼供，株连无限扩大。由于逮捕审讯都在晚上，杀死时用刺刀、深坑秘密处决，所以究竟逮捕多少，杀掉多少，谁也不知道。

张治中到政治部不久，就接连收到好些告密信，开始惊疑不定，后来派人密查，果然属实。于是把事情揭露出来，还亲自到綦江跑了一趟，把尚被关押的学员放出来，把迫害人的主犯、从犯押回重庆，交付军法审判，分别处理。重庆谈判时有人告诉了毛泽东主席，毛对张治中说：你对和平是有诚意的，綦江特务迫害学生案被你处理了，这是做了一件好事。

日本入侵中国的前后，美国一直供应日本以废钢铁杀害中国人民。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吃了大亏，才想到要联合中国对付日本，罗斯福总统派他的秘书居里以总统私人代表名义来华进行协商。开始，蒋介石并不重视，只派一些二等人物或主管财经后勤的人出面接待。一经接谈，居里除了要了解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军事力量、党派关系等外，还向国民党政府索要中国所需美援的军械、物资清单。蒋介石这才重视起来，改派陈诚、何应钦、孔祥熙等人出面，居里临走时蒋还亲自到机场相送。

可是，商谈将告结束前，居里突然提出要会见中共在渝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没有理由拒绝。就在会见前的一天，军委会举行会议，竟然有人提出：明天居里要会见周恩来，建议借故把周软禁一天，使居、周不能会见。话一提出，当时会上象开了锅，你一言，我一语，嚷个不停，乱成一团。张治中看到这种荒唐、愚蠢、可气可笑的现象，实在忍不住了，便说：此事主动在居里抑或周恩来，尚未搞清，况且委员长并未将此交付讨论，实在没有争论的必要。如果将周拘禁，不仅引起中共方面的严重抗议，亦必招致美国的不快，影响美援，谁负得起这个责任？至此，这幕闹剧才被刹住。

政治部不是外交部，可张治中喜欢搞外事活动。他差不多每年都有多次邀请各国大使夫妇、武官、参赞等人参加宴会、晚会。人数少时在桂园家中，规模较大则改在重庆北温泉。北温泉是有名的风景区，嘉陵江上能划船，温泉能游泳，缙云山上能爬山、野餐，大家各得其乐，每次都尽欢而散。重点是苏、美、英、法等国使节，尤其是苏联。张治中和苏联外交官交往多，谈话多。他认为要解决中共问题，少不了苏联，联共先得联苏，可

以借助苏联力量促进国共问题的解决。他和罗申最熟（罗先任驻华武官，后任驻华大使），一直到南京后还与他时有过从，有时还作非常重要的长谈。

政治部不是中宣部，不是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或教育部，但张治中喜欢做知识分子工作，文化人工作。他每年都找机会（如"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庆祝旧政协等）举行晚会，邀请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文化艺术界、新闻界、戏剧界等人士参加，演出音乐、戏剧或举行舞会，参加者常达四、五百人。老舍、曹禺要赴美讲学了，张治中就借晚会的机会为他们饯行，祝贺他们为沟通中美文化而作出贡献。有一次延安来了好些人，其中有江青，张就把她作为"毛先生的夫人"来款待，并说："本人两度去延安，承蒙延安朋友殷勤款待，高谊盛情，迄未敢忘，谨借这个机会表达衷心的谢忱。"张的这些活动，不单纯是联络感情，对他的和平主张与活动是有作用的。

抗日战争将近末期，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倒行逆施，大失人心，而行政院长孔祥熙更成为众矢之的，是个国人皆曰可杀的家伙。不仅一般群众纷纷起来骂娘，连国民党内稍有正义感的人也参与倒孔。张治中先在桂园约了几个亲信密谋策划，然后邀集反孔的同志三、四十人到北温泉数帆楼开了三天秘密会议。一方面决定向蒋介石上万言书，要求撤换孔祥熙，另一方面派人到各地发动倒孔运动。这本来是个幼稚天真的做法（向蒋告状实际上是与虎谋皮），但是倒孔运动却首先在云南出现了，以后不少地方也先后出现，规模大小不等。有人向蒋介石告发，说这是三青团的人发动的。蒋介石大发雷霆。宋美龄当着张治中的面说：要求民主，要求说话，可以，可不许乱说！

张治中到此还不甘心，他纠合了一批人向蒋介石建议："请

速改组政府，将已失众望之大员立即罢免，拔擢革命有为之干部，担负责任”；“请严整纪纲，信赏必罚，对官吏之贪污腐败，利用其地位与国难之机会得致巨富者，应予严厉之处置。”并更具体地提出：“党团员财产不得超过战前折价的五万元至十万元，超过的捐献国家，拒绝登记或捐献者，一律开除党团籍。”一九四五年国民党举行六大，张治中又约集一批人提出《改革党务和政治方案》，主张建立“真正以工农为本党组织之社会基础；彻底实行民主集权制；根绝党内任何小组织”的政党，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城市大工业和土地都收归国有”。在四大家族统治下，在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国民党党风下，这种主张和提案是不可能通过，通过了也不可能实行的。当时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知道了这些事，笑着对张治中说：“你们的案子要能实行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治上成了左派，我们却成了右派了！”

和青年人在一起

在官僚机构“中央训练委员会”的领导下，当时在重庆和各地也办了好些训练单位，什么训练团、训练班、集训队、战干团、游训班之类。从内容说，宣扬的都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老一套。从形式上，都是训话、报告、讨论、座谈，事实上从开学到毕业一直训话到底。铁板一块，死气沉沉，在学的人也毫无自由之可言。张治中有见及此，有意识地办一些生动活泼的集训活动，那就是夏令营。几乎每年都办。他对政治部、三青团的业务丝毫不感兴趣，但对办夏令营却积极得很。他当时已是年过半百了，但在青年学生心目中，却是个“老青年”。青年人参加的活

动他样样都参加，和青年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活动。最典型的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在四川灌县漓堆公园。

漓堆公园在灌县城外，是一处有名的风景区，位于岷江南岸，树木葱茏，风景宜人。附近有滚滚湍流的岷江，有纪念秦太守李冰父子的二王庙，有中国最古最有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有长达一华里的铁索桥——安澜桥。稍远一点有号称天下秀的峨嵋山，附近有天下幽的青城山。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方面临时修筑了一个游泳池，一个运动场和一些其他设备，就构成了夏令营地。

从山下一进营门，在道路两旁的古树上悬挂一幅长达四、五丈的大字横幅，上书："奋起吧，中国青年！"沿着一条长甬道便到大礼堂，礼堂正中挂着孙中山先生亲题刻在广州中山大学礼堂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把世界文明迎头赶上去"，下联是："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课堂寝室贴的标语是："青年是国家民族的至宝"，"要保持紧张、严肃、活泼、愉快的精神"，"立志要远大，要专一"，"生活规律性，行为革命性，意志要不怕困难、危险、失败的钢铁性"，"只有自立自强才能保障国家的真正自由、民族的永恒独立……"。开学的时候，张治中就和学生青年们讲这一类的话，并且特别强调以"紧张、严肃、活泼、愉快；简单、朴素、整齐、清洁"十六字作为营规，要求共同身体力行，根本不提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那一套东西。

每天活动是这样安排的：早上升旗讲话，张治中大多亲自主持，用简短精炼的语言同学生讲故事，如《李冰父子》、《廉颇与蔺相如》、《孙中山先生》、《意大利开国三杰》等，既不俗套，也不冗长，学生们很爱听。然后早饭，饭后上课。多数邀请国内大专院校的教授、学者主讲有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军事、科学等方面的问题。下午是体育活动，如骑马、射箭、射击、田径、游泳、爬山、球类等，这是学生们最感兴趣的项目。晚上活动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采，如座谈讨论、歌咏、话剧、戏剧、舞蹈等。或分组举行，或集中晚会，自编自弹自唱为主，偶然也请成都的艺术团体来表演一下，或者放场电影。还办了一份营刊，三日一期，报导各种活动消息，刊登同学们的写作，受到人们欢迎。

每天活动一个接一个，确实做到紧张、严肃、活泼、愉快。青年人精力充沛，爱好活动，他们觉得这里的生活比在学校有意义、有活力。虽然住的多数是临时盖的竹棚，饭里夹了粗粮和稗子，菜里肉不多，晚上睡觉有时还会有“轰炸机”（蚊子）和“坦克车”（臭虫、跳蚤）的袭击，但是他们都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大家有时还远足步行到青城山一次，一路上此歌彼唱，前后相和，笑语欢声，不绝于耳。到达目的地，大家啃干粮，喝自带的壶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四个星期过去了，要闭营了。同学们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张治中在降旗仪式作《临别赠言》时，对同学们也依依不舍。学生们每人都从衣袋里掏出小本子要求题字留念。张治中说，一时来不及，我回去写好复制寄给大家。哪知一回到重庆就忙开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亲笔写下如下十六字复制寄去，还附去一封慰问信：

“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一切忍耐，一切乐观。”

张治中从来不为人题字。这幅字当时受到学生们的爱惜。我想，可能还有人保存至今，那是接近花甲的人了。

和郭沫若的瓜葛

张治中和郭沫若的交往是老关系了。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郭沫若是政治部主任秘书，张治中是副官处处长。革命军克服武汉，张转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郭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从此分道扬镳。抗日战争开始，郭沫若由日本回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一九三八年底由武汉迁到重庆，张治中由湖南调重庆，不久，发表为政治部部长，于是故人又重逢了。

可是，这回和大革命时不同了。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以后，既不愿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又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反共面目逐渐暴露。由于郭沫若态度倾向中共，第三厅内又有不少地下党员，国民党顽固派要求张治中改组第三厅，把郭沫若和他手下一帮人排挤出去。张治中再三考虑，认为不妥，力排众议，并建议在政治部内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安排郭沫若和他手下的那批人。得到批准后张和郭协商，郭也觉得满意。当时张还跟郭说笑话：“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一个租界。”

跟着，第三厅改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也随之成立。网罗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作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等。会内设三个组：第一组，主编国际丛刊；第二组，文艺写作；第三组，敌情研究。会址在政治部外。有了编制、经费、人员、交通工具，特别是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条件很有利，实际上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一

开始，张、郭两人处得很好。郭沫若每两周去桂园一次和张治中叙谈，气氛友好和谐。以后虽有特务的挑拨破坏，说这些文化人思想左倾，同情共产党，翻译苏联报刊，宣传共产制度，攻击三民主义等等，使张治中产生一些疑虑，但他总认为既是特意为他们设的“租界”，就让他们自由一点吧。

到抗战中期，国共两党摩擦斗争渐趋激烈，蒋介石接连掀起反共高潮，重庆特务横行，时有进步人士失踪的传说，有些人纷纷向香港、南洋逃走。张治中为此举行招待会，向文化界人士解释，保证在重庆没有问题，到香港、南洋敌占区不安全，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郭沫若为此写了一则通讯在香港某报刊登，对张的保证加以讥讽，中有“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的话。张治中看到了很不高兴，写信向郭沫若提出质问：“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谈？这不是友好的行为。”郭沫若回信略加解释。从此，张、郭关系逐渐疏远。

特务看到有机可乘，更大肆造谣污蔑，各方对张纷纷指责，说张治中态度太柔懦，是养痈遗患。压力从四面八方来，张治中终于感到承担不了，就决定把这个委员会裁撤了。那一批著名人士转派为政治部设计委员，按月送车马费维持生活，实际上是把这些人养起来，封闭批评者之口。张治中还向蒋介石建议在中央研究院内增设一考古研究所，聘郭沫若任所长，但未得批准。以后，张治中总觉得于心不安，曾在宴席上向郭沫若致歉，但关系没能弥补过来。

但事情到此并未终结。郭沫若于一九四八年曾写了一些回忆录（后取名《洪波曲》），在香港某报发表。中间纪录长沙大火史实时，有张治中蓄意要把周恩来烧死；为了建立不世奇功，仿效帝俄的苏沃洛夫，在拿破仑进攻莫斯科之前，实行坚壁清野，把

城外所有房舍付之一炬，等语。张治中读到这篇文章后，感到非常痛心，认为郭沫若道听途说，颠倒是非，挑拨他和周恩来几十年老朋友的关系。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和郭沫若面谈。直到解放后，这件官司一直打到周总理面前。张、郭二人的来往信件都让周总理看到了。周总理认为《洪波曲》所载不符事实；同时因郭沫若已恢复党籍，张治中是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这样做不合适，影响党内外合作共事关系。所以周总理出面转圜，给郭沫若以适当批评，郭沫若也对《洪波曲》文字作了修正，事情才平息下来。

思想深处的矛盾

张治中将军生前多次语笔者："做人要有远见定见，不可随波逐流，作墙头草。"这不是他自负，而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在政治主张上，张治中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军事指挥上，他勇敢果断，从不参加反共军事。在工作方法上，远在一九四六年，他就懂得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新疆的问题。无论从政从军，他都显得敢作敢为，多谋善断，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可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则处处显得矛盾、柔懦、妥协，有时还相当胡涂。

在张治中与中共人员的交往中，如周恩来、叶剑英、林祖涵等，他处得不错，能看到人家的长处，也能学一些。但和国民党内部的人交往，则常常忘了原则。他对CC很反感、轻视、蔑视，但对陈果夫却必恭必敬。他力主联共，而对最死硬的反共分子戴季陶，却相当尊重。他对陈诚、陈布雷更是推心置腹，亲如兄弟。白崇禧极力反对他，他并不以为忤，始终维持友谊。他反对军统特务，而且明知康泽、滕杰反对他，却偏要加以重用。

康、滕在蒋介石面前告他的御状，蒋把康、滕的状子交给他，他并不施以报复。

最突出的还是他和蒋介石的相处。他明知蒋介石极端反共、反动，而且在为人处事、领导作风等方面毛病很多，可他仍然忠心耿耿，不背不弃。在侍从室一段已如上述，我还记得以下一些往事：

有一次，蒋介石在重庆南岸黄山官邸开军事会议，军委会各部会领导人、参谋总长何应钦等许多高级将领在座。张治中作了一次较长的发言，指出当前的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畏难苟安，不求进步，毫无创造进取精神，日趋腐败，以致引起党内外严重不满。如长此下去，不改弦更张，前途将不堪设想。还举了许多例子为证，越说越激昂。蒋介石听了皱起眉头说：大家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散会后，何应钦拍拍张治中的肩膀说："文白先生，你何必如此，使得老帅难过！"

有一天，日机来袭，张治中陪蒋介石夫妇进防空洞，就聊开了。张治中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大家都不肯说话，不敢说话，显得消沉衰老，这不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正常现象。希望蒋介石多多鼓励大家说话，虚心听取别人的话。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但问："为什么大家不肯说话？"张说："主要是不敢讲，讲了也没用，得请您以身作则，察纳嘉言，兼听兼信。"宋美龄在旁又说："讲话可以，但不能乱讲！"

有一天晚上，蒋介石约了陈诚、熊式辉和张治中到官邸研究改组行政院问题，请大家提意见，提人选。陈、熊都很慎重，只说应改组，但没提院长人选。蒋介石说：没人能做，只有我来兼了。张治中说：这不大合适。政府的改组，应以促进党内团结为目标。平日应建立人才阵容，不仅选拔党内优秀，对党外人士亦

应尽量网罗。党内元老，年事已高，体力难支，可考虑采取元老制，予以崇高的地位与丰厚的待遇，退出现职。并于各院增设副院长，以年富力强之可靠人士充任。至于行政院长人选，不要如走马灯式老是几个人，应提拔新人，一新全国耳目。在我看，现在能充任院长的人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委员长用何等标准衡量说没有人能做？蒋介石听了哈哈大笑说："有那么多的人能当行政院长吗？"

有一年，蒋介石想访问印度，约了几位文武高级人员征询意见。大家都顺着蒋介石的意旨说话。张治中表示不同的意见："您的地位相当于一国的元首，要是罗斯福总统请您去华盛顿或邱吉尔请您去伦敦，那是可以的。现在您接受印度殖民地总督的邀请而去，是不合适的，没什么意义的。"蒋听了摇摇头不耐烦地说："你的想法不对！"后来，蒋介石果然惹了一肚子气回来。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矛盾的现象？从政治上说，主要是个立场问题。张治中明知这些人不对，但不忍与之决裂；明知国民党必败，但不能弃暗投明。从思想上说，他的灵魂深处是存在另一个世界，这就是他小时读的十年线装书所带来的影响，儒家的一套东西深深植根于脑海之中。

张治中讲忠恕之道，对别人的错误采取无原则的迁就忍受。王世杰是他在一九二八年结交的老朋友，张治中一直引为知己，在国共和谈中长期合作。但王世杰以后越来越反动，最后在张治中家讨论问题时，王世杰一言不合，竟至勃然大怒，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往来。张治中隐忍不语。在新疆，一个由张治中请来主持新疆土产公司当经理的骗子，事败临走时，他仍然礼送。在他看来，君子绝交是应该不出恶言的。

张治中重友情，念旧谊，认为无友不如己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反动如陈果夫、戴季陶、陈诚、陈布雷，他不忍割席。在和戴季陶、陈布雷相交时，绝口不谈政治。在和陈诚交往中，绝口不提和谈。

张治中念念不忘感恩知遇。蒋介石在大革命时赏识了他，在长沙大火中维护了他，在中央军校、侍从室、政治部、西北行营等任内以及多次战役中重用了他。所以他明知蒋介石的错误和终必失败，但宁可上万言书，竭尽忠言，喋喋不休，而不愿背离蒋。到北平和谈失败时，面临去留之际，张治中思想上产生了剧烈痛苦的斗争，非常苦恼。周恩来为他直言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民着想？"这是一针见血的话，是虎狼之药，良药苦口利于病，这话促使他战胜了过去的错误，获得了以后的新生。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之后，蒋介石在台北摇头叹息："别人背叛了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

冯玉祥北碚纪事

李 萱 华

抗战中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冯玉祥常来北碚。他在北碚往返期间，给北碚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到北碚诗意浓

冯玉祥第一次来北碚，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当年北碚获得农业丰收，人们兴高彩烈。冯玉祥见农民屋檐下悬挂着排排金色包谷，十分高兴；当他看到北碚的优美景色时，更是诗意盎然，欣然吟咏道：

山前满绿竹，山后遍松树。
松竹相交翠，看去似画图。
远山和近山，千处与万处。
岭下有清泉，汩汩流不住。
这是川中景，无怪说天富。

这时，卢子英已接任实验区区长职务，故冯玉祥写道：

区长卢老四，精明又要好。
作乎升次长，区政难顾到。

遗缺补其弟，地方都欢笑。
事业有规模，筹画想必好。
内容究如何？我还未看到。

冯玉祥在群众大会上作了讲演后，中午在兼善中学用餐，校长张博和当初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曾去南苑参观过冯玉祥练兵。两人谈起这些事，甚为亲切。张校长送了冯玉祥一把扇子，并请冯玉祥吃了校园自种的西瓜。

饭后，冯玉祥由卢子英陪同，与陶行知先生等一行，乘船游览北温泉。下午，北温泉集中了两三百人在草坪集会，冯玉祥又作了《如何练新兵》的演讲。初次到北碚，冯玉祥感到事事欢欣，唯独对街上有宪兵警察作保卫，很不满意。于是写道：

走出校门来，行到大街上。
宪兵和警察，站立在街旁。
百姓担物者，强迫令停放。
无故阻民行，使我甚愧惶。
无法相劝说，只可暗心伤。
前后拥大群，究为谁增光。
我是一丘八，自顾颇平常。
吃穿皆民血，何必装假象？

后来冯玉祥到北碚，再没有宪警护卫了，跟普通人一样，穿身中式大褂，背着竹篾背篓独自一人上街赶场，真象土生土长在北碚的老百姓。

卖字鬻画

冯玉祥到北碚的主要活动是作抗日宣传，卖字募捐。北碚各个乡镇、机关、企业和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声音。他的演讲深深映在北碚人民的心中："我是丘八出身，粗人也只好说几句粗话。现在是全面抗战的时候，也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跟鬼子拼命的时候……要想安居乐业，保家立身，就只有打倒侵略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冯玉祥的隶书苍劲有力，诗画也别具一格。凡是要向他乞字求画的，皆索取笔资，作为抗日献金。有钱人多收，贫穷人少收，学生乞字一律收费五角。他住在兼善公寓楼上，乞字者必须头天送上笔资，写上姓名，第二天就去取字画。去乞字的学生特别多，比如邝忠勤得到的一幅字写着：

忠勤先生留念

世上无难事　　只怕男儿心不专

冯玉祥

他题写的字还有："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节约救国"等。他画的水墨画有茄子、黄瓜、白菜、萝卜等，画旁都题有小诗。茄子画上的小诗是："茄子紫，紫茄子，吃的有了力，可以把日寇打死。"萝卜画上的题诗是："红萝卜，蜜蜜甜，吃了气力如猛虎。如猛虎，打东洋。"据《新华日报》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报导："冯副委员长到碚后，曾至若干学校及工厂参观，冯氏在公开及私人谈话中，均阐发节约献金之重要，有乞墨宝者，亦皆索取笔资，移作献金，所获已达数千元。二十六日下午，并应

复旦大学邀请，至该校讲演，听者千余人。”

冯玉祥卖字鬻画是为了抗战，有时也资助贫寒学生。他曾捐赠育才学校相当数量的经费，也为生活教育社和复旦大学募捐过助学金。《新华日报》曾以《冯玉祥先生四卖兴学》为题报导：“生活教育社为着推行普及教育运动，由理事长陶行知先生发起三卖兴学：一卖文、二卖字、三卖诗歌，以所得尽充教育之用。昨日冯玉祥先生闻此消息，首先提倡，并说他还有嘴可卖。决定：字每件一万元；文每千字一万元；校歌每首一万元，加讲演一项，每讲市内一万元，所得尽充该社兴学之用。”

同年三月十七日，《新民报》载文《冯将军卖字救国》云：

> 冯焕章将军，对抗建之必胜必成，最具信心，亦最尽其力。生平行事，只求有利于国家，不以善小而不为。入蜀以后，除于军事方面，时有荩筹而外，复借售字所入，捐献政府。将军写篆隶，遒劲有力，而自逊为丘八体，一如吟新诗之称丘八体也。最初遇乞取墨宝者，几于有求必应。求者既多，将军因私念，倘能以此得资，亦不无小补。遂手订润格，写条屏一幅，取四十元，对联一幅，取八十元。至去年十一月，此项收入，达七、八千金，尽以捐献。此间既时有画展，诸画家往往求将军题字。将军因更提出条件，凡画展作品系出售者，应照标价加题字费，题字费之多寡，视画件取价高低以为准。诸画家无不欣然承诺，而将军笔墨之役乃愈繁。今年二月底止，便得万余金。将军自言，在未胜利结束战事前，卖字决不终止，寸纸尺缣，能得一分钱，便尽一分钱救国之力。甚愿国人，亦能各就其岗位肆其救国之力也。

好汉不怕出身低

冯玉祥出身贫苦，十一岁就吃粮投军，当了一级上将后，仍保持朴素本色，人称“布衣将军”。周恩来同志在《寿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中写道：“先生最喜欢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有人吟诗赞扬：“将军六十尚青春，布衣淡饭救贫民。”

冯玉祥的生活极其俭朴，他来北碚常住兼善公寓二院二〇九号或二一三号。这里特别清雅幽静，侧边有一小礼堂，正适合他写字绘画和接待客人。饮食也很简单，不吸烟，不喝茶，小菜便饭。每次来公寓，刚住定便向服务员招呼，要吃冬苋菜煮豆腐或泡咸菜。他平等待人，经常同服务员交谈，问长问短，十分亲切。有个服务员叫李昌遂(现名李仲良)，家庭很穷，十五岁就到兼善中学当杂工。冯玉祥时常鼓励他，并画了一张出水荷花赠给他，画上用隶书题写了“好汉不怕出身低”七个字，使李昌遂很受感动和鼓舞。冯玉祥在兼善公寓，作了许多诗画赠给职员和工友们，几乎人人都有。他在送给保管员伍正汉的一张大辣椒画上题诗道：

大辣椒，
小辣椒。
吃起来，
味道好。
大家齐心协力，
把倭寇打倒！

一九四三年十月下旬，冯玉祥住在北温泉农庄。陶行知先生向他介绍了一位由德返国的爱国工程师，这人叫李华，原名岳立，曾留学美、法、意、德诸国，学习采矿、冶炼、造船和航空技术。抗战爆发前夕，李华回国在江西南昌飞机工厂当热处理工程师，后入川来北碚，开初在复旦大学任教，继而自行研究西门子炼钢法。由于爱国心切，李华尔后又直接从事国防研究，研究动力潜艇及飞机内燃机。但国民党政府不支持，李华一无人，二无钱，三无场所。陶行知支援他部分经费，并把晓庄研究所的木工袁海洲调给他当助手。他们时而金刚碑，时而澄江镇，最后才来到北温泉的益寿楼。

这天，冯玉祥将军由陶行知先生带领，参观了李华及其助手袁海洲研制成功的两冲程飞机内燃机模型，很受感动，对他们那种艰苦奋斗、勇于创造的精神，十分钦佩和赞赏。第二天清晨，便派副官请李华和袁海洲，由陶行知先生作陪，在北泉码头小食店共进早餐。

十月二十七日，冯玉祥离开北泉，临行前，他叫公园卿真如给李华和袁海洲送来两幅画。送给李华的是一幅茄子，送给袁海洲的是一幅六月仙桃。画上题诗云：

河北六月仙，美观味且甜，
创造伟大事，贵在克困难。

铁笼中的老虎

冯玉祥到北碚，往往一下汽车后便把副官和司机支走，自己到处蹓跶，到望江茶馆喝喝茶，倒也幽闲自在。但认得他的人很多，实际上得不到清闲。有的慕名向他请教，有的想通过巴结他

抬高自己；有的是找他作靠山，撑持门面。至于出自好奇而要看看他、听他讲讲话的人就更多了。有一天，冯玉祥将军刚进望江茶馆坐下就被中共地下党员刘运隆上岸看到了。刘当时的公开职业是民生公司民法轮经理，冯玉祥乘过民法轮，两人有一面之交。刘运隆见冯玉祥一个人在吃茶，便和同行的会计周德修进去招呼道："副委员长在喝茶！"一边就在他侧方坐下来，想和他交谈交谈。可是，冯玉祥坐茶馆，是不大爱说话的，好大一阵也引不出他的话来。还是最后一句普通的问话，打开了冯的话匣。

"副委员长今天到北碚，比往常晚一些呢。"刘运隆说。

"今天还是来得很早，只是到公园和体育场去走了圈。"冯玉祥将军接着说，"公园那老虎样子可凶咧！可是铁笼子把它关起来了，一些人逗它，用石子打它，它佯装不知。一时睡，一时走，简直看不到一点威风。如果放它回山，那就吓人了，谁还敢去逗它、打它呢？"

说完就再也不开腔了。

一九四一年初，冯智舒请冯玉祥吃夹沙肉。因为他们都姓冯，成了宗族关系，冯智舒攀到了冯玉祥这棵大树，身价倍增，经常把冯玉祥请到家中(今北碚公安局院子)。这天出席作陪的，只有他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刘文襄和刘运隆两人。

冯玉祥对夹沙肉很感兴趣。他们就不断往他碗中送。混熟了，说说笑笑，谈得很投机。饭后他们又进行了长谈。刘运隆说："前次副委员长在一川电影院的讲演，我因船在重庆检修，还约了一些同事去听，都说讲得好，可恨有少数人捣乱，把主持人郭沫若先生都气坏了。"冯玉祥接着刘运隆的话题，说明那天去讲演的原因，原来蒋介石的生日那天，冯玉祥没有去，第二天蒋反倒来看他了。并说是担心他身体不舒服，临走时还假惺惺地要他

多关心国事，多发表意见。冯表示年纪老了，生性又昏庸，平素爱走走游游，以养残生，对国事缺乏见识，提不出什么。蒋介石吃个闭门羹走了，但这事不知怎的被郭沫若知道了，便约他在一个星期天去一川讲演。

"那次讲得很好，大家都很赞成副委员长的看法。"刘运隆赞扬道。

"不，不是大家都赞成，还有一少部分不赞成，他们不是先哄闹，后又甩东西吗？"

"那是极少数的，肯定是有人布置起来的！"

"那些不必去管它，我那天讲的都是国家的生存之道，抗战必胜的道理，哪个不听？听了哪个又不产生联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何况同是中国人，哪个又不关心国家大事？"冯玉祥在一川讲演的题目是《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这时，他又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他的观点，他从法国和波兰战败亡国中，提出中国应该吸取三个教训，每一个教训都紧紧联系着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说："我们中国在日本占了东北四省之后，命令驻军不抵抗，要依靠国联，国联派来个'李顿博士调查团'，到东北走了一趟，回去写了个报告，公然承认日本在我东北四省的特殊地位。这个惨痛的教训难道不吸取？芦沟桥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件之后，日寇长驱直入，占了大半个中国，直逼西南。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迁都，而不正式宣战，真是令人不解！我们的军队有一部份在前方抵抗，抵不住就往后撤，大部份力量摆在后方对付老百姓，别的军队自告奋勇上前线杀敌，认为是大逆不道，一律围剿，直至全部消灭而后已。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刘汝明部是这样，十九路军的蔡廷锴部也是这样。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怎不令人担忧！现在要我做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募捐，补充抗战经费。可是，有钱

的不出，还在天天搜刮，存进外国银行。光在贫民百姓中去募，这话怎么说？二件事是慰问前方战士。要人家到前方拼命，你要用绳子绑、扁担打，一天吃糙米清水，我看到就已心痛极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你们想想，我除了只有象公园的老虎，一天吃了东西，睡睡走走，还有什么办法呢？”

寓居缙云山

一九四二年初夏时节，冯玉祥来到北碚缙云山，寓居在接官亭后面的草房中，与陈铭枢住在一起。他经常走访附近的山民，宣传抗战和送药治病。五月十九日，他给世界佛学苑缙云山汉藏教理院演讲，并应太虚法师之请，写了“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十四个苍劲有力的隶书。

这本来是一副对联，冯玉祥这段时间，不论何人请他题字，他都首先要题写这对联词。原来这里面有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在这年春天，有位爱国人士曾树屏先生，愿为抗日捐款，想交给冯玉祥，冯在重庆特园康庄二号接待了曾树屏，曾先生表示要为抗日军捐献十万元，并当面缴纳了一部份。冯玉祥很高兴，当即给曾先生画了一张画，画面是一个老翁倒骑在一头小毛驴背上，并在画上题诗一首：“许多先生好乘马，惟有此翁爱骑驴，只要撵走日本鬼，无论如何皆欢喜。冯玉祥。三一，三，六。”同时又给他写了“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这副对联。曾树屏先生将这幅画和对联，悬挂在家里，不久，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便将其逮捕入狱。冯玉祥听到这个消息，气愤已极，但还未来得及营救，曾先生就死在狱中了。冯玉祥一气上了缙云山。这时，有人来乞画的，他首先就画一张“张果老倒骑毛驴”。有人要乞字的，他首先就写这幅对联词。五月十一日，《新华日报》便

披露了冯玉祥赠给柳非杞一幅《骑驴图》的题诗：

许多人们好乘马，惟有此翁爱骑驴。
祇要撵走日本鬼，无论如何皆欢喜。

诗中只有第一句中的“先生”改成了“人们”，第三句的“只”字改写成了“祇”字，其余全部与送给曾树屏的题诗相同。《新华日报》在发表这首诗的后面，在同一个特辟栏内，又刊登了一首《郭沫若先生题诗》。诗云：

有马借人乘，有驴独自坐。
骑去看梅花，板桥容易过。
骑去上战场，枪炮容易躲。
何必为龙始足豪，须知马大人显小。
其进锐者其退速，何如进退为一慢慢跑。
视死能如归，看花上阵两都好。

诗后有《跋》云：“焕章先生以名将而能善诗画，诗名妇儒皆知，而画却不轻易动笔。然其画之超脱，实有飘飘欲仙之意，观此为非杞先生所图可知也。”

冯玉祥寓居缙云山，目的是摆脱蒋介石的特务监视，策划奔赴陕北解放区。他把希望寄托在于志恭身上，派于到陕西具体安排联系。七月三十日，于志恭上缙云山与冯见面。冯玉祥向于志恭倾吐了北上的打算，派于立即动身去陕西，还写了一份诸葛亮《前出师表》、一幅中堂和“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这幅对联，送给于志恭。其用意是借诸葛亮“臣亮言，先帝

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教训蒋介石这个不争气的阿斗。中堂上写道："中华民国全仗你一个人来救呢！你敢不敢有此念头在心永久不忘呢！谁看不起你都不要紧，就怕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志恭弟台，冯玉祥。三一，七，卅一。缙云。”

后来，冯玉祥还画了许多水墨画，写了许多对联，寄去陕西，由于志恭卖作抗日献金。

“利他社”的由来

一九四二年初冬，冯玉祥受王荫槐邀请，在兼善餐厅赴宴，出席作陪的有北碚博物馆主任李乐元，美丰银行经理周以仕，宝源煤矿董事长蓝文彬等人。冯玉祥头戴灰色布帽，身穿灰色旧棉衣，脚穿一双半新旧的青色皮鞋，坐在首位。王荫槐以东道主的身份，坐在冯将军之侧，不住给冯玉祥奉菜。边拈边说："这是脆皮鱼。”“不要拈，我自己会来。”冯将军阻止道。

“这是下锅扎香，不是凉办，用腊月蘑菇、鸡蛋和花边油才弄得起。”王荫槐说得天花乱坠："这些菜只有兼善才有，在重庆没有别的厨师能弄得出来。”说着又往冯玉祥面前拈。

“够了，够了，吃不了这么多。”冯玉祥边推让边问："是哪位厨师，弄得这么好的菜，何不请他出来一起尝尝。”

厨师来到席前，王荫槐站起身对冯玉祥说："就是这位王师傅弄的。”回头又对厨师说："副委员长请你来共同饮杯酒。”

冯玉祥要王师傅坐下，王推辞说："我还要弄菜，没有时间陪副委员长，请原谅！菜弄得不好，请指教！”王师傅说完，向冯玉祥欠欠身，就回厨房去了，冯玉祥用目光送走厨师，沉思了片刻，停住筷子说道："这个师傅很谦逊，菜弄得这么好，还说孬，要请指教，这种谦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很难得的。”说罢

又靠着椅背思索什么。大家见他不吃菜，也都停下了筷子。

"噫，你们各人吃呀，不要等我。"冯玉祥虽然这么招呼大家，但自己仍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想法："这样好的菜，他弄出来让我们吃，他本人不吃……这是一种利他主义精神，须得我们提倡，凡是只要利他不利己，国家的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全国合作总社提出的口号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效法王师傅的精神，只提'我为人人'这句话，不是意义更大，事情更好办吗？我住在虎溪河，那里有个合作社，是合作总社办的，要我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几个字，我不写就是这个原因。今天在北碚吃一餐饭，很幸运，遇到了这位'利他'的师傅，我要把他这种精神作为座右铭，所作所为利他不利己。"停一会他又说："三国的曹操说，'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曹操想当皇帝，在座的没有人想当皇帝吧？所以，我说不要学曹操，要学王师傅的利他精神，只要人人都不利己，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冯玉祥一席话，深深地吸引着内堂外堂的顾客，他们似乎忘记了是在餐厅用餐。在座的人都聚精会神在聆听冯玉祥的演讲，莫不赞赏他的爱国爱民精神。果然，一九四五年底，冯玉祥在重庆发起建立了轰动一时的"利他社"组织，受到社会上的支持和称赞。陶行知先生在《颂利他工学团》一诗中写道：

让我们学习大地的伟大，
跳出自己的小圈，
来为大众服务，
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共甘苦，同悲欢。
……

冯公焕章，
烈血满腔。
本来是大将，
于今当团长，
深信兴学能兴国，
创办利他工学团。

保护育才学校

一九三九年七月，陶行知在北碚北温泉创办育才学校，不久迁往合川古圣寺。冯玉祥对育才学校十分关心。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准育才学校立案，进行政治迫害，经济封锁，经费极端困难，冯玉祥就用募捐来的献金资助，从五万、十万到三十万、五十万不等，解决了育才学校的燃眉之急。

育才学校所在的草街子的头面人物张登廉过去是土匪，受国民党笼络当了乡长。他在国民党合川县党部的指使下，经常派一些不三不四的地痞流氓到育才学校寻衅闹事。时而白天，时而晚上，对学校师生进行恐吓。冯玉祥将军知道此事后，以参观为名，到育才学校住了三天。并弄了一些枪支弹药给学校，亲自把青年教职工和年龄大的同学，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嗣后，这些地痞流氓都不敢胡作非为了，煞住了合川县党部的威风。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到育才学校抓人，大批地下党员转移到外地工作，党员老师戴白韬虽然离开了学校，但一时走不出重庆，特务搜寻很急。陶行知亲自把戴白韬送去冯玉祥家中隐蔽，并对冯玉祥说："特务要抓白韬，让他先在府上住几天吧？"冯玉祥满口答应："欢迎！欢迎！"后来戴白韬化装为国民党军人，由冯玉祥派了一位部下把他送出重庆，前往延安。

特务在育才学校扑了空，又强令要在学校中建立国民党区党部。经请示董必武同意，育才学校建立了一个假国民党组织，冯玉祥将军大力支持，给了他们五张国民党空白党证，把假国民党支部建立了起来，挫败了国民党企图打入育才学校的阴谋。

冯玉祥与育才学校关系密切，经常到育才学校访问。有一次，陶行知告诉他，音乐组有个优秀生叫陈贻新，得癞痢症，要求他帮忙设法医治。冯玉祥通过黄次咸找到一位由法国回来的医生，听说是陶行知的学生，愿义务治疗并捐药。黄次咸也主动捐膳食费，冯玉祥则负担来回路费。就这样，把陈贻新接到重庆医治，只用了两个月的功夫，就治好病，长出头发来了。

绘画组的同学画了很多画，举行画展，冯玉祥就满腔热情地鼓励支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小艺术家赞》，赞扬这些作品是"处处有意思，幅幅都秀拔。表现出天真，满眼皆奇葩。"音乐组的同学举行演奏会，他不仅多次亲自参加，而且在大家的热情邀请下，还与同学同台表演节目。一九四二年除夕，他们举行联欢，冯玉祥给同学唱了一首自编的泰山民歌《柴夫的儿子》：

爸爸（呀）上山去打柴，
日落西山方才回来。
百斤柴草百里路啊！
我得读书怎敢发呆，
我得读书怎敢发呆！

题名梅花山

北碚梅花山原名雨台山。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抗日名将

张自忠殉国后，冯玉祥商请卢作孚派专轮，从湖北宜昌将张自忠遗体运来北碚，落葬在雨台山麓。

张自忠是冯玉祥的老部下，他坚持抗日，"九一八"后血战喜峰口。"七七"事变爆发，张自忠又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最后血洒南瓜店。这样的抗战名将，还长期遭受蒋介石的非难和排挤。蒋介石在其嫡系中推行"拒绝冯玉祥，罢免张自忠，推倒宋哲元，拥护冯治安"的政策。所以，张自忠将军的灵柩到达重庆后，冯玉祥逼着蒋介石到江边登轮祭灵。十一月十六日张自忠落葬时，冯玉祥又逼着蒋介石到墓前奠祭。

张自忠殉国后，冯玉祥极为敬仰和悲痛。他在《哭张将军自忠》诗中写道：

我给公干看电报，看电未完已嚎啕；
师生之感能如此，为国惜师为最高。
二十五年如手足，教之载之为民族；
今已为国立奇功，死义成仁名万古；
为国牺牲军人分，死得其所复何恨；
国家损失真良将，如断我臂伤我心；
…… ……
我写至此泪湿衣，德全大哭叫"好的"，
我们谁人又不死，如此死法为第一。
随我朋友已服纱，个个决心把敌杀，
我要学习张将军，死在阵前不死家。

张自忠归葬雨台山后，冯玉祥借史可法殉国扬州梅花岭后于岭上筑衣冠墓的故事，遂挥笔题写了"梅花山"斗大三个隶书，

刻石立于张将军墓前，以表忠烈。从此，雨台山便成了梅花山。嗣后，每年五月十六日，冯玉祥将军都要在梅花山亲自主持祭奠。一九四二年初夏，陵墓将竣工时，冯玉祥写了“张上将自忠之墓”隶书墓碑，上款“民国三十一年”，下款“冯玉祥题”。

冯玉祥还为张自忠作了很多首挽诗和诔词。张自忠灵柩到北碚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一首悼诗《画眉》，悼念忠魂。随即又写有《哭张自忠将军》、《活关公》、《张上将自忠》和《名利》等诗词。他在《名利》一诗中写道：

什么名？
什么利？
什么值得细算计。
张荩忱，
为谁死？
为你死，
为我死，
为国死，
为民死，
我们还不自觉醒，
倒是等待到几时？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是张自忠殉国六周年忌日，也是抗战胜利后纪念张自忠殉国的第一个纪念日，冯玉祥特别重视。以往举行纪念会，都是育才学校音乐组师生来唱挽歌和奏哀乐。这一次他事前就特邀了一些知名作曲家和演奏家，从《张自忠将军纪念集》的挽诗诔词中，选出一些优秀篇章，分别谱写成歌曲。

如吴伯超把冯玉祥的悼诗《张自忠将军》写成混声合唱；马思聪把陈铭枢的古诗《千古香花祀英雄》写成混声合唱；夏之秋把易君左的挽诗《梅花山》写成无伴奏三部合唱曲；江定仙把卢冀野的《国殇》写成男声独唱；陈振锋写了一首钢琴独奏曲《悼抗日英雄》等等。这次祭典特别隆重、庄严。合唱的指挥由当年的孩子剧团团员、现中央乐团团长严良堃担任。在会场最显著的地方悬挂了一幅挽联：

张自忠将军殉国六周年纪念
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
再令生灵涂炭人民何堪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敬挽

祭奠后，当日冯玉祥又到北温泉住了一夜，次日晨才返回重庆。以后，冯玉祥将军就再没有来过北碚了。

重庆蒋宋旧居

王 抡 楦

抗战八年，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这里度过八年烽火岁月。当年，为了蒋氏夫妇的安全，他们在重庆住的地方属保密范围，知道的人并不多。邮局每天要把蒋氏夫妇的大批信件专送到德安里。德安里在何处？邮递员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曾家岩一带。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四十周年，我专门去参观了蒋宋旧居，结合我本人当时了解的情况写成此文，作为研究抗战史的参考。

蒋宋在重庆的旧居有四，即林园、黄山、曾家岩德安里和小温泉校长官邸。经过四十年的风云变幻及重庆的巨大变化，蒋宋旧居基本上保持原状。林园和黄山两处，经过培修和扩建，比当年更加壮丽。

且先从林园说起。

一

林园在重庆西郊歌乐山。传说我国古代的治水英雄夏禹与重庆南岸塗山氏之女结婚时曾歌乐于此，因以得名。

---

* 王抡楦，又名王能掀，四川南充人，现任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专员。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央日报社工作，历任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等职。

歌乐山属中梁山脉中段，海拔五百公尺，距重庆市中区二十五公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重庆近郊的著名风景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件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同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通告中外迁都重庆，由主席林森率领一部分政府官员乘军舰离宁赴渝，十二月一日开始在重庆办公。林森当时暂住李子坝刘湘的公馆，以后迁往歌乐山云顶寺。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介石来到重庆，在歌乐山双河街修建官邸。一九三九年官邸落成，林森与国民党要员前往祝贺，看见那里风光秀美，环境清幽，赞不绝口。蒋介石马上表示，将这座名园送给林森居住，因此，人们称这里为“林园”，至今仍沿用这个名字。

林森在林园住了四年。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上午，林森从林园乘车入城，准备到国民政府接受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林森的座车驶到山洞九倒拐转弯处，与美军卡车相撞，致使林森头部受伤，造成脑溢血症，于八月一日晚逝世，葬于林园。今林墓尚存，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林森在海内外的亲属，近年曾多次前来扫墓和凭吊。

林森逝世后，蒋介石将林园收回，加以扩建。新建大楼三幢，编为一、二、三号，林森原住大楼编为四号楼。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和宋美龄迁入林园，蒋住一号楼，宋住二号楼，三号楼为蒋介石办公和召开重要会议之用。宋美龄抗战末期赴美后，蒋经国曾住二号楼，有时作为外宾招待所。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来到重庆。当晚八时，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到林园晚宴。夜宿林园，毛主席住二号楼左室，王若飞住二号楼右

室，周恩来住三号楼。二十九日早晨，毛主席在花园散步，于小礼堂前林荫深处与蒋介石不期而遇，两人握手言欢，坐在石桌边畅谈，交换意见。三十日毛主席等才离开林园。

重庆谈判这一场斗争已载入史册，供千秋评说，而为一代风云人物作证的石桌石凳在林园经历了四十度春秋，今天仍保持原状，静静地留在花园旁边的林荫深处。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二十日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特使来重庆调停国共争端。二十二日马歇尔到达重庆，应蒋宋的邀请到林园作客，住在三号楼。三号楼前有一大客厅，后改为小礼堂，作为国民党高级官员作"总理纪念周"之用；蒋介石也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和召见部属。马歇尔住林园时，宋美龄常在此举行舞会，招待外国友人，因此，人称此地为"跳舞厅"。

一九四六年暮春，陈纳德辞去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职务，改由史东继任，宋美龄特别在林园小礼堂举行鸡尾酒会，欢迎美国空军人员。我得到美国新闻处中文部符家钦的电话，约我前往参加。当我与重庆各报记者进入林园时，蒋介石的侍从室人员逐一盘问每个记者的身份，大家很不高兴。《新民报》的采访主任浦熙修当即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对记者的侮辱。侍从室的人说："因为事先未得到蒋夫人的通知，所以要了解一下每个人的身份再说。"浦熙修说："那么，我们就走吧！"我们正走出大门时，侍从室的人又立刻跑来请我们回去，说是蒋夫人的电话来了，是史东司令通知美国新闻处请我们的，蒋夫人表示欢迎。这时，记者们很不愉快，坚持要走，侍从室的人一再挽留，并请我帮忙劝大家进去参加酒会。我感到左右为难，浦熙修向我说："你去参加好了，不然他们无法交差。"最后，只有我和《时事新报》的记

者等少数几个人参加了这次鸡尾酒会。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林园，归来，奉命写了一篇特写，刊登在重庆《中央日报》第一版上，题目叫《林园盛会》。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林园交给重庆市政府管理。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起，一度对外开放，重庆市市长张笃伦每逢春暖花开的时候，常在林园设宴招待重庆市各界人士，我曾数度参加，仔细参观过林森、宋美龄等的住宅。其中只有一号楼未对外开放，听说蒋介石的住宅和室内陈设，那时仍保持当年原状。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白市驿机场，再次进驻林园，林园又成为蒋介石发号司令的中心。当时在蒋介石身边的人有：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俞济时、曹圣芬、周宏涛等。陶希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和重庆中央日报社联系，与我有多次接触，重要新闻和评论多由他交《中央日报》发表。这段时期，林园冠盖云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来到这里，听候蒋介石的指示或会商大计。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蒋介石召见新闻界人士，我应邀参加。这是我解放前最后一次到林园。曹圣芬先与我作了简短的谈话，然后再引见蒋介石，地点又是当年我参加鸡尾酒会的小礼堂，可谓巧合。蒋介石当天身着黄呢中山服，神态萧索，他只简单问问我的家庭情况，鼓励我好好为“党国”工作。随后蒋介石对被召见的人讲话，痛骂大家不争气，才把国家搞得那样糟，说我们都对不起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这时，座中有人站起来说：“这是我们对不起总裁（指蒋介石)……”说着说着他竟嚎啕大哭起来。这次召见就在一场闹剧中结束。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重庆发生大火灾，朝天门一带繁华市井付之一炬，蒋介石原定九月三日发动十万人举行的反共大游行也因此流产，于九月十二日离开林园，飞往成都。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十五分由台北飞抵重庆，又进驻林园。十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渝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宣布复职，以国民政府总统名义发号司令。这时，距重庆解放只有三天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夜，解放大军直指重庆，蒋介石闻讯仓皇离开林园，偕蒋经国乘车到重庆市区巡视一周后，径投白市驿机场，于三十日晨飞往成都。这时，重庆南岸已闻枪声。

从此，蒋介石与林园永远告别了。

二

重庆是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之一，黄山官邸是抗战时期蒋宋避暑的地方，他们常住此地。

黄山原为重庆白理洋行买办黄云阶所有，故名“黄山”。此地前临凉风垭，左傍老鹰岩，林幽谷静，空气清新，夏季气温比重庆市中区低五六度。黄云阶嗜赌如命，曾在此地修建别墅，邀请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金融界大亨来这儿避暑，日夜狂赌，成为重庆有名的大赌窟。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初到重庆，曾应邀来此赌钱，一场豪赌，重庆美丰银行的老板康心如几乎把自己银行的本钱输光。当康心如心惊胆战地开出“墨条”（私人取款凭证）交给赢家杜月笙时，杜不动声色地拿出打火机把“墨条”烧了，连打几个哈哈说：“朋友们好玩嘛，怎么就认起真来了！”从此杜月笙就博得了川帮银行老板的好感。以后他也在黄山修了一座别墅，作为赌场。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蒋介石的侍从室选中黄山，将它购来为蒋宋修建官邸，划为禁区。

蒋氏官邸以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结构。云岫楼为蒋介石的住宅，松厅为宋美龄的住宅。

云岫楼为一座三层楼房，结构半中半西，矗立在官邸右面的高坡上。蒋介石住三楼右角，房屋三面皆有大玻璃窗，临窗眺望，重庆全景尽收眼底。云岫楼前面一峰独秀，原建有小亭，名望江亭，亭已毁圮，亭址仍在。

宋美龄的住宅松厅在云岫楼后面山下的幽谷里，为中式平房结构，走廊特别宽敞，为其特色。此厅为松林包围，浓荫蔽日，夏天在走廊小坐，松影摇曳，凉风习习，一片静寂，尘暑尽消。厅前院内原有两株丹桂，现已长成合抱大树，枝繁叶茂，宛如两把碧绿的巨伞笼罩全院。每到秋天，桂花怒放，香溢山谷，更为松厅生色。

云岫楼与松厅之间的深谷里，抗战时掘有防空洞，专为蒋氏夫妇躲避日机空袭之用。一九四一年八月，日本空军采用"疲劳战术"，以密集机群轮番轰炸重庆，曾猛炸黄山官邸，一颗炸弹落在防空洞口，未造成伤亡，引起一场虚惊。

蒋介石在黄山官邸门前左面山上建有云峰楼一幢，原备宋庆龄避暑之用，但宋庆龄一直未去住过。有年夏天，宋美龄约大姐宋霭龄和二姐宋庆龄去黄山消夏，她们三姊妹曾在松厅玩过一次桥牌，当天下午宋庆龄就回城去了。现在云峰楼重新修整，粉刷一新，当年楼下栽的小树今已成林。

蒋介石夫妇接待外宾，多在市中区曾家岩官邸和郊区山洞林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马歇尔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身份来重庆，调停国共争端，蒋氏夫妇特邀马歇尔到黄山作客，

住在云岫楼山脚下的草亭。草亭为一排中式平房，屋顶盖的是茅草，故名草亭。

黄山官邸原有孔二小姐住宅，在松厅对面，有正房二十六间，建筑面积达一千一百三十五平方米，是黄山最大的建筑群。云岫楼、松厅和草亭三处的建筑面积合计也只有八百七十七平方米，相形之下，孔二小姐的住宅可谓豪华。如今，改建为重庆市疗养院的病房，专供干部疗养和治疗慢性疾病的所在。

蒋介石夫妇住黄山时，最初由龙门浩乘凉轿上山，颇不方便。后来在南岸修建一条简易公路，专供他们上黄山之用。这条简易公路由南岸海棠溪四公里处盘旋而上，绕峰峦，穿深谷，傍悬岩，越峻岭，百折千回，始到黄山，行程颇不简易。现在，南山新建柏油公路，加之重庆长江大桥建成，汽车可由市中区直达黄山，行程比原来的简易公路缩短了五分之四，并且行车安全平稳。夏季洪峰到来，冬季浓雾弥天，汽车照常通行无阻，比当年方便多了！

三

曾家岩官邸是蒋宋在重庆市区的住地，编有门牌号数，蒋介石住德安里一〇一号，宋美龄住德安里一〇三号。当年人们知道有曾家岩官邸，知道德安里的人就不多了；个别邮递员知道德安里是蒋宋住地，但也不知道德安里究竟在何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会商和平建国大计。商谈的地点在曾家岩官邸，德安里一〇一号和一〇三号就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

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晚起，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王世杰在德安里一〇一

号开始商谈；九月二十七日起，改在德安里一〇三号继续商谈。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在曾家岩桂园客厅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重庆谈判这一重大事件已载入史册，曾家岩官邸也成为历史遗址供人凭吊。

当年，曾家岩官邸引人瞩目的原因还有，它是蒋介石抗战时期处理公务的地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简称侍从室）就设在这里。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就设有侍从室，规模很小。一九三七年一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改组，侍从室规模扩大，明确规定：侍从室“掌机要之承启传达，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动。”抗战时期蒋介石到重庆以后，侍从室的权力已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可直接指挥国民党的党、政、军各部门，形成国民政府的命令不如蒋介石的手令管用，侍从室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侍从室以蒋介石名义发布的手令，后来多如牛毛，也渐渐不起作用了。

侍从室人员的生活待遇比国民党政府其他机关优厚，工资加发三分之一，并免费供给伙食，外出穿着的呢料和哔叽料制成的中山装，也由公家发给。不仅如此，在侍从室工作一段期间，外放其他单位工作的人，也可得到较高较好的职务，所以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多认为到侍从室工作是向上爬的终南捷径。蒋介石身边的速记人员，皆由陈果夫亲自从中政校学生中挑选，经过他长期考察，毕业后才推荐给蒋介石。如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肖乃华、肖自诚、曹圣芬、周策纵等都是靠这个关系进入侍从室工作的。可是在侍从室工作的人行动极不自由，要经常随侍蒋介石，日夜不能擅自离开。周策纵于一九四二年夏天在中央政治学校法政系

第十期毕业后，经陈果夫挑选进入侍从室工作，因受不了这种约束，毅然脱离侍从室，自费到美国留学，现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系任教授，已成为国际知名的红学专家了。

四

蒋介石的小温泉校长官邸，在重庆风景区南温泉花溪中游的丛林深处，地极清幽，竹木葱笼，景色宜人。

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抗战开始，该校由南京红纸廊迁到重庆，从四川军人唐式遵手中租得小温泉的土地，修建校舍，在此复课。蒋介石经常到学校主持开学和毕业典礼，或专门给学生讲话，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特别在花溪畔修建西式平房一幢，供蒋介石休息之用，故称“校长官邸”。

南温泉以温泉著名。温泉出自建禹山，水温常在摄氏四十度左右，泉水含硫磺质，可治疗皮肤病及其他慢性病。小温泉为其支流，水温略低，该校修建有专门浴室供蒋介石使用。

南温泉不但以温泉著名，饮水泉也很有名。建文峰下的玉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将其划入公馆范围，禁外人取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汲其支流烹茶，味极甘纯，亲笔题“煮茶泉”三字刻于岩石上，至今犹存。著名的龙泉在高山上的龙泉洞内，取用不便，能品尝到的人不多。五湖泉为南温泉地区三大名泉之一，在仙女洞下的飞泉旁，取用方便，供附近农民饮用。五湖泉每逢天雨则浑，天晴则清，居民凭此以占晴雨，“五湖占雨”遂列名为南温泉十二景之一。中政校迁到小温泉后，五湖泉划为该校专用，蒋介石住校长官邸时，以专用木船运送五湖泉水供应。

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日本飞机突来轰炸该校，一颗炸弹正

中蒋介石的专用防空洞，因岩层坚厚，洞中毫无损失。另一颗炸弹投在该校办公室前面，地面被炸了一个深坑。陈果夫叫以坑为池，池旁栽种一些花木，布置成一个小庭园，命名为“三八园”，并亲笔题“三八园”三字悬挂于园门上。

一九四一年秋，中政校开学时，蒋介石去该校主持开学典礼，散会后蒋介石到三八园散步，学生们群集在园门口。后来蒋介石步上图书馆台阶，回首向学生点头微笑，忽然对当时的学校教育长张道藩说：“怎么这些学生仔这样矮呀？”张道藩慌忙答道：“因为校长站得高，学生们在下面，看起来他们就显得矮了。”蒋介石听了这番话含笑离去。事后张道藩在学校的总理纪念周会上说，幸好他临机应变，对答得体，不然蒋介石会不高兴的。

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三处也在小温泉办公。

侍从室原来只有第一处（主管警卫和军事参谋）和第二处（主管秘书、党政、宣传、外交和情报），均在曾家岩官邸办公。一九四〇年初，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掌握国民党政府的人事业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负责官吏任免，必须经过这一专门机构事先研究，提出人事资料，由蒋介石亲自核定，然后再交主管部门发布命令。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批准成立侍从室第三处，派陈果夫为主任，主持这一工作。因陈果夫患肺病多年，行动不便，特准将侍从室第三处设在小温泉，以“竹林别墅”为办公地点。竹林别墅原为阮姓地主所建，亦称“阮庄”。这样，陈果夫既可在小温泉养病，又可兼管中政校和侍三处的工作。

中央政治学校本来警卫森严，外人不能入内。侍从室第三处成立后，与校长官邸划为特别警戒区，中政校的师生也不准擅

入，更增加了人们对侍三处的神秘感。

陈果夫通过侍从室第三处秘密掌握国民党政府的人事大权，他的党羽因此渗透入国民党中央到地方政府，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为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所侧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国民政府改组，侍从室全部撤销，第三处因之结束。

蒋介石在小温泉的校长官邸现在仍然保持原状，当年门前栽有美国人士送蒋介石的雪松一株，今已成参天大树，亭亭如盖。

“皖南事变”与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

周　勇

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开始。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守势”的策略，提出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团结教育了中间势力，打破了日军趁国民党进攻共产党抗日部队之机进一步混水摸鱼的企图，从而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行径，挽救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总结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很有意义。

一、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方针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以后，其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了某些改变，即把以往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因此，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对华政策的这一改变，国民党政府也将政策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投降分裂倒退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

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〇年，在与日本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英美则要求中国放弃独立作战，加入英美同盟，因此，不断从财政、军火上加强援华抗日。这种国际形势，客观上加强了蒋介石集团的地位。蒋介石待价而沽，以投向日德意联盟或英美联盟来要挟另一方，因此他认为，这是打击共产党力量，完全掌握中国命运的极好时机。这既不会遭到英美的反对，又可以讨好日本，不向其进攻。在国内，由于桂系参加反共，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蒋桂（地方反共派）何（亲日派）的联盟，蒋的势力有所加强，因此，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起，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①

七月，国民党提出《中央提示案》，企图取消陕甘宁边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被中共拒绝。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发出致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对中共及其军队大肆诬蔑，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往黄河以北，企图把中共在华中的力量压到华北去。与此同时，国民党调兵遣将，准备向中共进攻，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面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因此，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一方面极力争取局势的好转，避免内战；另一方面又把重点放在准备应付国民党的投降和内战上。在蒋未动兵以前，对国民党采取缓和态度，利用一切办法，向国民

①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党当局和社会各界诚恳积极地说明，剿共就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分裂，中国共产党愿与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到底，决不容忍投降和内战。[①]因此，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驳斥《皓电》的造谣诬蔑和荒谬命令。但是，又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蒋介石认为中共《佳电》的缓和态度是不敢破裂的表示，正可利用来逼迫中共让步。因此，十二月七日，国民党政府下达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计划》；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齐电》，进一步作反共舆论动员。九日，蒋介石发布手令，要新四军限期北移；十日，蒋密令顾祝同，新四军如不遵令，"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②]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新四军军长叶挺率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沿事前经国民党同意的路线北移。次日，行至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部八万多人的围攻。新四军被迫还击，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十七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通令和谈话，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反共顽固派的分裂内战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

---

① 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

②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十五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

粉碎其进攻。①即政治上的全面攻势，军事上的守势，如果蒋介石已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合作，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在目前，我们必须以尖锐对立的态度回答蒋的进攻，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而且也不能团结全党全军，正中蒋介石各个击破的诡计。因此，《佳电》的缓和态度应予终结，转到尖锐对立和坚决斗争的立场。②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阴谋计划及其反动实质，并且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悬崖勒马，停止挑衅”，“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毛泽东最后声明：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猛烈反击，动员各方力量，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周恩来亲笔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悼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广大民众及进步势力表示对国民党愤恨，对共产党同情，认为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中国内战必然亡国。在香港的国民党爱国人士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当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③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和陈嘉庚等海外华侨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许多青年学

---

①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一四七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③ 《皖南事变资料选》第三六三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生、工人、职员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有的流泪，有的苦闷，有的愤恨，民怨沸腾。各小党派和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需要团结起来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因此，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等拟发起民主联合运动，要求与中共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救国会领袖邹韬奋愤激欲去陕北。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黄炎培等，一方面对被难新四军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对抗战前途表示失望。他表示，不论事情经过是非如何，国民党当局的处理方法都是“绝对错误”的，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感到“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表现恐慌，对中共同情。事变发生以后，各种物价更形高涨，外汇跌落，各银行无行市，汇丰银行停止挂牌，陈光甫等银行家停止向内地投资。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毛泽东的谈话发表以后，中间人士异常高兴，认为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办法”才能解决问题。①

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动还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分别拜会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表示：“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努力，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② 美国政府通过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③英国大使也要求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勿操之过

① 《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五八、二五九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② 〔苏〕瓦·崔可夫著，徐万才译：《在华使命》，第五十九页，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③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讨论稿），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编印。

急，以免迫成事变。除少数人外，大多数英美人士都认为，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与英美利益，因此纷纷发表文电，要求本国政府给中国当局以压力，迫使蒋介石集团慎重处理，不使事变发展成为中国的危机和日本的胜利。①

国际国内的形势，把蒋介石推到了被告的地位。当他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踌躇满志，凭借他在中、日、英美三角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为可以利用中共《佳电》的缓和态度，逼迫中共就范，先歼灭新四军，再收拾八路军，进而统治全中国。谁知事与愿违。他万没料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对他的反革命命令采取强硬的尖锐对立的态度，也没有料到国内舆论发生如此大的不赞成的反响，也没料到全国最大多数中间派及进步人士、海外华侨都站在共产党方面指责国民党政府。他更没料到，他把中共军队调往华北的部署，将损害日本的利益。因而就在他宣布新四军为"叛军"的第二天，一月十八日，日军调集七个师团乘虚而入，于一月二十四日在河南向蒋介石的剿共军队进攻，迫使国民党军仓促应战，丧师失地，破坏了他原来的计划。②凡此种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冯玉祥大骂何应钦搞阴谋，孙科表示忧虑，于右任愤慨地说何应钦欺骗了他，张冲（国民党与中共的联络代表）表示无脸见人（中共）。遭受日军进攻的国民党将领都感到上了亲日派何应钦的大当。许多老国民党员甚至说，"这样做恐至自取灭亡。"③蒋介石成了国内矛盾的焦点。

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蒋介石，被迫暂时改变初衷，在诬蔑新

---

① 《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五九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②③ 《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五八、二六〇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四军的同时，竭力向中外宣传皖南事变只是军纪问题。几次派他的代表张冲、张治中与周恩来商谈妥协办法，并于一月二十七日亲自出马，在重庆中央纪念周上发表讲话，把他在皖南一手制造的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制造分裂，消灭异己的严重政治事件，说成仅仅是一个“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极平常”的“整饬军纪”的局部问题。说它不涉及党派和政治问题，①以缩小皖南事变的严重意义，为自己下台，制造借口。

二、“前十二条”——中共提出拒绝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

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只是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和共产党的争取，他才被迫与中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这个原因，加上他居于执政党的领袖地位，以及他在抗战初期的一些积极抗战措施，因此，还能迷惑一批人，特别是中间派人士。但是，皖南事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惜破裂国共团结抗日局面的面目，他在把中共推到敌对地位的同时，也把自己置于了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因此，尽管中共在事变中遭受了损失，但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指出：“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是蒋一大失策，我们须紧紧捉住，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②使蒋介石及国民党不得不转入辩护地位。而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的演讲表明，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

① 王壮民编：《中共问题重要文献》第四十五页，大公出版社一九四一年版。
② 毛泽东致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电。

下，蒋确已从政治上的进攻转入防御，国共斗争将以新的方式出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使自己从政治上的防御转向进攻。

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致认为，皖南事变"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由于日蒋矛盾的存在，蒋介石还未公开对日妥协；英美又力图拉蒋抗战，不愿中国内战；苏联也反对中国分裂；全国人民巨大的反抗情绪，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所持的尖锐对立的态度，使得蒋介石在国共关系上从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将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政治方向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①

当蒋介石政治上转入防御，掩盖其反共罪行的时候，充分揭露他的狰狞面目，以孤立克服他的反动，争取中间势力，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延缓国共破裂的过程，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战。

按照预定日程，三月一日国民政府将在重庆召开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成立。成立之初，由于国共两党和各方面人士的努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力，它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共方面的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一直是参政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第二届参政会前夕，一方面利用参政会欺骗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在参政会内部大量增加国民党籍参政员，排挤取消了一部分进步人士。二月七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他注意蒋介石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他指出，蒋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蒋)非想个妥协办法，(否则)更加于他不利。"①正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企图诱骗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以粉饰皖南事变以来抗战营垒内出现的重大裂痕，和减少国内外各方对蒋的非难。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这一问题，乘胜进攻，彻底粉碎第二次反共高潮。

二月十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玉皇观约集各中间小党派代表黄炎培(职教社)、左舜生(青年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邹韬奋(救国会)、张君劢(国社党)聚谈。向他们通报中共对第二届参政会的态度：如国民党不根据中共一月二十日提出的十二条办法解决皖南事变，"则我们的参政员拟不出席"。②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各小党派代表对中共的立场表示谅解，主张中共向国民党明确表示，如不谈判"十二条"，共产党就不出席参政会。因为一旦共产党不出席，参政会就失去了意义，各小党派也可以此为借口不出席参政会。他们还主张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专门从政治上讨论国共关系与民主问题。会后，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可否以毛泽东等七参政员的名义，将中共所提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②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六二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条办法，提到国民参政会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至于小党派提出建立的党派委员会问题，应设在参政会外。二月十四日，中央复电同意。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我们的方针依然是政治上攻势，军事上守势。这样不仅不会破坏国共关系，只会拉拢国共合作。我们提出十二条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其中之一部分，而在于以此打退他的攻势，用我们政治进攻之手（十二条）来缝好蒋介石在国共关系上撕破的裂口。①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正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十二条：(一)停止挑衅；(二)停止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五)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邮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教；(十二)逮捕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电报说，“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②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将此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抄送各党派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多人。

公函发出以后，王世杰立即找国民党负责与共产党联络的代表张冲谈话，认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一些中间党派代表也感到时局严重，往访王世杰，要求必须设法解决。从二月十九日公函送达到二月二十日中午，张冲接连打电话发公函给周恩来，要求中共收回公函，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周恩

---

①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讨论稿)，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编印。

② 《新华日报》增刊，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

来拒绝了张冲的要求，他指出，近十天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依然严重，接连不断，实属无理之极，忍无可忍。张冲说，共产党一月二十日提出十二条虽已一月，举国皆知。但那只是宣传，并非公文。现在正式提交参政会讨论，蒋介石吃软不吃硬，对十二条中取消“一一七命令”和一党专政等条，决不会接受，势必与共产党翻脸。周恩来严肃指出，蒋的脸已翻一半。我们早已作好准备，让他下讨伐令，全国清党，查封《新华日报》，逮捕办事处人员等等。至于见蒋，决不会有任何结果。张冲还纠缠不放，要周代转延安，缓期两日提出公函。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目前不是国共谈判的好时机，见蒋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会来调解是必要的。我们的条件，一是如果能由各党派委员会在会外从政治上讨论党派纠纷及十二条，则不直接提到参政会解决。这样做，可以拉住小党派，为难国民党。二是国民党承认参政会延期开会，我们将十二条缓期提出，便于我们在会外扩大宣传。中央回电同意了周恩来所述对于国共关系的根本立场，强调说我们不拒绝谈判，但公函不仅不能撤回，还须广为散发。①

为了孤立中共，二月二十日，蒋介石宴请参政员，表示同意小党派的要求，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还提出增加委员人数，以便网罗更多的小党派成员。他还要张群、宋美龄出面活动，企图利用小党派联合组织党派委员会的心情，以略作让步来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目的。

二月二十五日，张冲往访周恩来，请求中共收回十二条，

①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一三、二一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他甚至说：为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周恩来坚决地告诉他，七参政员公函决不能撤回。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冲回答，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何应钦)；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出校对一次，以便蒋能见周。此外，张冲又提出了三点具体让步办法：(一)军事上，为国民党留个面子，声明只需八路军正规部队开往黄河以北，游击队可全部留在华中，还中共一个军编制，以补新四军之缺，并归还叶挺等；(二)参政会只请在渝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不要求中共七参政员都到会。另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讨论党派问题，蒋为主席，周为副；(三)国民党由蒋介石负责，停止军事进攻，解决政治压迫，再不许发生新事件。但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中共出席参政会，否则“一切无从谈起”。①

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②如国民党确有诚意，参政会延期两月，在此期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要求国民党派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讨论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立即约见张冲，在转达了中共的上述立场后，又转达中共中央二十三日提出的几点意见：(一)挽救国共关系的破裂，除请国民党及参政会实行十二条外，别无他法；(二)由于国民党不理睬中共十二条(周恩来已于一月二十五日交张冲转达蒋介石)，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三)如国民党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则可暂时不在参政会讨论，但谈

①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②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二〇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判在取得满意结果之前，中共不能出席参政会。（四）立即停止对中共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以证明国民党没有破裂的决心。[1]同时，还转交了叶剑英（中共中央代拟）致张冲的信。信中阐述了与以上意见相似的内容。张冲一方面指责共产党要破裂，另一方面一再要求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甚至说即使出席一人都可以。

张冲的所作所为表明，为了掩饰蒋介石制造的国共关系的裂痕，国民党英美派急切地哄骗共产党出席参政会为之捧场。而这期间，白崇禧等则以军事进攻相恐吓，亲日顽固派分子则以妥协投降来压迫。国民党哄、吓、压三策并进，流氓骗局，昭然若揭。中共只有拒绝出席参政会，才是揭穿这一骗局的唯一正确手段。

蒋介石见张冲与周恩来的交涉毫无进展，只得自己再次出马，拉拢小党派。二月二十七日上午，蒋会见了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会见时，张澜等提出：（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二）军队国家化，与党派绝缘；（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决议之实行；（四）成立各方面有关的委员会，以讨论并保证上项之执行。蒋介石做出让步姿态，表示原则上同意他们的四条意见。六位代表随即向周恩来通报。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共出席参政会的原则立场不会改变。各方面委员会可以在参政会外公开商讨十二条及一切国家大计，中共愿意参加，但名额应扩大。二十八日，中央电示周恩来，我党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一人组成，周恩来为中共代表。这个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它的任务是讨论各党派关系

---

[1]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一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和国家大事。①

经过蒋介石等人的拉拢和哄骗，中间党派不同程度地对蒋产生了某些幻想，对过去所持拥护中共不出席参政会的立场发生了动摇。接连几天，黄炎培、张澜、褚辅成、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八派，轮番奔走于曾家岩五十号，力劝中共再作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他们共同表示：只要共产党出席，蒋若再失信哄骗，愿与中共共进退。②周恩来、董必武耐心地向他们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和阐明中共的原则立场。提醒他们：不要上当，莫被各个击破。往往谈至深夜。

三、"后十二条"——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后一战

为了表示中共顾全大局、团结抗战的诚意，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团结教育中间党派，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提出"后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应编两个集团军(共辖五个军)；(二)华北、华中、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三)释放叶挺，充任军职；(四)释放皖南所有被俘干部，抚邺死难家属；(五)交还所有皖南人枪；(六)下令停止向我进攻；(七)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八)停止全国政治压迫，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被捕人员；(九)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周恩来为副主席；(十)周恩来加入参政会主席团；(十一)承认边区合法地位；(十二)承认敌后抗日政权。中央要求周恩来以口头方式向张冲提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让步条

①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二一、二二三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②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讨论稿)，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编印。

件。[1]当天，周恩来约见张冲，张冲表示不能作主，谈判僵持。

二十八日下午，国民党召集出席参政会的国民党员集会，宣布了蒋介石亲自提出的参政会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蒋中正、张伯苓、张君劢、左舜生、周恩来。如共产党不出席，则将周恩来改为吴贻芳。[2]当天，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两次前往曾家岩五十号，再劝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周恩来再次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不接受十二条解决办法，共产党就决不出席。

三月一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浮图关国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会前，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沈钧儒四人以及张冲，分别奉蒋介石之命，以蒋的名义再次请中共参政员出席，遭到拒绝。按大会议程，开幕式后即举行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席团。因中共不出席参政会，经黄炎培、张君劢提议，预备会议延期一天举行。八时半，黄、张再往曾家岩五十号见周恩来，最后劝告中共代表出席参政会。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共产党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而拒绝出席参政会，亦为海内外瞩目。正如周恩来三月一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现在"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3]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将不出席的立场坚持到底，电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决心不出席，亦不宜出外活动。"如

①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二二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黄炎培日记摘录》，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③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二五、二二六、二二八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所以，即使选周恩来为主席团主席也决不能出席。①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参政会问题，书记处反复分析形势后，认为，"蒋介石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②毛泽东认为，从当前的形势看，即使我们不出席，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皖南事变是蒋的错，举国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议，并非我之错，况且我已提出了让步条件(临时办法)。如蒋因此而采取更大的破裂行动，只会对他更加不利，加之国际上英德大战、英日冲突，形势已经不利于蒋了。只要熬过了目前这一关，就有好转可能。毛泽东指出，目前政治斗争空前尖锐，许多小党派已经转到蒋介石方面，在参政会内可能造成不利于我之空气，但这只是一时的，过一会即将起变化，小党派的话不可听信，他们的话是使我们上当的。③

三月二日清晨，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正式提出中共解决皖南事变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后十二条"），明确表示，只有国民政府全部采纳，并有明确保证，中共参政员才能出席参政会。该信送到会场，参政会马上令中外记者退席，召开秘密会议，会场大哗。随后，张冲致函周恩来，认为时间过急，等于哀的美敦书，并退回了周要他转蒋的公函。周恩来再次送去，告诉张冲，如再退回，

①②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二五、二二六、二二八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③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二八、二二九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即为国民党破裂国共合作的表示。但终为国民党政府拒绝。与此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致信黄炎培等中间党派领导人士，申明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原则立场。由于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的两个十二条解决办法，因此，中共七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

二届一次参政会的预备会在推迟一天之后，于三月二日上午举行，原被提为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之一的周恩来被取消，选举蒋介石、张伯苓、张君劢、左舜生、吴贻芳组成本届会议主席团。

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参政会赢得了广大进步势力的尊重。连中间党派的黄炎培都十分钦佩地说："贤才不堪为铁的纪律摧毁。"①而蒋介石则在世人面前狼狈不堪，因此操纵参政会，报复共产党。三月四日，何应钦在参政会上作军事报告，重弹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纪念周上讲话的老调，说皖南事变及其处理，只在"军政军令"范围之内，绝非"党派问题"，"政治问题"。当晚，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的参政员打气说，国共总有一天会分裂，仅就军事而论，三个月完全可以消灭共产党。但目前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②三月六日，他又在大会上就中共七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一事发表演说，采取一拉一打的两面政策，一方面诬蔑共产党先后提出的两个十二条解决办法，与日寇向中国提出的侵略条件"并无二致"，"令人悲痛伤心"，对十二条中涉及的军事、政治、党派问题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做出

---

①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二五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②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讨论稿)，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日。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编印。

“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①随后，又操纵参政会通过了王云五等六十四人提出的反共拥蒋动议，并由秘书处电告中共参政员。三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压，该报遂以留标题开“天窗”的方式抗议揭露。三月八日，中共七参政员电复参政会秘书处转全体参政员，同样采取一拉一打两面政策，回击蒋的进攻。电报陈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抗战与国内团结”的一贯立场，以及未能出席本次参政会的原因，进而再次声明：“泽东等接受政府之聘请，为团结抗战也。皖南事变以来，加之国共间之裂痕实甚深重，苟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②尽管如此，参政会在三月九日的大会上，仍选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驻会委员会委员。十日，二届一次参政会闭幕。同日，《新华日报》不经国民党当局检查出版增刊《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公布了中共未能出席参政会的真相。

国民党在参政会上其势汹汹，但这种虚张声势掩盖的是空虚、尴尬、难堪的实质。皖南事变后，由于中共在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迫使蒋介石从政治上的进攻转入防御。共产党进而利用出席参政会一事，先后提出两个十二条，使蒋不得不顾虑到全国分裂的危险。这时国际上日蒋矛盾并没解决，蒋介石不可能同时既反共又抗日；英美不愿蒋发动内战，放松抗日；苏联援华的力量及态度，也使蒋不能不慎重考虑。在国民党内部，政学系幕僚派及某些重要将领不积极赞成蒋反共，而参与反共的桂系又被蒋

①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纪录》第一〇五至一〇八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

② 《新华日报》增刊，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

趁机夺去部分地盘，蒋桂矛盾在发展。所有这一切，都逼迫蒋介石在从政治上的进攻转入防御以后，再退一步，停止这次反共高潮，缓和国共关系。所以，尽管他们在参政会上作反共讲演，通过反共决议，但参政会仍选董必武为驻会委员，会后蒋又约周恩来谈话。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最后一战，实则是为顾全面子的退兵之战。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四、国共关系的重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以《佳电》迎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以一月二十日的攻势（前十二条）对抗了他的高潮，以三月二日的后十二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参政会上的最后一战。这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变动。

皖南事变以前，蒋介石一直把共产党作为局部问题看待，由他在幕后策划的国共摩擦也主要表现为"地方性"军事摩擦。因此，往往由蒋以"领袖"身份进行"仲裁"。皖南事变和蒋的直接出面反共，使蒋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因此，他又极力缩小事变的影响，一再宣称，"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要求其所有宣传机器"不许涉及中共及第十八集团军"，[①]企图借此和缓进步势力及中间派对事变的反感。但是，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坚决揭露了他各个击破的阴谋，指出，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是企图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再消灭共产党，再消灭其他人民

①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通报第二号》（一九四一年二年三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〇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抗日力量。这是蒋介石准备投降的重大步骤。同时，又提出两个十二条，并拒绝出席参政会，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正面回答，把问题在全国公开。蒋的意图是把问题缩小，结果反而由军事问题扩大为政治、党派问题。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把新四军变成为一支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麻雀满天飞”，由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由三个省发展到七八个省。[①]因此，从皖南事变开始，国共间的摩擦和斗争，就由军事问题发展为政治问题，由局部问题发展为全局问题，由内政问题发展为外交问题。

“政治上的全面攻势，军事上的守势”是皖南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彻底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基本策略。它的提出及其运用（主要表现为围绕参政会的斗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明的策略思想和精湛的斗争艺术。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行着“既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延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时间，以利于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有抗日和反共的二重性。在抗日方面，他既与日本对立，又暗中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不惜破裂国共合作，发动皖南事变，但又不愿最后破裂。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破裂，但决不促进破裂，又尽量挽救破裂。而手段，则只能是以斗争求团结。这种斗争在当时的具体化，就是“政治上的全面攻势，军事上的守势”。

“政治上的全面攻势”是当时中共整个策略的主导方面。只有采取坚决的不妥协的政治攻势，才能使蒋不敢轻易破裂，从而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二〇〇页，人民出版社。

继续抗日。这种政治攻势的表现就是两个十二条和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如果中共当时不与国民党尖锐对立，而妥协退让（如放弃十二条，出席参政会），那么，待国民党度过了这一难关，就会得寸进尺，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投降活动。正是由于共产党坚持"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使蒋介石碰到了"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①才使他重新考虑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坚持抗战到底。同时，也教育了中间阶级。所以，毛泽东说："不出席（参政会）是千对万对的。"②在军事上，皖南事变以后，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日伪非常高兴，在南京召开庆祝会，汪精卫在会上宣称，"蒋介石近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很不错。"③因此日军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军，给蒋背后一刀。中国共产党如果在军事上对国民党也采取全面进攻的策略，使蒋两面作战，得利的只能是日本人。而国共在政治、军事上全面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势必使早抱"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最后下定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决心。况且，这种军事进攻也无胜利把握。因此，中共政治上采取全面攻势，尖锐对立，公开揭露蒋的投降反共面目，在军事上则取守势，以维护国共合作，不给日本以可乘之机。这样做的结果，既打退了反共高潮，又维护了国共团结，壮大了人民的进步力量，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因此，这种政治上的攻势，既是斗争的手段，又是团结的手段；而军事上的守势则反之，既是团结的手段，又是斗争的手段。"两者相反，正是相成。"④当斗争目的基本达到，国

①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日)。

③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二六〇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④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

民党力图退兵，缓和国共关系的时候，中共也采取了相应的缓和态度，使国共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充分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皖南事变及国共斗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不但导致了国共力量的消长，而且也促使中间阶级开始向左转。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策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所谓中间势力，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这个势力虽说容易动摇，但有很大的力量，他的政治动向如何，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所以，争取中间势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极严重任务"。①

在抗战初期，中间集团都表现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政治热情，但又对蒋介石心存幻想，依赖国民党政府抗战。随着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些中间党派深感势单力薄，既无力促使国民党实行宪政，又不能调解国共纠纷，甚至本身的前途也足堪忧虑。因此，一九三八年十月，由乡建派的梁漱溟在成都发起，联络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些小党派，在重庆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以第三者的立场，周旋于国共之间。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越来越不满意这个由蒋介石"钦定"的非党组织，希望"挺起身来，独树一帜"，②因此，又秘密进行改组活动。中共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加快了改组活动的进行和公开化。

当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中间党派深恐中共态度过于强硬，引起国共关系破裂，所以力劝中共让步，委屈求全，实际上帮助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〇五、七〇六页。人民出版社。
② 本文作者访问梁漱溟先生记录，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

了蒋介石。中共为争取他们，教育全国人民，对国民党采取了《佳电》的缓和态度。因此，当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中间党派完全同情共产党，赞成中共的强硬态度，同声指责蒋介石，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职位，出走香港，以示抗议。在二届一次参政会前夕，由于蒋介石出面，允许他们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各党派公开活动，因此，他们又对蒋产生幻想，转而再劝中共让步，出席参政会。中间党派内也产生了分化。中国共产党坚持了不出席的原则立场，以打退反共高潮的事实来争取中间党派，同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用各种方式广泛地与各小党派负责人接触，宣传中共的主张，消释他们的怀疑，批评他们的动摇，提醒他们不要受骗上当，使中间党派的绝大多数在这场大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团结"；①以妥协求团结，不但得不到团结，还会丧失共产党已有的地位，丧失中间党派已有的地位。因此，在参政会开幕前夕和会议之中，中间党派的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连续召开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筹备会议，于二届一次参政会结束后的第九天，三月十九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随后，派梁漱溟到香港创立机关报《光明报》，于十月十日发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十一月十六日，在重庆的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召开茶会，不顾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介乎国共之间的中间小党派组成的联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四一页。人民出版社。

盟，是中间势力政治力量发展的一件大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发生有利于进步势力的变化的重要标志。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策略、原则，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之一。这场国共之间的大斗争，开始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和中国政治的重大转折，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全国性大党，进入了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接对等谈判的新时期。

一九四四年的国共谈判

刘景修　武燕军

一九四四年，法西斯阵营已被打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在望。而在中国，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军事溃退，政治腐败，统治危机，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国共力量的消长引起了美国人的不安。美国政府曾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改革政治、缓和国共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这一时期出现过微妙的变动。

一九四四年的谈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谈判虽未解决任何问题，但谈判内容的公开及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却产生了极重大的影响。

一

一九四四年春，日寇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蒋介石为保存实力，消灭异己，继续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日寇的进攻不作认真的布署和积极的抵抗。致使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出现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第二次可耻的大溃退。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国民党损兵五、六十万，失地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使六千万人民陷入日寇跌蹄之下。

与此同时，国统区各阶层人民在国民党独裁统治和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在法币贬值、物价

飞涨的情况下，实际购买能力急剧下降。据国民党政府当局一九四四年九月公布的一个显然缩小了的比较数字说：职业工人工资较战前增加指数为二百八十倍，而生活费指数增加四百七十倍；产业工人的工资较战前增加指数为一百九十三倍，而生活费指数却增加四百四十七倍。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丢失了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却将田赋由一九四三年的六千二百万石增加到八千万石。当时仅四川一省的灾民就达二千万人之多。城市贫民生活之惨状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窥见一斑：一九四四年，重庆每日饿死街头无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重庆妓女总数在一万人以上，占当时青年妇女的十三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士兵的生活也很痛苦，普通士兵每月薪饷只够买三双草鞋。

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豫湘桂战役的可耻溃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端愤慨，国统区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民主运动再度活跃并日趋高涨。蒋介石独裁统治面临十分严重的危机。

然而，一九四四年解放区战场的情景却和国民党战场截然不同。解放区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持久抗战，战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四年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共对敌作战一万多次，毙伤敌伪军近二十万人，俘获六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三万人，攻克县城四十七座，据点五千余个，收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七百万。在战斗中，人民武装得到很大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民兵增加到二百万人。与此同时，共产党队伍也得到空前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春，共产党员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一万人。

解放区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政

府普遍进行民主选举，实行“三三制”，“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等一切自由”，开展生产运动，解决军民衣食问题。解放区还推行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民主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各根据地生气勃勃，面貌一新。

国民党统治日趋没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蓬勃发展。国共力量发展的这一明显趋势引起了美国人的不安。美国统治集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以史迪威将军及其参谋人员戴维斯、谢伟思和驻华大使高斯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强烈要求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在国共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共产党将必然会胜利”。①因而主张“不能无限度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府”，必要时“必须摆脱国民党的纠缠，而开始与共产党取得相当的合作”。②

国民党的军事溃退更加重了美国人的不满。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美国正在布署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计划，同时在太平洋战场上发动了对日本的新攻势。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努力作战，以牵制更多的日军。而蒋介石“把保持自己的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其重要”，③却把“大约三十万左右政府最好的军队留着不动，以监视中国共产党”，“这个原因也牵制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军队”。这是“不能有效地进行战争的主要障碍之一”。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人士也认为对蒋介石的支持“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⑤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中美关系出

①②③ 《高斯大使的悲观》、《驻华外交官员备忘录》.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三三、第五九九页。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④ 七月三日，孙科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的谈话.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二八页。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⑤ 七月十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给罗斯福的报告.见《中国通》第一四〇页。新华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现了转机的希望。

六月，华莱士以“调谐国共关系”为名，前来中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对“共产党问题”寻求“和平的解决”以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七月七日和八月二十三日，罗斯福两次致函蒋介石，让他“紧急考虑”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总司令，“统率中美一切军队”。美国人对蒋介石的这种压力一直伴随着国共谈判的进行，对于谈判无疑是有影响的。

迫于国内外局势和美国人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同共产党谈判，以装点门面，“作作样子给人看”。[①]

二

五月二日，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全国政治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促进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特派林伯渠为代表赴西安，从而开始了国共两党自抗战以来的第三次谈判。这次谈判先在西安后到重庆进行，从五月初开始到八月底告一段落，历时四个月。

西安初谈共进行了五次。谈判一开始，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就提出以周恩来三月十二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说的基本精神（即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循民主的途径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问题）为谈判的基础。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反对先谈民主问题，提出先谈军事及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同意。在军事问题上，林伯渠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敌后的正规军四十七万七千余人，都是久经

①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

考验对日作战卓有成绩的部队，应立即予以整编，目前可以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王世杰、张治中认为太多，只同意给四个军十二个师的编制。双方几经商谈，最后决定将历次双方会谈意见整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由两党中央再作决定。林伯渠按事先的约定首先在记录上签字，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却违背诺言，没有签字。

西安谈判是国共双方的初步接触和商谈。双方代表都陈述了各自的意见、主张和条件。由包括军事、边区和党的问题三方面内容组成的会议记录以及有关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均由双方代表呈报各自的中央。随后，谈判地点移到重庆。

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应邀赴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五月二十二日，林伯渠将中国共产党所拟定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交付王世杰、张治中。王、张阅后，认为所提太多，其中有些提法，无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的罪状，“足以使人生气”，不肯接受。

为顾全大局，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以示共产党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将原来的二十条改为十二条，把一些小问题改为备忘录。十二条包括了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中关于全国政治制度者有三条，即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有九条，主要内容为：编中共军队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目前至少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驻防地维持现状；承认陕甘宁边区及一切敌后抗日根据地；撤消对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停止对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的进攻；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两党均可在对方地区内出

版发行各自的党报等。

即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张、王再次借口中共所提十二条与前面所提“出入太大”，拒绝转呈国民党中央。同时，张、王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十八条交给林伯渠。该《提示案》分军事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党的问题三个部分。《提示案》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借口“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要求把八路军、新四军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要求解放区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坚持只给共产党四个军十个师的番号，对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予承认。至于各党派之地位，人民之集会、结社、人身自由以及释放爱国政治犯等问题，该《提示案》更只字不提。

六月六日，林伯渠致函王世杰、张治中，指出：国民党的《提示案》与共产党所提十二条，相距甚远，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同时也要求王、张将中共所提十二条转报国民党中央。六月八日，张、王复信，仍称中共十二条与西安谈判记录出入太大，不能转呈。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再次写信给王世杰、张治中，指出张、王二人拒绝中共正式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而只是片面要求林伯渠个人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六月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称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解决的办法仍照原提案不能变动，谈判遂成僵局。

为打破僵局，使谈判能有积极进展，七月三日，林伯渠约见张治中，就国民党《提示案》提出两点意见：(一)要求在政治问

题上，把民主尺度放宽。(二)要求按五个军十六个师扩编共产党军队。并转告张治中，中共中央欢迎王、张到延安商谈。张治中回答说：民主问题，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促其实现，中共军队允编四军十师“已经尽最大限度的容纳”。并表示只有在重庆谈出结果之后，方可考虑访问延安问题。七月二十三日，林伯渠写信给王世杰、张治中，再次邀请他们赴延商谈。

七月二十五日，林伯渠问王世杰、张治中国民党中央对我党所提十二条之具体意见如何，张、王回答说：《提示案》即为国民党中央的具体意见。会谈无法进行。

八月十日，王世杰、张治中写信给林伯渠说：中共所提之十二条，既未把服从国民党中央之军令政令统一列入条文，又未表示将服从国民党中央统一之政令军令，指责共产党不信守诺言，违反三民主义。信中还声明：政府提出的《提示案》对林伯渠在西安所提要求“已大部容纳”。信中又说，中共及一切党派之合法平等地位，将在抗战结束后行宪时给与；允许中共军队扩编为四军十师，已属“从宽核定”；至于解除对中共陕边的封锁及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得在本次商谈有结果之后，才能考虑。张、王还在信中要求林伯渠转告中共中央，接受国民党《提示案》并迅速答复。

八月三十日，林伯渠致函王世杰、张治中转呈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信中指出：王、张十日来信对我党的指责是“完全不合事实与错误的见解”，并对国民党在《提示案》和十日来信中的无理要求和对共产党的无端批评，逐一进行了批驳。希望国民党从抗战建国的利益上考虑问题，放弃一党专政的方针，认真推进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以争取全民抗战之最后胜利。随信又一次邀请王、张到延安商谈，以便看看我党是怎样忠

实履行四项诺言和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

三

至此，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固执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对谈判毫无诚意。

如前所述，蒋介石派人同共产党谈判即出于勉强。早在二月中旬到三月期间，国民党在接受中共谈判主张之后，即多次召开要人会议，蒋介石亲自出马，制定对策。其"对策"为："注意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原则上坚持，俾中外人士理解"；"对具体细目表示无不可以商量之态度"。①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拒绝民主改革，在一些小问题上虚于应付。国民党还利用宣传工具，诬蔑中共谈判代表到重庆是"作政治攻势"，"是作猛烈的政治宣传"，是在于"将中国战场的弱点暴露于世界"，是"以谈判不成为目的，而决不以谈判成功为目的"。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歪曲谈判经过真相，说谈判已使若干问题获得解决。此外，国民党还专门制订了监视林伯渠活动的计划。该计划如下："(一)即电西安令饬注意林到西安后之活动，并派员随车来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二)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三)发动同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来往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四)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五)控制其与外人接近，其与外人谈话，事先予以劝导，不得违背国家民族立

---

①② 《林祖涵来渝应付之要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一）、（三）二八二页。

场”。①

谈判过程中，国民党代表百般阻挠和破坏谈判的顺利进行，他们或则违背诺言，拒绝签字，事后大做文章；或则耍些无赖手段，拒不转呈中共所提谈判要求，并无视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合理主张，片面要求林伯渠个人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

相反，中国共产党完全出于解决问题的诚意，委曲求全，一再让步，多次打破谈判僵局。先是减少正式要求的条文，后是邀请王世杰、张治中到延安商谈，直到十月份，林伯渠仍写信给王、张二人，声明“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会有人来谈判的”。四个多月的国共谈判到此告一段落。

四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开幕。九月十五日，应参政员王云五、胡霖的请求，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公开报告了四个月来国共谈判的经过及毫无结果的原因。指出中国共产党盼望问题得到解决，希望国民党政府一切从抗日民主团结出发，接受共产党的合理要求。他声明“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需对政府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最后，林伯渠以个人名义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十月十日，延安各界集会庆祝双十节。周恩来发表了《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了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① 《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一)、(三)二八二页。

的具体步骤。即：(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二)国事会议，应于最近召开。(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国民党政府现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错误政策。(四)在共认的施政纲领基础上，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以代替一党专政的政府。(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由各主要军队代表参加成立联合统帅部。(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立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并在短期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

为使民主联合政府尽早实现，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四五年一月两次派周恩来到重庆同国民党商谈具体实现问题。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谈判仍无结果。

国共谈判虽然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但谈判内容的公开及中共关于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却对当时中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

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后，国民党极度恐慌。九月十六日，蒋介石为阻挠郑重讨论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民参政会上做报告，强调所谓“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要求共产党及其军队绝对服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拒不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一九四五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企图用召开“国民大会”的空言，来平息众怒，抵消联合政府主张的影响。说什么“一俟我们军事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

就及时“召开国民大会”。[1]一月二十四日，当周恩来与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就联合政府问题商谈时，国民党代表竟声称：“要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三月一日，蒋介石又在宪政促进会上发表演说称：“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两不相容的局面”；“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2]蒋介石公开拒绝了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企图玩弄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的把戏，继续保持其法西斯独裁统治。

然而，由于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一致拥护，它直接推动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召开了有五百人参加的宪政座谈会第七次会议。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钟天心、司徒德、王昆仑、屈武、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李璜、黄炎培、董必武、刘清扬、张申府、胡子婴等各界代表都到会。与会代表一致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成立联合政府。张澜在大会上发言说：“民国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入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兵，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3]章伯钧

---

[1][2] 转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

[3] 《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集会要求改组政府》，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

说："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①十月十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②等等。十二月二日，中国青年党也在《对时局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文件中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成立民主政府。

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纷纷发表文章、演说，要求民主。与此同时，广大工人、学生还通过举行游行等多种活动，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响应共产党的正确号召。国统区出现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六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之间有过多次谈判。一九四四年的谈判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次。这次谈判最重要的收获是中共公开提出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也使国共谈判进入了新的阶段。即谈判的中心由国共悬案问题转到全国政治制度问题上来；谈判不再只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事，各党派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都在过问，甚至连美国人也参加进来，而成为"举世关心的一件大事"；③从此，国共谈判双方的代表不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谈判的内容也不断公开。

这次谈判反映了战后中国两种前途之斗争，反映了抗日战争

① 《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集会要求改组政府》，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③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民主运动老战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时期“人民的战争路线”和“反人民的消极抗日路线”的斗争。通过谈判斗争，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真正面目，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国统区的民主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次谈判更为共产党积累了很多宝贵的谈判经验和教训，为以后国共谈判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重庆大轰炸与日军侵华战略

余　凡　陈建林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对中国城市滥施轰炸作为侵华战争的血腥手段，妄图以此“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在八年抗战中，重庆是遭受日寇野蛮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城市。综计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日机首袭重庆市区[①]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机空袭重庆达二一八次，出动飞机九，五一三架次，投弹二一，五九三枚，炸死市民一一，八八九人，伤一四，一〇〇人，焚毁房屋一七，六〇八幢[②]，损失资财难以计数，仅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即达五百万美元。

日本空军的野蛮轰炸，使繁华的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空前浩劫。但是日寇企图用残暴的屠杀来动摇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阴谋却始终未能得逞。

一、重庆成为日寇战略轰炸的主要目标

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军部曾制订“速战速决”的战略

---

① 日机对重庆空袭始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广阳坝机场投弹二枚，未进入市区。

② 根据原重庆防空司令部统计资料、当时的报刊资料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公布的有关资料综合计算。

计划，企图在三个月内全部结束对华军事行动，以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南进政策”。然而，战争的进程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迷梦，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日寇陷入了长期战争的致命消耗之中。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在攻占武汉以后被迫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当时，在日本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陆军首脑一致认为：“现在摆在国家面前有两大任务，一是处理中国事变，一是适应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作为战争的准备。”[①] 参谋次长泽田茂也在内部会议上承认：“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依靠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这些话充分暴露出日本急欲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攫夺更多的利益，同时又苦于中国战场牵制的矛盾状况。

日寇为了从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困境中挣脱出来，不得不改变前一阶段的侵华方针。它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当局实行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首相近卫发表所谓《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的声明，公开引诱国民党政府当局投降。同月，日本大本营对侵华日军发布了《大陆命第二百四十一号命令》，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宣称为了“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要开展“制空进攻战”，“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并制订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规定“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这样，自侵华战争以来以直接协助地面作战为重点的日军航空兵团，在占领武汉后就转向了重点攻击中国内地的战略要地。十二月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三卷第一分册第一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

下旬，日军航空兵团开始进行以重庆为目标的远距离攻击训练。

自南京、武汉失守以后，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日寇选择重庆作为战略轰炸目标，正是与重庆这一重要战略地位分不开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次年十月行政院决定将重庆改为直辖市。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政机关全部迁渝。一九四〇年九月四日定重庆为永远陪都，成为国民党在大后方的统治中心。同时，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各民主政团机构也驻在这里。

抗战爆发后，沿海工厂纷纷内迁，据统计内迁的民营工厂合计四五二家。迁入四川的占二五〇家，其中大半设在重庆及其附近，加上官营企业及陆续开办的新厂，大大改变了重庆地区的工业生产状况，使之成为大后方军需民用工业的重要基地①。重庆又是大后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它控扼长江、嘉陵江，具有良好的水运条件；它联结川黔、成渝、汉渝、川湘公路，沟通了西南、西北和东南地区的陆路交通；还辟有通达苏联阿拉木图、缅甸仰光、印度加尔各答的国际航线，及香港、贵阳、昆明、桂林、西安、兰州等地的国内航线。当时重庆市区不断展拓，较战前扩大二十多倍。市区人口急剧增加，一九三九年初达五十万人，一九四四年更增至百万人。市内设有商号、银行上千家，是大后方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呈现出战时首都的畸形繁荣。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轰炸重庆，势必造成大后方经济的破坏，人民厌战情绪的增长，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

---

① 林继庸：《民营厂矿迁川记略》．《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第一二八页，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战的意志和决心。

日军对重庆的空袭以占领武汉后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最为频繁猛烈，且有逐年增长之势。综观迭次大轰炸的情况，其特点是：每次轰炸投入的飞机多，规模大，为害极烈；轰炸时间多集中在五月至九月，持续的时间长；轰炸目标以人口稠密的市区为主，具有明显的大屠杀性质；轰炸行动与其整个侵略计划的实施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有着明确的战略目的。

二、汪精卫投敌和一九三九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潜离重庆逃往河内，二十九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三十日，汪精卫在对日本的“四点希望”中丧心病狂地提出“对重庆可施以致命的轰炸”，[①]以配合其卖国行动。日本也认为汪精卫投降后，会引起大后方人心的混乱，主和派势力的抬头，重庆政权的瓦解，因而是轰炸重庆、施加压力的有利时机，遂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航空兵团司令江桥英次中将命令第一飞行师团攻击重庆，第三飞行师团进行近距离策应。

第一飞行师团为了集中攻击以重庆为主要目标的四川，从二月下旬开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除补充装备和进行远距离飞行训练外，还故意减少空袭次数麻痹我方。

五月三日、四日，日本空军以突袭战术连续轰炸重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五三”、“五四”大轰炸。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二卷第二分册，第四十八页。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

五月三日，日机多架自沅陵经酉阳飞向重庆。中午一时十七分，敌机两批各十八架侵入重庆上空，沿长江北岸呼啸俯冲，向毫无设防的重庆市中心区狂掷爆炸弹和燃烧弹。顿时，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市中区陷入冲天烈焰、滚滚浓烟之中。当日被炸的有大梁子、左营街、苍平街、都邮街、一牌坊、储奇门、太平门、商业场、神仙口、陕西路、西四街、朝天门、玛瑙溪等处。市中区二十七条主要街道有十九条几乎被炸成废墟，大火漫延，至夜不息。到处是焦土烟火，死尸枕藉，甚至树枝上也挂着断臂残肢，令人惨不忍睹。

五月四日，日机二十七架再度空袭重庆市区，对都邮街、小梁子、夫子池、七星岗一带狂轰滥炸，使这一地区遭到彻底破坏。火头达十四处，水电设施均遭毁坏，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遭到炸弹袭击。

总计“五三”、“五四”两日，重庆市区房屋被毁二千余幢，市民死亡二，六四八人，伤三，六六八人。财产损失惨重，单是都邮街一带被焚毁的绸缎商店就有十五家，损失布匹一六七，二〇〇匹；全市三十七家私营银行有十四家毁于弹火。

从五月至十二月，日机除重点轰炸重庆外，还袭击了四川各地，成都、乐山、泸州、梁平均遭轰炸。

统计全年日机空袭重庆三十四次，计八六五架次，投弹一，八九七枚，毁房四，七五七幢，炸死市民五，二四七人，伤四，一九六人。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一九四〇年日寇轰炸重庆的“一〇一号作战”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并与英法交战，欧洲

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之中。日本大本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牵制了英法的力量，正是它在亚州趁火打劫、扩大侵略的时机。当时日本政界中普遍流传着“不要错过公共汽车”的暗语，“南进良机热”和军国主义情绪一齐高涨。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在组成新内阁后立即发表声明：“帝国……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为此，日本从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成立了统率在华全部陆军部队（东北地区除外）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加强对中国抗日力量的军事打击；扶植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的殖民政策；加紧对国民党政权进行诱降的“和平工作”。为了配合上述战略政略措施，日本在对中国内地进行轰炸的同时，还发动了地面军事进攻。

日本陆军统帅部认为单纯对中国内地轰炸收不到真正的效果，必须配合以军事上的进攻，才能收到双重效果。因此选定在日军进攻宜昌之后，实施空中进攻作战。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并把这次轰炸行动的代号定为“一〇一号作战”。其作战方针是“进攻内地，以挫伤敌人的抗战意志”。作战时间预定自五月中旬起约三个月时间，第一期主要是对重庆方面作战，第二期主要是对成都方面作战。投入的航空部队有陆军第三飞行师团和海军联合空袭部队，以武汉、孝感、运城为起飞基地。

五月十八日，日本海军联合空袭部队对重庆和成都实施攻击。为了打击中国空军的战斗力，首先袭击了重庆附近的白市驿机场和梁山机场。五月二十日，把攻击重点转向重庆，集中力量轰炸市区和工厂。

六月，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师团参加空袭，协同海军攻击重

庆，尽管中国空军和地面炮火进行了阻击，但因力量薄弱不能阻止日机进入市区。金陵兵工厂和江北区遭到毁灭性轰炸。

七月至八月，日本以更加密集的机群轰炸重庆。八月十九、二十日，日本陆海军每天出动飞机一百四十多架，创造了轰炸重庆以来一次使用飞机的最高纪录。并首次在中国战场投入十二架最新式的“零式”舰上飞机配合进攻，企图在摧毁市区的同时一举歼灭中国战斗机。国民党空军在空战失利后转移到后方机场，市民讥之为“飞机躲警报”。敌机因而肆意逞凶，重庆市区在连续轰炸下损失惨重。据美联社报道：自十九日一时三十五分至二十日十四时，重庆连续四次遭受轰炸，使西部商业区、郊外及江北的广大地区遭到破坏，三十八处起火，殃及民房和商店二千户以上，死伤达数百人。重庆街道几已无法辨认。

进入九月，日本为准备进攻法属印度支那，将第三飞行师团调往华南，下令结束对内地的攻击。从五月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历时一百一十天的“一〇一号作战”才宣告结束。据日方统计：陆海军对重庆空袭的日数达三十七天，投入飞机二，〇二三架次，投弹一〇，〇二一枚（一，四〇五吨）。在“一〇一号作战”中日本有三八七架飞机中弹，十六架被击毁。

一九四〇年重庆遭受日机空袭八十次，计四，七二二架次，投弹一〇，五八七枚，死亡人数四，一四九人，伤五，四一一人，毁房六，九五二幢。

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孤注一掷：一九四一年日寇对重庆的“疲劳轰炸”

一九四一年是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一年。在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在占领大半个欧洲后，于六月二十一日向苏联发动了疯狂

进攻。战争初期，德军长驱直入，进展迅速。日本深信德国将击败苏联，并以此为依据制订了夺取东南亚的南方作战计划。由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近百万兵力，成为悬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头上的一把利剑。

因此，如何尽快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以集中军力实行南进，就成了日本统治集团的当务之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一再向大本营和天皇建议："最主要的问题是处理中国事变"。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岛田繁太郎也认为："中国事变进入了后期，即进入了战略的最后阶段。为了迅速解决事变，需要更加积极、勇猛地进行攻击"。为此，日本大本营发出了《大陆命第九百二十五号命令》，指示侵华日军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倾其全力投入夏秋作战，发挥空中和地面的综合战力展开全面攻势，"以期彻底地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企图"。

从五月开始，日伪在江南地区施行"清乡"，在华北地区施行治安强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残酷扫荡，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对国民党军发动了长沙作战，以围歼其主力。为了配合地面进攻，同时布署了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轰炸——《第五次内地空中作战计划》，并把重庆再一次作为战略轰炸的重点，预定在第三期连续攻击重庆。

日军集中了它在中国的大部分机动航空兵力来实施这一攻击。计陆军方面有第一、三飞行师团，以及从东北调入的第十二、九十八战队（均是重轰炸机），海军方面有第十一航空舰队（最新的一式陆上攻击机约一百八十架），以武汉、孝感、运城为起飞基地。

一九四一年夏季是敌人兽性轰炸最酷烈的时期。日机大规模轰炸了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昆明、长沙和中共中央驻地延

安等内地城市，甚至连西宁、西昌、松潘等边远地区也未能幸免。

日本海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从五月三日至七月中旬连续对重庆进行了二十二次空袭；十一航空舰队自七月中旬加入对重庆的攻击；从八月起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轰炸重庆，轰炸目标包括居民区、商业区、军政机关、工厂、学校等，从而使对重庆的摧毁达到了空前惨烈的程度。

五月三日，日机六十三架分两批由武汉飞袭重庆，于中午十二时许侵入重庆上空，投弹二百余枚后向东逸去。毁房屋五十余幢，炸死五人，伤十一人，市区六处起火。

进入六月，敌机空袭更加频繁。日本空军采用疲劳战术，或以密集机群轮番进行轰炸，或以小批机群不断临空骚扰。八月初至中旬，敌机连日空袭，以每次六小时间隔持续轰炸重庆，并借月光照明进行夜袭。八月十日至十三日，市区发空袭警报十三次，警报时间长达九十六小时。敌机在市内各处投下大批爆炸弹和燃烧弹，使山城整日笼罩在烈火浓烟之中，民宅商店毁焚大半，水电设施多遭破坏，救火工作几至中断。国民大会大礼堂、蒋介石黄山官邸均遭轰炸，座落在日本划定的所谓安全地带南岸的英国使馆也被全部炸毁，停泊在长江江面的美国军舰图图拉号亦被炸伤。在日机的疲劳轰炸下，加之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六月五日发生了重庆大隧道惨案，近万人在洞中窒息而死。

九月以后，因日美关系渐趋紧张，日本全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航空部队纷纷南调，才结束了对中国内地的空中攻击。此后，日本空军受太平洋战争牵制，再也无力发动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了。①

---

① 一九四二年日机空袭重庆二次，未投弹；一九四三年日机空袭重庆九次，计三四八架次，投弹一五一枚，炸死二十一人，伤十八人，毁房九十九幢。

一九四一年日机空袭重庆八十一次，计三，四九五架次，投弹八，八九三枚，炸死二，四四八人，炸伤四，四四八人，毁房屋五，七九三幢。

五、一个流产的阴谋：《重庆作战》的出笼和中止

经过持续三年的残酷轰炸，日寇妄图从空中摧毁重庆的战略彻底失败了，但其亡我之心未死，并酝酿着一个更大的阴谋——从地面攻占重庆，这就是一九四二年间在日本大本营和侵华日军司令部中很热闹了一阵子的《重庆作战》计划。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得逞，并连续攻占东南亚各地。次年春又在缅北击败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切断了我国对外的主要交通路线——滇缅公路。“大东亚战争”的一连串“辉煌”胜利，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沉浸在狂喜之中，更加自信“皇军的无穷威力”。

一九四二年四月，日本陆军统帅部田边参谋次长赴华，与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华北方面军首脑等人秘密策划“今后对华战争的指导问题”，并一致认为：日本帝国为了准备今后长期的日美战争，积蓄国家实力，必须竭尽全力处理中国问题，尽快迫使重庆政权投降。关于对华作战的方向，华北方面军要求实行进攻西安和延安的作战，派遣军则主张进攻重庆和成都。后宫表示：我历来主张进行四川作战，先占领成都，然后向东进攻重庆。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主张在作战中不要触及同延安对峙的胡宗南第八战区，应利用蒋军进攻共产党，促使国共矛盾激化。

五月，日本大本营表示今年九月进行西安作战，根据情况明春进行重庆作战，并指示华北、华中日军司令部迅速制订作战计

划。

六月，大本营又改变主意，开始研究由华北日军突破秦岭和大巴山，华中日军沿长江进攻四川的计划。这一改变是因为大本营考虑到：仅仅进行西安作战难以收到预想效果，只有扩大为重庆作战，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或崩溃，才能达到迅速结束大陆作战的目的。

七月九日，陆军统帅部决定实行重庆作战，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在当天召开的陆海军部局长会议上，海军当局对这一作战计划表示同意。九月三日，参谋总长杉山和陆相东条英机，将计划上奏天皇获得批准。

次日，杉山发出了《大陆指第一千二百五十二号指示》：宣布实施对重庆作战的准备。

陆军统帅部制订了这一计划的作战要领，取名"五号作战"。规定其作战方针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克重庆，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预定于一九四三年春季以后发动进攻。由第五方面军、第十一军和第三飞行师团担任主攻部队。第五方面军（十个师团）由西安至广元和汉中方向进攻四川，占领成都；十一军（五个师团）沿长江攻入四川，占领重庆，然后以部分兵力固守该地，扼制长江，扫荡附近地区。预计全部计划的实施约需五个月。①

这个计划一出笼，就陷于物资匮乏、兵力不足的困境。陆军预计这一战役的规模将超过南方作战，需要十万吨船舶、五万吨钢铁、五万吨汽油等作战物资，并求助于海军，海军表示无能为力；同时还需要集中十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这对于战线漫长、

---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译稿）。上册第三十四页至四十一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

兵力分散的侵华日军也是一大难题，但日本陆军统帅部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发动进攻。

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在正面战场对日军采取守势，加之外援减少，国民党军队普遍士气低落。从以后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大溃退这件事可以设想，"重庆作战"一旦实施并不是没有威胁性的，它必然会给大后方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仅存的半壁河山也会受到惨痛的蹂躏。

但是历史并不是按照侵略者的狂想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正在迅猛发展，已在华北、华东、华中广大地区形成燎原之势；广大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迫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敢步汪精卫的后尘；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也在顽强抗击着敌人的进攻，这一切都使日寇在中国战场面临着灭顶之灾，也使"重庆作战"潜伏着自取灭亡的危机。当时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个参谋胆战心惊地在手记中写道："（重庆作战）搞得不好，有可能自行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愈加不利于日本。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和北非战场迭遭失利，日军在太平洋上发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继中途岛战役后也以失败告终，日本大本营笼罩在一片阴暗的气氛中。

日本为了挽回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不得不将军队和物资调往南方。这样，就使兵少力绌的"重庆作战"更是变成了空中楼阁。十一月十日，大本营向侵华日军首脑宣布：重庆作战在一九四三年已无希望。以后又正式下达了《大陆指第一千三百六十七号指示》，命令中止作战准备。这一阴谋计划的取消，在侵华日军首脑中引起了很深的危机感。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在当天（十

一月十日)的日记中哀叹："如何才能寻求出路，保持一线光明。"次日，总司令官畑俊六也在日记中写到："各方面的形势不甚有利……颇为悲观，实在难办。"

这样，"重庆作战"计划出笼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夭折了。

* * * *

从一九三九年日寇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击到一九四二年"重庆作战"计划的流产过程表明：它已丧失了在中国战场的战略主动权，日益陷入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穷于应付的困境。

日寇的轰炸，严重地危及到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大后方人民的生命财产。国民党政府当局采取若干防空措施：成立重庆防空司令部，在海棠溪、鹅岭、石桥铺、枇杷山设立总共只有几十门高炮的防空阵地，以及疏散市区人口、修建避难设施……但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力量薄弱，不能建立起更加有效的防空系统，而使重庆人民在敌机肆虐下蒙受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但它所带来的并不是"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被摧毁，而是日寇"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阴谋的破产。日本军国主义者在重庆犯下的种种罪行，重庆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

郭 伟 波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晚上，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发生了一起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

笔者当时亲历惨境，侥幸生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现将现场情况如实写出，公诸于世。

一、日机轰炸下的重庆

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日寇沿长江西进宜昌，窥视重庆，动用大量空军力量日夜轮番空袭，对重庆市区进行惨无人道的“地毯式”轰炸。

重庆是个多雾的山城，每年深秋季节，一到黄昏就大雾弥漫，翌晨八、九点钟才雾散天晴。雾季要延续至第二年春、夏间方才结束，这段时间能见度低，日寇飞机前来空袭的次数比平时少，晚上一般也很少来，重庆市民可以睡得略为安稳一些。

在日机的疯狂轰炸威胁下，国民政府的机关团体都占住了依山的有利地段，建造起各自的防空洞。而一般市民无法可想，只有去钻公用的防空洞，这些公用防空洞的地形都不好，设备尤其简陋。因此，当时很多人都在日机空袭时纷纷疏散到重庆的江北、南岸和近郊去躲避。

二、重庆大隧道的结构和设备

重庆市的防空大隧道建在市中区的十八梯附近，它是一条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约十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两公里长、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的大隧道，专供一般市民躲避空袭所用。

大隧道地面进道的洞口较宽，阶梯用石板石块砌成，阶梯尽头与地下隧道接合处有木栅制成的大闸门。每当敌机起飞、并向重庆方向飞来时，下川东一带的监视所即向陪都报警。此时，重庆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出第一次警报，市民闻警即行疏散，大隧道也打开闸门，让市民进去。但是，一旦敌机迫近，响过紧急警报之后，大隧道的闸门便要关闭，由防护团在闸外阶梯上把守，不再让市民进出。

大隧道是抗战开始后仓促修建的，隧道内宽、高均约两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点上一盏油灯，除此之外别无其它设备。隧道内既无支柱，道壁也未砌砖墙，上面也无水泥结构托顶，什么通风、防火、防毒、医药、电话通讯设备等等，一应俱无。

每遇日机空袭，市民如不到（或来不及去）郊外疏散，均扶老携幼，携带金银细软，进大隧道躲避。原因是一怕被炸死，二怕如果不进洞会涉及“汉奸”之嫌，所以都不愿留在地面上。尽管大隧道设备不好，但它是免费开放的，设备较好的防空洞不是由政府机关专用，就是要按人收费。因此，市中区的市民一般都往大隧道里跑。

三、日机夜袭重庆

一九四一年仲夏，重庆雾季甫过，停歇了很久的日机夜袭又

开始了。六月五日下午六时，空袭警报的汽笛长鸣。笔者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班三期受训，全班学员六十多人在警报的催促下草草吃完晚饭，就匆忙集合跑步到大隧道，从唯一电影院附近的隧道口进入地下。军委会外事班学员本来按规定是可以进入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处所属的另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的，但当时军统内部人事摩擦不让学员进洞，外事班学员才被迫进入民用的防空大隧道。

按往常的情况，从发出初次警报到发出紧急警报多在五十分钟到一个钟头之内。紧急警报发出后再过五十分钟左右，日机便会飞临重庆上空。敌机往往是轮番来回轰炸，因此人们有时要在防空洞里躲上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时间。

当时因久未有日机夜袭，市民毫无准备，闻警后疏散不及的大都涌入大隧道内躲避，人数比从前激增一倍以上。原容积约可容四、五千人的大隧道内，这天涌进了近万人，除洞内两旁的板凳坐得满满的外，连中间过道上也全都站满了人，显得特别拥挤，严重阻碍了空气的流通。

下午七时许，紧急警报响过，照例由防护团在外面关上闸门，断绝了进出。我和外事班同学黄鹤龄、谭锡麟三人坐在离闸门十米左右转角处的板凳上，因我们都是广东人，每入防空洞是不肯往深处走的。

四、惨案发生

晚上九时左右，万恶的日机又在重庆投下了大批炸弹，隧道里听得见一阵阵闷雷似的爆炸声和感到一股股震动和摇撼的冲击波。这时麕集在洞内已有两个小时的人们已经觉得浑身焗热，呼吸不畅，隧道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闪烁不定。稍有知识

的人都明白这是洞内氧气缺少，二氧化碳奇增的现象，情况开始严重了。

大隧道内的气温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死亡的危险已威胁到整个隧道里的所有避难者。但是人们仍旧保持沉默，谁也不想自己首先作出什么举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忍受着挤压、闷热和呼吸困难的痛苦。

缺氧越来越严重，婴孩和儿童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多。部份油灯开始熄灭，大祸临头，谁也不愿再坐以待毙。于是，忍耐转为紧张，斯文变成粗野，人们不约而同抢着向洞口挤去，只想尽快出隧道，上地面。

我发现事态严重，立刻站起身来与谭、黄二人随着人流向隧道口涌去。谁知，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群汹涌而来，把闸门挤得打不开，欲出无路，欲退不能。前边的人群被挤压着贴在闸门上，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有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

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三十米，周围有一百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

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五、触目惊心的死亡惨状

我竭力定一定神，环视四周，又发现另外有几名同学蹒跚地走着，活象是一个个幽灵。隧道中传来的叫声十分凄惨，我便和两个同学转身跑进隧道，想去援救自己的同学。

我们一进入大隧道，闷热而带有臭味的气流迎面扑来，使人不得不捂住嘴巴。木闸上吊着煤气灯，灯光下展现出一幅惨绝人寰的可怕图画。

地下隧道与阶梯结合部，即闸门所在之处，堆压着二、三十具尸体，堵塞了通往隧道口的道路。在这堆尸体后跪压着无数在拼命挣扎、厉声惨叫而又无法冲出来的人。他们象江里的木排一样，一排贴一排地挤压着。最前面的人俯伏在尸堆上面，后面的人压住前面人的腿，第三个又跪压住第二个人的腿，第四个、第五个……他们谁都无法抽出身体。通道已被堵塞死了，而隧道深处的数千人仍旧拼着力气想向外挤，致使前面的人群越挤越紧，越压越重，根本爬不起来。人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死亡前发出最后的哀号。

隧道里冲出来的气味更加烫热带臭，我们只好用手帕沾湿了水叼在嘴上权当口罩，跑到阶梯的最后几级。从无数遇难者中，我们看到有六、七位外事班同学被夹在人堆中挣扎。我们隔着尸体探身伸手去拉他们，摸到了他们的手却无法把人拉出来，用尽气力也拽不动他们，只好跑到洞外附近的店堂里敲开门户，借来水桶，搜集到一些茶水送进隧道里，用杯碗盛给离我们最近的遇难者喝。对远处的人，我们无法送水，只好干脆将茶水朝他们脸

上泼去，希望他们藉这茶水减少一些痛苦，多延长一刻生命去等待救援。

空气实在稀薄，每隔几分钟我们就被迫要到洞外去换换空气，商量一下又跑进去，心中仍想着营救同学。我们解下皮带，与借来的绳索连结起来，将一端抛到一位同学身上，用手势（因喊声嘈杂）示意他把绳子系住腋下，我们好往外拖拉他。然而这个办法失败了，那位同学的身体不但没有拉动，反而面容大变，双手乱摆，示意我们不要再拉。我们见到他那痛苦的神情，知道再大力拉下去，腰腹即使不拉断也会加速气绝死亡，只好又跑出隧道，茫然无策。

事后我们才了解，当时因隧道内没有通风设备，人多空气少，缺氧导致了普遍的窒息。少数离洞口较近的人幸能吸到一点微薄的新鲜空气，尚有残力冲上阶梯走到地面，我当时就是凭这仅有的条件幸存生还的。大多数离洞口较远、挤压时间较长、呼吸不畅的人，早已是精疲力竭，神志昏乱，虽勉强挤到闸门外，却无力再跨上台阶，一步踏空就被石级绊倒，被后来者践踏、挤压。结果，最前面一群人就这样被压死了，后来的人虽然未死，却又象木桩入地一样动弹不得。他们只有上身躯干还能动动，于是双手挥舞，嘶声喊叫，面色红胀，口角粘着胶状泡沫，衣服因窒息难受，自己抓扯得稀烂。

六、死神降临

晚上十点多钟，马路上开来两辆小车，从车上走下好几位官员和卫士，有人认识他们是刘峙、贺国光等国民党高级官员。这些人一下车就被在场的群众团团围住，刚交谈几句，东边天际又响起隆隆的马达声，日军飞机又来进行疲劳轰炸了。官员们大惊

失色，也不到隧道口去看一看就仓皇乘车溜走了。日本轰炸机再次轰炸了重庆。

大隧道惨案在继续发展，遇难者仍在拼命挣扎、狂叫。突然，有一、二十人从隧道深处跨越人丛的头顶，连踩带爬的摸出来获得新生。他们原在隧道中部，开初因缺氧休克而倒地，没有随人流挤向道口而留在原地。大批人群涌走后，隧道中部变得空荡荡的反而便于呼吸，所以他们躺了一阵清醒过来，体力得到一些恢复，终于踏着遇难者的头顶爬了出来。

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渐弱，难遇者经过四个多小时缺氧的折磨，气息奄奄，面色由红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我们看见外事班同学龚存悌猛举双手，嘶哑的喉咙竭力高呼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悲壮口号，挣扎了片刻便含恨死去。我们曾设法救援过的那六、七名同学，也象其他难遇者一样先后伏地死去。

死神降临了。在这个午夜时分，死神张开它那黑色的翅膀，夺去了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的生命。我们满腔悲愤地走到洞外，既不想什么也不愿离开，迷惘地同其他生还者坐在一起，谁也不愿多说话。

午夜刚过，我们突然听到隧道内又传出微弱的声音，便又戴上湿手帕进入洞内，只见少数遇难者又苏醒过来，正在呻吟和呼救，但我们却无法帮助他们。政府当局始终未组织任何力量进行抢救，组织松散的防护团人员早就不知去向了。

六月六日凌晨一、两点钟，少数苏醒过来的人再次伏地而绝气，隧道中一片死寂，充斥着数不清的尸体和闷热的臭气。恐怖代替了焦虑，我们再无勇气逗留在洞里，垂着头退出了大隧道。

天亮时分，空袭警报解除了，政府当局始派出人员清理大隧道里的尸体。这些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全都被撕碎了衣服，有些还是赤条条的，皮肤全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因尸体太多，无处可堆，改为边清理边用卡车运走掩埋。

死难者亲属是无法认领尸体的，一是因为尸身衣服碎落，面容变样，难以辨认。二是因为尸堆成山，难以翻动。三是因为有三个道口同时清尸，亲属无法分身到各处认领。且边清边运，时间短促。四是因为有不少人是全家死难，无人认领。当时我们外事班学员生还仅四十一人，死难学员尸体是靠从军制服上辨认领回。

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市中区有不少店铺、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来开门，原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卢　国　纪

一九三七年七月爆发的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先声；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先声。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和全国亿万同胞的敦促下，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以来推行的不抵抗政策，在此紧要关头开始转变为实行抗战的政策。

为实行对日抗战，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八月十日举行的三二四次会议上，通过了首先将上海工厂拆迁内地的提案。“八一三”事变的突发，使这项提案的施行变得更为紧迫，八月二十一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沪成立。从八月二十七日起，爱国的工商业者和广大职工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奋战，将大批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陆续撤向内地。

根据国民政府当时的决定，由沪拆迁工厂的第一站为武昌徐家棚。但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政府于十一月二十日宣布迁都重庆，南京随之沦陷，武汉亦告危急。

在此情况下，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武汉的各内迁厂方代表与国民政府经济部商定，将所有已撤至武汉的工厂设备再次迁往大后方重庆。已撤至武汉的大批机关和学校，亦拟分批撤至重庆。

---

* 卢国纪，四川合川人，卢作孚次子，现任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

当时中国的交通闭塞，运输工具稀少，如此大规模的撤退任务，绝大部分有赖于水运。因此从抗战一开始，国民政府即委任掌握了大量船只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随后又委任他为交通部次长。至此，一个紧急撤退的重担，落在卢作孚及其所属的民生轮船公司肩上。

一、抗战初期的抢运工作

抗战之前，民生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办理重庆、上海之间的客货运输。淞沪战事一起，上海烽火连天，江阴水道封锁，民生公司的主要航线顿时被割断。当时有人对此十分悲观，认为战事一开，民生公司的生命就完结了。

其时，正在南京帮助国民政府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的卢作孚却并不这样看，他说："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认为，长江下游的水道虽然沦入敌手，长江中、上游的水道仍大有民生公司的用武之地。他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为口号，号召公司职员积极拥护抗战，投入全民抗战的洪流。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为支援江、浙前线的战斗，四川部队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数万官兵要出川抗日。民生公司集中了所有船只，在半个月内将这批部队由重庆、万县两地赶运到宜昌，圆满地完成了运兵任务。

此后，上海战事吃紧，长江下游及沿海各省的厂矿陆续内迁，居民相率逃难，长江航运顿时紧张。于是，民生公司的船只便改以镇江为起点，除搭载难民外，还抢救各种物资约五千余吨，联运至南京或武汉。

由于日寇步步紧逼，上海弃守，民生公司的船只又改以蕪湖为起点，撤退金陵兵工厂；以南京为起点，撤退国民政府的人员、公物、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等；以汉口为起点，撤退所有的兵工厂及钢铁厂。

在此期间，民生公司的船只第一期运送物资一万二千吨，两个月完成。第二期运送物资八万吨。按卢作孚的意见，第二期的运输划分为两个区间：集中长江上游轮船，担任宜昌、重庆区间的运输；集中长江下游轮船，担任汉口、宜昌区间的运输。第二期除运送物资八万吨外，还运送了国民政府中央机关的全部人员、学校的大批师生、航空委员会的全部航空器材、以及大批工厂设备，其运输量也在八万吨以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陷，武汉时受日机轰炸和骚扰，民生公司遂以长江中、下游船只及海运轮船的全力，与招商局、三北轮船公司合作，将已撤至武汉的人员和器材，再次抢运到宜昌。

一九三八年五月，当民生公司在武汉承担抢运汉阳兵工厂、汉阳及泸河沟铁厂器材的时候，蒋介石却想一口吞併民生公司。他假借所谓“统一调配运力、便利抗战运输”的名义，强迫民生公司把全部船只交给军政部，由运输司令部掌管分派差运事宜。

面对民生公司的生死关头，卢作孚坚决抵制蒋介石的吞併。为了堵住蒋介石假借的口实，卢作孚一口承担所有撤退物资由民生公司包运，并且每吨货物只收平时运费的十分之一，负责将积压在宜昌的八万吨器材全数运川。另一方面，卢作孚又通过张公权(时任铁道部长)等在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前为民生公司游说，以抢运金陵兵工厂的成就来说明民生公司有承担大规模运输任务的能力。同时还提醒何应钦等人，如果政府将自愿的承运改

为硬性的派差，可能反而会干扰运输和完不成计划。而这样一来，民生公司也会因此破产，引起舆论的谴责。

蒋介石反复权衡利弊，最终撤销了吞併的指令，民生公司才得以继续存在。

二、宜昌大撤退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寇调集南北两战场兵力，沿陇海路和长江大举西侵，准备夺取郑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在组织武汉保卫战的同时，将前期运至武汉的物资陆续撤至宜昌。

汉口、宜昌区间由大船上运之物资，集中到宜昌后，均由民生公司的川江小轮转运入川。这两区间行驶船只的载运量相差悬殊，往往是汉宜段大船每航一次的载运量，川江船只必须转运若干次。这种在转运上脱节的情况，使在宜昌待转的货物器材滞积日多，以致仓库、货栈、驳船等设施都不敷应用。

当时，虽然民生公司增设了临时的仓储设施和驳船，增建起重设备和添雇三百多名装卸工外，卢作孚还特派童少生以重庆总公司业务经理兼宜昌分公司经理长驻宜昌，加强布署和指挥。但是，由于长江上游已近枯水季节，宜昌以上河段不能行驶大船，所以，宜昌物资积压的情况仍然未能得到缓解。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在日寇南北夹攻之下，华中重镇武汉失守。此时尚有三万以上的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国兵工业、航空业、轻工业的精华，完全滞留在这里。

宜昌城内一片混乱，敌机不时临空骚扰，满街都是撤下来的公职人员和难民，人心浮动，惶恐不安。城外江边，从宁、汉运来的兵工器材、飞行器材、武器弹药、后勤辎重等等黑压压地沿

江堆放，绵延数里。这堆集如山的宝贵资财，为国家的经济命脉所系，如果一旦被炸毁或落到日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宜昌告急！宜昌告急！

驻宜昌的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间办公室里，都塞满了来要船只的各部门人员。轮船公司的职员们，主要精力都花在办交涉上，甚至没有时间来办理运输，情形十分紊乱。

此时，卢作孚已由渝飞宜，他以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宜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依据船长、领江们提供的情况，估计川江水位尚能维持较大船只航行四十天左右。于是，卢作孚提出以四十天为限作出运输计划，由各机关据此分配吨位，各自选择重要器材，配合成套，次第起运。

当大家听到四十天内保证可以撤走的消息后，人人心中都放下一块石头，混乱的状态被克服，各职能部门转入有效的工作。

紧张的抢运展开了。

由于川江滩多水急，只能白昼航行，于是民生公司的船只便尽量利用夜间装卸。因为从宜昌上溯至重庆的航程需要四天时间，下水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民生公司又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除将最不容易拆卸的设备直运重庆外，一般的货物只先运至万县、奉节、巫山等地，有的货物刚运进三峡即卸下。这样，每日清晨均可从宜昌开出五艘或七艘轮船，下午也总有几艘空船驶回宜昌，保证了运输的不间断。

为了缩短装船时间，卢作孚还要求各交运单位将待运物资提前装箱，运上囤船，作好种种准备。而从上游卸完货驶回宜昌的空船，也在途中将船舱盖板揭开，舱门敞开，起重机检修待用。

空船一驶进宜昌码头，那一条条早已装满物资的驳船即被拖轮拖至空船边加固。空船上的起重机也立即伸出吊臂，从囤船上吊

起大宗货物，堆放在早已敞开的货舱内。无论是敌机临空扫射，还是风雨交加，抢运工作都在不停顿地进行。宜昌两岸和轮船、囤船、驳船上的灯光相互辉映，犹如从九天撒落下无数颗绚丽的星星。岸边的装卸工人们分为数人或数十人一队，吆喝着响亮的劳动号子，肩挑背扛，将一台台机器设备源源不断运上驳船。这紧张的撤退抢运，谱成了一首极其悲壮的交响曲，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威力。

经过四十个日日夜夜的抢运，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全部脱离了险境，积压的器材抢运出了三分之二。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先生惊叹这一规模宏大的成功撤退，将之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晏阳初先生的这一比喻并非夸张，因为当时位于长江上游的仅有二十四艘中国轮船，其中还有两艘不属于民生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生公司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当时虽亦有数条外轮在长江上游，均因保持“中立”而拒绝运送有关中国抗战的一切物资。

在此次宜昌抢运中，民生公司为了报效国家，对兵工器材每吨仅收运费三十元至三十七元，其他公物收费仅四十元。民间器材每吨收费六十元至八十元不等。而承运商品的外国轮船，每吨收费竟高达二百元至四百元。而在此次抢运中，民生公司有一百一十六名职工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有六十一名职工受伤至残，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宜昌失陷以后，湖北三斗坪还有一部分待运器材，正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卢作孚又亲自前往组织抢运，使这批物资安然转移到大后方。

三、最难的是准备战时运输

从宜昌到重庆的大规模撤退工作，是整个抗战运输中的一项最艰巨的工作，这项工作之所以最终能够完成，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远见卓识分不开。早在抗战初期，卢作孚就认为，在抗战中最难的还不是运输，而是如何准备运输，做到未雨绸缪。

抗战开始后，民生公司有四十六艘轮船，其中的三十二艘均以柴油为燃料。江阴水道封锁后，柴油断绝了来源，当务之急是要寻求这种燃料。于是，民生公司接连派人到香港、广州和长江沿岸，千方百计购买油料，共得四千多吨。这批油料在汉口至宜昌的撤退中就用去两千多吨，否则有船也开不动。

抗战前民生公司有十六艘轮船，一半以上在上海维修，五金材料完全取给于上海。一部分船用机器设备是外国制造的，其配件主要取给于国外。战争开始后，上述材料完全断绝了来源，而维修船只的重担，也落在民生公司自身上。这样，寻求五金材料和扩充民生机器厂，就算民生公司的第二件大事了。

民生公司从上海、香港、汉口等地尽量购买了五金材料两千余吨。但汉口撤退的第二年，因必须改造和建造若干船只，即消耗备用材料一千余吨。

民生公司使用柴油的船只，如果全部投入运行，每月需要油料三百余吨。从宜昌撤退后剩余之两千吨柴油，足够使用半年。半年之后油料告罄，民生公司将被迫让大部分船只停航，必然会对长江上游之交通运输造成极大的困难。

好在民生公司一向善于改造轮船，遂尽量在宜昌及其附近接收长江中下游逃难而无所依归的旧船，将其锅炉、机器及船壳彻底改造和整修，使之能勉强航行于长江上游。

民生公司便这样先后接收逃难船只六十余艘，但其中可以改造和适用的并不多，乃决定新订造以煤为燃料的新船，前后共十五艘。另又造以油为燃料的浅水船两艘，以满足川江航运的需要。

在民生公司订造的新船中，最大的两艘长一三七英尺，宽二五英尺，吃水七.五英尺至八英尺。其中有四艘为铁壳，有十二艘的机器是重庆制造，锅炉是民生机器厂制造的。在造船过程中，民生公司为材料和技工的问题费尽了周折。例如锅炉钢板，曾在香港购买了一批，到了海防却受阻无法运进。在上海买的一批钢板，绕道运至仰光后亦无法运进，只好在昆明另购一批。预先订购之轮船，两年之后才姗姗来到重庆。技工方面，冷作工系从上海招聘而来，木工系从湖南招聘而来，招聘过程亦十分费力耗时。

此后，民生公司一半的航线主要靠新船和改造的旧船营运，原来烧柴油的轮船停了一大半，只使用吃水最浅的烧油船，节省了大量柴油。这样，节省的油料和五金材料配件才能勉强维持战时运输，减少民生公司的亏损。不如此，则要仰靠高价油料，于支撑航运极为不利。

国民政府迁川后，川江航运成为大后方运输的主干。为了战时运输的需要，民生公司不断增添船只，其最多时为一九三九年，共有轮船一一六艘，三万零四百余吨。那时收购的旧轮达到最高纪录，订造的新轮则尚未完成。此后新轮十七艘陆续加入航行，又购得海关轮船四艘，共有船舶一三七艘，三万六千余吨。过了一段时间，又因部分船只不适用于川江的航行而拆卸了二十余艘；被炸毁沉没十五艘，仅有七艘被打捞修复。

一般人觉得，拥有大量船只的民生公司维持战时运输，绝不

至于感到为难。事实上，在运输过程中要准备油料、零配件和备用船，还得培养后备船长，准备工作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四、巨大的损失与牺牲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为了抢运长江中下游的难民和物资器材入川，把抗日部队不断运往前线，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与牺牲。在此期间，共有一百多名职工伤亡，令人伤悼。此外，先后被敌机炸毁炸伤船只十六艘，其中无法打捞及修复的共十一艘，四千七百吨。在撤退抢运中，因汽油着火，炮弹爆炸等故，又损失船驳四千一百五十二吨。至于民生公司被敌机炸毁的厂房、仓库、机器设备，以及被损坏的码头、囤船、货栈等等，亦为数甚巨。

在抗战期间，运费、票价都由政府当局限定，而运输开支却无法限定。远在一般物价尚未限价之前，轮船即已开始限价了，其水准比一般物价为低，更比轮船本身所需的油料、零配件的价格为低。例如，一九四三年钢板的价格已超过战前一千倍以上，圆钢条超过战前三百倍以上，柴油超过战前三百倍以上，机油超过战前两百倍以上，煤炭超过战前一百二十倍至一百六十倍以上，其它物价也无不超过战前百余倍乃至数百倍。唯有轮船的票价、运价平均仅比战前提高四十余倍，再加上名目繁多的差运，遂使民生公司的收支失其平衡。

民生公司除战时被炸毁沉没的船只外，尚有九十八艘船。其时川江航运的最大限度，仅可供其四十艘船运行，其余船只无法航行，但得准备航行。因为，首先需根据差运的缓急备好船只，其次因江水涨落的变化需要备好船只。例如嘉陵江水易涨易退，涨水时使用五艘烧煤的船，退水时立刻要改换五艘烧柴油的浅

水船。要维持一组轮船的经常航行，即需要一倍以上的船只备用，凡此困难，均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因此，在战时参加运输的若干轮船公司中，民生公司亏损最大。

抗战胜利后，因民生公司对抗战卓著勋劳，国民政府曾传令嘉奖，授予其总经理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副总经理童少生一等三级奖章。

中南橡胶厂对抗战的贡献

陈 维 新

重庆中南橡胶厂，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南洋爱国华侨集资创办的一家私营工厂，从它的创办到发展的全部过程，都体现了爱国华侨对祖国的热爱，体现了广大侨胞对神圣抗战事业的热忱关心和支持。我是当年从南洋归国的华侨之一，从中南橡胶厂创办之初，便参加了部份业务的主持工作。值此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谨就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对中南橡胶厂在抗战中的贡献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南洋华侨赤子心

一九三九年，艰苦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凶残的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无数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千百万人民惨遭杀害。仅南京一地，在失陷后一个多月内，就有三十万无辜人民牺牲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广大南洋

---

* 陈维新，台湾台北人，爱国华侨，现任四川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重庆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抗战初期，响应抗日救亡号召，自马来亚回国，担任重庆中南橡胶厂运输处负责人。

爱国华侨的无比愤慨，纷纷行动起来谴责日寇暴行，并酝酿支援祖国抗战，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呼吁各界人士以实际行动援助抗战。

南洋各国的爱国华侨最初的实际行动有二：一是宣传，二是募捐。宣传是以演讲为主，并组织文艺团体表演节目，高唱爱国歌曲，唤起侨胞们的赤子之心。募捐也是以义演为主，并在街头义卖纸花；义演和义卖的戏票或纸花等均不定价，由看戏人或买花人随意给钱。通常，大家都慷慨解囊，连许多外国人也同情中国的抗战，一张戏票或一朵纸花往往能卖到一、二十块钱。在民族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的特定时期，不仅一般华侨支援抗战心切，就连许多有钱的华侨也带头募捐，一时形成一股爱国的热潮。

在此情况下，由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等一批侨领发起成立了“南洋各属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筹赈总会），由陈嘉庚先生任主席。其它各国、各邦成立分会，分头进行有组织的宣传、募捐工作。

一九三九年冬天，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以筹赈总会的名义组成了华侨归国慰劳团，由他担任团长。慰问团的成员包括东南亚的越南、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婆罗洲、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代表人物近百人之多。一九四〇年初，华侨归国慰劳团先后分批从新加坡启程，经由香港、河内陆续回到昆明、重庆，一面分赴前线开展慰问伤兵、难民的活动，一面因地制宜，兴办实业，实际支援抗战。

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所在地，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因而归国华侨便以重庆为重点，按照国民政府关于《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的规定，先后在渝兴办了三个企业：

一是由慰问团集资创办的重庆制药厂，以生产奎宁丸和时令药品为主；一是由菲律宾华侨秦望山、叶松生等在长寿创办的中国电化厂，用电解方法生产电石等产品；另外一个便是马来亚华侨王振相、王金兴、庄怡生等人创办的重庆中南橡胶厂。

二、西南始有橡胶业

中南橡胶厂的创办人王振相、王金兴原在马来亚经营橡胶工业多年，他们还兼营锡矿，都是华侨中较有财力的人物。而庄怡生任马来亚橡胶公司副经理时，王振相就是福兴公司的大股东。在王振相任马来亚霹雳州福建同乡会会长期间，他又聘请庄怡生任该会主办的培南学校校长，因而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抗战发生后，庄怡生是华侨青年中拥护抗战的积极分子，担任了筹赈总会霹雳州怡保市分会的宣传部副部长。这时，我在怡保市利群橡胶公司任经理，也凭着爱国热情，经常和庄怡生一道参加宣传、募捐等工作，公私交往很深。

一九四〇年初，王振相、王金兴、庄怡生也参加了归国慰劳团。其时，不仅中国沿海口岸已经沦陷，越南王国的海防港亦沦陷，连泰国也被封锁，交通运输全靠仰光——腊戌——宛町——昆明这条滇缅公路，运输工具全靠汽车。而滇缅公路坑坑洼洼，路况不好，因而汽车轮胎的消耗特别大。有鉴于此，二王及庄怡生便认定如能在大后方经营橡胶业务，肯定是一项既有利于抗战建国，又可一展个人抱负的新兴事业，因而一回国便积极筹备。

当时国民政府设有官办的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三大公司，专门垄断出口贸易，换取外汇，以在国外购买战争所需物资。沿海通商口岸沦陷后，中国茶叶公司的外销业务都集中到东南亚地区。因此，当王振相等倡议创办中南橡胶厂时，中国茶叶公司首

先支持，并提出合作条件，委托他们代办茶叶推销和运输等工作。创办橡胶厂的倡议还得到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在贷款、免税、结汇和向国内外采购物资等方面，都给予特殊的照顾。在此互惠互利的条件下，仅仅经过约三个月的筹备阶段，取义于“中国南洋华侨投资创办”，以“中南”命名的官商合办的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在重庆正式成立。

重庆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总额为法币一百万元（折合食米三万多市石），分为一百股，每股一万元，由南洋华侨胶业公司代表王振相、王金兴、王家骥、王尊法等认股七十万元，由中国茶叶公司认股三十万元，即七比三的比例。商股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都为王振相、王金兴两人所分占，但在成立董事会时，因二王的主要业务在海外，不能长住国内，他们便推选中国茶叶公司的寿景伟、卓君卫分任正副董事长。王振相本人则退居常务董事，王金兴退居第二副董事长。庄怡生原无资本，但他为人精干，经营有方，深得王振相赏识，便给庄怡生凑集股本五万元，并全力支持庄怡生出任常务董事兼公司总经理之职。

中南橡胶厂虽然成立了，但当时国内既无橡胶，也无橡胶加工业。于是，王振相等人决定以商股七十万元用于到南洋采购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以官股三十万元作为在各地建厂之用，并派副董事长王金兴回马来亚做准备工作，庄怡生也从重庆来信约我帮忙。当时我认为这是华侨爱国行为的具体表现，心情异常激动，便与来马来亚采购原料的王金兴挂上了钩，辞去怡保市利群橡胶公司经理职务，参加了中南橡胶厂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七月，我带领着技术员雷教子和十二名技工，以及在马来亚购买的第一批原材料和制胶设备，到达了缅甸。

为了早日将已运至仰光、腊戌的物资运进国内，我先到昆明

与庄怡生商量后，又到缅甸雇私人汽车抢运物资回国。一周之内，共装运了三车物资，包括小型翻胎炉及原材料等。

一九四〇年七月末，我便带着十二名技工及物资到达昆明，随即被庄怡生委派主持刚成立的中南橡胶厂运输处的工作。

三、鼙鼓声中创分厂

重庆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即开始在大后方几个重要城市设立分厂，首先是在昆明设厂。那时庄怡生考虑到昆明位于滇缅公路要冲，是一个重要的业务据点，便聘请熟悉当地市场情况的广东人陈乐山担任昆明厂经理，并在昆明城内租赁元通街七十二号房屋，挂上了中南橡胶厂的招牌。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有几千辆卡车奔走于滇缅公路之间，轮胎耗损很大，所以很支持我们在昆明设厂，派出车辆协助我们运送部分物资。等我带着技工及首批设备、原材料到昆明后，庄怡生便亲自督促安装试车。九月一日，昆明分厂在国内翻造出第一只汽车轮胎。

中南橡胶厂昆明厂刚开工的第二天，日本飞机即来轰炸昆明，该厂厂房附近中弹，庄怡生险遭不测，乃将机器设备及时迁至城外小马村一座寺庙内继续生产。此时，我又去腊戌抢运第二批物资，但因滇缅公路上的功果桥被日机炸毁，我只有回昆小住，俟桥梁抢修好之后再到腊戌。

租用私人汽车很贵，租费与买新车所需之款相差无几，终不是长远办法。公司方面遂决定由我去仰光买车，首次购到新车一辆、旧车两辆，就地装运三车物资，于一九四〇年底直驶昆明。这时庄怡生向国外华侨中罗致的一批人员，也先后到了昆明和重庆，庄怡生便派我兼任昆明厂经理，而以吴中钦负实际责任。昆

明厂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才合并于贵阳厂。

早在设立昆明厂的同时，公司总经理庄怡生便根据当时业务的需要，指派王白山、庄东升分头筹建贵阳厂和重庆南岸厂。两厂的厂址，一在贵阳城外三桥，一在重庆南岸烟雨堡，都是租用中国茶叶公司运输站的房屋，先后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和六月分别投产。这年冬天，公司为了扩大业务，便于就近承揽川陕公路途中的翻胎生意，庄怡生又亲到广元设厂。但开工不到半年，便因原材料补给困难而撤销了广元厂。只有贵阳厂因地当川滇公路的中点站，它的业务在后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贵阳厂和重庆南岸厂开工投产后，我们的运输任务更重，原购的三辆车疲于奔命也跑不过来。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一九四一年中我第二次到仰光去买车，这次买到六辆车。此时，中南厂的业务有了较大发展，在仰光设有一处联络点，在腊戌设有办事处，工作非常方便。

四、滇缅路上抢运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海空军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与此同时，日本陆海军向东南亚各国进军，把战火扩大到整个南洋地区。不到半年时间，日寇就相继侵占了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马来亚和新加坡，缅甸、东印度群岛和印度也面临战火，形势十分危急！

那时我刚从仰光运货后回到昆明，即得知日本空军已开始轰炸仰光，心中万分焦急。于是，我一日数次给在渝的庄怡生拍发电报，请示早作安排，殊知几日不见回电，我便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乘专车去腊戌，和中南橡胶厂驻腊戌负责人邱啸秋布置接运仰光货物。接着，我又驱车赶往仰光。

我之所以急着去仰光，是因为当时中南橡胶厂在仰光囤集了大批待运物资：有南洋进口的胶料半成品五、六十吨，约计三百箱；另有炼胶机、空气压缩机、蒸汽锅炉、翻胎炉和简单的钻探机等成套机器约三十吨。这批原材料和机器，包括了中南橡胶厂原订以商股七十万元用于国外采购大批物资和机器的重要部份，关系到中南橡胶厂整个业务的发展，真是叫人焦虑不安。

由于日寇南进的威胁，滇缅路上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腊戌，满街都是军人，大家都在喝着象汤似的杂烩，衣服破烂的孩子们在桌子中间穿来穿去，等着抢一口别人吃剩下来的汤水。等我们上路的时候，大街上渐渐挤满了缅甸人，他们在担心着首都仰光的前途。

我们坐的火车开到离仰光五十英里时，一股巨大的人流从远处向我们迎面走来，活象一条黑色的大蟒，看不见它的尾巴在哪里。

原来，这股人流是从仰光市内逃出来的难民，他们疲倦地往前走着，脚在坚硬的路面上拖曳着，面部表情十分冷漠。一群又一群难民从我们的火车旁蹒跚地走过，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一个个沉默地走着，头顶是烈日，脚下是黄沙。

我和同伴们的心中燃起满腔愤恨：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战争的灾难强加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身上。如此深仇大恨，我们一定要同日寇血战到底！

我们的火车开进了仰光，这个原有一百万人口的东方大城市，如今成了一座空城，剩下的人口不到两万。当地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正在纷纷撤退，一片凄凉景象。我去西南运输处驻仰光办事处了解情况，才知道存放中南橡胶厂物资的仓库，大部份已于数日前被炸毁，在废墟中只剩下半成品原料约三十吨和钻探机一部。

我心急如焚，立即托同乡王紫如代雇印度工人二十名和短程运输汽车两部，到被炸毁的仓库中去抢运物资，将它们集中堆放在当地华侨中学校长王铁城借出的学校礼堂里。

庄怡生终于飞到了仰光，我们一道带领人员往返运送货物，从学校到码头，又从码头到学校。仰光的警报系统很差，不管用，我和庄怡生便一人开车，一人瞭望。一旦敌机临空，我们便匆匆开车躲避，终于将八十多吨物资抢运到华侨中学集中。

下一步是如何将物资运往腊戌，仰光如此危急，连买车也来不及了。我只好去拉几位私人司机坐茶馆，请他们每辆车捎带几箱物资到腊戌。那时我们身边无人可派，连押车人也没有，全部托付给这些私人司机，这样才把物资运到腊戌。

那八十多吨物资托运走后，庄怡生和我为着长远打算，想再买一批生胶回国，在码头上转了几天。恰好，有位熟人来告诉我们，有批刚从海岛运来的生胶无法运走，可能要卖。我和庄怡生立即去找货主，因对方急于脱手，每磅生胶只收六分钱，我们将这批生胶共五十吨全买下了。

又是运输问题，非常棘手。凑巧又碰上一条五十吨机帆船的船主是庄怡生的同乡，答应先将我们的生胶运到离仰光五十英里的深水处。但这条船吃水深，在冬季枯水期不能驶往伊洛瓦底江的中上游。适有王紫如几家亲戚要疏散，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就让他们搭上这条船，并委托他们转运这批生胶，到机帆船不能再往上游开时另雇小船转运曼德勒。

那条机帆船启航了，我们又买车赶往曼德勒，想早日得到那批生胶。然而到那里一看，那批人和橡胶都还未到，使我们茶饭无心，坐卧不宁，只好开车沿着伊洛瓦底江倒回去寻找。

我们的车一直开到伊洛瓦底江下游，遍寻无踪，以为那船生

胶算是完了，怏怏而返。谁知回到曼德勒，才知道生胶已经到了，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当时缅奸到处捣乱，替日军充当第五纵队。

从曼德勒到腊戌还有数百公里，全是山路，汽车运输非常困难。此时传说仰光已被日军占领，不几天，曼德勒也被日机轰炸，我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幸亏庄怡生在一次躲警报时，认识了一位英国人，他是曼德勒火车站站长。庄怡生恳请这位站长帮忙，那位英国人一次就批给我们三节车皮，简直是雪里送炭。

我们连忙组织人手装车，才将这五十吨生胶连同我们离开仰光时抢购的汽车配件和私人买的布匹、杂货等分装三节车皮运走。

我们乘汽车赶到腊戌收货，但那三车皮物资，后来仅有一车皮到了腊戌，上面只有生胶十五吨、一点汽车配件及少数布匹杂货。我们多次向火车站查询，杳无音信，那两节车皮失踪了。我们不敢耽搁，将这一车皮物资装上汽车很快拉回国内。不久，腊戌也陷入敌手。

滇缅路上的紧张抢运，为中南橡胶厂各厂的连续生产提供了急需的原料和设备。这次我们从仰光先后抢运出来的物资，当年四月下旬运到昆明后，只分出五吨生胶卖给昆明电线厂，便交付了货款和所有的开支运缴等费。其余十吨生胶和三十吨半成品原料，维持了昆明、贵阳两厂约半年生产之用。后来贵阳、重庆等厂开始炼胶，原料也是用的这批生胶。

五、扎根重庆创大业

一九四三年初，庄怡生开始筹建重庆化龙桥厂，这个厂是在

昆明、贵阳两厂的业务有了发展和重庆南岸厂提供技术之后才上马的。

那年，庄怡生在重庆化龙桥华村购地二十五亩，随即与一家建筑公司签订第一期承包工程合同，计有硫化车间、炼胶车间、胶浆房、修理房、办公大楼和职员宿舍等大小砖柱土墙房屋共九幢，全部工料费用为法币四百多万元。当时重庆系战时陪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常遭受敌机轰炸，因而一般新建工厂都因陋就简，搭盖临时建筑物。唯有中南橡胶厂大兴土木，修建这种带长期性的厂房，所以当时曾有不少人嘲笑华侨是傻瓜。

庄怡生对这种嘲笑却毫不在意，他还专门写了一块非常醒目的大字招牌："华侨投资创办中南橡胶厂"，悬挂在工地上，以显示华侨拥护全民抗战、举办新兴工业的决心。

化龙桥厂第一期工程完工时，由于严格执行了包工合同，追加费用不多，但因建筑材料上涨，多支出了一部份钱。厂方吸取了这个教训，第二期修建库房等工程，就改为自办材料，派厂内建筑工人廖银章负责主持修建工作，一面另派人安装机器设备。

重庆化龙桥厂一开始就是根据南洋橡胶工业的整套模式计划设计的。这家新厂先后安装有：100K.V.A.变压器一台，50HP马达一座，共75HP的大小马达七座，5'×12'锅炉一台，3'×6'蒸缸两口，14"×36"打胶车两部，8"×22"打胶车十部，搅浆机四部，硫化压机十一台，小压机十余台，黄包车胎模机四部，汽车胎模机六部。此外，还有打水机及工作母机等。

为了维护和检修这些机器，庄怡生还把化龙桥附近一家景星机器厂的全部设备收买过来，改为中南橡胶厂的修理车间。并吸收该厂经理陈庆利担任机务科长。后来这个修理车间，能自造

22" ×8" 的小炼胶车和小型平板硫化机等。

由于重庆化龙桥厂安装了从炼胶到成型硫化的整套正规生产设备，所以人们就将它称为重庆中南橡胶厂的总厂。

至此，重庆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原计划在抗战期间修建的四个主要厂子，均已全部建成。它们是：昆明中南橡胶厂、贵阳中南橡胶厂、重庆南岸中南橡胶厂、重庆化龙桥中南橡胶厂总厂。

新厂陆续兴建，培养技术力量亦成为紧迫问题。化龙桥厂筹建之初，庄怡生又以赠送股份的代价，特聘留美生陈国玱任化龙桥厂厂长。同时，庄怡生还考虑到新厂开工以后，需要技术人材更多，又接受陈国玱的介绍，先后吸收广东人谭朝亮和浙江人邓行文分别担任新厂工务主任和技术员，作为陈国玱的助手。所有新厂安装机器设计和制胶技术等工作，都由陈国玱悉行擘划，全权负责。

重庆化龙桥中南橡胶厂总厂开工后，公司又陆续招收小学毕业和少数初中毕业的学工一百余人，规定两年出师，以逐渐壮大技术队伍。厂内分科分组办事和诸如人事、财务、保管、检验等规章制度，也随之逐步建立起来。于是，重庆化龙桥厂便由几十人增加到三百人以上，产品种类也由翻补轮胎逐渐扩大到生产胶底、胶鞋、胶布、雨衣、球胆、皮碗、胶水管和黄包车内外胎及各种机器配件、汽车配件等几百种。

六、快速上马为抗战

华侨在南洋一带经营的橡胶工业，一般都拥有从炼胶到成型硫化的整套正规生产设备，中南橡胶厂筹备之初，也是根据南洋的经验向国外订购机器的。但后来又考虑到国内的条件较差，在使

用电力、选定厂址以及添配设备等方面都不如在南洋那样方便。因而决定暂时改为从南洋进口翻胎胶料的半成品，采取分散生产的游击战术，以争取快速开工，少花资金。

这种游击战术，勿须安装成套的炼胶设备，只要有32"×6"、34"×7"的小翻胎炉各一台，便可以同时翻造四只轮胎。以半成品原料一吨和一些简单的制胶工具，再加上三、四名熟练技工，用一辆卡车连人带物一并运至工地，便能马上开工，吹糠见米。昆明厂、贵阳厂和重庆南岸厂，最初都是用这种办法搞起来的。

一九四〇年十月昆明厂开工后，最初每月仅翻胎一百多只，后来增加到每月五、六百只。根据我的回忆，一九四一年，昆明厂全年翻胎约三千只。这一年，贵阳厂和重庆南岸厂相继开工，各翻胎两千只左右。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三年中，尽管原材料供应不足，时产时停，但上述三厂的全年平均产量，也还是七千到八千只，其中以贵阳厂产量为最多。

第一批由中南橡胶厂生产出来的新轮胎装上了奔驰在滇缅路上的军运车队之日，是我们在场的南洋华侨永远不会忘怀的时刻。那时，眼见我们华侨参加抗战、报效祖国的宿愿终于实现，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有的同事还流了眼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南洋华侨的心与祖国母亲的心是紧紧贴在一起的！

那几年，中南橡胶厂长期为军委会西南运输处、机械化兵团、复兴公司及各兵团的车队源源不断地提供轮胎，积极支援抗战。

一九四一年重庆市场上的新胎价格，每只约值法币二千元，翻补一次的收费标准，平均约为新胎进价的四分之一。根据实践调查，旧轮胎翻新后，其使用率可抵新胎百分之七十以上，每只轮胎可以翻补一次至三次。然而过去因国内无法翻胎，车辆换下

的旧胎都当作废料处理了。

中南橡胶厂创办的翻胎业务，无异是化无用为有用，在当时新胎进口困难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解决大后方的主要交通工具——汽车因轮胎磨损而无法补充的严重问题，因而深受各方面的重视。当昆明厂、贵阳厂和重庆南岸厂先后投入生产的时候，重庆有好几家报刊均报导过这些厂的生产情况，说它们取费低廉。的确，当时的中南橡胶厂是为国防交通服务的一家重要工厂。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由于日军曾一度切断了我国抗战的唯一国际运输大动脉滇缅公路，引起了政府当局对交通运输的高度重视。一九四四年庄怡生听说军政部要在重庆召开一次有关国防交通问题的重要会议，他便通过华侨兴业银行总经理闵陶生的介绍，结识并利用贵州盐帮巨商庄某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同乡关系，从旁打通了关节。对此，庄怡生利用时间由庄某向何转陈，强调了重庆中南橡胶厂是华侨投资创办的企业，在目前橡胶原材料进口困难的情况下，应由政府给予帮助，于抗战运输及中南橡胶厂的发展都有好处。

接着，重庆中南橡胶厂又草拟一份翻胎生产计划书由庄某面呈何应钦参考。不久，这个计划得到军委会军政部的批准，并通知中央银行拨出外汇一百万卢比，作为中南橡胶厂在印度采购橡胶原料之用。

一九四四年八、九月间，庄怡生便飞往印度加尔各答办理原料采购工作。在取得当地中国银行结付外汇的存折后，他便买进生胶五十吨，并就地加工为半成品的胎面胶，又买进促进剂一吨和升化硫磺两吨。经庄怡生向盟军总部驻印机构多次交涉，在领到出口证书之后，只三个月时间便全部空运回国。这批原材料一共开支外汇约六十万卢比，不仅维持了昆明、贵阳、重庆厂子的半

年生产，更重要的是一家私营橡胶厂能够获得这样一笔巨额外汇，使许多归国华侨对中南橡胶厂都刮目相待，大大提高了中南橡胶厂的声誉。

庄怡生在驻印度时，还打听到云南地方当局和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合作筹办的云南橡胶厂，曾向英国一家大公司订购了一套制造轮胎的新式机器。这批机器由英商包运到河内，后因法国封锁滇越铁路，又改运仰光，在仰光失陷前，复抢运到加尔各答。由于买方因故未能履行订货合同，准备将这批机器移交中国政府驻印机构代为处理。但英方打算以高价卖给印商，便托词中国内地尚无成型橡胶厂可以使用这批机器，拒不交货。

庄怡生认为，这批新式机器虽因途中辗转损失不少，但剩余部份尚可拼凑使用。于是他立即飞回重庆，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说明重庆中南橡胶厂已具相当规模，有条件收买这批机器，要求政府代向英方交涉。这个申请提出不久，英国政府即派其驻重庆使馆的一位参赞到化龙桥厂来实地了解情况。中南橡胶厂以总工程师陈国玱与之洽谈，因陈国玱早年在英国参加过英国皇家橡胶协会，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位参赞提出的一些问题，陈国玱都作了圆满的答复，这才确定了由中南橡胶厂收买这批机器。

庄怡生于一九四五年初再度飞往加尔各答购买了这批机器，计有22″×66″炼胶机两部，轮胎模型刻花机一部，轮胎硫化罐三台和一些零星机件等，共付出外汇十八万卢比。但后来这批机器因运输发生困难，迟至抗战胜利后很长时间才运至上海。

七、举国同庆胜利日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结束。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在中国军队和苏联红军、美国盟军的打击下，日本于八月十四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九月二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在重庆各界人民隆重集会庆祝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节日里，我们中南橡胶厂的广大华侨和职工也涌向街头，沉浸在举国同庆的节日气氛里。因为，在重庆中南橡胶厂创办以来的短短五年里，我们为抗战国防运输翻造了四万只汽车轮胎。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南洋华侨是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炎黄子孙！

杨耀健整理

郝贵林自杀原委

雷 启 汉

一、吊死在公共厕所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清晨三点多钟，有一个人到重庆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的公共厕所去大便。他刚进去，猛一抬头，就看到梁上悬着一个人，吓得惊叫一声，飞奔出来，大声呼喊：

“救人哪，有人上吊了？”

住在附近的人，从睡梦中被喊声惊醒，急忙披衣起床，奔赴出事地点。大家七手八脚解开绳索，将人放下，发现此人业已气绝身死。他们当即向警察局报案。警察来到现场，见死者躺在地上，身穿淡绿色西装，白色衬衫，年约五十余岁。身旁放着一条一丈多长的棕绳，是他上吊用的。警察从死者身上搜出一封遗书，上面写着：

吾自民国二年在兵工学校毕业，留学去洋三十余年，在法研究飞机坦克之工呈(程)。去年十二月，我政府派吾回国，自法返渝。三百美金用有半年之久，花费一尽。吾因去国多年，吾祖无有后台相助，可叹？学会一身本领，无可展身，困庆（指重庆）地，寸步难行。衣裳物件卖尽。到渝之日，即放（访）问家中消息，可叹吾父母兄弟十余口，民国二十七年被日人宰杀一空，现在无路可走，只得死命报国。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无名氏具结。

这封绝命书没有署明死者的真实姓名，但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名片。名片右边印的是他的学历和简历："巴黎汉鲁机械学校毕业"，"巴黎比斯纽斯兵工厂工程师"，名片的中间印着他的姓名："郝贵林"。

二、动力机械工程专家

根据死者的同乡、朋友钱楚雄、胡瑞根、罗裕惠等的叙述，郝贵林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动力机械工程专家。

郝贵林是湖北汉阳人，一八九五年出生。一九一三年毕业于汉阳兵工学校，时年十九岁。他本来可以在汉阳兵工厂工作，但由于当时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在军阀官僚的掌握下，内部贪污腐化，生产落后，外则受日人控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他怀着要使祖国强大起来的决心，毅然出国深造，以便学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力量。一九一五年，他二十一岁时到法国留学，一九四五年回国，在法国居住达三十一年之久。

在法国，郝贵林从中学读起，直到高等学校毕业，后在高校专攻动力机械工程。为了在实践中丰富自己的学识，高等学校毕业后，郝贵林又进工厂工作。由于他的专业基础扎实，又善于钻研新技术，所以在短短二十多年中，他由实习生做到巴黎雷诺工厂的大领班，做到比斯纽斯兵工厂的工程师，专攻飞机、坦克制造的设计施工。后来郝贵林又到一个意大利人办的工厂当厂长，这个工厂规模宏大，有五万多工人，平时生产汽车，战时生产飞机、坦克。由此可见郝贵林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郝贵林在法国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他的法国籍妻子被德军飞机炸死，留下他们的幼儿以柏儿，这使他痛苦。然而，最使他痛苦的是：第一次大战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加入协约国，是战胜国之一，可是巴黎和会却把德国强占中国山东的权利转交给日本。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者又把中国作为他们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国仍然受人宰割，他希望中国强大起来的意愿幻灭了。

"呵，祖国！呵，祖国！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起来呢？"他痛苦地自问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郝贵林为法国赶造飞机、坦克，全力以赴，好早日打垮法西斯强盗，实现世界和平。可是不久，德国法西斯越过马其诺防线，侵入法国，巴黎陷落。德军知道他技术高超，强迫他继续工作，为法西斯制造杀人武器。他又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胜利了，中国抗战胜利了。在开罗会议、《波茨坦公告》中，中国成了与美、英、苏并列的四强之一，郝贵林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是多么高兴呵！这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对外宣传，也象煞有介事地号召旅外华侨和留学生"回国服务，建设新中国"。郝贵林兴奋无比，认为报国的机会到了，赶往驻法大使馆登记。

回返祖国对于郝贵林来说是有种种困难的。在法三十多年，他已经置办了一些产业，不可能带回国来。续娶的法国年轻妻子，还有正在读书的孩子不可能都一起回国。还有法国政府规定侨民离开法国，只能携带美金三百元。到中国后，钱用完了，怎么办？第一个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以后再说。第二个问题，他觉得妻子是法国人，留在法国，问题不大。只有第三个问题自己难以解决。他到大使馆去了解，大使馆的朋友教他不必担心，一

切都由政府负担，自己不需花钱，到重庆后，一下飞机，就有人接待，“你只管放心”。于是他决心回国。

三、爱国有心，报国无门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郝贵林同其他响应号召的人，乘机飞往重庆。到重庆机场下机后，并不如大使馆的人所说的有人接待。相反，根本没有人理会，连住宿的地方也得靠自己去寻找。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适合的住处，最后只好到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打地铺。不仅生活无人照顾，工作也无人理睬，得自己想办法。

最初，郝贵林因缘去找陶希圣。陶希圣是他的同乡，这时已从汪精卫的伪组织回来，做了蒋介石的谋士，替蒋写了《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学说》等书，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陶希圣如果帮忙的话，安排一个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陶希圣却对郝贵林说：“早来一个星期就好了。”

后来又辗转托人介绍去见经济部长翁文灏。翁文灏叫他先写几个字看看。郝贵林离开祖国已三十多年，中国话都已说不流利，字当然更写不好。考核一个动力工程专家的能力如何，不问他的本业，却去看他的字写得如何？实在是滑稽可笑，然而中国官场确是这样一本正经地办着可笑的事。

郝贵林又去找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俞大维总算还认人，派郝贵林去南岸担任一个小兵工厂的厂长。郝贵林到厂里去看了一看，设备简陋落后，全是些老爷机器，全厂只有三五百个工人。“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兵工厂？这样的兵工厂设备造出来的武器能抵御外来侵略，保障民族的独立自主吗？”他感到真不是滋味。转而又想：“我在法国领导具有先进技术设备、拥有五万工人的工厂，而现在却叫我当这么小的工厂厂长，或许是瞧不起我，或许

是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党员，从而不放心吧？”他带着重重疑虑和失望辞去了这个职务。他不知道国民党的武器都是从美国买进的，这样，经手人就可以得到大笔回扣，哪里有心思办什么兵工厂！

然而，为了工作，为了生活，郝贵林仍然不得不继续“奔走于公卿之门”。虽然他四出奔走，到头来却处处碰壁。这时候，他带回国的三百元美金已经花完，教育部给予回国尚未找到工作者的生活费，每月只有法币两万元。这个数目，只等于当时官办银行最下层的公役的工资的尾数。而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轿夫，每月却拿财政部一个专员及其他两个机关两个荐任科员的工资。一个专家的待遇不及一个抬轿子的收入的几十分之一，真是“天下古今所未有”的事。就连这区区的两万元，还不能按时发给，郝贵林从回国到去世，半年多的时间，一共只拿到五万元。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马路旁边摆地摊，变卖衣物，过着吃上顿愁下顿的半饥饿的生活。后来，衣物卖光了，吃稀饭烧饼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正在山穷水尽的时候，郝贵林恰巧碰到了同机回国的陈铁夫。经陈铁夫的介绍，认识了重庆电力公司的同乡职工。同乡们尊敬他的为人，并要向他学习技术，就把他安顿在湖北汉属五邑同乡会暂住。他从此游食于同乡之间，无异于乞丐。他曾不胜唏嘘地对同乡们说：“唉！我的在法国的儿子哪里知道五十三岁的爸爸在祖国讨饭。”

一天郝贵林看报时，了解到顾维钧大使来到了重庆，住在胜利大厦(今重庆宾馆)。他高兴地对同乡们说：“我与大使在法国的时候，私交甚厚，过从很密，他一定能帮我的忙。”别人劝告郝贵林说：“你现在穷途落魄，他现在官运亨通，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不会帮助你的。”可郝贵林却认为大使不会那么无情。他到胜利大厦，递上名片，里面传出话来：“大使开会去了。”他认

为大使因公来渝，少不得要去开会、赴宴等种种活动，自己来得太不凑巧了。为了不致空跑，他在名片上写上下次再来拜谒的日期、时间，他第二次去拜见大使，仍然未能见面，他想自己约定的时间，不一定是大使空闲的时间，不如留下自己的住址，让大使有空闲时来约自己谈话。他在名片上写上了自己的住址，回到会馆，听候佳音。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郝贵林守在会馆里不敢离开，怕大使来召见时，自己不在。谁知好久好久都没有得到通知。他想按社会习惯，不是穷到了尽头，是不会住在会馆里的。自己写上住的地点是会馆，不是表明自己已经穷得不堪设想吗？他后悔不该在名片上写自己住在同乡会馆里，致使大使瞧不起自己，不愿与自己会面。他又想这是自己多疑，大使不会是这样的人。他又第三次到胜利大厦，仍然遭到挡驾。这才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后悔不该不听同乡的劝告。

这时郝贵林新认识的一个同乡刘瑞根，在渝开设电料行。刘很同情郝贵林的不幸遭遇，邀他到店里来住，并无偿地供给他膳食。后来他又认识了一个同乡小友罗裕惠。罗裕惠原来在湖南学机械，湘桂吃紧时，逃来重庆。人虽年轻，却爱好学习，工资收入虽然微薄，仍按月汇钱给母亲。郝贵林很爱他，愿意把自己的本事教给他。

四月，郝贵林碰到法国同学汤仲明。汤仲明深知郝贵林学有专长，经验丰富，便邀请他到自己开办的动力机械厂去帮忙。郝贵林欣然答应，带着罗裕惠一同前往。由于他在国外三十多年，不懂中国处世哲学，什么人事关系呀，什么交际应酬呀，什么吹、捧、拍呀，他都一概不知，他所知道的只是努力工作。于是人家视他为洋傻子，他也与人落落寡合。一天，一个女职员竟然因为

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和郝贵林大吵起来。郝贵林感到是人们对他太冷酷无情了，他受了侮辱，愤而离开了动力机械厂，回到刘瑞根的店里。

在这种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郝贵林是可以回到汉阳老家，暂且棲身的。然而，他回国后就打听老家的状况，得到的消息是他的老家在抗战初期就被日本人摧毁，全家老小都被日本人杀死，他是无家可归的了。

四、诉诸舆论，毫无反应

郝贵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诉诸舆论。五月二十日，写了一封信给重庆大公报馆。信上说：自从他们看到报上，中国抗战胜利，已成为四强之一，“我们流落在国外的人更有无限兴奋：此后我们是强国的人民，不再受欺侮。”

由中学到大学，我一直就读于法国。大学毕业后，就进厂工作。为了工作中求取经验，我不顾一切的干了二十多年。此种恒心与努力，也得到了相当的结果。我由实习员一步步的升到厂长，厂中容有五万工人，专门制造汽车，战时并曾出产坦克和飞机。

我国虽然击败了敌人，但尚有一段建国的艰苦路程。政府一再促令留学生回国，这表示国家需人孔急。我准备把一身本事献给祖国。由于在法国二十多年，在那里已经置了一些产业，我的孩子也都在上学，一时无法搬回来。好在妻是法籍女子，我走后当亦无甚困难。然照法政府规定，出境只许带三百美金，这使我颇为踌躇。因为离国已久，在国内我没有什么朋友，家里也多年没有通讯了，回国后如果需要钱必

极困难。我曾就此事商量大使馆的朋友们，他们说："此番回国，一切都由政府供给。到重庆一下飞机就有专人招待，不用自己费神，更无须个人掏腰包。"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正是报国良机，我不应该怕前顾后了。

国家苦战八年，一切艰苦，自属当然。我们到重庆后，假中、法、比、瑞同学会打地铺，也不敢有所抱怨。奇怪的是并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工作需要自己奔走。在未找到工作以前，每月到教育部领取两万元，这是对我们的恩赐与优待。

同回来的朋友，也有几个作了官，但都是在朝有人，其余的都各奔前程，四分五散。愿上帝保佑他们早日得到职业，不象我一样徘徊街头，为生活连累朋友。

为了工作，我已曾拜访过几位要人。但他们反而向我诉苦，说他们也在风雨飘摇之中，随时准备办交代。一切奔走，都是徒劳。除了尝到些敷衍塞责的官僚气味，一无所获。

到重庆后，曾写家信数次，满想于不得已时，暂作返归故乡之计，但一直无回音。后来听到家园化为灰烬，兄弟们也都不在人世了。这家败人亡的惨境，自然使我痛恸，然而他们是在神圣的抗战中牺牲的，死亦无所遗憾。我于抗战胜利，国家需人孔亟之时，遭遇失业的命运，才真是可悲的丑事！

孩子们由国外来信说："祖国现在是四强之一，一定比法国还好。"他们也想回来看看，但他们怎么能知道五十三岁的老爸爸，正陷入奥妙莫测的深渊。

信发出后，大公报馆将它刊登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的《大公晚报》第一版上，并加了一个标题：《如此回国服务》。

这封信刊登以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

这是一沟肮脏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五、日暮途穷，只得自杀

郝贵林一切办法都想遍了，结果是失望、失望、再失望。回到法国去吧！那里有自己的产业，有妻子、儿子，工作也不成问题。可是路费呢？即使筹措到路费，能不能取得出国护照？国民党政府就是那么奇怪，在国内，他不用你，但一旦你要出国，他却生怕你走了，百般刁难。即使拿到了出国护照，也不能走呵！郝贵林想：孩子们都认为祖国现在是四强之一，一定比法国还好。我如果回法国去，就会使他们的想象幻灭，使他们心碎。即使孩子们在我回法国以后，并不难过，我也不能去。我丢掉在法国的产业，离别妻室儿子，放弃优厚的待遇，高级的职位，眼巴巴的回到祖国是为了什么？

这年的端午节前夕，郝贵林接到从法国寄来的家信。信被检查的剪刀剪成数段，不能从头到尾完整无缺。但从字里行间可略为知悉：大儿以柏儿到西班牙避暑去了，年轻的妻子领了五万法郎离开了他的家。因为在这以前，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妻子，叫她不必等待他了，可自行改嫁。他这时候的心情，真是“肠一日而九回”。

郝贵林连续写了三封信给罗裕惠，催促他进城来话别。但罗裕惠在动力机械厂要工作十小时，分身不开，没有如约进城和他会晤。他来不及等罗裕惠的到来，于六月十五日留下一个包裹和信件，请店里的店员转交给罗裕惠和刘瑞根，默默地离开。郝贵

林走到中央公园，踽踽凉凉地走来走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公园里的游人陆续先后地归去，等到更深夜静，他走进公共厕所，用一根棕绳结束了自已的生命。

人们用一床芦席盖着郝贵林的尸体，苍蝇在他身上吮吸着。到了正午，重庆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来验了尸。

湖北汉属五邑同乡会的负责人钱楚雄闻讯，邀集友好募款法币三十余万元，料理他的丧事。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摄了他的遗像后，钱楚雄等当即备棺成殓，于下午四时半雇力夫抬到南岸沙罐窑五邑同乡会墓地埋葬。墓前立石碑一块。

郝贵林死后，罗裕惠、刘瑞根打开他留下的包裹，里面有一封绝命书同一个写好了的信封。信封上面写的是他儿子的法国住址和他儿子的姓名。他嘱托他们把他失踪的消息告知他的儿子，绝命书的最后一句是："以死报国。"

一位如此学有专长，在国外受到重用的专家、工程师，在抗战胜利后满怀热望回归祖国，却遭受到种种摧残和冷遇，竟至走投无路，忿而自戕，白白断送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一桩多么惊心动魄，令人痛惜的事情啊！

马寅初被捕始末

赵 国 恩

一、向四大家族开出的第一炮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热爱祖国，坚持正义，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为我国培养经济理论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为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抗战开始后，马寅初辗转来川，一九三七年为重庆大学擘划创立了商学院，并担任院长兼教授。一九四〇年，日本帝国主义铁蹄深入国土，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根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恣意推行投降卖国的独裁统治政策。人民生活穷困，国民经济艰难，而豪门巨富却把搜括来的大量黄金美钞，存入外国银行。马寅初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社社长。一九三九年在一次立法院会议上，他根据大量调查材料，提出了一个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同时他又在香港《工商日报》和《大公报》上相继发表文章，大声疾呼：“现在前方抗战，千百万将士牺牲流血，亿万人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贵人，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反而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马寅初认

为："今日发国难财者，除商人外，尚有利用政治力量而发财者，此种行为，本非官吏所应有，故实行资本税，必须先自发国难财之大官始。"马寅初向"四大家族"公开挑战，引起了全国及世界舆论的重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日，马寅初应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第一次在市中区黄家垭口实验剧院，向社会各界人士公开演讲。这一天，不但大厅座无虚席，就连窗口和过道都挤满了人。他照例没带讲稿，跨上讲台，劈头就说："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我们文人也要不惜死于后方，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见不得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是'家族英雄'。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站在后边的宪兵警察们，你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马寅初引用大量确凿的材料，痛骂了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抗日战争，依仗政治权势，趁火打劫大发其国难财的可耻行径，义正词严地宣传他开办"临时财产税"，征收豪门巨富的不义之财，充作抗日经费的主张，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马寅初讲完之后，大批听众簇拥在他的身边，一直陪送他离开实验剧院，走到七星岗郊区公共汽车站，在掌声和欢呼声中把他送上公共汽车回沙坪坝。

马寅初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和重庆的公开讲演，像一柄柄锋利的匕首，刺中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要害，使蒋介石深恶痛绝。就在这次讲演后，蒋帮特务恫吓马寅初说："再行攻击，当以手枪对待！"马寅初立予驳斥："所有指责，全系事实，有实据可查，非讲

不可！”十天以后他又再次应重庆大学经济学会邀请，在沙坪坝重大礼堂，作了第二次公开讲演，更加盛况空前，就连大礼堂外的空地都挤满了听众。讲完后马寅初问大家：“你们赞成我的主张吗？”场内场外都举起手来鼓掌。马寅初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衷心爱戴。

二、所谓的“前方考察”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①]，蒋介石果然对马寅初下毒手了。这天清晨，宪兵第六团一位姓胡的团长奉命率领一连宪兵，包围了重庆大学校门口的马家住宅。当时，马寅初正在吃早点，宪兵团长走进马家向马寅初声称：“委员长要见你！”马寅初心中早已明白，放下碗筷，从容地随着宪兵团长去了，直到下午都不见回来。家属找到宪兵团长家中，他推说已押解过南岸去了，对真相秘而不谈。

马寅初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传遍山城，邹韬奋很快就告诉了黄炎培。黄炎培听后深为骇异，立即写信给张治中设法营救。隔天，张治中面告黄炎培：马之被捕，并非起因于职教社演讲，而是他在重大多次演讲，直指孔祥熙、宋子文，被人告密，

---

① 关于马寅初在重大被捕的时间，国内报刊大多写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这是根据《新民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刊出的《马寅初昨日挥泪别重大》来推算的。根据当年参加重大学生运动有关同志的回忆和记载：马寅初被捕日期应是十二月六日；八日晨返校“话别”。十二月九日重庆《大公报》“渝市点滴”第一条：“重大商学院长马寅初六日离校，亲友甚为关切，昨闻马氏已返校。”重庆《国民公报》十二月八日“沙坪拾零”中刊登：“重大商学院长马寅初忽于六日离校，有关各方甚为关切，忧戚终日，极盼马院长早日返校。”几家报纸所称马寅初“离校”云云，不过是暗示被捕的曲笔而已。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在马寅初被捕之后，曾密令重庆各报不准发表“逮捕”消息。国民党中央社在十二月十三日发布新闻，胡说什么“立法委员马寅初奉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强令各报刊登。

目前拘留在宪兵团长家中，已嘱好生优待。

马寅初被捕之后，重大师生十分震惊，一时议论纷纷，立即掀起一个营救马寅初的怒潮。不少主持正义的同学秘密串连约集沙磁区各校学生，争取第二天举行游行，到行政院请愿，要求释放马寅初。不料消息泄漏，第二天（七日）上午，学校当局抢先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进行游说。并传出消息："马先生是暂时调去前方考察经济，明天即返校话别，暂时移交一下商学院的工作"等等，来掩盖逮捕的真实情况。但是大家心里明白，许多同学认为逮捕是实，"调用"是假，主张马寅初一返学校，就把他留下保护起来，并立即罢课，表示抗议！一些反动学生则诡称："马先生是调到前方去考察经济，应该听从党国安排。"双方争执不下，只好提交学生会干事会进行讨论，干事会由晚九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二时。最后在所谓"多数"的操纵下，通过了"让马先生去前方考察经济"的决定。

十二月八日上午，马寅初在宪兵团长和一群装扮成学生模样的便衣特务的监视下回到重大举行"话别会"。马寅初在会上照样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控诉"四大家族"的罪行。身着西装革履随马寅初返校的宪兵团长一时慌了手脚，赶忙上前阻止说："马先生这次奉命调前方考察经济，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动身走吧！"想把马寅初强行带出会场，广大同学激于义愤，不断高呼："马先生不能走！""请马先生讲下去，不愿听的人滚出去！"少数反动学生则急呼："请主席宣布昨晚干事会的决议！"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国民党为了掩盖捕押马寅初的真相，故作姿态，不但安排了这一场"话别"闹剧，而且还布置了"摄影留念"。正在广大同学坚决不让马寅初离开之际，一个反动学生跑到主席台边大声宣布："礼堂外照像机都摆好了，请大家出去照像！"许多同学急得放

声痛哭！但出于对马寅初先生的崇敬和怀念，[illegible]离开会场，和马寅初一起合影告别。

马寅初被捕的消息，国民党顽固派严加封锁，不许泄露。第二天(九日)的重庆《新民报》登了一条短短的“本报特讯”：《马寅初行矣,昨日挥泪别重大》。冀图从侧面戳穿所谓“去前方考察经济”的真相，给读者一点暗示。事实上当天马寅初在宪兵特务的押解下离开重大，非常从容，没有半点眼泪。相反，当全院师生送他到校门口时，他回到家中拿出一本英文书来交与银行系主任丁洪范教授，并向大家宣布：“抽资本税不是我马寅初发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就实行过。对豪门巨室，抽其财税，是理所当然！我走了以后，还望你们多多研究，坚持下去！”然后才昂首阔步，踏上汽车离开重大。

三、壁报的风波

马寅初被捕之后，全院师生义愤填膺，我们在地下党[①]组织领导下，纷纷签名，向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写了《陈情书》，同时酝酿草拟《罢课宣言》。为此暗中往访丁洪范教授请求给予指导，适值法学教授丁哲明在座。两位老师在同学当中颇孚众望，但迫于当时形势，态度都十分审慎，只说：“马先生被捕，不是重大一校、重庆一个地区的问题，是事关全国的大问题。弄得好有如‘一二九’学生运动一样，促使国家政治前进一步；弄得不

---

① 笔者进入重大后，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民主社”，在沙坪坝六人小组中(重大周亚君、鄢宝璋、赵国恩同学和中大王继纯、张士焜、张学孔同学)，王继纯、张士焜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个小组实际上是领导“援马运动”的秘密参谋部。在祝寿、建亭阶段，我们与张士焜、张学孔都已搬出学生宿舍，住在沙坪坝街上“重庆市日用品公卖处”楼上(鄢宝璋兼公卖处主任)，王继纯、周亚君几乎每晚必来公卖处楼上聚会。

好，中国的政治会更加黑暗，我们不便多言。同学们应如何作，可大家多商量，人多智慧多，力量大。”并嘱：“言行须特别谨慎。”我们去见丁洪范时，已经被人跟踪，还放出谣言说，《罢课宣言》是丁洪范教授代我们草拟的，以致后来不准他再为学生上课。

全院同学在《陈情书》上都签了名，大意是说：马师学者、专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一片丹心，忧国爱民。值强寇压境，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绝续之秋，奔走呼号，声嘶力竭，纯为救亡图存，肝胆可照。主张征收临时财产税，从经济学观点来阐发，实国家财经困难救急之计，俾足食足兵，坚持抗战至最后胜利。学生等深受马师严格教育，自其主重大商院，认真负责，不辞劳瘁，延聘名师来校任教，商院声誉蒸蒸日上，同学学业不断提高，马师爱校爱生也即爱国爱民，生等同马师朝夕相处，故知马师深。化雨春风，是爱马师切。马师年届六旬，天寒岁暮，倥偬远戍，情何以堪？而数百学子，羔羊迷途，学何以进？故为马师计，为生等计，为国家民族计，涕泣陈词，恳请促马师返校主持院务。等等。

同学们明知《陈情书》送到国民党当局去后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同时草拟了《罢课宣言》，酝酿全校罢课，争取得到社会舆论支持，扩大影响，营救马寅初。沙磁区各校同学也暗中派人联系，表示只要《罢课宣言》发出，他们就立即响应。《罢课宣言》内容大意是说，日寇侵华，步步深入，国家命运，危如垒卵。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前方将士浴血抗战，而后方却有些人毫无心肝，藉抗日民族危机，利用政治权势大发其国难财，并将钱汇存外国银行，准备逃亡出国去当富翁寓公，使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国民经济陷入危境。马师嫉恶如仇，心情悲愤，

心昭日月，气冲牛斗，不畏强暴，振臂高呼，全国响应。马师的主张在理论上有充分根据，事实上是济世良方，然而不得采纳，反失自由！恶讯传出，舆论哗然，凡有心肝，无不发指！我们受马师数年教育，春风化雨，受益无量，我们决效法马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凛然的精神，举行罢课，以示抗议！马师一片丹心昭日月，临危不屈泣鬼神，我们决定坚持正义，贯彻始终，吁请社会舆论声援，争取各界人士协助，马师一天不返重大，我们一天誓不复课。

当时，重大学校当局为了敷衍场面，也假意同情马寅初，借以缓和同学的义愤情绪；一面却利用学生会出刊的一张壁报掀起风波，来转移准备罢课的大方向。事情经过是：马寅初返校话别的第二天晚上，学生会干事会学术股的赵仲昂同学编好了一期壁报，来征求我们的意见，讲到其中有两篇文章可能会触怒学校当局。我们大家认为只要是事实就不要怕。第二天清早，壁报贴出不到一个小时，王纲英同学跑来找到我们说："壁报闯祸了！校长在那里大发雷霆，他公开表示辞职不干！"因为壁报上有篇《论世风》的文章，引用了一些古代的成语格言，内中有一条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天说彼此好朋友的人，也许明天送你上断头台的就是他。"重大校长就是以此借题发挥，贴出布告，订于下午二时召开全校师生紧急大会提出辞职，与全校师生告别。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全体师生大会上，校长一口咬定："我不反对任何政党公开提意见，但任何政党都不容忍出卖朋友的人。今天商学院有同学认为我出卖朋友，我受不了，我不够为人师表了。我的辞职函电已经发出去，我马上就离开学校。"说完就走出礼堂大门坐上轿子，过河回家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在全校同学当中又引起了全校性的大论争。

校长走后，有个三青团学生逼着要我们交出投稿同学名单，并说他们即使不是共产党也与共产党有关，必须给予处分，才能挽留校长。这些无理要求，我们坚决反对，一时群鸦鼓噪，在校园内贴满了所谓“质问商学院学生会负责人”的大字报。其中一张具名《理工两院大同盟质问商学院学生会负责人》的大字报公开提出什么校长被你们气走了，现在群龙无首，一切行政无人负责怎么办？总务长也要辞职，不再管战区同学们的伙食费申请筹措了，战区同学们要吃饭怎么办？等等。妄图制造矛盾使全校同学不和，以此来破坏罢课运动。

理工两院主持正义的同学（援马派）明知这些都是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干的，也就纷纷用系会或学会的名义贴出大字报，并盖上系会或学会的图章，公开声明：“理工两院从来没有所谓‘大同盟’的组织。”指责他们是“南京汪精卫伪组织在重庆的变种！”给这些学生当头一棒，对我们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一两天，这个“大同盟”的大字报和标语，被广大学生们撕得片纸不留。充分显示了正义的力量。但是，终因为干事会内国民党三青团学生的阻扰和破坏，《罢课宣言》竟未发出，罢课运动也流产了。

四、祝寿会和“寅初亭”

校长返校后，首先是丁洪范教授受到迫害，不再让他上课，但聘约定期是一年，不便立即解聘，改作“研究教授”。这一决定，引起广大同学的不满。

在地下党领导下，我们决定发起为马寅初庆祝六十寿辰，对他身陷囹圄，表示深切怀念。为了把这次祝寿大会开好，我们总结了“游行请愿”、“返校话别会”和《罢课宣言》被破坏的教训，决定踢开原有的学生会干事会，另行组织“祝寿筹备委员

会”来主持其事。筹委会组成人员，除原有干事为当然筹委外，另由各系、班选出一名筹委。由于我们在广大同学中加强了工作，新选出的筹委绝大多数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并在筹委会中形成了以胡仁庆、李桂、赵仲昂、赵国恩等同学的领导核心，另外组织了周亚君、鄢宝璋、王纲英、徐修梅、吕德润、张若鲁等同学为骨干力量，协助推动工作，使绝大多数同学都站到正义立场一边。

筹委会内分文书、财务、总务、交际联络、文娱等股。为了把这次祝寿大会开好，研究决定：(一)必须扩大社会影响，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援；(二)通过祝寿，进一步发起在重大校园内修建“寅初亭”，作为对马寅初的长远纪念。随即由李桂同学起草《祝寿启事》，交周亚君同学带进城内，经过多方努力，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的重庆《新民报》和《大公报》的广告栏内刊出。原题《重庆大学全体学生为庆祝马院长寅初六十寿辰启事》。原文如下：

> 本年欣逢马院长寅初先生六十大庆，我全体同学为崇德报功，敬老尊贤起见，除建亭购书以资纪念外，并订于三月三十日①午后二时，在本大学礼堂开会庆祝，当晚举行游艺。凡马院长亲戚友好，届时敬祈光临指导。恐柬不周，特此奉告。赐教处：重庆大学商学院办公室。

重庆《大公报》在刊登我们草拟的启事时，有意把文内“庆祝”改为“遥祝”，暗示马寅初已经被捕不在重庆。

---

① 马寅初先生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五，我们为了早日争取营救马寅初，祝寿会决定提前于三月三十日举行。

这两家报纸原来都预约将《启事》连刊三天，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就勒令撤版，不许再登。我们得知后，再派周亚君同学进城，在广大社会人士和新闻界的支援下，将《启事》中的“全体学生”改为“商院学生”，把“遥祝”改为“庆祝”，在三月二十四日的《大公报》上又“抗命”登了一天。

《启事》登出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当时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出面，立即“手谕”重大校长：“贵校学生为马君祝寿之事，委座甚为怀疑，事前校方是否知悉，事后作何处置，盼速查明陈复。”学校当局接到“手谕”，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当晚通知我们到校长办公室谈话。经研究决定由我和胡仁庆筹委一起同往。走进办公室后，校长一面将陈布雷的“手谕”拿给我们传阅，一面带着沉重的心情说：“你们又给学校闯大祸了！为马先生祝寿，何必去登报呢！？事前也不告诉我，现在委员长都震怒了，你们应该马上停止举办。明天去登一个广告，说明停止举行了，广告如何措辞不失面子，我帮你们拟稿，这样我才好回陈布雷先生的信。”我们当即拒绝，争执不下，最后约定于第二天上午召开紧急筹委会议，请学校当局到会向大家说明。我们从校长办公室回来，连夜分头串连，其中包括筹委会中可能争取的三青团同学，准备第二天同校长舌战一场。

第二天上午刚一开会，校长就想抢先发言，借以控制会场。胡仁庆同学立即制止：“校长不是筹委，请等我们筹委会主席报告后，你再发指示。”他只好坐下来。由我首先报告了昨晚与校长的谈话经过。然后由校长发言，他胡诌一通，大谈什么“马先生明为‘调用’，实系逮捕。政府已逮捕的犯人，你们竟然要崇德报功，敬老尊贤，岂不是存心讽刺政府不崇德，不报功，不敬老，不尊贤了吗？”

胡仁庆同学当即反驳说“政府从来没有宣布逮捕马先生，因此，政府也可以崇德报功，敬老尊贤嘛！”

校长只得摊牌说：“现在委座已经甚为怀疑了，你们的祝寿会就应该停办才是。”

我即插话：“怀疑只能解释，不能回避。我们心里光明磊落，为了免去委座怀疑，证明我们心中没有鬼，看来祝寿会更势必非办不可了。”多数筹委都齐声赞同。

校长只好一声长叹，说：“你们不到黄河心不死！那你们推出学生代表，跟我去见陈布雷先生。”

当天下午，我和另一个同学随校长去到陈布雷公馆。下午跑了一趟，晚上又跑一趟，等了几个时辰，陈布雷才回到家里，接见我们。校长向陈介绍了我们的身份，先由我发言，说：“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为马先生祝寿，竟引起了委员长的关心，马先生桃李满天下，不登报不足以布达四方，只有请陈先生代为转陈：我们纯粹是从私人感情出发，委员长为国辛劳，日理万机，就不必为这样小事烦劳操心了！”

陈布雷说：“你们这个祝寿会一开，有些人就想来你们会上大骂政府一通；其实，哪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人骂，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怕人骂呢？反正国家有的是法律，我劝你们要三思而后行！”

我们接着补充说：“祝寿是师生亲友团聚，纯属私人琐事，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陈布雷立即把脸沉了下来：“我不是教育部长，我不能答复你们的问题！我不过是你们校长的老朋友，才写信给他。反正国有国法，你们好自为之吧！”他转身问校长：“你怎么领着学生代表来找我呢？”问得校长下不了台。

同去的学校训导长忙转弯说："布雷先生与叶校长是老朋友，校长多坐一会，我和学生代表先走了。"

我们走出客厅，陈布雷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站也不站起来送一下。他是在摆官架子，还是流露了自己的沮丧心情，这只能由他自己去作回答。

从陈公馆回来的当晚，校长又找我们谈话说："政府的态度和意图，你们在陈布雷先生那里已看得很清楚了。你们是不是可以不搞了？"我答："临近会期只有几天了，这是大家的事，就请校长向大家说明。"

第二天上午再次召开筹委会议。我将昨晚会见陈布雷的情况向大家报告之后，校长讲话提出："政府的态度，你们的代表昨晚已亲自看到了，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就此止步。"许多筹委当即表示："陈布雷的话是不负责任的，他不是教育部长，不能答复我们的问题。"

校长听了很不耐烦，说："你们不见棺材不掉泪！好，我今天就引你们的代表去见陈部长吧！"

当天下午我和一位同学随校长乘校车进城，到教育部会陈立夫，殊知陈立夫开会去了，秘书叫我们在会客室等候。校长在会客室来回踱着步子，连连叹气，又去部长室联系一阵，终于忍不住冒火地说："你们为了对得起马先生，就把我踩在地下，于心何安？我受不了这口气，我要辞职，今天就当面提出。"

我们没有理睬，心安理得坐在沙发上。从下午二时等到五时，陈立夫还未回部，改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出来接见。顾毓琇说："你们有问题，能到教育部来，说明你们没有失掉学生身份。你们两人的情况叶校长已介绍了，是无共产党关系的纯洁青年。那么，教育部今天就明确告诉你们：'祝寿会'停止举行！"他回过

头去叮嘱校长，要校长回到重大立即发出布告，就说："奉部长面谕祝寿会停止举行！"校长几番点头称是。最后，顾毓琇说："教育部的指示是明确的。至于你们是否遵照办理，那只有看你们的了。你们是大学生，已经知道一切行为的后果和责任了。"顾毓琇先站起来跟校长握手，然后向我们点头示意送客。

不论是陈布雷的蛮横，或者是顾毓琇软中带硬的恫吓，都不能改变我们为马寅初祝寿的决心。从教育部回来的第二天，学校贴出了停止举行祝寿的布告。到三月三十日祝寿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也刊登了"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二篇奉令免登"的《重要声明》。学校当局则下令把大礼堂和大教室统统上锁，连电灯泡都下了，校长、教育长、总务长都分别离开学校。电工房接到通知："祝寿会一开，就立即停电。"

面对这个形势，我们只好打开大礼堂楼上一间大教室，及时布置成为寿堂。正面贴上"明师永寿"四个大金字，四面挂满了各方送来的寿联、寿幛。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合送的寿联是三月二十四日(会前六天)送来的，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新华日报社送来的寿联写的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有一幅寿幛写着"老马识途"，另一幅写"马首是瞻"。由于送来的寿联、寿幛很多，连寿堂外面的过道上都挂满了。孔祥熙在马寅初未被捕前也送过一副寿联，我们就将它挂在寿堂进门口处，正如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家为了驱鬼，在大门口处贴上"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的大红纸条一样，我们也想借此驱除特务前来捣乱。孔祥熙送来这副对联，果然起到了避免纠缠的妙用，沙坪坝警察分局还正式派人来问我们："今天孔院长会不会来？若来，我们好加岗保护。"

《祝寿启事》原订三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开会，实际上重庆各

报记者及部分来宾，上午就到重大来了，招待组分别向来宾和记者们详细说明了我们在筹备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刁难。大家亲眼看到学校当局“停止举行祝寿”的布告，还挂在原地“展览”。

祝寿会下午两点开始，非常隆重，各方来宾济济一堂。祝寿会特制了几百个“祝寿纪念章”，由招待组的同学一一给来宾佩戴在胸前。寿堂上宾客满座，后来的就只好坐在过道上。当天的来宾有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塔斯社驻重庆代表、邹韬奋、张西曼和重大商学院的教授。还有《新华日报》记者邵子南、鲁明、陆诒以及各报记者参加。我代表筹委会报告我们的筹备经过和所受到的各种高压、阻拦和恫吓。提出了募捐修建“寅初亭”和购买图书捐赠重大图书馆以纪念马寅初的建议。全场当即热烈鼓掌，表示支持。

会上许多来宾热情歌颂马寅初敢怒敢言，浩然正气的高贵品格。张西曼以茶代酒，遥祝马寅初健康长寿，他说：“过去历朝言官专司谏议朝政之责，民国以来的监察院也算是言官衙门，可是，我就听不见他们的发言。仔细想了一下，原来言官的嘴巴，只顾吃饭便顾不得说话了。马先生不是言官，他那张嘴巴，实在令人钦佩，因为不管吃饭不吃饭，他都敢于说话！”张西曼还当场拿出一部《资本论》来捐给祝寿会。商学院教授丁洪范、张圣奘、熊正玱等也都先后发言，热情赞扬马先生言人之所不敢言的精神，足为学者楷模。散会前，来宾及各报记者纷纷解囊捐款修建寅初亭。塔斯社驻重庆记者也捐了一百元。

祝寿会开得非常成功，可是第二天重庆各报一个字的消息也不让发出来。

祝寿大会开过后几天，学校当局又找我们到校长办公室谈话说：“你们祝寿会不听招呼，还是坚持开了，幸好来宾们发言没有引起麻烦算是侥倖。现在听说你们还募了捐款，准备在校园内

修建寅初亭。我建议你们全部拿来买书捐与本校图书馆。同样是纪念马先生的寿辰，不必费事建亭了。”

我说：“建亭是大家的意见，今天不建‘寅初亭’，不但对不住马先生，而且对同学对社会上的捐款人士都无法交待。”

校长又说：“将来你们动工修建了，上面不准你们修建，你们又是非修建不可，使我在当中为难！”我说：“我们尽可能不使校长为难。”他从此看出了我们的态度和决心，只有摇头长叹。

“寅初亭”的募捐启事是这样写的：

> 马寅初先生年高德劭，教学有方。自掌重大商学院以来，认真负责，对学生等言教身教，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受益无量。值兹强寇压境，国步维艰，他奔走呼号，救亡图存，提出临时财产税之主张，是切中时弊的济世良方。然而不获采纳，反失自由，恶讯传出，舆论哗然！今六旬高龄寿辰之日，却身陷囹圄！我们为了崇德报功，敬老尊贤，拟筹建“寅初亭”以为纪念。使马先生的丰功伟绩共山(歌乐山)水（嘉陵江）而长存。希各方慷慨解囊，共襄盛举。

寅初亭的奠基典礼是同商学院的第一届毕业典礼同时举行的。这天，学校当局主要负责人校长和教务长都一反常规，借故离校，不参加商学院毕业典礼。只有训导长杨德翘出席，他照本宣科的说了一些勉励学生的废话。受到校方迫害的丁洪范教授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同学离校之后，在社会上要明辨是非，坚持正义，向马院长学习。

随即在热烈的掌声中举行寅初亭奠基典礼，杨德翘带头退席，有些教授也只好站起来，跟着他缓步走出礼堂。只有丁洪范教授参加了奠基典礼大会。典礼开始时，大家把马师母请到第

一排来，由我报告了筹备经过和决定建立寅初亭的地点。全体同学随着马师母和丁教授走出礼堂，去到“梅岭”为寅初亭奠基破土立碑。在一片掌声和鞭炮声中，一块刻着“寅初亭奠基典礼”的石碑，竖立在“梅岭”的花树丛中了。

寅初亭奠基典礼后，王纲英同学自告奋勇去找冯玉祥将军题写匾额，冯将军不仅答应题字，还为我们捐了款。重大附近的中央工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同学承包了建亭工程，他们为了表示对马先生的怀念，只收材料费。学生们参加劳动，作为实习，不计入成本。他们设计了一张肃穆壮观的宫殿式瓦亭图，按成本估价要三千余元。当时我们只募得二千二百多元，尚差约八百元，决定由全体筹委分担负责募足。可是当我去到中央工校土木部正式签订工程合同时，土木部老师愤然告诉我们：已奉通知，对寅初亭修建工程“不准承包”。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决定秘密修建。另外找来一个土包工头，要他为我们秘密修建一个亭子，在动工后两天以内建成。我们与包工师傅商定，为了快速、经济，将此亭改为茅草亭。先在另外一个地方将亭子做好，然后运进重大组装。亭基附近原有防空壕，动工修筑亭基时，校方以为是在修防空壕。两天之后，寅初亭建立起来了，校方才大吃一惊，同学则人人称快。从那时起，很多同学自动跑来保护寅初亭，学校园艺工人在四周精心种植了各种花草，使园亭更加壮丽。事已如此，学校当局徒呼奈何，只好装聋作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至此祝寿筹委会的任务基本完成，余款买成图书，捐给重大图书馆，整个祝寿活动，正式宣布结束。

五、民主战士，老而弥坚

马寅初被捕后，先是被送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后又被转押江

西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关押期间，马寅初不屈不挠，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随时向奉命来看管他的军官、宪兵、特务不断地宣讲国家大事，使他们有些人很受感动，后来弃暗投明。

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才把马寅初释放出来，软禁在重庆附近歌乐山大木鱼堡五号家中。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马寅初全家又才迁回沙坪坝重庆大学宿舍。马寅初满怀激情，投身民主活动，继续与"四大家族"作斗争。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在地下党领导下，以重庆大学学生为首的各校学生举行万人大游行，提出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马寅初与各校教授百余人，走在队伍前面，步行三十华里，使人深受感动。

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马寅初在沙坪坝中央大学讲演《新公司法与官僚资本》，进一步揭露"四大家族"的罪行，指出"官僚资本发了国难财，还要发胜利财、建设财"。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特地于二月六日发表《打倒官僚资本》的社论，附题标明"响应马寅初教授的呼吁"再次给予"四大家族"以迎头痛击。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市各界人民为了庆祝旧政协的成功，在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马寅初亲自参加。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旧政协决议，指使暴徒特务捣乱会场，马寅初与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被暴徒特务殴打。

马寅初在革命斗争中，越来越坚强。抗战胜利后，他由重庆回到杭州老家，后到上海为民主、自由继续奋斗。一九四八年，在党的关怀和帮助下，马寅初化装脱离了蒋管区，奔向解放区，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中。

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

阳 翰 笙

一九三九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全部迁到重庆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活动。他们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秘密发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接着，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共浪潮。一九四〇年夏，他们又一次企图胁迫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工作的文化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以郭沫若为首的绝大多数三厅工作人员当即予以严辞拒绝，并纷纷提出辞呈，表示离开第三厅。同时，有许许多多的人，向周恩来同志表示，愿意到延安去工作。当时，周恩来同志采取了巧妙的策略，代表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这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到延安去。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这些卓有影响的进步文化人士真的去了解放区，又害怕招致中外舆论的谴责，便采取了羁縻政策，另外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性团体，仍归属于政治部。并美其名叫“离厅不离部”。而我们则利用其合法地位，在敌人的心腹之地团结革命、进步的文化力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文化工作委员会时期的斗争，是第三厅时期斗争的继续。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我们已不可能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群众、发

* 阳翰笙，四川高县人，著名戏剧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动群众的工作，斗争的焦点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政策，贯彻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从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初解散，以郭沫若为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利用合法地位，在法西斯沉霾笼罩的雾重庆坚持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我们以文工会为据点，团结广大爱国进步人士，扩大我们党各项政策的影响；我们开展各种文化学术活动，联系群众，伸张正义，壮大人民民主的力量。文工会的许多党内外革命同志，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从事民主斗争，唤起人民，与蒋介石政权的法西斯政策作斗争。文工会的斗争，配合了我党在抗战时期革命任务的全局，是我党在国统区工作的重要战线之一。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在文工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们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文工会内外一大批爱国、民主、进步的同志，他们信任党、追随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是令人难忘的斗争，这是不可抹煞的历史事实。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文工会斗争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所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国统区斗争情况的介绍和研究比较少。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林彪、康生、江青等反革命分子阴谋篡党夺权，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恣意诬陷，致使许多同志蒙受了极大的冤屈。

岁月流逝，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担任文工会上层领导工作的同志大都已经去世，作为担负领导工作的成员之一，我有义务就我所能记忆得起来的情况，或所能搜集得到的材料来说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斗争史实，对党、对人民、对或幸存或去世的同志略尽我个人应尽的责任。

一、文工会的组建，党对文工会的领导

文工会的具体筹建工作于一九四〇年九月基本就绪，十月起便开始了正常工作。十二月七日在抗建堂举行招待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工会的成立。所有文工会的机构设置、工作方式和人员调整，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和郭沫若的主持下进行的，许多事情同时也经过与党外同志的充分磋商。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原在三厅工作的许多同志要转移到其他岗位去工作，原三厅所属团体的归属也有变化，这些都作了细致周详的安排。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方面的民主力量，在安排文工会的专任委员、兼任委员人选时，一些未参加第三厅工作的知名人士也参加进来，比以前更扩大了团结面。恩来同志稳健周密、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原三厅人员工作的高效率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一切都能按照筹备的意图如期完成。

在筹备文工会的过程中，恩来同志反复以在国民党顽固派营垒中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思想武装文工会的干部。他指出，国民党当局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他们是企图划地为牢，束缚我们的手脚。在我们，一方面可以利用军委会政治部所属团体这一合法地位，尽量多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进行活动。他指出，“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当时正处在反共高潮中，重庆和各地都弥漫着法西斯白色恐怖；抗日战争中后期的大后方经济十分困难，文化人的生计都成问题，而文工会居然能容纳几十个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居然能够让他们以进步的观点、方法从事政治、哲学、历史、法律、

军事、文艺等研究和文艺创作，这是十分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有人称文工会是“租界”。我们就是利用文工会这个地盘埋伏、掩护了不少我们党的同志，保护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士。在中共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基地，群众则美称它是“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

自然，国民党顽固派对文工会的存在是十分忌恨的，他们在文工会的两处办公地点周围都设置了监视据点，还派特务打入文工会内部探听消息，实行法西斯特务控制。在一次会议上，政治部长张治中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说什么“现在有些人口头上拥护三民主义，但叫他参加国民党，他就不参加。”还说“社会上有人说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个租界，国民政府管不了”。对文工会施加压力。郭沫若当即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吻回答：“我是研究过佛学的。我知道懂得佛学的并不一定当和尚，当和尚的不一定懂得佛学。至于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租界’问题，我们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如果张部长认为是‘租界’的话，我们就请张部长把这‘租界’收回去。”张治中无言答对，十分尴尬。我们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文工会的组织机构是这样安排的：主任委员由郭沫若担任，副主任委员为阳翰笙、谢仁钊。设有十名专任委员：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休、翦伯赞、胡风、姚蓬子；十名兼任委员：舒舍予、陶行知、张志让、邓初民、侯外庐、卢于道、马宗融、黎东方、王昆仑、吕振羽。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组长张铁生未到任，实际工作由蔡馥生担任；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组长为田汉。田汉到西南工作后，

由石凌鹤代理；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组长为冯乃超。文工会分两处办公，城区在天官府七号，主任秘书为罗髫渔；乡间在赖家桥全家院子，主任秘书为何成湘。还有三十余人先后担任秘书、副官、雇员等工作。文工会还设有敌情收听室，世界语、日语印刷厂和其他附属部门。在许多老同志的帮助下，列了一个当年文工会的人员名单，附于本文之后。由于时间相隔较长，肯定还有遗漏、误记之处，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补充、订正。

可以看出，新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它的委员、工作人员中，包容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如著名作家沈雁冰、舒舍予，教育家陶行知，历史学家邓初民、翦伯赞，自然科学家卢于道；还有胡风代表了《七月》一派文艺家，姚蓬子则为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在研究人员中更有许多未参加第三厅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加入。需要说明的是，在文工会的雇员中有记者、诗人、作家、作曲家等，这是由于编制所限，他们的地位和正式研究人员是一样的。由于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文化统一战线的范围反而有所扩大，我们团结了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在文工会组建阶段取得了第一个胜利。

应该指出，文工会的副主任之一谢仁钊是国民党派来实行监督的高级人员，后来暴露了行迹，陷于孤立。于是政治部又派了一位副主任叫李侠公，李在北伐战争时期同恩来同志和郭沫若都有过工作关系，因此他对我们的态度很好。他一到文工会就向我和乃超说明了他的来历，还出示了国民党给他的手令。李侠公比较开明，在此后工作中根本没有和我们发生冲突，而且相处很友好。在研究人员中他们也安插了钉子，如所谓“鲁迅研究专家”荆有麟和第三组的徐经满，先后都暴露了他们的特务嘴脸而陷于孤立。

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第三厅时一样，分为领导干部小组和基层支部两部分。而且由于斗争形势的复杂和严重，一般都实行单线联系。因此，同志之间常有彼此都不知道的情况。

从第三厅到文工会，组织编制不得不有大幅度的缩减，但我们不仅保存了精干，而且扩大了统一战线。文工会的党组织，在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以文工会为据点，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战斗。

二、学术研究和理论斗争

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第三厅的继续，但机构的性质、任务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化斗争的方式、途径也有所不同。文工会不能象第三厅那样以国家机关的名义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这一点上，有些同志说文工会是没有实际权力的清耍机构。作为学术研究机构来说，文工会却是名副其实的。以郭沫若为首，文工会的委员、兼任委员和各组工作人员中，有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有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电影艺术家，等等，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文工会曾被誉为"齐之稷下"。这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或著书立说，或讲学论争，或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大后方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政治高压、经济困难、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多种斗争形式，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为民族解放战争和反蒋民主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文工会的委员中，中国通史、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我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历史学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学科。一批进步的历史学家自觉地学习、运用革命的思想武器在学术领域里打开了新局面，在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大论战中，击败了新老军阀和国民党政权豢养的反动学者以及托派分子的谰言。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革命的、爱国进步的历史学家们发扬了这一传统，写出了一系列著作，从历史宏观的角度阐明我国社会的发展，以科学的力量，证明了抗日民族斗争的必胜前途。尽管论述的是古代史，但它以事实说明正义必胜，反动派必亡，所以在大后方群众中具有很大的魅力。一九四一年，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一九四二年，邓初民出版了《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一九四四年，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各家单篇论文更是不可胜数。上述历史论著，都努力以唯物史观来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各具特色，其中不少是传世之作。

需要提到的是，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工作的卓越成绩和战斗精神。从大革命失败、旅居日本时起，郭沫若就从事古代历史研究。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郭沫若不是为逃避现实而埋头故纸堆中，而是自觉地要清算过去的历史，为着中华民族的将来而探讨历史经验。他涉猎广泛，治学精勤，除《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外，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文工会时期写作的。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深刻地总结了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新华日报》自三月九日至二十二日予以连载。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大为震恐，《中央日报》于五月十九日发表社论进行攻击。周恩来同志对这篇史论给予高度评价，并把它带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将它列为整风文件之一，

设法在上海出版。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从延安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在哲学研究方面，要首推杜国庠，他在这几年间写作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对墨子、公孙龙子尤其作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他和侯外庐、纪玄冰、赵纪彬合著了《中国思想通史》。杜国庠治学严谨，持论平实，为学术界所尊重。抗战期间，冯友兰发表了《新原人》。杜国庠曾著文给予严正的批判，体现了高度的原则精神。

在文工会内，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不少。其中除了多数同志从事创作外，王昆仑在这一时期出版了《〈红楼梦〉人物论》，这是在"红学"中别具一格的重要论著。王昆仑对文学语言深有研究，文工会曾请他作过专题报告。在艺术理论方面，蔡仪完成了《新美学》，有很大的影响。文工会的同志还和文艺界的同志一起，对民族形式问题和《论主观》进行了研究，展开了讨论，发表了大量论文。

在文工会内部，我们重视自我教育，提倡切磋学问，砥砺品节。我们常举办内部学术讲座，郭沫若、翦伯赞都给大家讲过历史专题。有从桂林、昆明来的文化界朋友，就请他们介绍当地的文化学术动态。记得戏剧小组的同志还分专题进行戏剧创作的探讨，由一位同志作中心发言，然后大家讨论，最后由有创作经验的同志作总结，先后讨论了主题、情节、故事、人物、语言和戏剧批评等题目。戏剧组还组织大家阅读研究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使大家在理论上有较大的提高。每当白色恐怖加紧的时候，文工会的同志到外进行活动比较困难，整个社会气氛是那样专制高压令人窒息，经济上又十分艰

难，少数知识分子容易产生消沉的情绪，容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我们则强调利用时间淬砺自己，提出“多研究、多学习、多写作”的口号，激励大家精进不息。事后表明，这样做对干部是严格的培养和爱护，许多同志在此后的文化工作中做了不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理论研究工作有它鲜明的特点，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多数同志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问题。并在研究运用的过程中加深了对这一科学理论的认识，成为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强战士，因而在史学、文学等方面理论研究中，有新的建树和开拓。

（二） 整个文工会的学术空气比较严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努力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有益于民族解放战争和长远的文化建设。这里不尚空谈，不作书斋、经院式研究，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参加了理论斗争，自觉地为革命事业廓清道路。

（三） 在抗日战争的大前提下，许多进步爱国的专家、学者走向社会，逐步实现和民众的结合，这是学术界的一种新鲜空气。

从以上几个特点看，文工会是一种新型的学术机构，它形成了一种新的学风，至今对我们还可以有所效法。

三、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我们在《新蜀报》等报刊主办专栏，如国际问题研究组负责《国际问题周刊》。文艺组石凌鹤、龚啸岚等负责《七天文

艺》，针对大家关心的社会实际问题发表文章，因而很受读者的欢迎。

文工会举办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以学术活动的方式来广泛联系群众，造成健康的舆论，推动民主运动。文工会举办的讲座，在重庆是很有号召力的。我们请来主讲的人，一方面是社会名流，有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张友渔、王芸生等人，国民党左派邵力子、冯玉祥、王昆仑等人；一方面是文工会的委员，著名的学者、专家、艺术家。象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讲座和文艺演讲，邓初民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冯玉祥讲三国故事；邓初民、张志让、潘念之讲国际形势；文艺如老舍讲小说，田汉讲戏剧，贺绿汀讲音乐等。主讲人是一时之选，课题是群众关切的问题，所以文工会主办讲座、报告的消息不胫而走，深受群众的欢迎。临讲的时候，不但座无虚席，而且往往在走道、会议厅后边都要加座，甚至窗台上、窗户外都站满了人，其气氛之热烈，至今还印象很深。当时不少国际问题、文化问题的讲座，实际上是一次斗争，而进步的言论占了上风。如在苏德战争的前途问题、抗日战争的前途、太平洋战争的分析，文工会主办的讲座、报告，给群众以舆论的武器，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等谬论，为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作了思想动员工作。

说到时事讲座，使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时，苏德战争十分紧张，希特勒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便指使龚德柏等人出来散布"苏联必败"的论调。龚德柏以国际问题专家特别是日本问题专家自诩，他断言莫斯科必定要被打下来，而且料定日本必然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进攻西伯利亚。在德、日夹击之下，苏联的结局必然失败。此种论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投降

逻辑：苏联必然失败，德、意、日不可战胜，同盟国尚未出兵，中国还能支撑抗战吗？所以，这种鼓噪实质是为国民党进一步卖国投降造舆论。文工会成立不久，我们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反击顽固派。于是，我们在重庆举办"苏德战争形势分析座谈会"。一方面，我们把龚德柏和其他主张"苏联必败"的人请来发言；在我们方面，请屈武主讲，他是国民党左派，又是立法委员，对军事问题素有研究。还请了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等对国际问题有研究的专家。

会议由我主持，对于哪些人发言，发言的次序，事先我们都有准备。这时，国民党派来监视我们的那个右派副主任谢仁钊来了，和我一起坐在主席位置上。他一心想让他们的人多说话，老是安排他们的人讲。我不理会他，力主请我们的同志讲话，会上，屈武画了一幅军事形势图，具体分析了苏德双方力量消长的情况，阐明了斯大林的战略布署和目前双方相持的阶段，有理有据十分有说服力，从战争的趋向论证法西斯德国最后必然失败。龚德柏那一方就起来重弹老调，认为战争的结局必然是苏联失败。最后，章汉夫起来发言，他说："研究国际问题要根据事实作出科学的分析，只能判断在什么条件下，日本有出兵的可能，或不可能出兵；只能判断可能性的大小，推测其发展的趋势。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怎能象龚先生那样说日本一定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当时，龚德柏十分狼狈。会上论争的展开，在群众面前显示了"苏联必败"论的荒谬。事后，我们得知谢仁钊到政治部去说了我们许多坏话，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举行的这次会议十分不满，正在注意我们的行动。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在活动方式上注意有所节制，以利展开工作。

国际问题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主要依靠中苏文协来开展活

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要依靠苏联的军事援助，所以和苏联维持正常外交关系，并不时作出友好姿态，以求国际关系中的平衡。我们就利用这一特点进行工作。中苏文协主持实际工作的王昆仑、刘仲容、侯外庐、屈武、许宝驹等同志都是自己人，大家在斗争中完全能保持默契。我们纪念了苏联国庆二十四周年，由国民党左派人士冯玉祥主持，郭沫若朗诵了《苏联友人歌》，歌颂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斗争。我们还先后纪念了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强调了要学习他们用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在艰苦的处境中坚韧不拔、坚持斗争的精神。利用中苏文协、中国作家或中国学者的名义，发表给苏联作家、科学院乃至斯大林同志的公开信、致敬电等，借以分析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揭露顽固派妥协投降的阴谋。同时，也用中国作家名义给美国作家和各国作家发公开信，呼吁实行国际主义的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些做法使得广大读者能了解国际事件的真相，也利于提高国内问题的认识。合法斗争进行得巧妙而又有分寸，使顽固派虽然有所感觉但又无可奈何。

文工会叶籁士等人所办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做了大量工作，使艰苦抗战中的我国情况为全世界四十余国家所了解，取得了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寇占领了我国东南部大片领土，占领了香港等地，使得中国的消息阻塞，外界有许多误传。《中国报导》作为途径之一沟通了中外人民的联系。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不少人通过它了解祖国的情况，从而从道义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

四、文艺创作和群众性文艺活动

从第三厅时期起，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就是我们抗日工作的

主要内容之一。在以郭沫若为首的文工会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导演和演员，团结了一大批剧团和其他演出团体。文工会内部，郭沫若、沈雁冰、老舍、田汉、郑伯奇等都是著名的作家，傅抱石、贺绿汀等则是著名的艺术家，我们正是依靠了这些骨干力量和广大群众，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震动中外的抗日宣传。重庆时期的斗争形势变了，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法西斯白色恐怖，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社会经济十分困难，但文艺工作仍是一条重要战线，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斗争。戏剧运动另立专节叙述，这里主要谈谈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的情况。

首先，择要提一下文工会成员的创作。郭沫若出版了《沸羹集》、《天地玄黄》两部文艺论集，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五个话剧剧本。沈雁冰创作了小说《腐蚀》、话剧本《清明前后》，写作了大量文艺论文和杂文。老舍在主持"文协"工作的同时，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和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诗集《剑北集》等，还创作了《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面子问题》等剧本。田汉创作了话剧剧本《秋声赋》、戏曲剧本《岳飞》、《会缘桥》、《双忠记》等和大量诗作。我在重庆时期创作了《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等四部话剧剧本，《塞上风云》、《青年中国》、《日本间谍》等三部电影剧本。石凌鹤创作了《乐园进行曲》、《秃秃大王》等话剧剧本。其他从事文学、美术、音乐等各种艺术创作的同志都创作了不少新作品，因缺乏完备的资料，不能一一列举。

在重庆时期，美术界的同志办过多次木刻展览、漫画展览和

其它各种美展，发挥了战斗作用。郭沫若和我曾多次去参观展出，为美术家们艰苦奋斗、大胆创新的精神所感动。文工会的同志和抗敌“文协”的同志曾多次举办过音乐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演出《黄河大合唱》，那大气磅礴的乐章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战斗精神，使我至今难忘。那时候，诗歌创作、朗诵活动也是很活跃的，郭沫若、田汉、张光年、臧云远、柳倩都是诗人，诗歌界的许多活动也常在文工会办公地进行。记得当时确定屈原投江的端午节为“诗人节”，一直纪念了好几年，以激扬诗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举行了多次的诗歌晚会、诗歌问题座谈会，除了上述同志我记得起来的还有徐迟、任钧、王亚平、安娥等人。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方殷，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编辑，又是个热情而有才华的诗人，在当时的许多次诗歌晚会上，我们都能听到他动人心弦的诗句。

最后，我要谈谈文艺运动问题。文工会作为研究机构不能领导群众文艺团体，但在实际上，抗敌文协、中苏文协和其它抗日文化团体、广大文艺界群众都团结在文工会周围，中共中央南方局也主要通过文工会的党组织来领导文艺运动。这不仅因为有三厅时期和文艺界历史的因缘，还由于文工会有一批有成就、有威望的作家、艺术家，能发挥他们的影响。至于我本人，一九三八年奉党组织之命，联络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文艺界有许多朋友，便于工作。我们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活动，组织形式则主要依靠“文协”和“中苏文协”。文协方面有老舍、冯乃超、罗荪、丰村、梅林等在那里主持实际工作，中苏文化协会在前文已经说过了。我们党在文化界、文艺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有坚强的骨干力量，更由于周恩来同志坚持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具有高度的斗

争艺术，使我们在文艺斗争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在我们组织抗日群众文艺团体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政权也成立了文化运动委员会，用来破坏文艺界的抗日活动，和我们争夺文艺运动的领导权、争夺中间群众。张道藩、潘公展、王平陵等人是一些有政治经验、有手腕的反共文化老手，斗争是相当错综复杂的。当时还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文化机关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本旨，又不肯拉下假面具来，害怕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这样，就出现了真真假假，有敷衍、有欺骗、有摩擦、有压制的局面。我们对他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一般性呼吁抗日的活动如庆祝会、纪念会，以及于我有利的事情，我们和他们合作，并注意保持自己的主动；有反共、投降倾向的活动，则坚决抵制和反对。同时，我们自己举行各种活动，如纪念鲁迅逝世若干周年，强调文艺界不屈的斗争精神；纪念孙中山先生、钱亦石先生逝世，强调联苏联共、坚持抗战等等。我们还通过对过去一年文艺工作的总结评价、对未来一年的展望等方式，在刊物上发表指导性文章，举办座谈会总结经验等，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舆论上我们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张道藩他们具有无法克服的病症，即他们处于反人民的立场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方针以至后来的投降政策；他们拿不出一个象样的作家来，他们拿不出一部象样的抗日的作品来，这是他们不可能排解的悲哀。人心向背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更加感受到这一历史规律的力量。

五、敌情资料情报工作与“反战同盟”种种

从第三厅以来，我们一直有同志在进行国际问题研究和敌情研究。我们有各种外语人才，有熟悉国际问题的专家，当时还配

置了收听用的电台。第三厅编译的《国际问题资料》和《敌情研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为军政各方所重视。到了文工会时期，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人才，而又需要这方面的情报资料，所以有关敌情研究工作等任务和专用设备都延续下来，原先第三厅联系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也仍由文工会第三组负责。我们的许多同志为抗战事业默默地付出辛劳。当然，这些宝贵的情报资料也经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转给延安，供我们的党政军领导参考。

“反战同盟”是“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简称，西南分盟和重庆的总盟先后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初，它的发起人是日本作家池田幸子和鹿地亘夫妇，在郭沫若、冯乃超等人的推荐下，得到陈诚等人的支持，从下层日军俘虏中物色人选，经过思想教育后，组成反战组织。西南分盟在成立后的第二天就派出了前线工作队到前线喊话，收集日军资料，在瓦解敌军工作上树立了良好的先例。在这次战争中，有三位盟员牺牲。他们的事迹受到中国军民的热情欢迎，广西的报纸还专门发了消息。“反战同盟重庆总部”成立反比西南分盟要晚，这是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碍，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初才正式宣布成立。当时总部机关报为《真理的斗争》，西南分盟的机关报是《人民之友》，向日军士兵进行反战宣传，同时在盟员中进行民主思想教育。在第三厅的积极工作下，这些士兵和低级军官思想提高很快。重庆总部根据需要，于一九四〇年九月派出第二支前线工作队到湖北宜昌，他们在阵地前用汽球发传单播放日本歌曲，作宣传讲话。有一位盟员原是日本第十三师团的士兵，他熟悉情况，在阵地前指名喊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鹿地亘写作了反战剧《三兄弟》，由林林译出，由反战同盟先后在桂林、重庆演出，效果良好。

在第三厅的帮助下，由电台进行了广播。第三厅对敌工作的成绩招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反战同盟的活动也因而受到了限制。

一九四〇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第三厅被改组，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反战同盟的处境也便日益恶化，不仅不能从事反战工作，而且第二次作为战俘，加上手铐，被送到贵州镇远收容所，名义上是进行学习、研究，实际上是进行隔离、监禁。国民党政权一方面惧怕这些士兵受我们影响，另一方面又想把这部分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作为邀功请赏的资本。这些，斗争便日益复杂。镇远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完全采用法西斯专制的管理方法，使这些受过民主进步思想影响的战俘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人身待遇。国民党当局为避免矛盾激化，撤换了所长。当时，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求助于文工会。经过郭沫若、我、冯乃超的洽商，请康天顺（现名康大川）去就任。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又具有组织能力。大川到任后，改善了伙食、医疗、用水等条件，发挥战俘中各种业务人员的专长，改善了生活；同时，加强了学习，使收容所空气为之一变。大川的民主作风和实干精神受到大家的尊敬，但又受到国民党宪特的陷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突然被捕，直到日寇投降，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获释。“反战同盟”在收容所一直和文工会方面保持联系，我们也设法给他们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在那里，他们又壮大组织，一直发展到拥有盟员一百五十多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反战同盟的所有成员和其他日军战俘被遣送回国。到达日本博多港时，反战同盟的一百五十名盟员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大家宣誓为日本民主化而奋斗，并祝愿中国革命胜利成功，中日两国友好相处。最后，由长谷川氏宣布解

散。他们归国迄今近四十年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中坚。今天，中日已建立了外交关系，当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性的一页还历历在目；那些为中日友谊作出牺牲、付出辛劳的人们，历史不会湮没他们的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六、皖南事变和重庆文化界的对策

一九四〇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进步力量加紧压迫和进攻。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对奉命北撤的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国民党顽固派一边封锁消息，一边加强法西斯特务控制。红岩村、曾家岩五十号、新华日报社都受到武装特务的严密监视，街上到处是便衣特务。山城重庆，为白色恐怖所笼罩。当时，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谈判的首席代表，并领导南方局的工作。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我们都是义愤填膺，又为皖南新四军战友的处境担忧。面临这样严酷的形势，我们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法西斯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挫败敌人的反共阴谋，首先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真实面目，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提高认识，有所警惕和准备。恩来同志当即向何应钦严词抗议，并领导《新华日报》揭露蒋介石政权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滔天罪行。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恩来同志的题辞和四言诗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突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封锁，使皖南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重庆、传遍大后方。三月

十日《新华日报》出版增刊，披露皖南事变的详细情况，并综合揭露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种种表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纷纷起来谴责国民党政权破坏抗日的倒行逆施，要求制止白色恐怖，要求惩办发动皖南事变的元凶，使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于被告的地位。文工会的许多同志参加了揭露敌人、发动群众的实际工作，为粉碎顽固派的阴谋作出努力。

同时，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周密而深刻地分析了斗争形势，指出这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的必然表现。鉴于蒋介石集团背叛大革命、投靠帝国主义的一贯表现，要防备“四一二”事件的重演。为此，南方局坚决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党内外骨干中进行斗争形势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并决定有计划地迅速疏散力量，以防一旦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时被他们一网打尽。

在这千钧一发重要时刻，我们党十分注意保护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保存文化界革命同志和朋友的工作，作了具体妥善的部署。当时，我们在戏剧、电影界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摄影场和中国青年剧团等处。我们党组织和少数左派人士研究，根据受迫害的可能分成三类，一是身份已经暴露的党员或党外骨干，必须从速离开国统区，由八路军办事处送延安解放区或去江苏新四军；二是在重庆已不便工作，但以后可以继续工作的同志，则安排去香港或西南，并在桂林、昆明开辟新的工作；三是身份比较隐蔽，尚可留在重庆，或工作需要，必须留在重庆的，留下坚持斗争。一切都有条不紊而极有效率地进行，短时期内完成了有组织的撤退。

重庆文艺界按照这一安排，分几批悄悄地撤离。路费有困难的，由组织筹划给予帮助。当时，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和欧

阳凡海等撤到延安；田汉、光未然、石凌鹤、贺绿汀、徐步等去昆明；夏衍、杜国庠、柳亚子、宋之的、章泯、舒强、凤子、丁聪等去香港。到香港和昆明去的同志，在那里办刊物、写文章、组织演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建立新的民主进步的文化中心。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我国大陆则集中兵力打通中南一线。不久，香港被占。我们在重庆非常惦念那里文化界的战友，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危。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才传来他们安然脱险的消息，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等到绝大部分文化人已经分散，其它应变措施已经大致安排停当后，恩来同志让我离开重庆，暂避一下敌人的刀锋。他说："你是四川人，找个地方隐蔽一下，等局势缓和下来或者稳定下来再回来。"我的家乡在川南高县，是地方军阀刘湘的势力范围，蒋介石的力量在那里比较薄弱。我又有些老同学是那里的开明士绅，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隐蔽下来。我便以回乡省亲的名义回到了高县。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我就陪着父亲住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我拜会了一些亲戚朋友，访问了故乡各种人物，为戏剧创作收集了大量素材。后来，看到斗争形势有所缓和，没有出现进一步决裂的征兆，我便回到重庆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在我党我军击退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周恩来同志又领导我们重新布署力量，团结群众，准备向顽固派进行回击。一九四一年夏，我在周恩来同志同意下着手组织中华剧艺社，准备通过"中艺"团结文艺界广大同志进一步开展文化斗争。接着，党组织决定通过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来冲破国统区法西斯专政的高压气氛。这些都是服从于反击国民党政权这一总任务的具体步骤。

这里，要提到一九四一年夏成立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它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是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等革命人士组织的秘密政治团体。负责人为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为中共代表，我也是成立时十八人之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配合党的民主革命任务，从事秘密工作。它曾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进行活动。从一九四一年夏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散，它的成员一直坚持进行斗争。

“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这是恩来同志勉励新华日报社同志的名言。此后，文化战线的斗争你来我往十分尖锐，代表人民利益的光明力量在一次次斗争中锻炼壮大，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七、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群益出版社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郭沫若和我正在家里商议工作，周恩来同志来了，他兴致勃勃地提出要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郭沫若当即谦辞。恩来同志深沉地指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恩来同志责成由我主持这一工作，他强调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

恩来同志要我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项。通知由恩来同志改完后，以电报发给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的党组织。我深感这一任务的重大，经过反复考虑，提出了一个计划；并由文工会的冯乃超、

罗髫渔、石凌鹤、朱海观、翁泽永等二十余人组成一个工作班子。计划得到恩来同志批准以后，我便着手推动各项准备工作的进行。

在筹备组织的建立上，我首先找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老舍，又找了救国会的沈钧儒老先生和陶行知先生，找了中苏文协的王昆仑、侯外庐等同志。这些单位大都由我们的同志、朋友在负责，他们都热情地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著名人士如邓初民、翦伯赞、黄炎培、许宝驹、黄琪翔、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章伯钧、刘仲容等，都一致赞同。发起人中还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在新闻界，除了我们自己的《新华日报》外，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陈铭德、邓季惺主办的《新民报》都参加了。《大公报》及《商务日报》这次也参加了进来。一个包罗广泛的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几乎整个文化界、新闻界、文艺界都动员起来，各项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迅速。

十一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出了两版篇幅的纪念专刊，第一版刊载周恩来同志亲自撰写的文章《我要说的话》，文章论述了鲁迅和郭沫若两人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各自的贡献，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文章热情地赞扬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在篇末，恩来同志指出："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我祝他前进！"在纪念专刊上，刊载了董必武、沈钧儒、潘梓年、徐冰、田汉、邓颖超、沈尹默和绿川英子的诗词或短文，歌颂了郭沫若二十五年来的

战斗历程。《新蜀报》、《新民报》也都出了纪念特刊。

下午的庆祝茶会在中苏文协大楼进行，文化界、新闻界和文艺界人士，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无党派著名人士和爱国青年，好几百人济济一堂，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庆祝会由国民党左派、抗日名将冯玉祥主持，老舍、沈钧儒、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相继讲话，热烈赞扬郭沫若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高度评价他在学术文化上多方面的成就。周恩来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高度评价了郭沫若作为诗人、学者、战士的卓越贡献，指出："他那一生战斗的生活，在反对旧礼教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有着他这一支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运动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人们应当学习的。"郭沫若接着致答辞，他宣誓，一定终身献出他的力量给多难的祖国；一定为着人类的幸福和反法西斯的斗争，做出更大的努力。恩来同志的讲话和郭沫若的答辞，点明这次庆祝活动的主题，表达了皖南事变以来长期郁结在人们心中的呼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会场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使茶会热烈的气氛达到了最高峰。

在庆祝大会的同时，在中苏文协大楼还举办了"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展览会"，展出了大量照片、手稿、书法和各种版本的著作与译作，展示了郭沫若从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流亡日本到归国抗日的历程。郭沫若对祖国之爱的执着，创作著述的繁富，使人们受到很大的激励和鼓舞。文艺界为纪念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准备了两台话剧作为献礼，一台是纪念日前由中华剧艺社演出的《天国春秋》，这是我在不久前创作的剧本，以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来启发人们认识蒋介石政权同室操戈、破坏抗日的罪

行。另一台是由中国万岁剧团在纪念日后演出的《棠棣之花》，这是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写作的诗剧，这次加以修改，扩大为五幕历史剧，以聂莹、聂政的故事，歌颂了不畏专制强暴、舍身取义的精神。两台戏都配置了优秀的导演和演员，演出效果极为强烈，成为重庆戏剧运动的佳话。

在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延安、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为庆祝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延安文艺工作者将《凤凰涅槃》编成大合唱演出。在香港，由夏衍、茅盾等人发起，百余位文化界名人聚会庆祝。上述城市和后方各地的报纸刊物陆续发表纪念文章，先后达半年之久。

这次纪念活动终于取得了预期的成功。通过庆祝和纪念的方式，我们冲破国民党长期以来造成的白色恐怖，以高昂的声音喊出了要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主张，谴责了法西斯主义，伸张了正义。纪念活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文艺组织的协同活动，充分显示了团结的力量。在纪念活动中，通过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和讲话，明确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有力地推动着文化界的战士们继续前进。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具体组织工作的人来说，经过这一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的胜利，无不由衷地钦佩周恩来同志英明卓越的斗争艺术。

在国民党统治区，举行群众性集会是犯禁的，左派进步人士的集会更招特务统治的忌恨。这次，我们找到了一种扩大影响的斗争方式。共产党人是不主张为个人祝寿的，但从此以后我们先后给沈钧儒、茅盾、冯玉祥、洪深、老舍等人作生日或举行纪念创作活动，以祝寿的方式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歌颂不畏强暴、坚持原则的节操，提倡讲大局、求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总

之，都是有所为而为，出于斗争的需要。许多党外的同志和朋友对此心照不宣，我们大家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在这里，还要讲一讲关于群益出版社的事。在武汉时期，第三厅团结了大批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人士，在发展进步出版事业方面也做过不少工作。当时，出版了大批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各种各样的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同时出版界还争取出版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但是，第三厅自己的小型印刷所只能排印少量内部文件资料和部分宣传品，书籍出版工作要依靠外边的书店、图书公司。到了文工会成立，因为反共高潮迭起，也因为当时纸张等物质条件不足，出版进步书籍非常困难。在为郭沫若作生日以后，组织上考虑到需要出版郭沫若著作和解决其家庭经济困难，决定帮助郭沫若家属成立一个出版社。文工会方面由冯乃超和我主持这一工作，以个人名义进行投资。群益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开始营业，前后担任出版社经理、负责出版业务的有郭培谦、沈硕甫、屈楚、刘川等人，一九四五年以后由吉少甫负责。这个出版社主要出版郭沫若著译的作品，并出版大型学术刊物《中原》杂志。群益出版社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出版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屈原》、《十批判书》、《甲骨文研究》等政治、文艺、历史、古文字学等著作二十三种。此外，他们还出版了一批外国文学名著和艺术理论著作；通过出版“戏剧丛书”、“文艺丛书”，团结了一大批文化工作者。在社会上，群益出版社配合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对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统战工作；他们团结出版界同业，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合法斗争，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设做了准备工作，这些都是不能抹煞的贡献。

八、“中艺”的组建和重庆戏剧运动

在抗日战争初期，全国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使戏剧演出的活动形成了高潮。而当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一九四〇年的戏剧演出一度显得零落，剧目的质量和数量都远不如前。皖南事变不久，我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以戏剧为突破口，反击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高压政策，使戏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从高县家乡返回重庆以后，我反复考虑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革命工作。戏剧界的同志也有这种要求，纷纷向我提出：“老阳，我们在这里等着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演戏。”当时左翼戏剧运动的领导人大都转移了，就我和极少数同志留在重庆。但在几个电影厂里，戏剧人才不少，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人员，应有尽有。只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就一定能通过戏剧给顽固派以有力的反击。有一次在郭沫若家里和恩来同志会面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和设想。恩来同志十分赞成我这个想法，要我提出个初步计划来。

回来后，我考虑到政治环境的险恶和经济条件的艰难，拟订的计划主要有三条：一是组织一个业余剧团，工作上比较主动，演员不脱离“中万”、“中制”、“中电”等单位，生活上有保证；二是演出剧目以现实主义的作品为主，以借古讽今、旁敲侧击的办法来进行战斗，比较适合当时的形势，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三是出面领头的人选，这点很费斟酌，他既要听党的话，政治色彩又不要太浓，既要业务真正懂行，又要有组织活动才能。我想起了应云卫。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他信任党，在文化运动中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他是个干才，点子多，艺术上有水平；

虽然在作风上存在一些问题，但他敢于冒险犯难，在当时这样困难情况下站出来挑担子；他关系多，会应付，对付国民党有一套办法。我把上述想法先和郭沫若商量，得到郭沫若的热情支持，然后再向恩来同志请示。他作了精密细致的推敲，然后同意了这一计划，还提醒我对顽固派的阴谋要有足够的警惕。于是，筹备中华剧艺社的工作便开始了。

第一步是搭架子，组建核心班子。我找到应云卫，讲了组织中艺的意图，他答应立即辞了职出来张罗。接着我又找了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刘郁民、孟君谋等人来组成班子。陈鲤庭又拉来了贺孟斧。集合演员的工作比较顺利，“中艺”的基本队伍不到三十人。中艺办公地由苦竹林搬到“文协”楼下，并由文工会拨三千元作开办费。各方面的筹备工作都动起来了，大家议定，以陈白尘的《大地回春》作为打炮戏。我又跑去找夏云瑚，借他的国泰电影院为演出场地。夏云瑚虽然有顾虑，但还是讲交情、识大体，在以后的剧运中从经济上给我们以支持，为抗战事业做了不少好事。

由于我们创办中艺的真实意图不便公开说明，也由于有些工作没有做细，有些朋友产生过误会。经过解释，都取得了谅解。另外，中艺的创办也触怒了“中制”厂长郑某人。他来找我，要打消这个计划。一计不成，又请客吃饭，想请周恩来和郭沫若来说服我们。他们二位没有支持他，郑也就不便再说。后来，中艺要演出《天国春秋》，剧本按规定送审。郑又跑到审查委员会去要求禁演这一剧本，暴露出他的两面派真面目。幸而审查委员会里吴茂荪是我们自己人，使中艺通过了这一关。为了缓和矛盾，在筹备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活动中，我们请中万的朋友们演出《棠棣之花》，王瑞麟和郑某高兴地答应

了。这样，大家都很高兴，进行了认真的排练，演出时受到热烈的欢迎。

《天国春秋》上演时，配备了强大的阵容，导演为应云卫，主要演员有白杨、舒绣文、耿震、项堃等人。全体工作人员有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演出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山城。每当剧中人洪宣娇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观众席中立刻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可见，人同此心，广大人民群众憎恶蒋介石政权同室操戈的卑鄙行径。考虑到"中艺"成立不久，政治环境险恶，恩来同志指示少对此剧作报导评论，充分相信群众的鉴赏力。

祝寿演出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激情。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下，他写出了剧本《屈原》，许多同志和朋友贡献了积极的意见，恩来同志嘱我帮助配置强有力的演出阵容，保证剧本的演出效果。我们四出奔走，约请优秀演员。这次演出和《棠棣之花》、《天国春秋》一样，采用全明星制。即从主角到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导演为陈鲤庭，主要演员为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施超、孙坚白、张逸生等。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屈原》正式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气磅礴的爱国主义激情，精湛完整的艺术演出，征服了广大观众。大家奔走相告，欢呼《屈原》演出成功；《雷电颂》的诗句，回荡在嘉陵江两岸，充分表达了国统区人民的心声。

一九四二年晚春，政治形势稍稍有所缓解。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不得不有所收敛。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研究，决定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新华日报》和其它进步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同时在报上诗词唱和，黄炎培、郭沫若、沈钧儒、董必武等数十人先后发表诗作，大家乘胜追击、借题发

挥，连续进行了约半年之久。后来，郭沫若举行《屈原》演出庆功会，我正病倒在乡下，不了解会上情况。我深感郭沫若以他的才情和学力作出了贡献，而恩来同志和党组织为剧本的创作和演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文工会内外、中艺的许多同志则是把这次演出作为党领导下的一次文艺战役来全力奋斗的。

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雾季演出中，中华剧艺社演出了七个大戏、一个小戏，和中万合演了一个大戏。《棠棣之花》、《天国春秋》、《屈原》的初次演出场次分别为二十四场、二十五场、二十一场，达到了当时最高纪录。令人高兴的是，孩子剧团、中万、中青、中制、旅渝剧人剧团都演出了不少好戏。我们终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给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重庆戏剧运动出现了新气象。

中艺的成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刁难。那时的重庆，物价飞涨，老百姓难以卒岁。中艺的同志们忍受着政治、经济的双重压迫，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雾季演出中又演出了《法西斯细菌》、《长夜行》、《风雪夜归人》等有深度、有水平的大戏。后来，他们离开重庆，辗转内江、资中、自流井、成都等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共演出大小八十多个剧目。这支党领导下的文艺队伍经受了考验，作出了贡献，在戏剧史上写下了自己的一页。

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的戏剧运动中，中华剧艺社起了核心和骨干作用，不仅在于它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两个雾季演出中的成就，也在于参加“中艺”演出活动的成员包括了中万、中青、中电等剧团中进步的、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那时候文艺队伍中党员比较少，党对文化工作的意图，由相信党、靠拢党的左派人士贯彻到各方面去；而从三十年代以

来一大批进步艺术家，都自觉地跟党走、采取和党一致的行动，团结在党的周围。就这么一支队伍，左右了重庆戏剧运动的风气。大家不演不健康的戏，抵制反共的戏，争取演进步的戏，形成了默契。象马彦祥就明确向张治中提了条件，拒绝排他不愿排的戏。国民党当局要排反动戏，找不到有影响的导演和演员。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戏剧领域我们占据了主动地位。

当时，文工会、文协的同志们还通过戏剧评论、戏剧问题讨论来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当时《新华日报》的剧评是突出的，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参加了评论写作工作，通过剧评来教育群众提高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并诚恳地帮助艺术家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引导戏剧运动的健康发展。对不健康的倾向如商业观点、噱头主义等进行批评，要求艺术家进行自我教育，提高一步。当时《新蜀报》的周钦岳、《戏剧岗位》的评论工作者不少是我们的朋友，发表了不少评论，其它一些戏剧刊物基本上都是自己人在办，对大的方面的认识大都比较一致。

重庆时期关于戏剧问题的座谈、讨论是很活跃的，差不多每个戏都有讨论。文工会常出来组织这种活动。每隔一时期，文工会举行总结探讨性的报告会、讲演会，对话剧、戏曲、歌剧、剧评进行评价，由田汉、郑伯奇、洪深、石凌鹤、龚啸岚等人主讲，吸引了许多戏剧界人士参加。同时，田汉主持过历史剧问题的讨论，石凌鹤、龚啸岚主持过戏曲改革问题的讨论，我主持过建立新现实主义体系的讨论。这些专题讨论，使大家对戏剧实践中的实践问题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从而推动了工作的发展。

这里要提到的是，田汉在桂林、昆明仍坚持创作了《秋声赋》等剧本外，还领导了戏剧运动的开展，新中国剧社、演剧

四队和九队的演出活动都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帮助，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戏剧工作者。一九四四年二月，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落成，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瞿白音、熊佛西等领导举办了规模巨大的西南戏剧展览演出，有粤、桂、黔、滇、湘、闽、赣、鄂八个省、二十六个戏剧团体、一千多人参加，检阅了戏剧界的力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田汉是文工会的领导成员，他虽转移西南，始终和我们声息相通。更重要的是，西南戏剧运动和重庆戏剧运动都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的文化斗争，是密切关联的两个战场。

从武汉时期起，第三厅就曾组织戏曲演员参加抗日斗争，办过歌剧演员训练班，那时把戏曲叫歌剧。田汉的长处之一是，他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戏曲艺人打成一片。在团结戏曲界从事抗日工作方面，龚啸岚是出过很多力的。到了重庆，郭沫若、田汉等文工会的同志经常去看戏曲演出。周恩来同志曾点名要看戏。外国客人来，恩来同志也要排戏曲演出。文工会的石凌鹤、龚啸岚曾组织多次座谈，讨论地方戏曲的改革问题，川剧名演员张德成、刘成基（当头棒）、阳友鹤(筱桐凤)、魏香庭、胡漱芳（川蝴蝶）、陈书舫，汉剧的吴天保、沈云陔、傅心一都参加了讨论。后来他们从事戏曲改革，上演了《秋江》、《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经过改进的剧目，甚至还演出了《雷雨》。许多戏曲艺人在抗战时期艰苦奋斗，坚持抗日宣传，表现出高度爱国主义精神。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爱国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共同努力，使重庆戏剧运动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紧密配合了政治斗争；(二)产生了一大批有思想深度、艺术质量高的剧本，几个雾季演出了二三十个大戏；(三)

舞台艺术的综合性得到了加强，新现实主义的戏剧体系逐步形成；（四）锻炼了戏剧艺术的骨干，培养了新生力量，为日后的民主斗争、文化建设积蓄了力量。

说到重庆戏剧运动的成绩，不能不谈到恩来同志的卓越贡献。长期以来，恩来同志十分喜欢戏剧和其它各种样式的文艺作品，他更从对敌斗争的高度，把文艺作为克敌制胜的武器之一。他从重庆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以话剧为突破口，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既从斗争原则、策略上指导戏剧运动，又以不倦的精神去看戏、接触戏剧工作者和亲自过问评论工作。他对国民党文化特务的反动戏，态度严厉，旗帜鲜明。对同志、朋友的作品，则采取十分细致耐心的态度，坚持从大后方实际情况出发，凡符合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的、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法西斯统治的作品都给予支持和鼓励。对于具体作品，他总是反复考虑，鼓励别人提出不同看法，再慎重地作出判断。他肯定过一些作品，但并不作不切实际的溢美；他批评过一些作品中的缺点，但十分注意分寸，避免挫伤朋友的积极性。许多朋友爱看《新华日报》上的剧评，认为能使人得到教益，使人感到心悦诚服。恩来同志有许多文艺界、戏剧界的朋友，他总是以真诚的爱护、耐心细致的帮助，带领大家前进。重庆戏剧界能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并发挥战斗作用，与恩来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九、我在重庆时期的创作活动

在文工会工作时期，戏剧创作是我斗争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的全部创作生涯中，除去小说、电影剧本和文艺评论等作品，共创作了八部话剧剧本，而其中半数是在重庆时期写作的。以我写的十七部电影剧本来说，也有三部是在重庆写的。现我集中谈谈这

几个剧本的写作过程，可能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斗争的若干侧面。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进行有计划的疏散应变工作。这一工作告一段落，恩来同志让我回家乡一次，以避开敌人的刀锋。那时，我内心充满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决心通过戏剧形式来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外投降、对内残杀的罪行。在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的日子里，写现实题材是不容许的。我在三十年代初曾打算写作太平天国三部曲，搜集了大量材料。这时，我便想到从我熟悉的历史材料中选取题材，准备通过描写太平天国的内乱来体现我的创作意图。从故乡高县回到重庆后，我和恩来同志谈了这个想法。他赞成这一构思，并提出由于主题的尖锐性，要考虑如何设法通过审查机关。当时我的工作任务很繁重：一是正在筹备组织中华剧艺社，打算以戏剧为突破口给敌人以反击；二是筹备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组织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而《天国春秋》已列为中华剧艺社第二个演出剧目，于是，我在为中艺解决好剧场问题之后，赶紧到乡下去写作剧本。

因为对太平天国的题材酝酿较充分，写作进行得很顺利，一个六幕历史剧只化了四十多天就完成了。为了通过审查，当时颇费心思，不得不加上一些爱情纠纷。新中国成立后再版《天国春秋》时，对这些描写作了删节。如前边所述，中艺在排演此剧时安排了第一流的艺术家；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们精湛的二度创造，使《天国春秋》的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个戏以艺术形象反映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使人们联想到内部的分裂残杀会造成对敌斗争的失败。剧本反映了皖南事变后千百万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九四一年秋，话剧《草莽英雄》写成。剧本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反对满清统治的斗争。这次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前奏。这是我童年时代耳闻目睹的历史事件，多年群众起义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早在抗战前，我就曾以这个题材写成电影剧本。联华公司准备由孙瑜导演进行拍摄。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实现。在《天国春秋》演出之后，我便把这个孕育已久的题材，重新加以提炼，写成话剧《草莽英雄》。剧本写成后，得到洪深、冯乃超和文工会其他同志的鼓励和赞许。洪深认为这是那几年难得的收获，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热情地表示要亲自来排这个戏。恩来同志听说了，让我到曾家岩去谈这个剧本，在场的有八路军办事处来的许多同志。大家听了，给了我许多鼓励。当时我们估计这个剧本能通过审查，因为它写的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恩来同志主持了这次讨论，最后作了精辟的论述：保路同志会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都先后被摇身一变为“拥护共和”的保皇党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所篡夺，四川、湖南、湖北、浙江、陕西等省的起义领袖都遭到屠杀，这一惨痛的教训值得记取。历史为我们证明，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在文工会宣读《草莽英雄》时，有一个叫荆有麟的也来听了。这个人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出现，实际上是打进文工会搞情报的国民党特务。当念完剧本，他脸色大变，忍不住冷声说：“阳先生，你专门写暴动，真不愧是暴动专家啊？”我一听，心想这家伙真敏感。听话听音，这可是个不祥之兆。果然荆有麟进行了告密，当中艺的人将本子送去审查时，审查委员会的人早已摆开架势等在那里了。早先《天国春秋》、《屈原》的演出打痛

了他们，这回便对《草莽英雄》开刀。他们不但禁止演出，还禁止出版，更没收了剧本原稿，这是前所未有的严厉处罚。后来通过王昆仑辗转托人打听，才知道罪名是鼓动四川人民起来推翻政府，鼓吹武装暴动。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秋，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争取到一些暂时的自由，这个被禁锢达四年之久的剧本才得到上演。

《草莽英雄》剧本的被禁，对我是很大的打击。这个剧本是我经过长期酝酿，反复写作，付出巨大的劳动才写成的。满心希望它能发挥作用，对四川人民的斗争有所推动和鼓舞。恩来同志知道了我的心情，一天约我到孙师毅家里去谈心。他说，剧本被禁的事，我们知道了。你要想得开一点，不要为这件事感到不愉快。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能够代表人民，一时不能演出，不能出版都不要紧。他鼓励我继续写作，努力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来。我们的恩来同志总是那样，对同志的工作经常给予细致周到的关怀，该进的时候让你进，该退的时候让你退；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及时给你以温暖。他常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斗争，却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志们的安危；他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统筹全局，还能在百忙中关心一个干部的情绪。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又是多么深挚的阶级情谊！

在一次政治形势分析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对蒋介石反革命统治手腕作了透辟的剖析。他说，蒋介石专门制造矛盾、利用矛盾，要两面派手段。有了政学系，又搞黄埔系，再来一个CC系。对这派这样，对那派又那样。玩权术，要手段，搞来搞去都是为了巩固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使我想起平时接触到的许多国民党官员，他们表面扬言要坚决抗日，暗地里却是卖国投降；一方面说要团结御侮，另一方面又处心积虑排斥异已。集中到一点，

目的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私利。在国统区工作，形形色色的两面派见得太多了，蒋介石就是他们的总代表。我深受启发，感到如能塑造两面派的艺术典型，对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和斗争水平是十分有益的，于是决定写作剧本《两面人》。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既要深刻揭露，又要掌握分寸，留有余地，因此只能在剧本里写一个茶场主祝茗斋这样的两面人。他两面敷衍、两面利用，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茶山。当群众一旦觉悟，祝茗斋便陷于孤立的境地。当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上演《两面人》时，重庆的观众反应十分强烈。《新华日报》接连发表了许多篇评论，借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手法。

一九四四年，我着手写作话剧《槿花之歌》。这个剧本以一九一九年朝鲜“三一事件”为背景，描写朝鲜人民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第三厅和文工会工作期间，我接触过许多朝鲜同志。他们投身于中朝人民共同的抗日事业，在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忠诚勇敢，使我产生了用戏剧艺术反映他们的强烈愿望。我查阅了大量朝鲜斗争史料，访问了朴哲爱、金奎光等，结合我的直接感受，于一九四五年初写了《槿花之歌》。剧本由中青剧社演出，马彦祥导演。演出时许多旅华朝鲜朋友穿上民族服装去观看，不少人激动得流泪。《新华日报》刊载评论，强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意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紧接《槿花之歌》的写作，我本来准备创作反映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革命者形象的大型剧本《苦行记》，已经收齐了材料，并列出了详细写作提纲。后来，由于斗争形势急剧变化，我便放弃了这一写作计划，以全付精力投入到民主斗争中去。

在重庆坚持斗争的时候，我的主要精力用于文化斗争的组织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不仅政治环境险恶，经济生活也十

分困难，父亲的逝世，几个孩子接连生病，精神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但作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干部，我们从不放松自己的研究、学习和创作。在文工会，我学习中外文学名著，尤其研究了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契诃夫等人的剧作；回顾、总结了我国话剧运动的历史经验；坚持话剧创作和写作文艺评论。我写作的这几个剧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着眼于现实斗争，自觉服从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大方向。这是些石缝中生长的花朵，尽管不可能那么丰满和壮丽，我却有点敝帚自珍，因为它们凝集着党和同志对我的关怀，联系着在黎明前艰苦奋斗的岁月。

十、抗战后期的民主斗争，《对时事进言》，围绕解散文工会的斗争

自文工会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和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保持密切的联系。许多党的干部以个人身份参加各种活动，广泛结交朋友，真诚地商讨问题，在抗战的总目标下，和尽可能多的群众团结在一起。郭沫若居住的天官府四号是民主党派、进步人士交换意见的场所。各方面代表人物、各地文化人士经常出入郭府，自由地发表意见，探讨问题。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也是这里的常客，大家分析形势，提出问题，交换看法，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身体力行地坚持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许多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进步人士服膺共产党的主张，和我们采取协调的步骤。在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的情况下，这种自由协商、团结斗争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民主运动。

国民党顽固派借口“军事和民主不能并容”，一步一步强化法西斯统治。皖南事变后，郭沫若、阳翰笙、夏衍、于伶、陈

白尘、石凌鹤等写作的一百六十余种剧本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上演和出版。除了查禁剧本，我们外出还有特务盯梢，当时我们称之为"义务随从"。他们还用控制剧场来阻止进步戏剧的演出，用各种捐税来拖垮进步剧团。当时的捐税名目繁多，有娱乐捐、防空捐、救济捐、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以及侮辱性的名目"不正当行为取缔税"等，这最后一种税，受到文化界的愤怒抗议才只得撤去。苛捐杂税的数值，恰是票价的一倍。但进步的戏剧战士们仍然排除万难，在这荆天棘地中坚持演出活动。

一九四三年潘公展主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成都、桂林、昆明、贵阳都设有分会，被扼杀的书籍杂志数以百计，引起大后方文艺界的强烈不满。于是大家一致起来造舆论，揭露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黑暗内幕，把潘公展及其掌握的审查机关搞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潘公展拉起一个"中国著作人协会"，由鲁觉吾负责。十一月五日举行成立大会，我也收到了邀请书。我事先和郭沫若、夏衍、洪深等商量了对策，决定利用讲台进行合法斗争。我们的朋友去了二、三十人。会议由程天放主持，到会的作家不多，有许多人是根本没有著作的文化打手。我们在会上提出三项议案：

(一)放宽图书杂志审查，除违反抗战建国、泄露国防机密者外，概应准予出版；

(二)废除剧本演出审查；

(三)请政府重行审查本年七月前被禁的一百多种剧本。

讨论第一项议案时，有一"不知何许人也"的人物起来发言，主张取消这一提案，而且还声色俱厉地大骂，说"批评政府的缺点，暴露社会黑暗的人不是中国人，是英国人、美国人、苏

联人。”最后更咆哮着说：根据他在职务中的经验看来，审查条例实太宽，应该从严；审查太简单，还应该加重！原来，他就是审查机关的文化鹰犬！洪深当即起来反驳，我也接着发言，痛斥了那个鹰犬一顿。在讨论第二、第三项提案时，由于张道藩、潘公展的反对，也未被通过。我二次要求发言，他们进行阻止，我便同夏衍、洪深等，很气愤地退出了会场，其他许多作家也跟着退出会场，会议不欢而散。事后，在党组织主持下，总结了这次合法斗争的经验。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从延安返抵重庆，对记者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他指出除此别无它途可以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也别无它途可以挽救目前的危机。至于其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办法，不管其形式如何，决然无补于事。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活动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队，承认所有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等。

中共中央提出的纲领性意见，给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指出了斗争的目标和提供了思想武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在国统区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党派各人民团体都积极起来响应。第二天，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开党派会议，产生举

国一致的政府；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等自由，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月十三日，重庆妇女界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请政府立即邀请各党各派和各方人士，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共商国事，成立全国人民一致的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当时成都、昆明、桂林等地都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一时造成强大的声势。

这时，我们接到王若飞的建议，要求我们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时局宣言。当时，郭沫若、冯乃超、杜国庠和我，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进行讨论，拟定了六条要求的提纲，然后由郭沫若执笔起草，经过大家讨论修改，定名为《文化界时局进言》。这六条是和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要求民主团结，所以一般人叫它做《民主宣言》。在党的领导下，文工会从郭沫若起所有领导干部都投入了这一工作，以秘密方式发起一个签名运动。我们努力的对象主要是各界代表性人物，这样才有号召力，才能显示出文化界的力量。

我先找到女作家谢冰心，告诉她我们要发起一个签名运动，把“宣言”交给她看，征求她的意见，冰心看了爽朗地说：“很好嘛，我赞成。”她当即在宣言上签了名。我又去找科学家丁瓒，他住在歌乐山半山腰。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到他家说明了来意。他十分热情，自己签了名，还答应帮助找其他科学家签名。后来我又和郭沫若到北碚去找老舍。老舍看了宣言，提起笔就签了名，他还说：“复旦大学还有许多人，可以找他们签名。”我说，我们正要去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在北碚的对面，在那里马宗融、陈望道、周谷城等都签了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名作家巴金也签了名。这样，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三百一十二人，包括了

自然科学界，哲学、法律、历史、教育、出版、语言学等社会科学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界各方面代表性人士。文工会的全体领导，文艺界的党员，还有许多能保守秘密的朋友，四面八方都签了名。

这个《文化界时局进言》于二月二十二日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发表，在舆论界引起极大的震动。这三百多文化人士都是国统区的民意标志人物，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他们的一致签名，表明蒋介石政权的极端孤立，极端不得人心。签名的人士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尽管重庆特务如麻，但对这次签名运动，他们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蒋介石为此暴跳如雷。张道藩、潘公展之流赶忙派出鹰犬四出追查。他们对许多签了名的朋友施加威胁和迫害，有的被勒令写悔过书，有的被关禁闭，这些朋友都没有屈服。国民党顽固派搞了一个表示反对的"声明"，拉人签名，但除了几个特务文人和投机分子外，凑不出一个象样的名单。此举不过在他们丑恶的脸上添一笔滑稽的油彩而已。

在追查过程中，许多友好人士表现得严正光明，特务们无可奈何。他们找到了谢冰心，问她见到宣言没有？是否同意宣言？冰心理直气壮地说，当然看到了宣言，如果不同意干吗要签名？她还说，这有什么不得了的！今天大家都在争取民主，中国没有民主就国无宁日。他们知道了是我去约她签名的，这也不是秘密，本来是正大光明的事，也就无可奈何。他们又到复旦大学去追查，得知郭沫若也亲自出马。从追查中，他们知道文工会是这次签名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蒋介石对此恼怒不已，决意解散文工会。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各报刊载如下消息："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三十日）奉政治部张

部长命令，予以解散。”

对于国民党解散文工会之一招，我们并不感到意外，相反感到某种轻松愉快。国民党顽固派被沉重地打痛了，他们感到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惨败，感到了自己的孤立，才诉诸手中的权力。我们进行了研究，根据南方局指示，把文工会解散的善后工作当作后续的战斗，扩大我们党的影响，揭露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促进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同时，尽可能妥善安排好文工会人员，保护革命的力量。

四月一日，文工会举行聚餐晚会，重庆新闻界、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国际友好人士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签名纸上郭沫若亲笔写着：

始于今日，终于今日；
憎恨法西，勿忘今日。

“今日”指第三厅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文工会解散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因为法西斯特务正在借端害人，“憎恨法西”一句在报刊发表时改为“摔掉花瓶”。会上充满着严肃激昂的气氛，郭沫若在会前致辞，他高昂地说：“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是更自由了！”沈钧儒在会上热情地赞扬了文工会的贡献，指出“文工会的被解散，只能认为是政治上的变动。机关可以解散，但文化工作者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解散的”！翦白赞驳斥了张治中命令中“机构重复”的所谓理由，他义正辞严地说：“历史的发展是全体支配局部，而不是局部支配全体。机关虽被解散，到马路上也可以团结起来的。中国是绝对不能从世界的主流分开的，‘终于今日’也正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从事新民主主

义文化工作的开始！”会上邓初民、纪青、陈迩冬、胡邦杰来信致意。王亚平、高龙生等相继在会上发了言。招待会变成了战斗动员令，精神是十分高昂的。

四月九日，重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沈钧儒为首设宴慰问郭沫若和原文工会人员。沈钧儒、左舜生、侯外庐、史东山、陶行知等人讲话，称颂郭沫若的贡献；尚丁朗诵了黄任之的文化诗；邓初民发言，提出“安慰是不够的，要争取民主自由”！柳亚子愤慨地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马寅初直率地说：“我只说一句话，那解散文工会的是真空管！”中共代表王若飞提出建议政府任命郭沫若为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如若不能实现，欢迎他到边区、解放区去，给国民党顽固派将了一军。翦伯赞在最后沉痛而激昂地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摧残文化、扼杀民主的罪行。他大声疾呼：“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有权爱中国救中国！我们要继续斗争！”

在这同时，重庆市的许多进步青年、爱国人士络绎不绝地来文工会致意。昆明、桂林、成都等地各文化团体纷纷来电来信，对郭沫若和文工会全体同志表示敬意和慰问，并进一步提出民主自由的要求，揭露顽固派扼杀民意、摧残文化的丑恶行径。可以说，文工会是以斗争的姿态解散的，在重庆和国统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文工会人员的安置工作经时约一年多之久，自己有办法的自己另谋工作，没有办法的由党组织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安排，几乎全体研究人员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拒绝由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安排。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之邀，乘飞机出国了。我由党组织安排，在中苏文协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出国期间，代理他主持工作。从第三厅到文工会，经历了七个多年头，几与抗日战争

相终始。岁月如流，记录着我们在国统区的大后方所进行的特殊的战斗。

不久，抗战胜利了，我们又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国统区经受过斗争考验的文化界人士，纷纷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附一：

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

主　任：

郭沫若

副主任：

阳翰笙　谢仁钊　李侠公

专任委员：

沈雁冰　沈志远　杜国庠　田　汉　洪　深　郑伯奇

尹伯休　鹳伯赞　胡　风　姚蓬子

兼任委员：

舒舍予　陶行知　张志让　邓初民　王昆仑　侯外庐

卢于道　马宗融　黎东方　吕振羽

第一组：　国际问题研究

组长：　张铁生　蔡馥生代

蔡馥生　叶籁士　霍应人　沈锡嘉　高　植　石啸冲

钱运铎　翁植耘　徐　步　黄序庞　陈世泽

雇员：

卢　逸　孟世昌　陈田华　郑林曦　冯××（不在编）

第二组：　文艺研究

组长：　田　汉　石凌鹤代

石凌鹤　光未然　贺绿汀　李广才　王　琦　李可染

卢鸿基　丁正献　臧云远　龚啸岚　高龙生　万迪鹤

秦奉香　白　薇

雇员：

沈　慧　柳　倩　安　娥　刘　巍　刘子谷

第三组：　敌情研究

组长：　冯乃超

廖体仁　蔡　仪　郭劳为　康天顺　朱　喆　绿川英子

刘　仁　史殿昭　潘念之　王学瀛　徐经满①

敌情收听室

负责人：朱　喆

王孝宏　周　继　李　嘉

雇员：

郭宝权　卢炳雄　郭敬贤　史××

城内秘书室（天官府七号）

负责人：罗髫渔　朱海观

骆湘楼　郭培谦　王肇启（三人均为副官）

乐嘉煊会计　李　平文书　陆坚毅打字

雇员：

吕佩文　姜梦绮　郭美英

乡间秘书室（赖家桥全家院子）

负责人：何成湘

卢鸿漠副官　施白芜　荆有麟②

汪　遐出纳　梁文若资料　高履芳资料　林健美

何忆娴　裴吉英幼儿园

排字房（五人）

负责人：郭敬贤

张　曜　王××

附二：

对时局进言

（《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了。

内部未能团结，政治贪墨成风，经济日趋竭蹶，人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以致无力阻止敌寇的进侵，更无力配合盟军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快要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全国的人民都在焦虑，全世界的盟友都在期待，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须及早实行民主，在野人士正日夕为此奔走呼号，政府最近也公开言明，准备提前结束党治，还政于民，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分朝野，共具悃忱，中国的危机是依然可以挽救的。

---

①② 徐经满、荆有麟系国民党安插的特务，因文工会多数工作人员知道他们的身份，处于孤立地位。

然而“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不应有瞬息的踌躇，更不应有丝毫的顾虑。其有益于民主实现者，在我们认为，应该是：

一、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个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有改进的依据，以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

二、由临时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与目前的战事配合。

以上二大纲领实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步骤，政府既决心还政于民，且不愿人民空言民主，自宜采取此项步骤，使人民有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共挽目前的危机。

更就有碍民主实现者而言，则有荦荦六大端，应该加以考虑。

一、审查检阅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皆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

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

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尅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

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富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

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

以上诸大端如能早日见诸实施，则军事形势必能稳定，反攻基础必能确立，最后胜利也毫无疑问，必能更有把握了。

故民主团结实为解决国内局势之主要前提，而在今天尤为争取国际地位的必须步骤。今天的时局虽然紧迫，而国际形势却大有利于我们，我们尤应趁此时机，早早决定我们的国策。

目前克里米亚会议已告圆满结束，四月二十五日并将由中苏英美法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已经普遍地宣布死刑，为全人类开出了民主和平的康庄的大道。

更以军事而言，苏联的大攻势正以雷霆万钧之力，雄师数路趋指柏林。英美联军更由西线积极进攻，纳粹兽军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不久当在它的巢窟里面遭受屠戮了。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进军，也正和欧洲攻势桴鼓相应。美国的意志，在东方急于要在中国登陆作战，急于期待陆上力量的大反攻，以期能同时及早解决日本，更是切迫如火。

今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苏联红军及英美盟军的进攻，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屈挠同盟国人民的意志。全世界都在吹奏着胜利进行曲，我们中国人民不愿甘自落伍，不愿在这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仍有自私自利，苟且因循，等待胜利，甚至种下未来祸根的做法。

我们恳切地希望，希望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力　扬　　丁　然　　于去疾　　于　友　　于　伶
王　戎　　王　采　　王　岚　　王　琦　　王亚平
王冶秋　　王复生　　王郁天　　王深林　　王超凡
王治津　　王务安　　王进英　　巴　金　　戈宝权
方令孺　　方兴岩　　方学武　　文怀沙　　毛守昌
禾　波　　白　薇　　白　杨　　甘祠森　　史东山
石西民　　石　炎　　石啸冲　　田一文　　田　涛
田仲济　　司徒慧敏　史伊凡　　伍　禾　　任　钧
任秋石　　朱海观　　朱鹤年　　老　舍　　吉联抗
仲秋元　　沈　扬　　沈　浮　　沈钧儒　　沈静芷
沈经农　　沈　慧　　冷　火　　宋之的　　宋云彬
杜水波　　杜君慧　　杜国庠　　吕霞光　　吕　恩
汪子美　　汪刃锋　　何公敢　　何成湘　　余所亚
沙千里　　李　凌　　李　畏　　李士豪　　李可染
李恩杰　　李华飞　　李声韵　　吴　视　　吴　茵
吴祖光　　吴家骧　　吴蔚云　　吴组缃　　吴藻溪
吴清友　　吴　泽　　但杜宇　　辛　勤　　阮有秋
林　谷　　林　辰　　林仲易　　林举岱　　周而复
周　知　　周　峰　　周谷城　　周徽林　　明　敏
金月石　　金仲华　　金善宝　　金锡如　　金瑞苓
邵荃麟　　孟目的　　孟君谋　　孟用潜　　初大告
阿　嘉　　岳　路　　茅　盾　　胡　孑　　胡　风
胡　绳　　胡文淑　　胡守愚　　洪　深　　侯外庐
柳　倩　　柳亚子　　范朴斋　　姚木溪　　姚雪垠
姚蓬子　　郁　风　　郁文哉　　施白芜　　俞　珊
俞励犍　　冼　群　　马　义　　马宗融　　马寅初

马思聪	高　集	高崇民	高龙生	高　懿
崔小萍	崔万秋	夏　衍	夏　白	夏迪蒙
徐　冰	徐　迟	徐昌霖	徐悲鸿	袁水拍
梁　希	梁纯夫	梁永泰	梁公在	索　开
孙伏园	孙　陵	孙　源	孙坚白	孙施谊
孙锡纲	秦柳方	秦　牧	康性天	祝公健
殷　子	殷　野	耿　震	凌珊如	郭沫若
郭春涛	郭培谦	郭树权	梅　林	许士骐
许幸之	许桂明	许涤新	黄　晨	黄　蕊
黄若海	黄洛峰	黄宛苏	黄碧野	黄荣灿
黄寿慈	舒维清	褚述初	毕相辉	盛家伦
陈之佛	陈文泉	陈先舟	陈先泽	陈　原
陈润泉	陈鲤庭	陈翰伯	陈翠华	陈烟桥
陈迩冬	陶　金	陶行知	曹靖华	曹　禺
章石林	章汉夫	章靳以	章蔓蘋	章超群
焦菊隐	陆梦生	陆　诒	张正宇	张申府
张西曼	张光宇	张志让	张定夫	张明养
张孟闻	张鸿眉	张静庐	张铁弦	张瑞芳
张　雁	张　磊	张　翼	张骏祥	张维冷
张重英	冯乃超	冯文洛	冯雪峰	傅彬然
傅抱石	华　林	华　嘉	彭燕郊	禾　木
覃　英	覃必陶	舒绣文	曾敏之	汤　灏
阳翰笙	贺礼逊	贺孟斧	黄　巩	项　堃
董时进	董鼎清	叶以群	叶浅予	杨　晦
杨荣国	杨潮声	杨村彬	贾纬廉	邹绿芷
葛一虹	葛　琴	路　翎	路　曦	庄寿慈

虞静子　万　灿　廖静文　廖沫沙　赵晓恩
赵韫如　赵慧深　邓初民　刘清扬　刘厚生
刘白羽　刘火子　刘尊棋　刘砥方　刘铁华
刘运筹　刘义斯　蒋　路　翦伯赞　臧克家
臧云远　潘子农　潘梓年　潘　菽　潘震亚
霍应人　蔡　仪　蔡楚生　郑君里　郑　敏
卢于道　卢鸿基　薛迪畅　钱歌川　钱辛权
萧　强　萧隽英　戴爱莲　谢冰心　谢　添
龙季子　聂绀弩　韩北屏　韩　涛　罗家正
罗髫渔　严杰人　魏志澄　蓝　马　蓝馥心
苏　怡　顾颉刚①

---

① 发表时，签名排列以姓氏笔划（繁体）为序。

记中华剧艺社

张逸生　金淑之

抗日战争时期，从一九三八年起，到抗战胜利后一年多，前后十个年头，我们的演剧生活都是在成渝两地度过的。而两地比较，则重庆和我们又有着特殊关系。我们从事演剧这个专业，就开始在重庆。在重庆，有使我们不能忘怀的一段战斗岁月，有使我们不能忘怀的很多支持我们战斗的同志和朋友。更怀念指挥着我们创造历史的司令员、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今天，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整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戏剧运动有关的资料，这是一件有着历史意义的事。我们作为当年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为这一工作作出贡献，遗憾的是经过十年浩劫，手边的文献资料被洗劫一空，许多情景只能凭记忆来写，势必难于详尽了。

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在即将离开国立戏剧学校的前后，我们在重庆先后演出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金淑之饰德丝蒂蒙纳，张逸生饰卡希欧）、洪深的《飞将军》（张逸生饰高鹏飞，金淑之饰陈怡仙）、还有曹禺的《日出》（金淑之饰陈白露，张逸生饰乔治张）。这之后，就去了成都，一别三载，到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才又回到重庆，加入当时在重庆新成立的唯一的民营

* 张逸生、金淑之，著名话剧演员，抗战期间在重庆长期参加中华剧艺社演出。

剧社“中华剧艺社”。这个剧社，名为民营，实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演剧团体。现在首先对这个剧社，就我们所经历，作--简要介绍。

一

中华剧艺社的成立，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它的组成经过与其历史背景紧密相关。

当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貌暴露而掀起反共高潮之后，原先由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工作的、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抗议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经请示周恩来同志之后，准备撤退。而国民党顽固派深恐这支文化力量前往延安，为共产党增添实力，他们为了便于对这支力量加以控制，于是又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将原三厅的人员聘为委员。三厅同志在请示了周恩来同志之后，为了坚持抗战，继续斗争，就从三厅转到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顽固派说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为了作研究工作。其实，谁都知道，他们是为了要把这些人软禁起来不让跑掉。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呼之为“租界”，而我们的同志则称之为“高等集中营”。就是这个所谓的租界和高等集中营，被中国共产党用来作为进行工作的掩体，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战斗。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顽固派再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激起了大后方民主进步人士的无比愤怒，特别是在文化战线上表现更为突出；当时的形势，要求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迅速占领并扩大阵地，对国民党顽固派予以还

击，而最有力的方式莫如演剧。但是那时在重庆只有两个官办的电影厂，我们手里并没有剧团，虽然分散在两个电影厂里的人员，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但是如果只靠官办团体为我们经常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对这种情况，党内进行了仔细研究，决定从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场”里拉出一些人来，筹备组织一个民营剧社，为我党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个计划经请示周恩来同志，得到他的同意和指示后，便由阳翰笙主持，着手筹划起来。

筹划开始，第一个要周密考虑的问题是：让谁来公开出面办事？因为当时的环境是既险恶又复杂，应付那种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选定一位适宜于此项工作的同志才行，经过审慎地研究，最后决定了应云卫。大家都知道应云卫是一直跟着共产党走的无党派人士，他从事戏剧运动多年，没有政治色彩，社会关系多而办法也多，活动能力很强，会应付三教九流，有一套对付恶势力的经验，公认他是组织剧社的干才。应云卫当时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拍完一部《塞上风云》之后，正好没有新的拍片任务，经阳翰笙直接出面找了该厂厂长郑用之洽谈，很费一番周折，才说服郑用之，答应让出了应云卫。

应云卫的问题解决之后，又通过各种渠道从成渝两地找来陈白尘、陈鲤庭、贺孟斧、辛汉文、孟君谋等人，组成理事会，作为领导核心，对剧社采取集体领导，理事会由应云卫任理事长，剧社定名为“中华剧艺社”，应云卫对外就称中华剧艺社社长。此外，由陈白尘任秘书长，和刘郁民、赵慧深等人主持剧社的日常工作。其它工作人员，连一部分演员在内，固定在剧社的为数还不足三十人，计划在演出时，由官办团体的朋友来支援。所以如此者，是限于经济力量，当时开办费只有三千元，这三千元是

经周恩来批准，而由阳翰笙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经费中秘密拨出来的。如此少量的开办费，用于演出成本，就不可能象官办团体那样给工作人员发放薪金了，固定在剧社工作的不足三十人，也只能在必要时发一点购买日用必需品的零花钱。到剧社来支援演出的官办团体的演员，则是拿着官家的薪俸来为这个私营剧社演戏。剧社请了一位做饭的大师傅，每天开两餐大锅饭，遇演出之日，夜间再加一顿热汤面。中华剧艺社就是这样一个苦干穷干的团体，大家抱着同一个目标，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党的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虽苦亦乐。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选定了剧目，因为一时在市区找不到房子，就在南岸黄桷垭借了一处私人宅子，先进行排演。后来才在市内离"精神堡垒"不远的"国泰大戏院"对面，一个旧门面的小茶馆的后院，租赁到了三开间的一楼一底，算是有了社址。这处房子确实不大，用处可不算小，楼上是摆满了床位的宿舍，楼下半间也隔成宿舍。前半间算作办公室，文书要写字，会计要算帐，许多日常杂务都要在这儿办。怎么办？办法还是在人想，我们不客气用了点"扩张主义"来解决问题。前边小茶馆的茶桌，从前门外一直摆到后厢院的过道，我们就把这后厢过道的两张茶桌几乎包了下来，每天泡上几碗"鸳鸯"和"玻璃"，[1]总有人守在这里。这里就成了我们的阅览室，演员的自修室，演员可以在这里写点东西，读书，背台词。同时，这里还是我们的会客室和接待室，在以后的日子里，许多来剧社的生熟客人、社友，我们都在这里接待。就是这么个小茶馆深处的过道茶座，象夏衍、于伶、宋之的、石凌鹤、还有老舍先生，还有郭沫若及许许多多关怀、

---

[1] 四川茶馆俗例，沱茶与菊花对镶叫"鸳鸯"，自带茶叶，仅要开水叫"玻璃"。
——编者

爱护这个剧社的知名之士，都是这里的常坐客人。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剧社宣布正式成立，这时也正进入了重庆少有敌机轰炸的雾季，可以公演了，于是就在宣布成立之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举行了首次公演。

二

中华剧艺社正式成立了，也举行了首次公演，但远在中华剧艺社成立之前，航道上早就布满了逆风恶浪，中华剧艺社的航船一扬帆，就是在顶逆风战恶浪的战斗中前进的。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疯狂反共，在文化上也实行了法西斯专政。他们为了控制大城市的书店，不仅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给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制造困难；还为了控制剧场，又特意设立了“剧本审查委员会”，规定一个戏在上演之前，将剧本送到剧本审查委员会去审查，要经他们审查通过，发给了“准演证”之后才能公演。如何对付这种无理审查？就成了中华剧艺社首要而经常的斗争。在首次公演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时，一则由于剧社初建，审查当局还没有摸清是个什么团体，所以还不太重视；二则由于剧本内容写的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破坏，振兴民族工业”，是抗战主题，顽固派一时还找不到不予通过的借口，可是等到另一个剧本送去审查时，就遇到了阻力。

还在《大地回春》投入排练期间，阳翰笙就着手创作借古喻今的历史剧《天国春秋》。作者借太平天国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和大批太平军将士的故事，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用剧中人洪宣娇之口，痛斥顽固派“大敌当前不该自相残杀！”一九四二年，正好是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

党内为此作出决定，要借为郭沫若祝寿这一件事情来开展一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阳翰笙就把这部《天国春秋》奉献给郭沫若作寿礼，预告作为中华剧艺社的演出剧目。当剧本送去审查后，却似石沉大海，剧社派人去“剧本审查委员会”再三催问，才知道他们正抓住“大敌当前不该自相残杀”这句洪宣娇的台词，在大做文章，企图砍杀这个剧本。同时，我们还从侧面得知，那位明为朋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还在背地里对剧本进了谗言。这事还是阳翰笙亲自出面，找了在国民党市党部工作的我们党的朋友吴茂荪先生，由他从中出力，剧本才得以审查通过，却被删去了洪宣娇那句重要台词。不过剧本拿回来了，“准演证”也拿到了；至于怎样演出，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在我们演出时，扮演洪宣娇的舒绣文在台上仍然是大声痛斥韦昌辉：“大敌当前不该自相残杀！”观众听到这句大义凛然的台词，完全领会到了它的寓意，剧场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作为给郭沫若祝寿的《天国春秋》演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和我们这个戏演出的同时，党还在天官府举行了祝寿仪式，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在会上许多人发表演讲。此外，报刊上还发表了许多文章，搞得颇有声色，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恼火。

趁着为郭沫若祝寿和庆祝他创作二十五周年的机会，中华剧艺社继《天国春秋》之后，又连续上演了郭若沫的两个历史题材的剧本。头一个是写善与恶斗争的《孔雀胆》；在《孔雀胆》演出期间，我们就听了郭若沫自己朗读了他另一部新作，那就是他仅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一气呵成，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屈原》。中华剧艺社又接受了上演《屈原》的任务，那是既感光荣，又感艰巨的。因为《屈原》的演出，意义重大，从听了郭若沫朗读剧本后，我们就清楚地意识到：演出这个戏就是在进行一

场政治斗争。

《屈原》的演出，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布署下进行的。一开始，周恩来同志就指示要组织人力来支援演出，要组织宣传来配合演出。在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之后，党内作了各方面动员。首先是调动了当时最有声望最有艺术修养的“明星”来充实演员阵容，金山当时正好从香港到了重庆还没有和观众见过面，由他来扮演屈原公认为最合适；其他角色则调来“中电”的白杨、顾而已、施超，“中制”的孙坚白，还有业余的“怒吼剧社”的张瑞芳，再配上剧社固定工作人员周锋、丁然、张立德，以及一些业余戏剧爱好者和我们的演员一起来演群众；从国立剧专调来在那里教课的陈鲤庭担任导演。没有排演场，我们就在小茶馆侧边被敌机轰炸的断垣残壁中清扫了一片小天地，作为排演场地。大家齐心协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认真进行了《屈原》的排演。《屈原》的演出，自始至终受着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在排演进行中他不断询问情况，在戏上演之后，除亲临剧场看戏之外，还问到演出的社会反应，当第一轮演出之后，周恩来同志特向郭沫若祝贺成功。

《屈原》的演出，是在国统区我党领导的一次取得了辉煌战果的伟大战役。在《屈原》舞台上，发出了“反对邪恶、拥护正义！”“反对黑暗，拥护光明！”的号召，引起了千万观众的强烈共鸣。

我们还清晰地记得，最初的演出，不论是演员还是舞台工作，都不熟练，因之演出时间竟长达四小时以上，但是剧场里却安静如常，再晚观众也要专注地把戏看完。有一次，上百位从几十里外沙坪坝一带来的大学师生，看到深夜，没有交通工具回去，竟索性留在剧场，情绪高涨地座谈起观感来。我们演职员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不少人走到观众席和这些可爱的观众会见，

到了他们中间，我们受到象知心朋友相聚一样的热情欢迎。大家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倾诉着由《屈原》所引起的昂扬激荡的心怀，抒发着对眼前黑暗统治的愤慨情绪。在寂静的剧场里，一阵阵《雷电颂》的复诵回响，“炸裂了吧！”“你们滚下云头来！我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鼓动吧！”“咆哮吧！”人们不是在学金山演戏，而是思想感情为屈原精神所溶化，似乎即将汇成的惊涛激浪，冲向顽固派们。仅是这短时间和观众的直接接触，使我深切地认识到“戏剧”这一武器的力量，更深刻领会到“演剧”这一行业的战斗意义。

但是，正由于《屈原》的演出成功，国民党顽固派吓得手忙脚乱。文化特务头子、CC派潘公展竟然赤膊上阵，公开出来叫嚣“屈原不是个好戏！”他自此把对剧本的审查权，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手里夺到由他自己直接掌握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审查机关去。顽固派加强了对剧本的审查，阴谋暗中破坏阻止中华剧艺社的活动，凡中华剧艺社送审的剧本，总是要受到刁难，剧社要经四处奔走，托情说项，挖出最好的座票去“送包袱”，三番五次催问，好不容易才拿到一张“准演证”。但有的剧本，却被审查得支离破碎，被砍删得面目全非，还有的就硬是不给通过，不发给“准演证”。阳翰笙后来又为中华剧艺社写的剧本《草莽英雄》，就遭到如此厄运。剧本送去审查不仅没有通过，还被扣上“作者在煽动四川人反对中央”的罪名，连剧本原稿都给没收了。国民党顽固派强加给中华剧艺社的困难，还远不止此，剧本送审不易且不说，连我们的演出场地也发生了问题。他们竟限制一直让中华剧艺社演出的国泰大戏院只准放映电影，不准再演话剧。

对中华剧艺社，顽固派除了加重政治迫害之外，在经济上

也故意施加压力。他们一方面限制票价，另一方面课以重税，什么印花税、娱乐税、消防捐、防空捐，这捐那税，五花八门，直想在经济上置这个剧社于死地而后快。

中华剧艺社面对如此险恶的情势，既要争取生存，又要继续演出，不能不筹谋对策，此中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顽固派内部的复杂矛盾。我们把每一次演出都找出一个募捐名义，将一部分前排座票包给募捐团体，票子由他们去加价推销，这种加了价的票子名曰“荣誉券”，募捐团体就收得这种加价款作为捐款。我们所找的一些募捐团体，差不多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背景和力量的人搞的，借此，就还可以由他们协助我们搞点外交，许多事由他们出面就减少我们的麻烦。当然，这种利用募捐名义的办法，剧社实际上是受着一定的经济剥削，但遭受这点剥削，却能使我们的演出顺利进行。今天回想起来，这种战术，还是值得记述一笔。

三

中华剧艺社在一九四二年全年和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就是采用这种募捐名义的战术，在重庆先后又上演了石凌鹤的《战斗的女性》，于伶的《长夜行》，夏衍的《愁城记》和《第七号风球》（即《法西斯细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老舍的《面子问题》，陈白尘的《岁寒图》和《石达开》等进步作家的剧本，对观众从不同角度施加进步影响。中华剧艺社在重庆虽为观众所赞扬，声誉越来越大，但除了要不断地承受政治压力之外，经济也始终不见好转。微薄的一点开办费早已用光，作为演出的周转金已无着落，应云卫

社长不得不四处奔走，靠借“比期”来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景况更是江河日下。写到这里，禁不住要记述一下我们的前台主任沈硕甫被折磨致死的事情。

那是一九四三年四月间，国泰大戏院已经不让演出了，我们不得不到大梁子“一园”去上演陈白尘的《石达开》。那天戏已开演，还不见沈硕甫来剧场，戏进行中间，忽然有人跑来送信：“我们老沈大哥死在临江门街头了！”这晴天霹雳使大家木然许久之后，才暴发出一片饮泣声，发自心底的悲痛难以抑止啊！沈硕甫是我们大家敬爱的一位老大哥，他为中华剧艺社东奔西跑，终日劳累，协助应云卫联系借演出募捐的单位，帮着应云卫到处找寻肯帮忙的债主，更紧要的是他要独自负责前台重任。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怎样搞前台？是今天的观众难以想象的。在前台要应付军、警、宪三个方面官家的所谓“弹压”，要对付歪着头瞪着眼的“弟兄”和善拍胸脯的“英雄”，以及一要票就摸炮的“好汉”，前台有多少类奇特人物都随时可以闯进剧场“耍下子”。对付那些各色各样身份不明的一帮子人，要有多大的耐心？要用什么方法？要付出怎样的辛劳？想到这些，怎能忘怀沈硕甫的功绩呢？谁能料到一位剧社的功臣，竟然倒毙街头啊！这晚上的戏不知道是怎样演完的，大家含着泪好不不容易熬到戏完，一闭上大幕，不少人顾不得卸装就奔回住地，扑向停放在一扇门板上的老沈遗体，大家凝视着他象在熟睡似的安详的容颜，哭诉他死得多么令人痛心！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有什么病，只见他象个健康的人一样为剧社忙碌，其实他这个患有心脏病的病人是因剧社困窘无钱给他医治而不声不响死了的。沈硕甫对穷困的忍受是感人的，他平素总是穿一套褪了色的深灰西服，这显然是为了撑场面好办事，那晚当我们为他换寿衣准备入殓时，却发

现他穿在西服里的衬衫，原来是件只有个完整衣领和袖口的破布烂片，穿在西服裤内的衬裤两条裤腿都露着膝盖，此情此景，又引起大家一阵酸辛，禁不住纷纷落泪。

沈硕甫的死，使剧社蒙受的损失是很重的，剧社的战斗力被削弱了，必须再弥补起来，充实起来。再要找一位象老沈这样的前台主任却是很不容易，在新的人选没有解决之前，社长应云卫只好暂时兼挑这付担子，增加了他肩头的重压。

沈硕甫的死，还反映出了中华剧艺社在重庆的社会影响和关系。中华剧艺社为前台主任沈硕甫发丧，成了当时重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件。我们剧社当然没有埋葬死人的地产，可又怎忍把老沈埋到乱葬岗去呢？所以大家为此还聚首商议了一下，感谢我们的社友 Sy（即刘盛亚），他慷慨给老沈捐赠了一块地，使老沈死有葬身之地。葬礼原本很简单，在灵榇前有一张老沈的画像，像前有一个《新华日报》送的花圈，送葬的队伍也不长。但当送葬队伍在默哀中刚一出发，重庆街头就立刻轰动起来，不少路人得知是中华剧艺社为前台主任老沈发丧的时候，就自动加入到送葬队列里来，因此，送葬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很难回忆起个具体数字来，只清楚地记得是队伍越来越长，长到队头看不到队尾。更值得记叙的有：一路上灵榇过处，有许多摆设好了的“路祭”供桌，每一“路祭”供桌旁都有不少人在那里迎送。就这样中华剧艺社为前台主任沈硕甫出殡，自然形成了重庆进步文化界和支持进步文化的人士一次示威游行。这事，又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紧张惊慌。

由于中华剧艺社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顽固派对之也就更加憎恶，他们暗地里搞阴谋诡计，放出一些对剧社威胁的谣言，有许多朋友为我们安危担心。一九四三年春季过后，根据党

的指示，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狗急跳墙，避免中华剧艺社遭受重大伤害，就决定让另一些同志组成"中国艺术剧社"，以新的战斗队来接防重庆演剧阵地，而让中华剧艺社转移川西一带活动。为此，周恩来同志特通过南方局布置地方党动员进步力量对中华剧艺社的活动给予保护和协助。在一九四三年夏季，中华剧艺社借着为《华西日报》募捐的名义，暂时告别了重庆的观众，去到成都。

四

中华剧艺社在离开重庆后的两年中，在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下，以成都为中心，活动在川西一带，推动进步戏剧运动。先到内江、自流井、五通桥、泸州、嘉定等地巡回公演；第二年定居在成都，得到地方进步力量的协助，租用了一个叫"三益公"的戏曲园子，稍加改造，作为固定演出场地。先后演出了夏衍的《离离草》和《上海屋檐下》，夏衍、宋之的等集体创作的《戏剧春秋》和《草木皆兵》，还有曹禺的《北京人》、《雷雨》、《日出》、周彦的《李香君》，沈浮的《金玉满堂》等剧，还重演了《天国春秋》、《孔雀胆》等保留剧目。在成都期间，我们除经常演出之外，还作为地方党的一支力量，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特别在日本投降之后，参与推动了党领导的成都文化界"反对内战、呼吁民主"签名运动，剧社的全体同志都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在成都，我们呆到一九四五年秋后，又回到重庆。整个形势和我们离开重庆的两年前已大不相同，由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反动派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做出一点开明姿态，表面上出现了些民主气氛，但这些假相的后面，却酝酿着更大的杀机。先是昆

明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一二一”惨案，后又在重庆发生了“沧白堂”、“较场口”两起特务行凶事件，连象郭沫若那样有名望的人都被打伤！到七月中旬，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竟在一周之内遭到杀害。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再回到重庆之后，只是重演了《孔雀胆》、《雷雨》等几个旧戏，演出已不是太多，许多时间是在参加社会活动。我们回到重庆的当时，正是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党正在发动一次重庆文化界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签名运动，中华剧艺社的主要工作人员，除自己在《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书》上签名之外，还投入了运动。

一九四六年二月中，在被国民党政府当局强令改订的“戏剧节”日，文化界另一特务头子张道藩在文化会堂亲自主持举行了个庆祝会，真正的戏剧界人士到的寥寥无几。原来重庆的进步戏剧界在江苏同乡会礼堂另外举行了茶话会，并借以欢迎新到重庆的田汉。这个集会本身，应该说是“戏剧节”斗争的胜利，可是就在这个会上我们邀约了几位同志联名提案，发起签名慰问较场口受伤人士时，当我们将书面提案送上主席台后，不想落到一位胆小怕事的执行主席手里，提案被他看了之后不声不响装进衣袋去了，久久没有动静。我们见此情景，不得不站起来提出质问，这样一来，到会的人都知道这位某官办团体负责人做了一件什么事了，于是责难之声四起，迫使他不得不把提案掏出来宣读。这个提案一经宣读，立即博得热烈掌声，大家一致赞成。主席团把一张签名纸铺在主席台前桌上，当主席一声宣布“征求签名”时，田汉激愤地讲了几句话之后，提起笔向群众高喊了一声：“我第一个签名！”又是一阵掌声。全场沸腾起来，在他落笔之后，人们拥向主席台前，一张签名纸上很快就签满了名字，第二天这

个慰问较场口受伤人士的签名信就在报上登了出来，我们在取得戏剧节斗争的胜利之后，取得了又一个新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春季，中华剧艺社曾举行了一次新剧目公演，剧本是陈白尘新写成的讽刺喜剧《升官图》。这个戏的演出，配合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本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和叶挺同志及其家人，都来观看了演出。《新华日报》还专为这个演出出了特刊。《升官图》是中华剧艺社在重庆演出的最后一个剧目，也是在国统区大后方进步戏剧运动中做的又一件大事。

很遗憾的是：没有想到《升官图》的尊敬的观众王若飞和叶挺等同志，四月八日飞赴延安因座机失事，不幸遇难。中华剧艺社的同志们含悲忍泪为重庆各界追悼"四八"死难烈士布置了会场，沉痛地参加了追悼大会。

五

中华剧艺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抗日战争年代，战斗在成渝两地，对国统区大后方的影响是显著的。它不只是奋战了六个年头，演出了几十个优秀剧目；而且在推动整个大后方的进步戏剧运动中起了杠杆作用。在重庆，由于中华剧艺剧社的影响，顽固派们不得不允许他们官办团体里的演员出来演戏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恢复了"中国万岁剧团"，中央电影场成立了"中电剧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也成立了"中央青年剧社"，业余的怒吼剧社也不断开展活动，一时重庆戏剧团体演出频繁。由于散在这许多团体的我们的朋友掌握着主动权，因而许多团体演出的剧目，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我们党的作家和进步作家的剧本，

搞得那些御用文人和反动作家无立足之地。他们活动了好长时间，才欺骗拉拢了几个演员，演了个陈铨的《野玫瑰》，并且利用官势，让国民党教育部把这个戏列为受奖剧本，受到了戏剧界人士的签名抗议。

中华剧艺社的进步影响，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经济上靠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就连做一堂布景要用多少钉子都精确地作出预算，从不浪费一文钱，经济公开。参加中华剧艺社工作的同志，宁愿放弃官办团体的薪俸，来过没有工钱只吃大锅饭的生活，养成了艰苦朴素，愿为革命戏剧事业不计较个人利益的高贵品德。

中华剧艺社奋战了六个年头，做出了一定成绩，今天回顾这段历程，对我们这些当年的文艺工作者，是有一定教育意义；记下这一段历史，对今天的青年观众和读者，也还是有益的吧。

关于《屈原》及其在重庆的演出

俞　仲　文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重庆写成，同年四月三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即今和平电影院）首次演出。《屈原》的创作及其演出，在我国现代文学史、戏剧史上和郭沫若的革命生涯中，都是一件值得十分重视的大事。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楚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后期。当时强秦崛起，危及楚国，屈原力主联齐抗秦。但楚怀王昏庸信谗，贪利短见，加上南后、子椒、靳尚等人从中作梗，屈原被诬见疏，终遭放逐，最后被一群阴险的小人害死。两千多年来，人民群众一直把屈原作为民族正义的象征，把他自沉汨罗那一天（农历五月初五），看成是个邪避的日子，人们挂蒲剑，浴兰汤，喝雄黄酒，用以驱邪避鬼，保持自身的清洁，以求内心的高尚。

郭沫若对屈原历来就很推崇，并从屈原的诗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五四"时期，郭沫若就以封建叛逆者的反抗精神，满怀渴求解放的意志，用屈原这个历史题材，直抒胸臆，创作了第一个诗剧《湘累》。他寄意香草，取譬美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招魂。郭沫若诗集《女神》中的长诗《凤凰涅槃》，也是以屈

原的《天问》为影子，预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流亡日本后，郭沫若又从中国古代史的考察出发，对屈原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完成了《离骚今言译》，充分抒发了他“个人的郁积”和“民族的郁积”。郭沫若自己也承认，《湘累》中的屈原就是他自己，“那里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

历史剧《屈原》是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期间，于皖南事变之后写成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在武汉期间，郭沫若团结了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年底，郭沫若从武汉来到重庆。随后，国民党顽固派发起反共高潮，一时雾压山城，万马齐瘖。政治部于一九四〇年改组，所有左翼人士全部解职，郭沫若亦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室操戈，疯狂屠杀抗日的新四军将士。消息传来，郭沫若愤慨极了，“已兆分崩同往日”，“莫须有狱出连绵”！① 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文苑的禁锢，郭沫若和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发起把农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开屈原纪念会，向顽固派作斗争。

早在二十年代，胡适之流就否认屈原的存在。“诗人节”的倡议发出后，国民党当局又百般阻挠，肆意污蔑。他们说什么屈原是恃才扬己，诽谤当道，终于独善其身，消极自杀，是个值不

① 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写了《闻新四军事件书忿二首》。其中第二首云：“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狱出连绵！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园。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胜利在今年。谁欺只自欺天耳，那有蘧篨真个妍？”

得纪念的人。有个御用文人，甚至在成都召开的“诗人节”纪念会上，以学术研究为幌子，大放厥词，把屈原说成是楚怀王的“文学弄臣”。围绕着屈原问题，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郭沫若满怀悲愤，在《棠棣之花》第二次演出之后，经过周密思考，仅用了十天时间就写成了《屈原》这部历史名剧。

二

在郭沫若为我们留下的丰富文学遗产中，史剧是一颗颗光辉灿烂的明珠，而《屈原》则是最为耀眼的一颗。郭沫若在一九五〇年回忆《屈原》的创作时指出：“这个剧本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派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写的。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级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我的眼前看见了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被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受到很大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忿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① 换句话说，郭沫若是“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象征一九四二年的旧中国。周恩来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曾对《屈原》作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

《屈原》的主题思想非常鲜明，它热情地歌颂屈原的爱国主义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南后郑袖等人的卖国阴谋和迫害忠良的倒行逆施。郭沫若把《桔颂》作为对婵娟的

① 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沫若文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礼赞，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战的愿望，无情地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历史剧《屈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屈原的悲剧，已经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楚国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郭沫若用《桔颂》来塑造屈原的坚贞高洁，以《雷电颂》来抒发他自己的愤懑之情，把他在早期诗剧《湘累》中所表现的“个人的郁积”和“民族的郁积”，一扫而空。他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已为捍卫真理，保卫祖国，反抗强暴的崇高理想所代替。一九四二年四月《屈原》剧本出版后，《新华日报》在介绍该书的广告中指出：

> 《屈原》是郭沫若先生继《棠棣之花》后的第一部精心创作，作者对屈原的思想、人格，乃至悲剧的身世，有极深湛的研究。这本五幕史剧，正是将屈原的思想、人格给予了伟大的形象化。
>
> 这虽然是一幕历史悲剧，但是在这里面有现实的人底声音，有崇高的人格，正义凛然的气节，使你爱憎是非之感，分外分明。
>
> 这是一首美的诗篇，她唱出你要唱的诗，她说出你要说的话！美与丑恶在这诗篇中的斗争，强烈的使你的灵魂作了最忠实的裁判。

《屈原》和《棠棣之花》在剧本创作上都是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为话剧演出创了一条新的路子。同时，又在政治上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事业的层层封锁，使沉寂的重庆又活跃起来。所以，它得到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欢迎。《屈原》演出告一段落之

后，周恩来同志在郭沫若的天官府寓所宴请全体演出人员和部分文化界人士，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周恩来同志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立了大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毛主席在延安给郭沫若写了亲笔信，委托周恩来同志带到重庆。毛主席在信中鼓励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屈原》在重庆上演时盛况空前，许多观众为了能买到一张戏票，不辞辛劳。有的人半夜带着被盖到剧场门口等候；有的人没有座位，宁愿站着看三个多小时；有的观众甚至从成都、贵阳等地专程赶来看戏。本市一些由郊区进城看戏的穷学生，戏完之后已是深夜，无法回去，就干脆留在剧场过夜。新闻界将此誉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连国民党中央社在发出的电讯稿中，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在国泰戏院演出，"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苏联驻华大使潘又新看了《屈原》之后，当场对郭沫若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

三

《屈原》在重庆是由中华剧艺社以纪念第二届"诗人节"的名义公开上演的。国民党中央社说它是"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之筹备"，"古色古香，堪称绝唱"。这次盛大演出的阵容是：

演出者：应云卫

导　　演：陈鲤庭

舞台监督：辛汉文

演　　员：金山、张瑞芳、坚白、施超、丁然、白杨、顾而已、卢业高、苏绘、张立德、张逸生、李君遏、周峰、房勉。郭沫若感谢演员的辛劳，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写了《十四绝赠演员诸友》（以出场先后为序）：

金山饰屈原

《桔颂》清辞费剪裁，满腔热力叱风雷。

苍茫披发行吟处，浑似三闾转世来。

瑞芳饰婵娟

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

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

坚白饰宋玉

宋玉悲秋情调哀，人生一憾是多才。

如何王庶分风色，长恶谀词自此开。

施超饰靳尚

文章无价焉能假，千古谗人数上官。

纵得化身心不易，知君此役最艰难。

丁然饰子兰

子兰跛足良由我，台上传神赖有君。

寄语都门纨裤子，应知终古有莸薰。

白杨饰南后

南后聪明绝等伦，谅曾误用害灵均。

不然龟策何须问，强笑行将事妇人。

而已饰怀王

旷代庸人数此王，受给一代太荒唐。
招魂无计成哀郢，坐令秦人混八方。

业高饰子椒

子椒专侫事难详，老朽视之谅不妨。
自古昏庸多误国，论愆宁亚丧心狂。

苏绘饰张仪

张仪当日亦人豪，一策连横口舌劳。
辅得嬴秦成帝业，至今霸道尚滔滔。

立德饰巫师

幻出招魂一老翁，楚兮原本是民风。
误起荃蕙俘肖艾，盲目与情万古同。

逸生饰钓者

深谙艺术即良心，况与诗人协瑟琴。
舞罢九歌成钓者，醉人满目一知音。

君遏饰更夫

击柝由来不值钱，几修得替女婵娟。
怪他一卒荒伧甚，不肯商量在事先。

周峰饰仆夫

《离骚》中见仆夫悲，惜尔声闻不可知。
护得诗人天北去，不教鸾凤陷鸡埘。

房勉饰詹尹

詹尹原无不善名，氍毹一现作牺牲。
唯司所职为司卜，卜者欺人今古情。

一九七八年郭沫若逝世前《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说：当年郭沫若曾“自编自演”，“主饰屈原”，讲得非常肯定，说是“千

真万确”。①郭沫若逝世后，有的人不明真相，在撰写悼念郭沫若的文章中加以引用。②这显然不确，但影响很大。所幸当年扮演《屈原》剧中角色的演员如金山、白杨、张瑞芳、坚白(石羽)，还有其他许多演职员都还健在。郭夫人于立群对此非常重视，认为此事若不在当事人都可作证时予以澄清，势必在今后研究我国现代文学史和郭沫若生平、文学创作中造成误会。于是，于立群特地委托金山撰写文章《郭老从未扮演屈原》，发表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向读者说明事实，以免以讹传讹”。

金山是当年屈原的扮演者，他公开声明：“郭老从未扮演屈原”，事实已经澄清。但上述错传，由何而来，还必须进一步加以探讨。

《北京日报》的文章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发表的，郭沫若主演屈原之说引自当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北京日报》的文章说：

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则重庆公演大型历史剧《屈原》的消息，演员阵容十分壮观，郭沫若扮演屈原，马彦祥扮演宋玉，老舍扮演子兰，沈慧扮演南后，于立群扮演婵娟，孙伏园扮演子椒，曹禺扮演靳尚，邓初民扮演张仪，罗荪扮演钓者，王亚平扮演渔夫，孙师毅扮演詹尹，夏衍扮演更夫，陈白尘、常任侠扮演群众。

当时，我国已处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进步文化界有名人士合演这台戏，目的是募捐援助从香港回重庆的大批文艺

① 艾克恩：《从郭老主演〈屈原〉想到的》。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日报》。
② 胡愈之：《悼念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工作者。并通过《屈原》的演出振奋民族反帝斗争精神，痛击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看这演员表，特别看到有不少专业剧作家上台演戏，许多同志都感到兴趣。

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在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上，的确刊登过一条“重庆航讯”，并作了醒目的标题：《渝文艺界筹备公演〈屈原〉，郭沫若先生自饰主角》，还附有一张非常详细的演员表。这条消息报导说：

【本报重庆航讯】此间文艺界拟于最近为山城脱险文化人募捐及纪念第二届诗人节，公演《屈原》，由在渝作家扮演，兹将内定演员阵营列下：

郭沫若（屈原）　　马彦祥（宋玉）
老　舍（子兰）　　沈　慧（南后）
于立群（婵娟）　　孙伏园（子椒）
曹　禺（靳尚）　　张西曼（楚怀王）
邓初民（张仪）　　臧远云（卫士）
罗　荪（钓者）　　王亚平（渔夫）
孙师毅（詹尹）　　夏　衍（更夫）
白　薇（女官甲）　陆晶清（女官乙）
马宗融（老者）
陈白尘、柳　倩、梅　林、常任侠、
方　殷（群众）
姚蓬子、崔万秋、李　嘉等（舞者）

由阳翰笙任导演，郑伯奇舞台监督，其他前台人员及宣传均由文艺界人士担任。

这个新闻很为轰动，有些地方报纸曾经转载。当时在桂林主持进步戏剧活动的田汉，在读到这些传闻后写了四首《闻〈屈原〉演出成功绝句》，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寄给在重庆的郭沫若。

峨眉谣诼寻常事，谁把江郎似鼎堂？
江入夔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

传来妙语满榕都，如此军容盖世无。
独讶聪明黄子布，长空万里饰更夫。

曾是哀时自亦哀，嘉陵江畔几徘徊。
金山热艺开风气，未识何如洪浅哉？

绝代风流忆白杨，演来南后艺弥光。
梨涡莫漫拟蝴蝶，不向倭儿斗艳妆。

第二首诗就是指所谓重庆文艺界串演《屈原》和郭沫若扮演屈原这件事，田汉是持否定态度的，把它视为"妙语"。黄子布即夏衍，于四月初由桂林飞来重庆。田汉曾为原诗写了一条小注："传沫若自演屈原，立群饰婵娟，老舍、家宝、彦祥皆登场，夏衍由桂飞渝，亦饰更夫。"田汉的诗传到重庆后，夏衍为了说明情况，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写信给田汉，信中写道：

讲到演戏，顺便告诉你一个笑话。这笑话大概已经传遍桂林了，由于《屈原》公演的成功，有几个戏迷在郭先生家里聊天，偶然高兴，戏拟了一个由文艺工作者来串演屈原的

名单。后来不知给哪一位好事者拿去当作真的事而发表了，弄得大家啼笑皆非。①

至此真相大白。这场公案从发生到现在已四十多年了，由于事过境迁，人事变迭，加之资料查阅不易，往往以讹传讹，真伪莫辨。现谨就所知，抄附如上，供关心现代文学史、戏剧史的同志参考。

① 郭沫若的《十四绝赠演员诸友》，田汉的《闻〈屈原〉演出成功绝句》，以及郭沫若、夏衍、田汉的往来函件，均见田汉在桂林期间主编的《戏剧春秋》第二卷第二期，一九四二年七月出版。

田汉在重庆的抗战宣传

范 国 华

著名戏剧家田汉，在抗敌前线经过了三年苦斗之后，于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从桂林来到重庆。第二年三月，田汉又由重庆返桂林，郭沫若曾以“长风万里送骅骝”的诗句相赠。田汉在重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执着地进行抗战宣传，积极参加和指导抗战文艺活动，生气勃勃，非常活跃，时间虽不长，成绩却很显著。四十多年过去了，他对人民和抗战文艺事业的贡献，至今使人难以忘怀。

动员一切力量投身抗战

田汉一直把抗战视为神圣的事业，无论走到哪里，都以满腔热情，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动员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投身抗战，为把日寇早日驱出中国而奋斗。他一到重庆，不顾旅途劳顿，就于五月二十六日到张家花园巴蜀学校，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举办的职业青年星期讲座上，讲了前线军民抗战情形。五月三十一日晚，在中央广播电台作了题为《前方与后方》的广播讲演。接着，六月九日，又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星期讲座讲了《抗战与抗战艺术》。六月十二日，田汉与夫人一道去北碚。十四日，田汉在民众会场作了《巩固抗战必胜信念》的报告。

对于当时的艺术界，田汉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也给予了很多

的鼓励。他到重庆的当天晚上，重庆文艺界和电影界人士阳翰笙、郑用之、孙师毅、罗静予、马彦祥、史东山、王瑞麟、司徒慧敏等在一心饭店设宴欢迎他。席间，田汉说："我们从事戏剧运动的人，我们志向不妨大，可是我们的作法不妨小，在江南各地中，虽然也有绝无仅有与我们'打对台'的事，可是我们抱定了一种志向，我们决心不屈不挠的干去，我们相信我们给旧剧观众的影响是大的。"

当时重庆章华、又新、大新民三家川戏院有小的误会。六月七日晚，田汉在阳翰笙、郑用之、郑沙梅以及川剧界张德成、傅三乾、魏香庭、黄耀庭、筱桐凤等在冠生园欢迎他的宴会上说："抗战期间，无论艺术文化各界朋友，均应扫除私见，一致为艺术、为国家而努力。"经过田汉等作工作，三家戏院消除了误会。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对敌人，他是"横眉冷对"，从无奴颜和媚骨。抗战期中，继续发扬鲁迅先生的这种硬骨头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一九四〇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了两次纪念鲁迅的活动。一次是八月三日晚，在中苏文化协会会址举行的鲁迅六十周年诞辰纪念会。一次是十月十九日下午，在巴蜀小学广场举行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两次活动均有田汉参加。鲁迅六十周年诞辰纪念会，由郭沫若任主席，他致词后，田汉在会上讲了话。田汉回溯了参加纪念鲁迅的感想："在纪念鲁迅五十周年诞辰时，因环境关系，所以情绪激昂慷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八一三'抗战起，大家皆热烈万分；两周年纪念时，在武汉撤退一月前，既怀悲壮之情，而心实仓惶。今年在此树荫下纪念，悠然自得，情绪稳定，此实接近抗战胜利之现象也。"

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有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沈

钧儒、田汉、胡风等六百余人到会。冯玉祥担任主席，胡风报告鲁迅先生生平，郭沫若、田汉等讲话。田汉主张发挥鲁迅尖锐的批判精神。他说："鲁迅先生最值得效法的是对于旧社会旧习惯的彻底的憎恶，平常我们的批判力不够尖锐，便常常和旧社会旧习惯妥协起来。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的确是我们的好榜样，好导师，尤其到了晚年，更为坚定的奋斗到底，不妥协，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旧社会犹如鲜菌，好吃但是有毒，我们和旧社会接触多了，慢慢习惯了，往往不再战斗而和旧社会妥协起来，这是最要不得的。所以必须加强我们的批判力，才不致于妥协屈服。"

十月十九日晚，重庆文艺界人士在一心饭店聚餐，参加者有周恩来、沈钧儒、及新从塞北归来的应云卫（拍摄影片《塞上风云》）等五十余人，老舍主持。周恩来同志讲话后，田汉讲话。田汉把全国文艺界的迫切任务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认为目前文艺界应动员一切文字中最好的力量，并动员文协的会员到前线各地考察及服务。

阐述文艺家的新任务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日，重庆《新蜀报·蜀道》副刊召开座谈会。出席人有：田汉、黄芝岗、戈宝权、沙汀、罗荪、叶以群、宋之的、周钦岳、潘孑农等。座谈题目是：《二十九年来中国作家对民主运动的奋斗》。田汉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田汉说：

抗战三年来的作品实在不少，同时文艺部门又大又广，现在仅就我在上海、武汉、长沙，以及在重庆所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三年来，文艺的各部门有很大的发展。而各种作品

都有共同的倾向，这个倾向可以分作三个时期来看。(一)从“八一三”到武汉会战；(二)从武汉会战到转入重庆；(三)从转入重庆直到今天。这三个时期的作品简单说来，第一时期是兴奋的；在抗战以前，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直到“八一三”的前夜，文艺作家在这时期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看见国家民族唯一的出路是只有抗战，因此全部的文艺作品都号召大家要努力奔赴这条路上去；这个号召对于推动抗战是有重大的功绩。因为这个号召，果然到了“八一三”，对于压迫我们、束缚我们的日寇，全民一致地宣布了战争。这个从思想到行动的战争，最初好象是一个幻梦，一到这梦成了现实，大家便自然而然地兴奋起来了。一般的作品都是乐观的，乐观得几乎可笑，以为抗战一起，一切都有办法了，对于我们内在必须克服的困难还没有看到。

到了第二个时期，即是由武汉会战到转入重庆的这个时期，一切文艺作品虽然没有前一时期的那么过度的兴奋，可是仍是乐观的，这时文化界在组织方面开始了新的行动，成立了全国性的文化组织，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这些组织不仅推动了文化界的抗战工作，同时也开始了文化界真正的团结运动，无论哪一方面的作家都团结起来了！大家恐怕还记得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市商会开成立大会时的那种盛况吧。

到了第三期，这是一个新的时期，抗战到了更艰苦，国际形势到了相当危险的阶段。在国际方面，有人过分估计英美对我国的援助，对于苏联还怀疑她会不会和日本妥协，因此，作家们无形中对于现实就有些灰黯起来，第一、二期的

兴奋和乐观的成分是大大地减少了。我在柳州，看见有些作家经商去了，而且，大家对于当前文艺上的问题的争论非常奇怪，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发生怀疑，要另外去找谋生的道路。在作品中间，很多都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调。我在重庆所遇到的朋友们，没有听见过一句积极的话。自然米卖到三十多元一斗，一笔版税买不到两斗米，现实的艰难是无可讳言的。

然而，正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应该开始新的文艺运动，既不象以前那种廉价的乐观，也不要今日的这种灰暗的心境，我们要设法来稳定前后方军民的心。重庆是抗战的司令台，可是没有起到司令台的效用，这是曾住在这司令台上的文化人的责任！现在我们要尽量发挥主观的力量，来稳定前后方的人心，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一切作品要强调新的乐观成分，更加有力的，坚决的，认清敌友的，团结一致的，抗战，我们要唤起大家来踊跃参加，这是文艺作家今日的新任务。

在沙汀等人发言后，田汉又补充了两点。"第一，讽刺或暴露对于抗战都是有益的，但作者自己不能因为有黑暗或腐烂的事实的存在而发生动摇、失望、悲观，必须抱着一种积极的战斗的感情来讽刺，来暴露。第二，就是三年来我们的文艺作家一面扩大了写作的范围，如老舍先生就是一个，一面更加专门化，如写游击战争的故事，最初士兵同志看了觉得好笑，后来回头向士兵学习，就慢慢写得逼真了。又如近来有人提倡空军文学，专门描写空军，海军方面前几天也有人提议，是抗战三年文艺的好现象。"

关于川剧与川剧改革

田汉在重庆期间，对川剧十分关注，不仅有剧评，而且对川剧改革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川剧界一致决定，组织“抗战川剧促进社”，聘请田汉为顾问，以便进一步从事改良川剧之演出。

六月下旬，田汉在重庆观看了俞珊演出的《探母回令》后，曾与俞珊发生了一场争论。

田汉说：“我以为《探母回令》一戏至少应该少演，而《贵妃醉酒》之类的戏则尚无不可演之处，因为《探母回令》一剧，杨四郎于出关见娘后，竟置母子、夫妻、国家、朋友之爱不顾，毅然回到番邦，仍旧去叫人家作爷娘。这在意识上，似乎有点象殷汝耕作了日本的驸马即作汉奸，而绝不似我们的郭沫若先生在作了驸马之后，到了国家存亡之秋，毅然抛妻舍子回到祖国来，这才不愧为中华的好男儿。反之，《贵妃醉酒》这个戏反映出来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压迫下，女性的性的饥渴与追求，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尚且如此，而其他后宫中的女子就更可知了，所以唐玄宗在由蜀返长安后，乃有释宫女四万人之举，这是多么悲惨严重的事实，所以这个剧至少是有一点社会意义的。俞小姐则以为有些剧倒不妨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看，不必一定要用严格的眼光去批评它，我则以为如果凡是戏剧艺术一失掉了民族意识的观点，至少是有点问题的。”

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上午九点钟，川剧演员协会在又新剧院开成立大会。川剧演员到会三百余人。应邀出席的文艺界著名人士有郭沫若、田汉、郑用之等。张德成担任主席，报告开会理由后，由刘承基报告筹备经过。最后郭沫若、田汉在警报声中讲了

话。

田汉说："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四川人口甲于各省，宜乎其戏剧应为中国戏剧复兴根据地，更兼川剧邻壤省分极多，而其戏剧亦因吸收至广，谓为戏剧复兴根据地，实当之而无愧。个人此次遍历西南各城市，参观地方剧颇多，有一点值得向大家报告者，即无论平剧、桂剧、汉剧、楚剧、粤剧，均已在抗战大旗下，纷纷组成力量，为宣传工作努力，单就此点，已足保证大中华民族之胜利前途，川剧同人，今日组织协会，即属此一力量之最大表现。因此个人对于川剧同人，将提出四点意见，希望大家采纳：(一)改善艺术水准；(二)提高精神生活；(三)集中演唱意志；(四)贯彻合作精神。"

此外，田汉在重庆观看了几出川戏后，乃于二月二十四日，在《新蜀报·七天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柴市节·情探·断桥——川剧观感之一》。原作为：

文山慷慨辞柴市，白氏缠绵泣断桥。
各有深情销不得，歌场留待艺人描。

纠缠至死似春蚕，犹恋从前一叶甘。
双鬓秋来近意满，何堪此夜看情探？

在剧协聚餐时，曾对张德成先生说："想看看几个代表的川剧以资见习。"这个愿望很快地就被满足了。十八日夜场，我和沫若、绿汀兄看了又新剧场的《柴市节》、《情探》和《断桥》。

《柴市节》以前以魏香庭先生之招看过一次。因为是节演一段，所以印象不甚完整，只觉得四川前辈改革戏剧有点

只求题材好文句雅驯，而忘了戏剧应有的艺术性。……此次也还有此感，但以张德成先生的妙技，无论扮相，表情，歌喉都给我们以深刻的感铭……

词句始终是觉得太文雅了。有的雅得不好懂，因而减低情绪，有的雅得不合身份。理解力高的演员还过得去，理解力低的再一念错，就容易把戏也毁了。

《情探》……是演得不够好的，实在那位演负义王魁的小生表情有点不够，不能把王魁的内心苦闷，即愧悔与利害的交战充分表现出来，……演敫桂英的那位演员虽是年轻而给人的印象并不甚坏。她的舞蹈身段使我们贺绿汀兄极口称颂。说川剧的音乐虽简单而散漫，但舞蹈的原素却有甚高的成就，假使加上适当的布景，美丽的音乐和周到的导演，必能成为很美的东西。

但这位少年艺人也有些小缺点，……她念王魁当日怎样和她“海誓山盟”的“山”字时应屈三个指头，那样变成了“海誓三盟”了。剧中最后一个紧张场面，她只顾优美了，情绪上没有大的变化。

本来这戏在明王玉峰写的传奇《焚香记》中原是以喜剧结尾的。……但说到戏剧的艺术性来，与其要那么多神仙手法勉强凑成大团圆，还不如作为悲剧的《情探》来得较近人情。因此后面应该演得更深刻一点。至于那位演鸡脚神的真是扮得好。白唇猪牙，吐舌如蛇，肚皮紧缩成一深坎，狰狞恶猛之感，使沫若兄连称“要得”，四川戏关于变脸之类具有特长，不知何故。

川剧《断桥》也是看第二次了。看桂剧断桥时，曾写有一绝：

剑佩戎装对着腰，非常时节可怜宵。

西湖呜咽雷峰倒，忍听珠喉唱断桥！

……只有四川戏不同，青儿以净角扮演，粗服戴耳毛，怒时还作各种可怕的脸。其源流殊足玩味。

……川剧以重庆所见似乎不重视小生，此剧亦无例外，却是憾事。

慰洪深与赞歌咏团

田汉又是诗人，常有诗作与郭沫若唱和。在重庆的一年时间里，田汉也不时有诗作发表。这里，仅记一二。

抗战期间，著名戏剧家洪深在重庆赖家桥居住。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洪深因受经济压迫，又兼女儿患肺病甚剧，压力很大，一家三人（洪深及夫人、女儿）突然服大量奎宁、红药水以自杀。幸得郭沫若带了医生前去抢救，才脱了险。洪深自杀前，曾写有绝命书一纸："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食衣住，种种，如此将来，不如且归去，我也管不尽许多了！"

二月七日，田汉夫妇与应云卫、石凌鹤、光未然、王若愚一道，前往洪深家探视。归来后，田汉赋绝句五章。诗前，田汉有注云："闻洪深兄惨变，骇我心魄，席地写此为慰，并质沫若兄。"

憔悴双江只自哀，当筵常欲纵千杯；
新来亦有怀沙意，相对何言慰浅哉？

好活不能宁恶死，桥头何必苦张罗？
过《桥》名士今如鲫，犹是先生勇气多！

披发缨冠事救亡，金陵赠别忆心长。
果然道偶成佳偶，直把歌场作战场！

海内争传《包得行》，纷纷屠狗化干城。
书生报国非无计，我辈胸中有甲兵！

描来黑白眼无花，二十年来老作家。
莫堕新亭红涕泪，铜琶铁板走天涯！

二月十日，田汉在《新蜀报·七天文艺》副刊上发表诗一首：《赠业余歌咏团》。诗曰：

战血流淞沪，雄歌起江汉，
动员天下众，乐为诸艺冠。
劝富者出钱，劝贫者出汗，
奸邪众口伐，忠烈众口赞。
何处无杜鹃，况来嘉陵畔，
精诚啼日夜，直至喉舌烂。
宜战不宜和，风雨励同舟，
齐心向彼岸，百里九十半。
枪声不可歇，歌声不可断，
晨星已灿然，长夜行将旦。

诗末田汉注："业余歌咏团自汉口成立又三年矣，诸同志努力不懈，钦敬之余，歌此赠之。国民三十年一月二十四日。"

* * *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田汉离开重庆去桂林。郭沫若于三月六日写了一首《送田寿昌赴桂林》的七言绝句：

南山昨日事春游，并辔江边君兴遒。
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骅骝。

第一届戏剧节纪盛

吕 贤 汶

抗日战争初期，在文化界人士中，最不容易团结的要算是戏剧界。它存在着新剧与旧剧之分，在朝与在野之别，京派与海派等。门户之见，派别之争，这道鸿沟是很深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全国十八个戏剧团体，戏剧界百分之九十的代表人物都到了武汉。值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大家为了促成中华全国戏剧界大联合，于是，由阳翰笙、王平陵发起，洪深、田汉、张道藩、马彦祥、应云卫附议，于二十八日晚在汉口普海春酒家举行了筹备会议，推举洪深、田汉、张道藩、熊佛西、熊式一、余上沅、王平陵、赵丹、郑君里、马彦祥、宋之的、章泯、阿英、凌鹤、王莹、陈波儿、万家宝、李健吾、万籁天、郑用之、唐槐秋、应云卫、朱双云、王泊生、陈治策、顾仲彝、向培良、陈白尘等九十一人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由筹备会向大会推荐。这个名单广泛团结了戏剧界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十二月三十一日，戏剧工作者们借汉口光明大戏院举行大会，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中国的戏剧界团结起来了，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订每年十月十日为戏剧节。中国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节日。

戏剧节虽然诞生在武汉，第一届戏剧节却没有能在武汉举行。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侵华的战火，已经燃烧到武汉。著名的演剧团体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影人剧团已与之合併)、怒潮剧社、四川旅外剧人抗敌剧社、国立戏剧学校先后到了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也从汉口迁到重庆建厂，大批影剧界人士荟萃山城。重庆成了大后方戏剧运动中心，在重庆隆重纪念第一届戏剧节成为势所必然。

中华全国戏剧界协会在渝理事和重庆分会的理事联合召开筹备会，会上推选余上沅、郑用之、罗学濂、应云卫、余克稷、赵丹、宋之的、康黛莎、张德成、潘孑农、富少舫、姜公伟、吴漱予等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第一届戏剧节演出委员会委员，下设总务、歌剧、话剧三部。话剧部由余上沅任主任，阎哲吾为副主任，应云卫、宋之的、曹禺、沈西苓、章泯、赵丹、郑用之、姜公伟、王平陵、陈永倞等为话剧部领导成员。

这时，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势较好，人们抗日情绪昂扬，演出委员会内各种代表人物，团结了在渝的全部专业和业余戏剧团体，参加了联合演出活动。又因为是首次纪念戏剧节，戏剧界人士格外兴奋，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感想，为戏剧的前途而欢呼，为抗日的前途而欢呼。

第一届戏剧节的庆祝活动，从十月十日开始，到十一月一日结束，在重庆持续了二十三天。五百多名话剧和戏曲工作者，上千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参加了演出活动，观众达数十万人，演员和观众的情绪，一直处于昂奋当中。戏剧界这一空前的盛举，既广泛地开展了一次抗日救亡活动，又唤起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为支持抗日战争出钱尽力；还促进了戏剧界大联合的巩固，对于推动抗战剧运的开展，尤其是大后方的话剧运动，起到了重大作用。

十月十日上午九时，由第一届戏剧节演出委员会主持，在又新大舞台举行大会。戏剧界五百余人出席。余上沅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会上通过提案：(一)为纪念戏剧节，由戏剧界抗敌协会征求抗战剧本，以进一步开展抗日戏剧运动；(二)开展都市与农村的戏剧活动，使抗战戏剧深入到群众中去。会后举行为期三天的大规模的街头剧演出。

这支由一千余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街头演出大军，共有二十五个队。这支大军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当中除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怒潮、国立剧校、四川旅外剧队等专业剧团外，大多数是来自各界的群众演出队，体现了抗战戏剧深入广泛的开展以及它和群众密切的联系。他们当中有求精中学、南渝中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学校演剧队；社会青年组成的自强读书会，青年职业互助会的话剧队；以及专门由妇女、儿童组成的宣传队。他们分赴中央公园、夫子池、江北、南岸、化龙桥、磁器口、小龙坎、菜园坝、大溪沟、高店子、红庙以至铜梁各地演出。

这么多的演出队同时出动，轰动了重庆城乡。第一天，仅在夫子池、中央公园两处，上下午的观众不下五、六千人。演出剧目的内容，除了宣传抗战就是征募寒衣。怒吼剧社创作演出的《募寒衣》，观众看到感动的地方，纷纷抛掷银钱者达七、八百人，其它各队演出时，也收到成百上千观众捐献的寒衣费。

在这次各种街头演出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

一是十月十日下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化装宣传，成为当天山城人民广为传播的新闻。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事先就动了一番脑筋，研究怎样演出效果最好。他们本来想借卡车作舞台，举行流动演出；不料没有借到卡车，演员化好了装，打着上海业余剧人街头演出队的横幅步行出发。在这个队伍里，周峰扮土肥原，

钱千里演汉奸，叶露茜饰农妇，石羽装工人。一路上，他们把锣鼓打得震天响，这比演员在卡车上站着更轰动，招来了成千的观众跟着他们跑，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他们从两路口演到了七星岗，这时满城传遍上海电影明星上街演戏的消息，再向都邮街前进时，街道两旁已经站满了上万的观众，人山人海，交通为之阻塞。一路上，他们演出了《汉奸和十字舞》、《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一条心》等节目。赵丹当导演，向观众解说剧情，孟君谋维持秩序。最精彩的是，当剧中的汉奸被打倒后，群众真的当作捉到了汉奸，跑上去把饰汉奸的演员拉住不放，剧团的人提心吊胆，深怕观众抑止不住愤怒，把饰汉奸的钱千里痛打一顿。那天，直到夜幕降临，他们还高举火把向朝天门前进，继续为观众演出。

另一件事，吴雪所在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完成街头演出后，十月十三日到了巴县白市驿。他们住在民众教育馆内，白市驿中学教师发现他们是演话剧的，立刻在小镇上传扬开。他们只好为当地群众演出了根据《放下你的鞭子》改编的《逃难到四川》，吴雪演卖艺老汉。这个地方从来没有看过话剧演出，他们的演出博得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还有一件事，黎莉莉和舒绣文都是三十年代著名电影演员，她们在一、二十部电影里担任了角色，早为广大观众所熟悉。黎莉莉又曾是明月歌舞团演员，能歌善舞，这次她们随怒潮剧社到铜梁去演出《为自由和平而战》，除在街头演出外，也在剧场演出。那里的戏院老板为了迎合小市民趣味，便利用黎莉莉和舒绣文电影明星的声望，刊登广告："价钱好，真公道；看明星，呱呱叫。"并要求她们在演出之外，加唱不相干的歌曲。黎莉莉和舒绣文坚决拒绝了，以维护抗战戏剧的尊严。

从十日到十三日，大梁子的一园大戏院，是旧剧公演的场所，连日出场的都是戏曲界的名角。其中有厉慧敏演的《春香闹学》，刘丽华、周裕祥演的《归正楼》，厉慧兰、厉慧森的《张义得宝》，厉家班演的《群英会》，刘千金、刘四岁演的《乌龙院》，张德成、傅三乾演的《乔太守》，山药旦(富少舫)演唱的大鼓书《抗战救国》等。

为了向一般平民宣传抗战戏剧，又能为前方将士添制寒衣尽一分力量，演出委员会举办了"五分公演"（五分钱一张票）。从十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连续演出八个晚上，由重庆各剧团在演武厅社交会堂轮流公演。国立剧校、怒吼剧社、南渝中学、青年职业互助会、儿童演剧队、戈兴剧社、华北宣传队等演剧团体都有精彩演出。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以为这样的演出非贴钱不可；谁知观众们出于爱国热情，又能以较低票价看到话剧演出，所以极为踊跃，不仅每天座无虚席，而且还有上百的观众在门口要求买票入场。有几天把大门关了两、三次，才挡住了要求进场的观众。有的观众到了剧场没有买到戏票，他们提意见说："我们是花了车钱赶来看戏的，你们为什么不把票价卖高一点？"

从这种普及性的演出中，我们也发现了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创作剧本，如怒吼剧社的《女英锄奸》、《死里求生》，姚时晓的《林中口哨》，钟锄云的《重整战袍》，何治安的《募寒衣》等，以后成为在群众演出中广为流传的剧目。

八天的演出，天天客满，收入近四百元，除去开支，为做寒衣捐献了一百四十多元。

纪念第一届戏剧节的压轴戏是话剧界联合演出的《全民总动员》。参加这个戏工作的演职员多达二百余人，人们说这也是当时重庆话剧界的总动员，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这是曹禺与宋之的合作的一个大型的反间谍斗争的抗战戏。当时，抗战正由

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政治动员极为重要，那时有一个口号叫做后方重于前方，政治重于军事。所以肃清汉奸，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是绝不可少的，这就成为《全民总动员》剧本的主题。

《全民总动员》原作名为《总动员》，是宋之的、陈荒煤、舒群、罗烽四人所写。剧本被推荐到演出委员会后，作者之一的宋之的提出剧本原来所触及的一些问题已不重要，需有更重要的内容，乃由原作者中当时在重庆的宋之的和曹禺来进行修改。两位作者修改之初，从演出委员会接受了一份来头不小的演员名单，其中就有当时已经蜚声剧坛的赵丹、白杨、舒绣文、顾而已、魏鹤龄、施超、高占非、王为一等人，要把这些著名的演员恰当地组织到一出戏里去，又有戏可演，确实不容易。结果曹禺和宋之的做到了，使这些演员在剧中各安其位，真不愧为大手笔。

《全民总动员》的演出，是中国话剧运动史上前所未有过的璀灿群星的大聚会、大合作，现将四十七年前的这张演员表列示如下：

莉　莉……白　杨
侯凤元……曹　禺
侯文杰……洪　虹
陈云甫……王为一
邓疯子……赵　丹
吴　妈……沈蔚德
江云峰……江　村
张希成……施　超
冯　震……魏鹤龄
刘瞪眼……余师龙
丁　明……章曼苹

彭　朗…A，舒绣文
　　　　B，黛丽莎
时昌洪　……戴　浩
导　演　……潘孑农
胡长有　……余上沅
王喜贵　……顾而已
孙将军　……张道藩
新闻记者……宋之的
宪兵队长……耿　震
宪兵甲　……林颂文
宪兵乙　……乔文彩

警察甲……李铮普　　卫　队　……寇嘉弼
张太太……英　茵　　伤兵甲　……杨育英（沈扬）
马公超……高占非　　伤兵乙　……何治安
芳　姑……张瑞芳　　男　孩　……蔡　骧
陈　虹……凌琯如　　女　孩　……王菲菲
花　匠……柏　森　　汉奸甲　……张世骝
暗探甲……蒋少麟　　汉奸乙　……叶燕荪
暗探乙……姚亚影　　汉奸丙　……朱平康
暗探丙……刘厚生　　汉奸丁　……李乃忱
警察乙……胡智清

从这个演员阵容上可以看出来，戏剧界在“团结为了抗战，抗战促进团结”的口号下，这时有了广泛的团结，国民党文化界首领张道藩，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也参加了演出，这是我党统一战线的成果。张道藩参加这次演出也有余波，他扮演孙将军一角，穿了件黑大氅，模拟蒋介石衣着。《全民总动员》演出的最后一个晚上，全体演职员合影，张道藩当然立在前排中央显著地位，旁边就是几位女主角。这件事被反共人物告到蒋介石面前，说张道藩与女演员合影有失官体，乃被免了教育部次长职务。

从这个演员名单上还可以看出来，张瑞芳那时在话剧界初露头角，在剧中演小难民芳姑。现在话剧界知名人士刘厚生、耿震、蔡骧、何治安等，那时正在国立剧校读书，即将毕业，参加演出见习，在戏中担任一些小角色。还有演员表上没列进去的，宋之的、应云卫、阎哲吾这些当时的知名人士也在戏中担任群众跑龙套。可见这时期人材济济，大家抗日热情之高。

这个戏由张道藩、余上沅、曹禺、宋之的、沈西苓、应云卫组成导演团，应云卫担任执行导演。与此相配合的前后台工作人员阵

容也是令人羡慕的。余上沅担任舞台监督，陈永倞的装置设计，提示陈健、万长达，后台事务有耿震、李农、施文琪，后台主任郭兰田、陈永倞，布景任德耀，灯光朱今明，服装程梦莲，效果蔡松龄，剧务金毅、易烈。孟君谋则是剧务主任，他把二百多人的演出队伍安排得井然有序，这些人有的当时已是艺术名家，至今仍健在者几乎无一不是专家、教授。担任前台工作的绝大部分也是当时戏剧界名流：前台主任余克稷；文书组吴祖光、廖季登，交际组郑用之、罗学濂、黛丽莎、章功叙、胡光燕；宣传组姜公伟、肖崇素、赵铭彝、潘孑农、葛一虹、杨子戒；票务组梁少侯，田天绣、郑眠松、王景祥；纠察主任方丝乐，纠察胡光燕、张永书、陈光武、陈季文、朱崇懋、唐鹤生。全剧演出堪称为是第一流的剧作家、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中央电影制片厂、国立戏剧学校、中国电影制片厂和怒潮剧社则负责有人出人，有物出物；演出经费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在抗日宣传费名下拨给。

整个十月份，重庆的观众就翘首以待这次盛大的演出。《全民总动员》十月十五日开排，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招待参加戏剧节工作的各单位成员，演出两场，二十九日正式公演。演出的票价分别为三角、六角、一元、一元五角。当时，四块钱是普通公教人员一月伙食费，这样的票价不可谓之不高。另外还有五十元一张的荣誉券。所有的荣誉券和预售票都在演出的前一天卖完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观众抗日的热情和对话剧的爱好。

在《全民总动员》演出当中，最引起观众兴趣的是邓疯子与汉奸张希成斗法的那场戏。赵丹演邓疯子，装疯假癫，嬉皮笑脸，忽冷忽热，有他独到之处；施超演张希成，他作贼心虚，又强自矜持，体现了汉奸的阴险奸滑。当汉奸企图用炸弹炸死抗日

英雄孙将军时，全场观众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当邓疯子机警地夺下了汉奸的炸弹后，全场热烈鼓掌。白杨演的莉莉，舒绣文演的彭朗，表现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引起观众注目。张瑞芳当时演小难民芳姑，已经引起话剧圈内的人们注目，大家称赞她的戏虽不多，而对艺术是严肃认真的，没有一处松懈，认为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女演员，她很懂得怎样唤起观众对她所扮演的人物给予同情。虽然这个戏的演出长达四个小时，但观众始终被剧情紧紧抓住而没有退场。话剧在重庆获得这样的欢迎，这是头一次。

《全民总动员》在国泰大戏院演了八场（内招待两场），到十一月一日为止。因为场场满座，场场有观众在门口要求买站票看戏，在四天中又加演了两个日场。最后一天，因为要买票的仍拥挤不堪，前台工作人员不得已在剧场设了五道防线。当时重庆一家报纸报导这个戏的演出，标题是：《剧界空前盛举，美满的<总动员>。观众挤破了国泰》文中说："这个戏的演出，在渝剧人全体参加，在中国戏剧史上可谓空前盛举，观众之拥挤亦破国泰从未有的纪录。"六场票款的收入达一万零九百六十四元。《全民总动员》的票款，加上各剧团在二十多天中的收入，共有一万四千多元，除去开支，还有八千多元，全部作了捐献寒衣的用费，表达了戏剧工作者的抗日救国的热忱和他们的力量。

纪念第一届戏剧节过后，还有一个更为盛大的尾声。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一周年，一九三九年元旦的晚上，重庆戏剧界动员了二千八百多人，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游行中表演《抗战建国进行曲》，它由《自由魂》、《民族公敌》、《群魔乱舞》、《怒吼吧中国》、《为自由和平而战》、《全民总动员》、《最后的胜利》七个剧目组成，每出戏都配有相应的彩灯，有的表演高跷，有的用车辆扎成舞台，演出

时随游行队伍边演边前进。游行队伍中还有耍龙灯舞狮子的。这样规模巨大的火炬游行演出，再一次轰动了山城。

第一届戏剧节的联合大公演，使最不容易团结的戏剧界团结起来了，团结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这是十分值得纪念的。此后，抗敌剧协继续团结广大戏剧界人士，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又度过第二、三、四届戏剧节，其中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的戏剧节都有较多的剧目演出。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复社会部的指令说，戏剧节“未便与国庆纪念合并举行”，把全国抗敌剧协订每年十月十日的戏剧节给撤销了。一九四四年国民政府才规定二月十五日为戏剧节。然而，这时戏剧工作者对于这个千呼万唤才出来的节日，热情已经减退了。

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民主浪潮高涨中，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在江苏同乡会“来苏堂”举行了一个茶话会，这个茶话会有多种意义，一是纪念戏剧节；二是欢迎田汉由昆明来重庆，报告“一二一”潘琰等四人为民主斗争惨遭杀害的情况；三是茅盾写的话剧《清明前后》已上演，剧协欢迎这位“新”入伍的战士。茶话会上通过：《声援二一〇较场口血案受害者，严惩肇事凶手，立即取消特务机关。推派代表慰问受伤的民主战士郭沫若等人，严办附逆剧人》的紧急提案。这也是重庆最后一次戏剧节。

抗战时期重庆公演话剧剧目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石　曼

前　言

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的话剧演出，空前繁荣，广泛普及。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间的雾季公演[①]，每年都有几十出话剧搬上舞台。抗战八年间，无论从编剧、导演、表演、舞台部门的哪一方面来说，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很高的成就。

当时在重庆工作过的文艺工作者有郭沫若、茅盾、阳翰笙、洪深、田汉、夏衍、曹禺、老舍、熊佛西、石凌鹤、于伶、宋之的、陈白尘、马彦祥、吴祖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贺孟斧、应云卫、章泯、张骏祥、郑君里、王瑞麟、孙师毅、司徒慧敏、葛一虹、赵铭彝、辛汉文、沈硕甫、孟君谋、陈瘦竹、陈治策、杨村彬、潘子农、阎哲吾、周彦、余上沅、董每戡、白杨、舒绣文、黎莉莉、张瑞芳、杨露茜（路曦）、凤子、吴茵、叶露茜、李恩琪、章曼苹、叶子、赵韫如、赵慧深、秦怡、金山、赵

① 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每年很长一段时间内，话剧无法演出。只有每年十月到第二年五月，经常被雾笼罩着，通称雾季，有时才幸免敌机空袭。自一九四一年十月起，话剧演出遂集中在这个期间，乃称“雾季公演”。

丹、蓝马、陶金、陈天国、项堃、王斑、沙蒙、江村、施超、顾而已、魏鹤龄、石羽、钱千里、王为一、徐韬、谢添、周伯勋、高占非、冼群、周峰、舒强、张颖、余克稷、姜公伟、梁少侯、凌琯如、张鸿眉、吕恩、虞静子、英茵、朱铭仙、李健、沈蔚德、黄宛苏、王苹、蒋天流、季禾子、贺路、张莺、金淑之、冀淑平、沙莉、耿震、沈扬、蔡松龄、张逸生、张雁、刘郁民、方琯德、刘厚生、田稼、张立德、卢业高、徐昌霖、宗由、夏天、韩涛、李畏、阳华、黄宗江、丁然、李天济、刘沧浪、李纬、王戎、寇嘉弼、朱今明、陈永倞、丁聪、章超群、姚宗汉、胡孑、李恩杰、苏丹、张垚、程梦莲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山城剧坛璀灿的明星，有的更是对敌冲锋陷阵的猛士，文艺界的旗手。当时重庆的著名话剧团体，有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电剧团、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孩子剧团、怒吼剧社、中国胜利剧社等。演出场地多在国泰大戏院、抗建堂、银社、青年馆。

建国以后，中国话剧运动史的研究工作者，把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重庆的话剧演出，作为一项重要课题进行研究。三十余年来，全国许多文学研究机构、大专院校、戏剧工作者，想找一份抗战时期重庆话剧演出剧目资料而不可得。一九六四年，我将所藏的郭沫若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期间油印的一本《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重庆演剧概况摘要》，由重庆市话剧团资料室翻印，供应各地大专院校、戏剧团体、报社资料室等一百多个单位。近几年来，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对戏剧史料的需要更加迫切。老一辈戏剧家对抗战期间重庆雾季公演资料的搜集十分关注，鼓励我能进行整理，乃编成《抗战时期重庆公演话剧剧目》，以供参考。只因现能找到的资料有限，一九四一年以前的重庆非正规化演出较多，有些演出剧目的编、导为何人，尚

付阙如。辑录剧目有遗漏及差误处，尚请识者指正。

一九三七年

保卫芦沟桥 怒吼剧社演出，崔嵬、张季纯、马彦祥、阿英、于伶、宋之的等十七人编剧，赵铭彝、余克稷、陈叔亮导演。

芦沟桥之战 上海影人剧团演出，陈白尘编剧。

流民三千万 上海影人剧团演出，塞克编剧。

放下你的鞭子 上海影人剧团演出，集体创作。

一九三八年

塞上风云 四川旅外剧队演出，阳翰笙编剧，陈光导演。

民族万岁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宋之的、陈白尘根据席勒《威廉·退尔》改编。

故乡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章泯编剧。

塞上风云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

夜光杯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于伶编剧。

自由魂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赵慧深根据波兰廖抗夫《夜未央》改编。

黑地狱 怒吼剧社演出，凌鹤编剧，赵铭彝、余克稷、陈叔亮、章功叙联合导演。余克稷执行导演。

从南到北 （即《放下你的鞭子》）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编剧，集体创作。

反正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洗群编剧，陈永倞导演。

火中上海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

八百壮士　怒吼剧社、戏剧工作社联合演出，崔嵬、王震之编剧。

飞将军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洪深编剧，阎哲吾导演。

爱与仇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丁玲编剧，阎哲吾导演。

凤凰城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吴祖光编剧，汪德、余师龙导演。

可怜虫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李庆华编剧，陈永倞导演。

炸药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克莱曼唐原著，王思曾改编，余师龙导演。

魔窟　（即《群魔乱舞》）国立戏剧学校演出，陈白尘编剧，阎哲吾导演。

奥赛罗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莎士比亚著，梁实秋译，余上沅导演。

烟幕弹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腊皮虚原著，万家宝改编，郭蓝田导演。

古城烽火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顾一樵编剧，陈永倞导演。

血海怒潮　怒吼剧社演出，林静根据萨都《祖国》改编，陈治策导演。

阿Q正传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田汉改编，黄作霖导演。

为自由和平而战　怒潮剧社演出，王为一编剧，王为一导演。

我们的后防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沈蔚德编剧，蔡松龄导演。

女英锄奸　怒吼剧社演出。

黎明　怒吼剧社演出，贾文献编剧。

血祭九一八　怒吼剧社演出。

阿Q正传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田汉改编，赵丹导演。

我们的国旗 南渝中学演剧队演出，陈豫源编剧。

重整战袍 南渝中学演剧队演出，钟锄云编剧。

林中口哨 怒吼剧社演出，姚时晓编剧，张瑞芳导演。

新十八扯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阎哲吾编剧，阎哲吾导演。

募寒衣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何治安编剧，何治安导演。

重整战袍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钟锄云编剧，蔡松龄导演。

当壮丁去 戈兴剧社演出，胡绍轩编剧。

盲哑恨 青年剧社演出，李增援编剧。

争取最后胜利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

大家一条心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

汉奸和十字舞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

全民总动员 （即《黑字二十八》）重庆戏剧界联合公演，宋之的、陈荒煤、舒群、罗烽原作，宋之的、曹禺修订，张道藩、余上沅、曹禺、宋之的、沈西苓、应云卫联合导演，应云卫执行导演。

模范富翁 教育部第三巡迴戏剧教育队演出。

张家店 教育部第三巡迴戏剧教育队演出，崔嵬编剧。

壮丁 教育部第三巡迴戏剧教育队演出，舒非编剧。

中国万岁 怒潮剧社演出，唐纳编剧，王为一导演。

一九三九年

群魔乱舞 华北流亡学生工作队演出，陈白尘编剧，沈浮导演。

上海屋檐下 留渝剧人演出，宋之的根据夏衍原作改编，应云卫导演。

扬子江暴风雨 七七少年剧团演出，田汉编剧。

荣誉大队 七七少年剧团演出，吕复、赵明编剧。

帮助咱们的游击队 孩子剧团演出。

凤凰城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吴祖光编剧，黄作霖、阎哲吾、曹禺导演。

菱姑 中华全国剧协重庆分会演出，冼群编剧。

国旗飘扬 中华全国剧协重庆分会演出，罗烽编剧。

不愿作奴隶的孩子 孩子剧团演出。

反侵略 怒吼剧社演出，杨村彬、阎哲吾编剧。

壮丁 七七宣传队演出，舒非编剧。

古城的怒吼 复旦剧社演出，马彦祥根据萨都《祖国》改编，赵丹导演。

民族光荣 （即《自卫队》）怒潮剧社演出，宋之的编剧，应云卫导演。

战斗 中电剧团演出，章泯编剧，赵丹导演。

伪君子 山东省立剧院演出，莫里哀编剧。

民族万岁 怒吼剧社演出，宋之的、陈白尘改编，应云卫、沈西苓、赵丹联合导演。

一年间 留渝剧人演出，夏衍编剧，宋之的、沈西苓、凌鹤、章泯、应云卫联合导演，沈西苓执行导演。

包得行 军委会政治部教导剧团演出，洪深编剧，洪深导演

渡黄河 怒潮剧社演出，救亡演剧二队集体创作，颜一烟执笔。

三勇士 怒潮剧社演出。

狐群狗党 怒潮剧社演出，马彦祥编剧，马彦祥导演。

爱与仇 军委会政治部教导剧团演出，丁玲编剧，凌鹤导

演。

寄生草 军委会政治部教导剧团演出，洪深根据台维斯《软体动物》改编。

残雾 怒潮剧社演出，老舍编剧，马彦祥导演。

故乡 重庆卫戍总部抗敌剧团演出，章泯编剧，马彦祥导演。

一九四〇年

李秀成之死 军委会战干团忠诚剧团演出，阳翰笙编剧，马彦祥导演。

塞上风云 留渝业余剧人演出，阳翰笙编剧，沈西苓导演。

黑地狱 国际反侵略剧团演出，凌鹤编剧，凌鹤导演。

岳飞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顾一樵编剧，杨村彬导演。

从军乐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余上沅、王思曾编剧，杨村彬导演。

蜕变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曹禺编剧，张骏祥导演。

国家至上 （又名《回教三杰》）中国万岁剧团（由怒潮剧社改名）演出，老舍、宋之的编剧，马彦祥导演。

软体动物 留渝业余剧人演出，英·台维斯编剧。

三兄弟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迴工作团演出，鹿地亘编剧。

名优之死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田汉编剧。

浪淘沙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

未婚夫妻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陈白尘编剧。

一出戏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寇嘉弼编剧。

夜上海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于伶编剧，马彦祥导演。

明末遗恨 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励进会演出，魏如晦编剧，张雪峰导演。

刑 中电剧团演出，宋之的编剧，章泯导演。

雾重庆 （又名《鞭》）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宋之的编剧，应云卫导演。

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九月

女子公寓 中央实验剧团演出，于伶编剧，应云卫导演。

乐园进行曲 孩子剧团演出，凌鹤编剧，凌鹤导演。

边城故事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袁俊编剧，张骏祥导演。

国贼汪精卫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马彦祥编剧，马彦祥导演。

秦良玉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杨村彬编剧，杨村彬导演。

天长地久 恒社演出，许幸之根据小仲马《茶花女》改编，应云卫导演。

人约黄昏后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施谊改编，陶金导演。

赎罪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夏衍编剧，黄田导演。

皇军的刺客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万流编剧，孙坚白导演。

走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吴天编剧，孙坚白导演。

正在想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曹禺编剧。

小皇帝 孩子剧团演出。

这怎么办 孩子剧团演出。

新生 中央实验剧团演出，瞿白音根据华尔寇《梅萝香》改编，张逸生导演。

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

大地回春 中华剧艺社演出，陈白尘编剧，应云卫导演。

愁城记 中华剧艺社演出，夏衍编剧，贺孟斧导演。

天国春秋 中华剧艺社演出，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

钦差大臣 中华剧艺社演出，果戈理原著，中华剧艺社文学部译，陈鲤庭导演。

孤岛小景 中华剧艺社演出，袁牧之编剧，张立德导演。

面子问题 中华剧艺社演出，老舍编剧，应云卫导演。

忠王李秀成 中华剧艺社演出，欧阳予倩编剧，贺孟斧导演。

屈原 中华剧艺社演出，郭沫若编剧，陈鲤庭导演。

陌上秋 （即《秋收》又名《大地黄金》）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陈白尘根据艾芜小说《秋收》改编，马彦祥导演。

棠棣之花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郭沫若编剧，凌鹤导演。

江南之春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马彦祥根据陈瘦竹小说《春雷》改编，马彦祥导演。

战斗的女性 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凌鹤编剧，凌鹤导演。

北京人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曹禺编剧，张骏祥导演。

美国总统号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袁俊编剧，杨村彬导演。

女房东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陈治策编剧，寇嘉弼导演。

生财有道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莫里哀原著，顾仲彝改编，刘厚生导演。

法西斯丧钟响了 孩子剧团演出，臧云远、王云阶、吴晓邦编剧，吴晓邦导演。

农村曲 孩子剧团演出，李伯钊编剧，向隅作曲，凌鹤导演。

猴儿大王 孩子剧团演出，张天翼原著，凌鹤、张莺、吴晓邦改编，凌鹤导演。

遥望 中央广播电台演出，奥尼尔原著，李庆华改编，凌鹤导演。

黄金时代 中央广播电台演出，郭蓝田改编，江村导演。

表 育才学校戏剧组演出，班台莱耶夫原著，董林肯改编，刘厚生导演。

原野 朝阳大学剧社演出，曹禺编剧，周彦导演。

秋子[1] 中国实验歌剧团演出，陈定编剧，臧云远、李嘉诗词，黄源洛作曲，吴晓邦导演。

反间谍 教育部第二社会教育工作团演出，陶熊编剧，彭行才导演。

一心堂 中电剧团演出，王震之编剧，徐苏灵导演。

结婚进行曲 中电剧团演出，陈白尘编剧，陈鲤庭导演。

闺怨 留渝剧人演出，许子译剧，贺孟斧导演。

范筑先 留渝剧人演出，姚亚影编剧，姚亚影导演。

重庆二十四小时 留渝剧人演出，沈浮编剧，沈浮导演。

大雷雨 留渝剧人演出，亚·奥斯特洛夫斯基著，芳信译，孙师毅导演。

天网 留渝剧人演出，戴耳编剧，集体导演。

野玫瑰 留渝剧人演出，陈铨编剧，苏怡导演。

日出 留渝剧人演出，曹禺编剧，苏怡导演。

杜玉梅 实验剧院演出，董每戡编剧，肖赛导演。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

法西斯细菌 中华剧艺社演出，夏衍编剧，洪深导演。

---

[1] 《秋子》系大型歌剧，因演出影响广泛，乃列入。

长夜行 中华剧艺社演出，于伶编剧，应云卫导演。

孔雀胆 中华剧艺社演出，郭沫若编剧，应云卫导演。

风雪夜归人 中华剧艺社演出，吴祖光编剧，贺孟斧导演。

石达开 中华剧艺社演出，陈白尘编剧，张骏祥导演。

复活 中华剧艺社演出，L·托尔斯泰原著，夏衍改编，陈鲤庭导演。

祖国在呼唤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宋之的编剧，洪深导演。

北京人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曹禺编剧，章泯导演。

家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曹禺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章泯导演。

蜕变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曹禺编剧，史东山导演。

虎符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郭沫若编剧，王瑞麟导演。

蓝蝴蝶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陈铨编剧，陈铨导演。

金玉满堂 中电剧团演出，沈浮编剧，潘孑农导演。

正气歌 中电剧团演出，吴祖光编剧，陈鲤庭导演。

柳暗花明 国立剧专校友剧团演出，王进珊编剧，余师龙导演。

哈姆雷特 国立剧专校友剧团演出，莎士比亚著，梁实秋译，焦菊隐导演。

清宫外史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杨村彬编剧，杨村彬导演。

黄金梦 中宣部实验剧团演出，吴漱予根据巴若来《小学教员》改编，周彦导演。

安魂曲 怒吼剧社演出，匈·贝勒·巴拉兹著，焦菊隐译，张骏祥导演。

小主人 育才学校戏剧组演出，董林肯编剧，刘厚生导演。

黄白丹青 中央银行业余剧团演出，洪深编剧，金山导演。

之子于归　戏剧工作社演出，姚苏凤编剧，包时导演。

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

大地黄金　（《秋收》）中央青年剧社演出，陈白尘编剧，史东山导演。

金风剪玉衣（即《南冠草》）中央青年剧社演出，郭沫若编剧，洪深导演。

少年游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吴祖光编剧，马彦祥导演。

野玫瑰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陈铨编剧，吴树勋导演。

繁菌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辛明编剧，宗由导演。

董小宛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舒湮编剧，袁丛美导演。

玉麒麟　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鲁觉吾编剧，苏怡导演。

大地回春　中电剧团演出，陈白尘编剧，沈浮导演。

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振》）中电剧团演出，老舍、赵清阁编剧，吴永刚导演。

凯歌归　（原名《胜利号》）中电剧团演出，陈白尘、吴祖光、杨村彬、周彦编剧，潘孑农导演。

杏花春雨江南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于伶编剧，史东山导演，

天上人间　（即《一年间》）中国艺术剧社演出，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

戏剧春秋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夏衍、于伶、宋之的编剧，郑君里导演。

处女的心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苏·Y·雅鲁纳尔原作，佐临、黄宗江改编，黄宗江、郑君里导演。

镀金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曹禺根据腊皮虚《迷眼的沙子》

其中一幕改编，东方晦之导演。

求婚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柴霍甫原著，东方晦之改编，郑君里导演。

草木皆兵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宋之的、夏衍、于伶编剧，史东山导演。

河山春晓 戏剧工作社演出，吴铁翼编剧，丁伯骝导演。

喜相逢 中国胜利剧社演出，李健吾编剧，沈浮导演。

两面人 中国胜利剧社演出，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

牛郎织女 怒吼剧社演出，吴祖光编剧，张骏祥导演。

有凤来仪 （原名《职业妇女》）中国业余剧社演出，石华父编剧，吴祖光导演。

醉鬼 （原名《可怜的裴迦》）教育部实验剧队演出，俄·亚穆伯著，陈治策改译，何治安导演。

迷眼的沙子 教育部实验剧队演出，腊皮虚原著，阎哲吾改编，阎哲吾导演。

还乡记 东吴、沪江大学，法商学院演出，寇嘉弼编剧，焦菊隐导演。

穷将就 邮工剧团演出，卡达耶夫原著，袁俊改编，刘巍导演。

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山城故事 中电剧团演出，袁俊编剧，沈浮导演。

万世师表 中电剧团演出，袁俊编剧，潘孑农导演。

不夜天 中电剧团演出，西渭（李健吾）根据《金小玉》改编，陈鲤庭导演。

小人物狂想曲 中电剧团演出，沈浮编剧，沈浮导演。

重庆屋檐下 中国胜利剧社演出，徐昌霖编剧，史东山导演。

祖国　中国胜利剧社演出，法·萨度著，郑君里导演。

檀花之歌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阳翰笙编剧，马彦祥导演。

秣陵风雨　（即《桃花扇》）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周彦编剧，贺孟斧导演。

密支那风云　中国胜利剧社演出，徐昌霖编剧，陶金导演。

大马戏团（即《吃耳光的人》）　中国业余剧社演出，安特列夫著，师陀、于伶改编，陈鲤庭导演。

春暖花开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李庆华编剧，顾而已导演。

春寒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宋之的编剧，洪深导演。

离离草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夏衍编剧，贺孟斧导演。

清明前后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茅盾编剧，赵丹导演。

芳草天涯　中国艺术剧社演出，夏衍编剧，金山导演。

林冲夜奔　中国国光剧社演出，吴祖光编剧，陈光导演。

乱世佳人　新生剧社演出，密西尔原著，王光乃改编，焦菊隐导演。

雷峰塔[①]　东方剧团演出，卫聚贤编剧，周彦导演。

人为财死　力行剧社演出，巴若莱原著，余师龙改编。

嘟格办　育才学校戏剧组演出，张本志编剧，钱风导演。

风雪夜归人　新中国剧社演出，吴祖光编剧，贺孟斧导演。

郁雷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朱彤编剧，马彦祥导演。

女人女人　留渝剧人演出，洪深编剧，洪深导演。

鸡鸣早看天　中央青年剧社演出，洪深编剧，马彦祥导演。

黄花岗　中央青年剧社、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集体创作，洪深导演。

---

① 《雷峰塔》出自陈白尘手笔。当时在写剧本热潮中，洪深应卫聚贤之请，由陈白尘用三天时间写成，署名卫聚贤编剧，由项堃等人演出。

抗战时期中统在重庆的活动

刘 介 鲁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定重庆为陪都。一九三八年春夏，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实际负责主持工作。

中统局成立后，鉴于武汉势将难保，决定在重庆设立首都区，为局本部西迁作准备，并派李熙元为区长，潘眠石为书记。首都区成立不久，局本部即决定西迁，是年秋即派出一批先遣人员到重庆，分两路入川，一路由水路溯长江而上，一路经湘黔陆路入川。中统局到达重庆后，先在九道门租赁重庆药材业同业公会为办公地址，不久迁至中山二路川东师范学校内办公，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迁回南京为止。

首都区听起来似乎规模很大，实际是空有其名，除区长、书记外，别无机构，而人员又少，区长李熙元仅有名义，实际工作由书记潘眠石负责。局本部迁到重庆后，感到首都区实不副名，乃将该区撤消，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重庆市党部及重庆市政府内分设两个调查统计室，以余介立为市党部调统室主任，潘眠石为

* 刘介鲁，四川巴县人，现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解放前长期在中统局工作，曾任中统局本部专员，川滇、滇越两路调统室主任。

市政府调统室主任，两室均直接由局本部领导。两室因系地方单位，编制小，仅各有工作人员十余人，分工不能合作，自难发挥作用。

两室工作不到一年，局本部认为在一个地区竟有两个单位，力量分散，工作成效不大，而重庆既是陪都，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非常重要，两室力量薄弱，不能担负战时首都地区的重任。一九三九年冬，局本部计划改组两室，组成统一的机构来负责陪都地区中统的工作。这时留苏的老牌特务杨为（号拔一）从苏联回国来到重庆，于是徐恩曾便指派杨为负责主持陪都地区工作，并将两个调统室及局本部的行动队拨归杨为统一指挥。这一决定十二月中旬正式公布，当晚，杨为便在重庆大梁子聚丰园酒楼设宴，约集两室骨干及行动队骨干聚餐，并向大家宣布新机构于一九四〇年正式成立，现正积极筹备中，希望大家努力工作，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当杨为受命筹建陪都地区新机构时，原定名"行动站"，并取行动站三字的谐音"邢东山"为机构代名，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即以行动站的名义正式办公并举行元旦团拜。行动站下设三个部门：（一）总务部门；（二）情报部门；（三）行动部门。

不久，中统局本部认为行动站侧重行动工作，不能适应战时首都的形势及工作需要，指示改组为"重庆首都实验区"（简称实验区），为局本部直属单位。明确规定实验区的任务是实验，为了适应战时需要的各项调查工作，由该区实验并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培养领导骨干向中统局本部及全国各地方单位输送。实验区由杨为任区长，张庆恩任副区长，朱凌云为书记，下设总务、考训、情报、行动四个科，两个调统室名义上仍然存在，实际上两室主任及人员均调到实验区工作。该区发展、领导特务组织的

任务由情报科负责。因为中统是运用各级特务组织去搜集情报，组成广泛的情报网。情报科还按性质划分工作范围，设置了机关网、社团网、职工网、学校网等机构，有计划按系统去发展特务组织和搜集情报。

一九四一年重庆受到日本飞机空袭，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机关、学校、企业及居民均疏散到郊区和县区。在大疏散中，实验区领导的特务组织关系，也随同各自的工作单位疏散，因而联系中断，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实验区为了适应这一新情况，对机构进行调整，改变按性质划分工作范围而为按地区划分工作范围，将情报科下各网撤消，另行设立分区、站。计设有城分区、新市分区、沙磁分区、北碚分区、南岸分区、江北分区、巴县分区、新桥站、歌乐山站、青木关站、南温泉站。分区、站为基层实际工作单位，负责发展并领导各自地区的特务组织，并搜集情报。区本部仍设四个科（一九四二年曾增设第五科，主管民意、谣言调查，不久即撤消）：一科总务，办理一切事务性工作；二科组训（原为考训科），主管特务组织关系的审批及训练事宜；三科情报，负责编审情报；四科行动，执行侦查、逮捕、关押、审讯、监视等任务。自此，实验区内部设四个科，外部设分区、站，成为定型组织，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该区撤消为止。

实验区成立之初，其人员来自局本部的行动队、两个调统室及由军委会战干团毕业分配到中统局工作的部分人员。该区为局本部直属单位，同处级，编制无定额限制，最多时达一二〇人。平时调进调出，流动性很大，经常也在百人左右。

实验区成立后积极展开工作，从事各种活动，其较为重大的事件概述于后：

举办暑期讲习班

中统历来重视发展特务组织，组成广泛的情报网。特务组织主要有二，一为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简称党网），一为通讯员，前者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能参加，后者非党员也可参加。这些人员都不是职业特务，而是隶属于基层特务组织，各自有公开职业，他们在其业务时间及可能范围内义务地为中统从事发展特务组织和搜集情报的活动。中统发展特务组织，不是为组织而组织，而是为情报而组织。实验区虽新成立，但原有的两个调统室在发展组织方面已有适当的基础，运用原有基础，从事新的发展比较容易，所以当时在党、政机关（包括警察），新闻界，文化界，大专院校，厂矿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乡镇保甲人员中，均有中统的党网和通讯员。中统发展特务组织，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中统历来重视学运工作，战前特工总部在南京，运用在校学生中的特务关系组成"学生生活社"。南京设总社，各省、市设分社，作为从事反动学运的外围组织。重庆实验区在发展特务组织中也着重在大专院校中吸收学生参加，当时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院校中发展了不少的学生，并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办了一个暑期讲习班，专门选调各院校中的特务学生十余人参加受训。该班设在重庆菜园坝王家花园，由副区长齐耀荣负责主持，情报科长向贤书协助办理，局本部及实验区各处、科负责人担任讲课。训练一月，时间虽短，对于灌输特务工作之理论及技术，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有些人如谢寿国、谭才雄、张兆勋等毕业后调到内部充当职业特务。

通过这次实验进行总结后，局本部认为，这种方法是从大学

生中吸收新鲜血液提高特务工作人员质量的好办法，决定采用推广。以后在重庆地区遂由局本部于每年暑假期间举办一次暑期讲习班，从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中抽调党网分子及直属通讯员到重庆集训，由局本部训练委员会负责办理。主任秘书王思诚亲自抓这项工作。参加暑期讲习班受训的一些人，在学校毕业后，便到中统充当职业特务，如西南联大毕业的周德清、大夏大学毕业的王淦等等，都是在暑期讲习班受过训的党网分子。

培养领导骨干

培养领导骨干，输送干部是实验区的任务之一。该区对此工作非常重视，对具有领导能力的工作人员，先放在基层单位充当领导职务，使之取得领导基层工作的经验。相当时期后才调到区本部担任科长或书记，培养掌握领导全面工作的能力。然后将这些人的情况向局本部汇报，以供挑选。几年来除调到局本部工作者外，调到各省、市地方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有：

林葆宇　原任实验区新市分区主任，一九四一年中统局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成立印度、缅甸等区时，调任印度区长。

朱凌云　原任实验区书记，一九四一年调任缅甸区副区长。

谢寿国　原任沙磁分区主任，一九四二年调任甘肃省调统室主任。

王全章　原任情报科长，一九四二年调任山西省调统室主任，后调广西室主任。

李九林　原任实验区书记，一九四二年调任缅甸区副区长。

刘介鲁　原任分区主任、行动科长，一九四三年调任川滇、滇越两路调统室主任。

周德清　原任组训科长、书记，一九四四年调任缅甸区副区

长兼缅甸总支部调统室主任，后调江西省调统室主任。

杨保康　原任分区主任、科长，一九四四年调任山西省调统室主任，实验区撤消后调任重庆区长。

周仕珊　原任分区主任，一九四二年先调局本部工作，后调任汉口市调统室主任。

开展情报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是合作抗日，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对中共仍然持敌视态度，因而中统的情报工作以搜集党派情报为中心任务，实际是以搜集中共的活动情况为中心任务，其他如行政效率、经济、社会等等情报，均处于次要地位。实验区的情报活动，主要也是放在搜集中共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各种活动方面。

当时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极为高涨，中共在各学校、各厂矿均有地下组织。有的是小组，有的还成立了支部，虽是地下组织，但不是完全处于隐蔽状态。由于形势的变化，各校及各厂的中共党员，均以抗日救亡为中心，从事各种宣传活动，并在各单位组织读书会、歌咏队等等外围组织，积极展开工作，这些动态，自然成为中统的情报材料。

重庆青年会有个少年部，中共及一些进步人士利用该处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歌咏队，从事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宣传，中统对这些团体的组织、人事、活动情况，均派专人详为了解，搜集情报。

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经常有中共及民主人士在那里活动，举行公开讲演。该会设有一个“文化沙龙”，是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的活动中心。侯外庐先生等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于是该会

便成为实验区搜集情报的一个重要对象，经常有特务分子在该会活动，了解各种动态，凡该会的各种公开集会及活动，特务分子必然要伪装成一般群众前往参加，将了解到的各种情况作为情报材料上报。

蒋介石曾经搞过一个“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宋美龄也搞了一个“新生活妇女运动委员会”。于是国民党方面一些从事妇女运动的人如沈慧莲(原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徐闾瑞等积极参与该会活动，成为其中骨干；进步的妇女界人士如史良、张晓梅等也参与该会的活动。因该会作过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如慰劳伤兵，为抗日将士征募寒衣等。由于有进步人士参与该会活动，因此这也成为特务搜集情报的对象，不仅实验区经常派遣女特务熊叔衡、陈慕松、徐亚斯等前往该会刺探情报，中统局本部也指派女特务陈文昭、张丽芬、唐一苇等前往该会搜集情报，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夫人费侠也常去该会活动。

此外，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是实验区搜集情报的主要对象。举凡郭沫若的言行，政治部第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各种活动，都是实验区所需要的情报材料。其他如较为活跃的业余剧团怒吼剧社的各种活动，也在搜集情报之列，实验区还派了一个特务去参加怒吼剧社，经常提供有关该社的各种情报及进步演员张瑞芳等的活动情报。特务分子虽然已经打进了怒吼剧社，却不知张瑞芳当时已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设立监视哨

中统局本部的行动大队从一九三九年便开始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中共代表团进行监视，并运用交通工具进行长途盯梢。局

本部的行动大队划归实验区领导后，便由该区行动科正式建立监视哨的工作。所谓监视哨，就是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上清寺“特园”(川军将领鲜特生公馆，该处为民盟机关及聚会之所)，枣子岚垭“犹庄”(沈钧儒先生住处)，苏联大使馆等处设立监视哨，每天派遣行动人员到上述各处进行监视。

监视又分固定与流动两种：固定监视就是蹲在以上各处不动，以摆香烟摊(或其他摊)、坐茶馆等等方式掩护，其任务是注意来往该处的人员，千方百计设法了解出入该处人员的姓名、身份及相貌特征，逐日将所得情况上报。流动监视是针对各该处的重要人员，如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钱之光、王炳南；新华日报社的潘梓年等人外出时，担任流动监视的行动人员便进行盯梢，了解他们去何处，同什么人接触，停留多少时间等等，均一一记录上报。

实验区由行动科将每日所得各种材料汇编为《监视报告》，呈报局本部，利用这种外形侦查，了解中共及民主人士的动态，并进而了解与中共人士接触的人员情况，以扩大侦查的线索。

实验区还在新桥、青木关两地设了新桥站及青木关站，这两个站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统设立的交通检查站及宪兵，检查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进出重庆的车辆，检查车上的人员及物品，从而了解中共有什么人离开重庆去延安，或什么人从延安来到重庆。这种监视活动虽然能了解到一些中共人士的动态，但无法得知其活动的内容。

实验区的行动人员长期在曾家岩、化龙桥搞监视活动，早为革命警惕性很高的中共代表团所察觉。有次周恩来从曾家岩乘车外出，特务照例盯梢，车行不远，忽然停下，周恩来探头到车窗

外，等盯梢的特务临近时，他告诫说："七十二行哪一行不好干，你们何苦来搞这个。"说罢才开车而去。这个受告诫的特务回到实验区报告这一情况时，特务们还笑他盯梢被识破，技术不高明。

关于对中共进行监视的问题，蒋介石还有过一次重大的阴谋。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三个特务机关密切配合，对中共代表团、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进行监视，务期查明中共在渝所有人员及秘密组织和地下党员，准备在必要时一网打尽。三个特务机关奉到蒋介石的密令后，中统局代局长徐恩曾、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张镇等会商执行蒋介石这项密令的具体办法。经商定，执行这项任务绝对保密，在外租民房作为联合办公之用。对于监视工作，立即由三方面分别进行，所得材料，定期汇报交换研究。

中统局当即派人在重庆水巷子租下楼房一幢，作为秘密联合办公处所，房屋租定后便宣告正式成立，开始进行会报。中统方面参加会报的，除徐恩曾外，尚有副局长顾建中、主任秘书王思诚、第二处处长张炎茂、实验区副区长白坚等；军统方面参加会报的有副局长戴笠、第二处处长何芝园、副处长叶翔之等；宪兵方面参加会报的有副司令张镇、警务处长卫持平、科长高瘦影、周剑心等。

第一次会报决定该处定名"临时参谋部"，推中统局副局长顾建中负责主持，事务工作由中统派人办理，警卫工作由宪兵司令部派人担任。会报并规定临时参谋部绝对保密，三方面人员与临时参谋部无工作关系者不得去该处，执行监视工作的低级行动人员亦不得去该处。这次会报后，中统局副局长顾建中便移住该处，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并由实验区派蔡文二去该处办理事务工

作，宪兵司令部派四名便衣人员担任警卫，由蔡文二指挥。

中统的实验区，原来没有监视哨，为了执行蒋介石的这项秘密命令，在原有监视哨的基础上，加强工作，加派行动人员执行监视任务。当时我在该区任行动科长，为了加强工作，除增派行动人员，充实监视哨的力量外，每天还亲到各监视哨进行检查，要他们加强监视。在此期间，比平时确也多得了一些情报，行动科也确实忙了一番，档案上登记的所谓“嫌疑”分子的卡片也增多了。

临时参谋部搞了两个多月，三方面都没有从监视工作中发现中共的秘密组织，天天监视，也没有看到什么行动，工作不免又停滞下来。后来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被打退，蒋介石准备必要时将在渝中共人士一网打尽的阴谋活动，也就随之终止，这个为了执行蒋介石阴谋而组合的临时参谋部约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宣告解散，该处房屋由中统局交通处继续租用作为转运站。实验区的监视哨工作，仍沿旧例，继续进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该区撤消为止。

大搞特情工作

实验区的监视活动，只能了解到一些中共主要人士的一般动态，无法得知其活动内容，虽然搜集到不少情报，也只是表面现象，不了解中共内情，因此迫切需要从中共内部刺探情报，建立“特情”就成了首要的任务。

所谓特情工作，就是特种情报工作，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就叫特情人员，简单说，就是搞内线活动。中统对特情工作的原则，是采取“打入”、“拉出”的方式。所谓“打入”，就是派遣特务分子，伪装进步，寻找机会打入中共组织，以便在中共内部刺探各

种活动情报。中统也明知中共的组织非常严密，打入既不容易，深入更为困难，一旦有了打入的机会，成为内线，尽量不使暴露身份，而且希望能深入下去，由小组而支部，由支部而区委、县委等等，这样才能起更大的作用。“拉出”，就是设法寻找中共组织内的动摇分子，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其变节，仍然使其留在中共组织内，秘密的向中统提供情报。无论是由中统打入或拉出的特情人员，都尽量设法不使其暴露身份，身份一经暴露，便失去特情作用；失去特情作用的分子，一般均调到中统内部工作。

特情工作是绝对保密的，不经管是项工作的人是无法知道该区究竟有多少特情，有些什么样的特情人员。我由于工作关系及其他原因，了解部分情况和下面几个特情人员。

王光华　原是重庆南岸铜元局二十兵工厂的青年工人，是中统的通讯员，他向特务组织报告该厂有进步人士的活动，有读书会、歌咏队等等组织在从事各种活动。特务组织便叫他先参加这些活动，努力表现，然后设法打入中共组织。约经数月，据王报告已参加中共的小组活动，后来又报称参加支部活动，提供过该厂中共支部成员活动情况，以及南岸区委成员胡甫章出席该厂支部会议情况等，后来胡甫章曾被实验区逮捕关押过。

杨培柱　中统的通讯员，江北二十一兵工厂工人，经特务组织指示设法打入该厂的中共组织，后参加了中共的小组活动，提供过该厂中共支部的活动情况。

邹韵宜　女，杨培柱的未婚妻，江北相国寺陆军医院护士，由于她向杨培柱谈起陆军医院内有共产党活动，杨向特务组织汇报了这个情况后，因而要杨培柱设法指使邹韵宜打入中共组织。约经半年之久邹韵宜方参加了中共组织，提供过一些较有价值的

有关中共在江北地区的活动情况。约在一九四二年，实验区企图扩大线索，对陆军医院的中共组织搞了一次破坏活动，抓了几个人，致使邹韵宜身份暴露，失去特情作用，实验区将她调到内部工作。

荆有麟　特务，化名林安。原是一个报屁股文人，抗日战争前便在上海一些小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抗战爆发后逃到重庆。他同金满成比较熟，当时金满成在重庆《新蜀报》主编副刊，荆有麟便常向《新蜀报》副刊投稿，因此，遂以文化人身份混入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郭以后还领导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左翼作家同进步人士集中的地方，其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员。荆有麟利用工作机会，对第三厅同文工会的情况及各种活动情形均比较了解，经常向实验区提供情报。实验区将他列为特情人员，而且还比较重视，从一九四一年起便每月发给一笔工作津贴，后来中统局给以专员名义，按月支领生活费三百元。荆有麟虽当上中统专员，并不到中统办公，只是暗中向实验区提供情报，以林安的名义领取薪津，按月由实验区派人送给他。他长期不断地向实验区提供有关郭沫若及其主持下的政治部第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各种活动情况的情报。

实验区为了建立特情人员，真是用尽心机。如当时曾家岩周公馆附近有个开茶馆的保长，中统将其发展为特务，一方面利用他来协助监视哨的工作，另方面想运用这个地头蛇熟悉当地各种情况之便来设法建立内线。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并非一家独住，房东还住在里面，房东家有个女佣人，据地头蛇报告，可以想办法利用她。实验区便派特务毛翔去收买这个女佣人，关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九四二年春夏，有天

实验区区长陈庆斋在办公室拿着几张四寸大的照片叫叛徒程全楚（原是学联领导人之一，叛变后在实验区工作，后任该区情报科长并兼管特情）辨认，程细看之后，指明其中一张男的是乔冠华，一张女的是龚澎，说其他的人不认识。旁边有人问陈庆斋，这些相片从哪里搞来的？陈诡秘的笑笑说：在外边当然是弄不到的。从陈庆斋的这句话来分析，显然，相片是从里边的内线手里得来的，只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内线是何人罢了。

实验区为了建立特情是不择手段的。如天主教徒祝银松在重庆中一路开设五金商店，其弟在中共代表团给周恩来作副官。当时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生活比较清苦，因此，他有时向其兄要钱。时间久了，祝银松不太高兴，无意中向其教友许蔚川表示出来。祝银松的新婚妻子是许介绍的，他们二人关系较好，常相往来，所以把心里话对许蔚川讲了。许蔚川有特务关系，将此情况向实验区汇报。当时（一九四二年）实验区区长陈庆斋认为这是个极好机会，如能将祝弟拉过来，建立为特情，便可通过他的手，偷窃中共代表团的文件，并可详细了解周恩来的一切动态，比监视哨所得到的材料要准确翔实，便决定立即进行活动。考虑到祝银松不愿给其弟钱用，想把特务机关的钱，通过他嫂嫂的手送给祝弟，过了一段时间，便可向祝弟说明，用的钱不是祝银松的，是特务机关的；用了特务机关的钱，就要为特务机关工作，企图用此办法引祝弟上钩。商定由许蔚川介绍一个女特务去与祝银松之妻认识，然后由女特务相机去执行这个计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

实验区还在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华籍人员中建立过内线。此外还在青年党、民社党中建立有内线关系。

在国民参政会集会期间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遴选中国共产党等党派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国民参政员，组成国民参政会，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每次集会，中共和各党派团体参政员都要提出许多问题向政府质询，还要提出各种提案。蒋介石为了采取对策，需要事前了解各种质询及提案的内容，因而责成中统局搜集这方面的情报。中统局的党政处遂派出专人配合实验区进行活动，广泛搜集国民参政员之间的接触、交往，会后言论，特别注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人士同民盟的沈钧儒、史良等人的言论、活动，每日均将所搜集到的材料编成情报送呈蒋介石参考。实验区的具体作法是：

一、动员所有有条件接触国民参政员的党网、通讯员，利用各种关系拜访其所认识的国民参政员，采取正面、侧面多种方法，了解他们准备提出什么质询或什么提案以及他们对会议的感想和看法。

二、运用新闻界中的党网分子，以新闻记者身份，公开对参政员进行访问，提出具体问题，请他们发表意见，据以推测可能提出那些质询和提案。

三、出动行动人员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同盟和民主人士中的参政员的监视活动，从而了解他们相互间的往来情况。国民参政会集会期间设有招待所，外地来的参政员大都住在招待所内，实验区指派行动人员装成招待所的服务员，于侍应中偷听参政员之间的交谈；参政员开会或外出时，以打扫室内卫生为由，偷看甚至窃取参政员的提案和质询的底稿。

采取这些方法搜集到的材料是很多的，必须加以选择，将有

用的有价值的材料整编为情报。在国民参政会集会期间，参与这项活动的特务人员是很紧张繁忙的，白天黑夜都要工作，编辑誊写人员有时要忙到天亮，才能把材料送出。特务机关及特务人员虽然如此紧张地活动，但是对于中共和民主同盟参政员向政府的重要质询和提案，事前仍无法获悉，因而在会上正式提出时，致使蒋介石穷于应付，因为重要的问题，往往是等到蒋介石本人出席的时候才提出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蒋介石有时答非所问，事后则大发脾气，骂中统无能，不能在事前搜集了解到这些情况。特务挨了骂，只好自认晦气，背地发牢骚。所以每当国民参政会集会时，有的人就想方设法不参与这项活动，推脱不掉的，便自认倒霉。

进行行动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形势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重庆又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中统不敢如战前一样，明目张胆地大肆破坏中共组织，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形成白色恐怖，只是偷偷摸摸秘密拘捕一些共产党人，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没有大规模的进行过行动破坏。较为大一点的是破坏学联组织，迫使某学联领导人叛变；破坏江北相国寺陆军医院中的中共地下组织；其他都是零零星星地逮捕个别共产党人。另外在日本投降之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前，中统在重庆还搞过两次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一次是利用所谓“张莘夫事件”进行反苏大游行，一次是破坏旧政协决议制造“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国民政府中央各部均派出大员分赴东北、华北、京、沪、汉等广大地区进行接收工作，由

经济部派往东北接收各厂矿企业的一位工程师张莘夫，被苏军所杀，于是国民党便以“张莘夫事件”掀起反苏大游行。重庆各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十二月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反苏口号，并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示威，散传单，呼口号，投递抗议书。

中统实验区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事前指使各校的党网、通讯员在各校进行宣传鼓动，组织游行。游行的当天，实验区还派出大批行动人员分散到学生队伍中与各校的特务学生取得联系，暗中指使他们带头呼喊反苏口号。当游行队伍行经民生路新华日报社门市部时，行动人员乘机闯入门市部，一声呼啸，动手殴打门市部的工作人员，并对门市部进行捣毁，工作人员也被打伤多人。

一九四五年日寇宣布投降后，蒋介石邀请中共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谈，接着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定期在沧白纪念堂举行报告会，向重庆各界人士报告会议进行情况并解答到会群众提出的问题，以扩大政治影响。国民党顽固派对此既恨且怕，乃由中统特务设法进行破坏。

每当民主人士在沧白堂举行报告会时，中统实验区便派出情报人员及行动人员到会场进行捣乱。情报人员以普通听众身份混进会场，注视会场内的各种情况，主要搜集民主人士所作报告的内容、会场有何反映等情报材料。行动人员则相机进行破坏，如在会场外制造吵闹斗殴，甚至向沧白堂房上投掷石块等，干扰报告会的正常进行。情报人员有时也提出问题向报告人质询，有意刁难，使报告者难于置答；或者采取与报告者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一些人便怪声乱叫，呐喊助威，破坏会场秩序，使报告会无法进行。周仕珊便因为在会上提出问题与报告者进行辩论而受到中统局长叶秀峰的嘉奖，当上了汉口市调统室主任。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签定了“五项协定”，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以重庆市各界人士的名义于二月十日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反动派事前得此消息后，决定进行破坏，由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委员王思诚(原系中统局主任秘书)与中统实验区区长田纯玉商定，用市党部的名义组织社会服务队充当破坏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打手，由中统实验区派遣特务人员充当服务队各级队长，作为骨干力量，并指使刘野樵以重庆市农会代表名义，周德侯以重庆市商会代表名义于开会之日到会，与大会主持人士争当大会主席，企图以此来改变大会的政治方向。

临开会前，方治、王思诚、田纯玉等在川东师范中统局礼堂——信谊堂召集社会服务队各级队长开会，进行动员并布置任务，然后开赴较场口会场。方治等则到青年路青年馆坐镇，便于就近了解情况并进行指挥。中统实验区特务率领服务队员进入会场后散布会场四周，混迹于到会群众之中，拳师谢雨樵率领一群打手，散布于主席台下。大会开会前，刘野樵、周德侯走上主席台，以重庆市农会、商会的代表的名义与大会主席李公朴争夺扩音器，争当大会主席。主席台上争夺一开始，预伏于主席台下的打手便一拥而上，大打出手，混杂于会场四周的特务及社会服务队队员便四处喊打，会场秩序立即大乱，刘野樵、谢雨樵及众打手在主席台上当场将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打伤，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便遭到彻底的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所签定的各项协议墨迹未干，便被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撕毁！

中统在重庆制造的反苏游行和沧白堂、较场口事件，可称抗战时期在重庆活动的尾声。至此，中统重庆实验区宣告结束。

抗战时期军统在重庆的活动

陈 文 荣

三十年代，刘湘为了巩固其"四川王"的地位，采用了一手反共、一手防蒋的策略。蒋介石也处心积虑，既要利用刘湘反共，又想伺机吞併刘湘。所以，他们之间是既有矛盾、又相互勾结。

一九三三年，出自于对四川的控制计，蒋介石对刘湘进行渗透，派黄埔一期学生曾扩情(四川威远县人)为特派员，入川与刘联系。戴笠（时任复兴社特务处长）也密派黄埔三期学生张树良(四川荣县人)以随员身份随曾扩情入川活动。因此，解放后曾扩情在追溯起军统在四川的早期活动时，曾自我解嘲地说："我是四川军统组织的始祖。"

一九三四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甘边区取得了很大进展，挫败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剿"后，刘湘等人感到很大威胁，不得不求助于蒋介石。

其时，蒋介石在复兴社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因此他很快同意了刘湘的请求，从武汉行辕派出了一个以贺国光为首的驻川参谋团进驻重庆。康泽（四川安岳县人）以复兴社人员为骨干，组织中央军校失业同学成立别动

---

* 陈文荣，湖北武汉人，现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抗战时期任军统渝特区渝组政治情报组小组长。

总队(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配属贺国光参谋团入川。戴笠也派其骨干陈绍平为参谋团第三课课长，公开以搜集军事情报为掩护。同时康泽还以秘密方式建立复兴社重庆区社，原随曾扩情入川的张树良也是复兴社重庆区社常务干事。因此，张树良既有公开的参谋团第三课为掩护，暗地里又有复兴社区社的支持，便正式成立了军统（复兴社特务处）在重庆的第一个组织——重庆组（简称“渝组”）。

川康军统组织的摇篮——“渝组”

“渝组”的成员，均由戴笠挑选，主要是军校五、六期毕业的川籍学生，如颜齐、蒲凤鸣、何龙庆、唐伯岳、周迅予、胡有为、杨蜀农、贺鳌、徐昭俊、沈夕峰等人。这些人以后都在军统川康地区组织分别担任了重要职务。所以，渝组被人称为“老渝组”，又被人称为川康地区军统组织的摇篮。

张树良组建渝组后，主要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活动。出于“剿共”军事的需要，蒋、刘虽携手合作，实则仍是同床异梦。所以渝组早期向南京特务处报告情况时，采用的均为“密写”通讯法，后来参谋团入川才带来电台，但拍发电文仍用密码。渝组在此时期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刘湘及其军政机构，是为蒋介石吃掉刘湘服务的。

刘湘当时以重庆为基地，集四川的军、政、财权于一手，经营起一个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与蒋介石的“中央”相抗衡。

刘湘部的特务头子是冷开泰，宪兵司令是李根固，他们对刘湘忠心耿耿，因此渝组在重庆与冷开泰的谍报人员斗争非常尖锐激烈。

渝组人员是隐蔽活动，没有武器，也没有什么证件，采取的是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法，对刘湘军政宪警和谍报队内部人员进行

策反、安插坐探。这种活动又深为刘湘忌恨，命令冷开泰派出大批谍报人员四处缉访，逮捕到渝组或与渝组有联系的人就立即枪杀，给渝组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渝组初期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了解刘湘在重庆地区的军队布署、部队番号、编制、武器、弹药、兵种、车辆、马匹、粮秣以及部队历史演变、官兵素质、作战能力、训练水平等情况。刘湘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的姓名、年龄、籍贯、经历、政治背景、思想倾向、工作能力、个人品德、各种爱好和兴趣，也是渝组要搜集的。刘湘部队几位师长之间的利害冲突、与刘湘的关系和态度、团级以下军宫之间的矛盾、官兵关系、军政关系、民众的反映等等，渝组也要搜集。

对四川大、小军阀间的矛盾，蒋介石则最感兴趣。如曾充当刘湘的刽子手、制造“三三一”惨案主凶之一的蓝文彬，背叛刘湘投靠刘文辉，刘湘发觉后要抓蓝。渝组得此情报后送给贺国光，由他出面说情，使蓝文彬得救。蓝文彬不胜感激，遂改弦更张，投入蒋介石的怀抱。

渝组最重视的是刘湘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的情况，因为加入这个组织的全是刘湘部的军政骨干和嫡系、亲戚、子弟和忠实门徒，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核心小团体。

鉴于四川长期陷于军阀割据的水深火热之中，百姓对此恨之入骨，盲目地希望有一种新的力量来代替这种腐朽势力。因此，渝组打开局面后，立即向刘湘的核心小团体纵深活动。

一九四二年，我在渝组遇见一位满面烟容的缮写员赵纯一，挂的是中校军衔，感到很奇怪。因为抗战时期军统人员的军衔都很低，渝组组长也只有少校，高者才是中校。后来赵纯一告诉我，他是在“冷开泰恐怖时期”被张树良策反加入军统的，不仅提供过情报，还为张的策反立下了一些功劳。后被冷开泰发

党，经张树良设法掩护逃进行辕。“渝特区”成立前军统帮他把大烟戒掉，赵纯一康复后要求工作，但他原只担任过粮秣部门的秘书，对特务工作不熟悉，只好派他搞缮写，化名“章程”，有时也写点关于粮食部门的情报。

为了吃掉刘湘，渝组对刘湘陆海空三军和宪警部门的重要骨干进行策反，如刘湘的三军秘书长陶某某、空军梁某某、警察毕孔殷等，被拉了过来。通过这些人，刘湘的陆海空军和警、宪部队的一部分，都被控制在参谋团手中。

同时，康泽亦以新生活运动会为名，搞了一个“商劳团”，把重庆的商界头面人物如周懋植、仇秀敷、周游等人都拉进复兴社，成为“商劳团”的负责人，施以军训，俨然成为复兴社的民间外围组织。

渝组和复兴社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刘湘在四川的统治，因此刘湘集团中有不少人主张“以武力赶走中央”。到一九三七年，这种矛盾日趋激化，双方戒备，发展到大有一触即发的地步。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这就必须解决刘湘问题，乃特派何应钦、陈诚来渝与刘湘谈判。

刘湘被迫交出重庆而退居成都。南京立即在重庆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派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副主任兼参谋长；同时发表刘湘为四川省主席。

重庆行营下仍设第三科，戴笠任科长，陈绍平任副科长；并与康泽合作设了一个邮电、新闻检查所，地点在海关巷一号。渝组正式由第三科领导，颜齐担任组长，原组长张树良调升滇缅路方面任新职。何龙庆任成都组长，徐昭俊任西康组长，云、贵两地也建立了组织。

这个三科，以后也被人称为“渝三科”，行政上受重庆行营领

导，人事、业务则受南京特务处指挥。渝三科称南京特务处为“总处”，戴笠在渝三科只是挂名，一般坐镇总处遥控。这时三科的主要任务是先发展川、康两省地方组织，然后云、贵。陈绍平外出时，三科工作由督察叶道信代理。

渝组组长颜齐，一面扩大组织，一面逐步转移工作重心。过去是用主要的力量对付刘湘，现在则把力量转移来对付中共及其领导的进步团体和群众。如吴玉章一九三八年到渝后，应酬频繁，各方延请讲演，很受欢迎。渝组对此一一向南京总处作了汇报。

抗战爆发后，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病死汉口，结束了他对四川的统治。

国民党在重庆党的组织当时叫“党务指导委员会”，以龙文治、尹静夫、毛嘉谋、黄应乾等人为首，其中尹、黄原属刘湘集团，后来转向蒋介石的。重庆警察局长王秉璋原为刘湘下属某师参谋长，由万县警备司令任上调来的。李根固的宪兵司令部也起了变化，如何做好这些人的工作，是渝组的任务之一。

此时，渝组组长已改由蒲凤鸣担任，工作的重点是搜集从上海、武汉迁来内地的大批进步文艺团体人员的政治面貌、活动情况等。蒲凤鸣以中央势力为后盾，向警察局长王秉璋施加压力，进而控制了警察局所属的侦缉队。

重庆警察局侦缉队原本是搞刑事案件的，到了渝组手中，就成为以刑事警察为掩护的特工组织，原队长张培根也被迫辞职。侦缉队本身扩充为大队，下设三个分队，除启用旧有人员外，另派了一部分军统人员和蒲凤鸣在袍哥中的“兄弟伙”。对于原侦缉队中较有能力的人，则分批送到军统训练班受训，加以培养。

蒲凤鸣在渝工作多年，一向以袍哥为掩护。重庆袍哥头子石

孝先与蒲均为黄埔同学，把蒲抬出来当“大爷”。蒲凤鸣当了侦缉大队队长后，名气更加响亮。因为侦缉队队员全是袍哥，军统在重庆能站住脚，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这帮社会力量的支持。据统计，解放前在重庆的汉流袍哥（不包括青、洪帮）共有五百四十七个公口(即组织单位)，人员约有九万二千六百多人，足见其势力之大。

渝组的实际负责人为杨蜀农，他和蒲凤鸣利用侦缉大队的牌子合法地掩护了渝组，又成功地使其成为渝组的行动机构，从而创造了一套公开与秘密相配合的工作方法。

到渝组活动的后期，当初最先潜入重庆任组员的一批人都先后分布到各地担任了组长以上职务。渝组新来的成员，一部分是军统早期训练班派来的学生，一部分是在渝多年参加军统外围工作，立下功劳而被吸收进来的。

陪都时期的“渝特区”

抗战爆发后，因复兴社不利于联合抗日，被迫取销。此时，以贺衷寒为首的政工系统，以康泽为首的别动队系统，以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工系统，趁机大肆发展其组织。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蒋介石自任团长，康泽任组织处长，别动队原班人马全部转入三青团工作。贺衷寒则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秘书和厅长，原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全部由复兴社特务处取而代之，这就是“军统”简称和缩写的开始。此时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一个调查统计局(即陈立夫领导的特工组织)，简称为“中统”，均在这个时期问世。军统与中统性质相同，一属军，一属党，均为蒋介石的统治忠实服务，与明代的“东厂”、“西厂”颇有相似之处。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继从武汉迁入重庆。军统本部人员于八月份大部到渝，由蒲凤鸣在市中区江家巷找到几间房子开始办公，后来才在罗家湾建立大本营（即军统局局本部）。此后又在歌乐山下缫丝场建立训练班和关押囚犯的看守所，对外叫“军委会乡下办事处”。

军委会迁入重庆在金紫门行营所在地办公。重庆行营撤销，改设川康行营、西昌行营。军委会办公厅内仍然设有调查科，由军统派人负责。

一、“渝特区”的由来

特务处时代和军统初期，在南京地区的组织是“南京特区”（简称“京特区”）。所谓“特”，就是组织编制要大一些。重庆成为陪都后，按照首都级编制设立了“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此时军统在各地均设区的编制，如川康区、上海区、华北区、西北区等，它们都是军统局本部的直属机构。

渝特区是保密的，连军委会办公厅都不知道这个组织，在警察局上户口时也是以其它种种机构的名义为掩护。它的第一个掩护机构是“军委会办公厅调查科”，渝特区的区长就是当然的科长。这个科的编制不大，渝特区的内勤再加渝组人员的编制均在内，如果超过这个编制，所有开支便由军统局本部承担。

在渝特区先后担任过区长的人有朱啸谷、何龙庆、廖公劭、姜绍模、涂寿眉等人。此后姜绍模又一度出任过区长，最后一任区长是叶翔之。

廖公劭是渝特区早期的区长之一，他是上海敌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的重要骨干，担任过敌伪政治保卫局华南分局局长。廖公劭投靠军统后，戴笠要他出任渝特区区长，专门对付日伪谍报活动进行反间谍工作。

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国共合作出现裂痕，渝特区的工作随之转向对付共产党了。

按照军统局本部第二处（即政治情报处）规定，军统人员在工作时采用了如下专用语：

敌情——指日军方面的情况。

伪——指汉奸，如王克敏、殷汝耕、汪精卫等。

奸——指中共。

左倾文人——指一般进步文化人士。奸嫌——指民盟等组织中的左派人士。

二、姜绍模任区长时的"渝特区"

重庆定为陪都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情况十分复杂。此时，如果仍以军人来担任渝特区区长是不行的，因此军统选定姜绍模出任区长。

姜绍模是戴笠的同乡，过去长期在上海做文教方面的工作，与文教界某些头面人物多少有一面之缘。军统又以涂寿眉为副区长，使渝特区成为政治情报专业机构，针对中共及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左翼文化界人士工作。

姜绍模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基本能达到戴笠的要求，干了两年左右时间。后因上海区的工作遭日伪破坏，戴笠乃派姜去上海重建组织，涂寿眉升任渝特区区长。

涂寿眉亦属黄埔系中的书生人物，难以应付重庆的局面。于是过了一年多，军统又将姜绍模调回渝特区任区长。姜绍模再度出任区长，时间达两年左右。

出于保密的需要，渝特区内部人员是各管一部分，互不往来，每个工作人员很难了解全貌。如渝特区派驻军委会政治部的专员张永权，他的任务是专门监视周恩来和郭沫若。又如李济深

当时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在他主持的“国民党战地党务指导委员会”里容纳了一些进步人士，蒋介石对此很不放心。于是姜绍模又派人钻到李济深身边进行监视。

那时，冯玉祥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重庆秘密组织了一个“利他社”，主要吸收文教卫生界、工商界具有进步倾向的知名人士参加，入社要宣誓，并由冯玉祥亲自主持。姜绍模得知后，派了好几个人参加了“利他社”，其中有青年会的职员和一个艺专的教授，长期对该组织进行监视。

朝鲜人金九搞的“大韩民国政府”（流亡政府）当时也驻在重庆，军统渝特区也派了一个人住在里面，企图通过这个流亡政府来防止朝鲜进步力量插手。

对于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渝特区也作为重要目标进行监视。军统方面委托《漫画列车》画报的发行人王恩忠和中苏文化协会门口“文风书店”的负责人，有意与文化界进步人士打交道，想探听虚实。

总之，这一时期渝特区的工作主要是监视中共及进步文化团体、进步人士。但由于中共的活动很秘密，姜绍模感到困难很多。他在渝特区工作会议上经常说：“作共产党的情报是事倍功半，对于其它党派作情报则是事半功倍。”

由于姜绍模在中共情报方面无大的突破，戴笠对姜有些责难。姜绍模因而灰心丧气，常与他的同乡及处一级的人员打麻将，借此消磨时光，表示不想干了。其实，姜绍模是想通过这些人向戴笠反映，另调他职。姜绍模是搞教育出身，想谋一个省、市教育厅长、局长职务。但戴笠一直不放姜走，把他留在军统内。姜绍模在大陆解放前夕去了台湾。

姜绍模时期渝特区的组织机构如下：

区长　姜绍模

副区长　涂寿眉（后为马镇国）

督察或联络、指导员　黄逸公

书记　杜显达（主管业务，为第三把手）

第一股（人事）股长　皮世修

第二股（情报）股长　张　曼（张容之）

第三股（事务）股长　蓝　翔

第四股（会计）股长　王瑞麟　龚尔瞻

以上为内勤组织。外勤在重庆市内原为一个“渝组”，后来随着陪都的设立及地区的扩大，新添了沙磁区组、南岸区组、江北区组、北碚区组。在姜绍模后期，还在万县、泸县设站，并在每个专区的县设县组。

渝组建制人员保持在十五至十八人之内。蒲凤鸣病死后，由杨蜀农当组长，刘匡时、晏光侯当副组长。杨蜀农调走后由晏光侯任组长，蔡大勋任副组长兼组书记。

沙磁区组主要搞工运和学运，组长文济民、汪道生都是军统临训班学生。

南岸区组组长田光灿，时任南岸区警察分局局长。

江北区组组长李武勋，主要依靠江北区警察分局局长毕孔殷来掩护工作。

北碚区组组长夏纯、薛明澄，主要搞学运。

渝特区设有三个专业组：

一为经济情报组，组长方圆(方登鳌)，以开设安利拍卖行为掩护。

一为特一组，组长沈夕峰，专搞跟踪、监视。

一为监听组，组长陈秉阳，专门窃听电话，检查信件。

这些组在外活动一律保密，在工作时如发生事故被宪兵、警察拘捕时，也不能显示身份，只能要求打一个电话，由组织出面处理。这是军统的纪律和规定。

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越来越多，工厂、学校小规模的风潮此起彼伏。民主进步力量日益发展，“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民主同盟”）等进步社团相继成立，成为一支重要的反蒋力量。

在这政治斗争剧烈变化的形势下，因渝特区原区长姜绍模无所作为，戴笠便将他调升为军统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叶翔之任区长时的“渝特区”

姜绍模所遗之渝特区区长一职，戴笠原拟由王新衡接任。王新衡时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党政情报处）处长，因他深知渝特区工作是吃力不讨好，乃向戴笠推荐他手下的反共科科长叶翔之担任，并把叶提升为第二处副处长。

叶翔之是浙江杭州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为人多智善谋，反映敏捷。他到渝特区后，对人事作了大的调整，提拔了一批年轻得力的人，被称为“少壮派”班子。调整后的渝特区组织机构如下：

区长　叶翔之

副区长　张心慈（兼书记，主管情报业务）

助理书记兼情报股股长　吕世锟

人事股长　文济民

事务股长　杨席珍

督察或联络、指导员　范　炎　刘德文　张德为

对外勤组的人事，叶翔之也作了调整：

渝组组长　李蜀虹，副组长沈阜物、陈作新（此后的组长又换成杨政，副组长刘慎修、谢金等人）。

沙磁区组组长　甘立佐。

南岸区组组长　李武勋。

北碚区组组长　某某某。

叶翔之还加强了川东万县站（包括川北一部分）的工作，原万县站站长胡有为因打死英国人被关押，另派唐伯岳（稽查处处长）兼。泸州站站长由颜齐担任。

渝特区所辖范围包括整个重庆卫戍区，以区属渝组为中心，以郊区各组为内线。川东地区因与湖北交界，川南泸县与川东南地区及贵州交界，川东北达县地区属大巴山范围，渝特区在这个活动半径内与军统川康区平分秋色。

叶翔之特别注意的是专业组，除原有的以外，又增了一个专业组，共为四个。这四个组是：特一组、特二组、特别工作组、专门侦察组。

（一）特一组

这个组是原有的，负责监视、跟踪等任务。叶翔之认为这个组非常重要，在人事上大加充实，自兼组长，吴立生任副组长，并从中美合作所特训班第二期学生中挑选一部分新人参加这个组的工作。

特一组在监视方面分若干点，每点三人。设点的地区有红岩村、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至圣宫文工会办事处（郭沫若城内住处）、和平路管家巷社会大学(主要跟踪李公朴)、上清寺“特园”、林森路平衡法律事务所（主要跟踪沈钧儒、史良)、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德兴里《新华日报》采访部等。

我那时常往市中区民生路，看见在《新华日报》营业部对面

一家皮鞋店楼上有个旧式晒台，这个监视点的小组长徐云龙就在这个楼上监视《新华日报》营业部。

这些监视点每天都要填写《监视日报表》，主要项目有：对象(若干人)、上午活动情况、下午活动情况、对象及来往人的特征、身高和象貌特征。由值班人具名，写明交接班时间，每天上交。

与监视相联系的就是跟踪，当时限于条件没用汽车跟踪，因此必须加强监视网点间的联系。对坐汽车的跟踪对象，则要求在《监视日报表》上详细记下车型和车号。步行跟踪则比较艰苦。

有个叫张仲秋的上海人被派去监视跟踪史良，史良住在枣子岚垭"犹庄"，她每天除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要去林森路平衡法律事务所上班。张仲秋每天步行跟着史良上班、下班，史良在前，张仲秋在后。过去枣子岚垭很僻静，有时路上只有两、三个人，张仲秋的跟踪很快就被史良发觉了，史良一到家便用上海话斥责张仲秋说："吃人民血汗钱，干这种卑鄙勾当！"

张仲秋向叶翔之汇报了这一情况，说自己已暴露，要求换人跟踪。叶翔之却说："不必换，她知道有人跟也好，以后她就不敢随便活动了！"

至于跟踪中共代表团人员则比较困难。有次特一组派人跟踪王炳南，亲眼看见王走进领事巷法国领事馆，等了半夜还不见出来，后来一打听，说王炳南早就走了。对此，叶翔之要手下人搞"三角盯梢法"，以免中途脱梢。

（二）特二组

负责电报、电话窃听及邮电检查，由鲁仲篪和陈秉阳负责，二人均为临训班学生。

电话窃听是在几家重点监视对象的电话线路上接一个听筒，

偷听通话双方的交谈。红岩村、周公馆、文工会等处，均为窃听重点。

直接窃听监视对象的电话，当然是最好的情报资料。例如窃听到郭沫若约好什么时候到周公馆、监听人员便报告叶翔之。叶即查对当天的《监视日报表》记载的郭沫若是否外出，周公馆门口的监视小组有无报告。如核实无误，就交其他小组再进一步了解郭去周公馆的会见内容。

搞窃听在当时是很有价值的情报线索，但也闹过很多笑话，某些窃听者因为缺乏常识，对一些对象往往弄得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有时在电话上听走了音，搞得满城风雨，庸人自扰。

检查邮件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工作方法，可以从中发现地下党或某些进步人士的活动线索。解放前夕被杨森杀害的杨汉秀烈士，她在抗战时期就有一些从外地寄到重庆的信件，被渝特区的邮检组扣下。

特一组、特二组相互配合，是当时渝特区对付中共地下活动的主要力量

（三） 特别工作组

这个组是叶翔之增设的，由于它比其它组更加保密，军统内部均称它是“特别而又特别的特别组”。该组的情报直接交叶翔之，该组的开支连会计股也不能审查。特工组组长由挂上校衔的袁晓轩担任，他的老婆是唯一的内勤。

袁晓轩原系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叛变后投靠军统。袁是东北人，他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一些东北籍的民主进步人士。

（四） 专门侦查组

这个组也是叶翔之增设的，任务就是在某一案件接近于成熟后，交给这个组进一步侦查，以便迅速破案。该组在白象街成立

办公处，由破案能手汤百勋任组长。但这个组没搞好几个月，便因日本投降而终止了活动。

四、军统设立的其它组织机构

早在姜绍模时期，戴笠便依据临时出现的某些问题的需要，由军统局局本部直接设了几个组，这些组与渝特区没有上下关系。

（一） 经济情报组

一九四〇年成都发生春荒暴动，民众群起抢粮，使戴笠深感经济情报是军统的薄弱环节。于是，他除了在局本部设经济研究室外，又专门在重庆设立了经济情报组，由他直接领导。由沈夕峰任组长，派渝特区经济组组长方圆任副组长，谢金为内勤文书。组员有王芷园（以卖香烟、百货生意为掩护）等人。童永生（以棉纱生意为掩护）、沈夕峰本人以开设天一保险公司为掩护。

戴笠还叫沈夕峰在市中区开两家“裕民米店”，把军统局本部仓库存米都拿来供应市面。戴笠认为这样可以平抑粮价，不至于在蒋介石鼻子下面发生抢米风潮。

经济情报组设在五四路口的留俄同学会内，直到抗战胜利才撤销。

（二） 外事侦查组

由吴毅生任组长，主要监视驻渝的外国大使馆、领事馆、新闻机构、商务代表团以及外国侨民的活动。同时又想法在上述机构内安插“内线”，由戴笠直接指挥。

（三） 特侦工作组

由倪超凡任组长，直属戴笠领导，中心工作是搞高级情报，实际上是因人设事。叶翔之当区长后予以撤销，人员併入稽查处侦查大队。

以上三组原未与渝特区发生联系，叶翔之上台后，才与渝特区挂钩。这样便使叶翔之的情报网铺得更开，互相支援，互相配合。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搞了一个“党政军联席会报”，参加这个会报的有中央和重庆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还有军统、中统的负责人。叶翔之以军委会办公厅调查科科长身份担任会议秘书部门的实际工作。

（四） 特别工作组

每逢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军统还要设立临时性的特别工作组，组长由戴笠兼，以便调动所有军统内外勤、公密机构人员投入这一活动。副组长过去均由二处处长王新衡担任，叶翔之当渝特区区长后，便由叶任副组长，具体负责。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的临时议会组织，参政员中除有国民党内部各派人员外，还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所以每次参政会开会，军统格外忙碌，主要是为蒋介石提供会议情况。

旧政协开会期间，军统也设立了特别工作组，由叶翔之具体负责，叶还在大会秘书处担任秘书，主要搞会内情报。

旧政协开会期间，叶翔之要求渝特区人员搜集的会外情报的主要项目有：中共与民盟的交往活动；民社、青年两党被蒋介石收买后的活动情况与反映；进步社团对旧政协的反映；会外出现的一批小党派的活动。

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后，在重庆地区成立的各种各样小党派犹如雨后春笋，且活动频繁。这些新出现的小党派是：

中国农民自由党　党魁何某

中国农民党　党魁董时进

中国国民自由党　党魁林东海

中国人民党　中央秘书长马义

中国民主党　中央秘书长侯野君

中华民主党　秘书长吕无畏

中国少年劳动党　负责人安若定

中国忠义党　负责人谭备三

甚至连重庆的袍哥大爷石孝先也计划建党。这些小党派的情况仍属军统重视的对象，渝特区渝组为此组织了一个“周报联合会”，以陈孝威为理事，将这些小党派办的机关报一一拉进这个联合会内。当时重庆的日报就有十几家，呈饱和状态，只有办周报可获准登记。这些小党派办的周报有《民主周报》、《民权周报》、《人民周报》、《现代农民》、《社会周报》等。虽热闹一时，但因蒋介石很快撕毁旧政协协议，这些小党派也由此昙花一现，停止活动了。

五、“渝特区”的其它活动

为了作好意识形态的工作，与轰轰烈烈的“雾季大演出”唱对台戏，戴笠同意王新衡、叶翔之的建议，从文艺方面着手，为军统的形象张目。他们通过一些文人之手，先后拍过《血溅樱花》、《警魂歌》两部电影，公开放映。而最突出的是泡制了话剧《野玫瑰》。

《野玫瑰》是根据戴笠口述的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它把军统在敌伪占领区一次失败的活动写成成功的活动，剧中女主人公以毛人凤的第二个夫人向影心为模特儿。原来，向影心曾被派到某大汉奸身边当内线，结果身份暴露，一事无成跑回重庆。

《野玫瑰》一出笼，就受到重庆剧坛的指责。但国民党中宣部却给予奖励，三青团和军队政工部门发动所属剧团四处演出，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吴树勋还亲自导演，使尽全身解数，仍为陪

都进步剧团和观众所不齿。

军统派到四川江安剧校去学习的女特务朱玉巩回到重庆，主演过《柳暗花明》。军统还用重金请人写过一出只能在军统内部演出的剧本，名为《清白世家》。戴笠自称军统为大家庭，大肆吹嘘其“清白家风”。

从一九四三年到抗战胜利前，渝特区也搞了几件抗日的反间谍案件。我知道一件是成功的，另一件是闹了笑话的。

一九三三年初，渝特区侦察到由安徽蚌埠来重庆的商人赵忠绥（天津人，天津文汇中学学生）系敌伪派来的间谍，便在大梁子新都招待所将其逮捕，随后枪决。

另外一起是由渝组组员汪荣超侦察到一个和尚，宣传的一套近乎“汉奸理论”，对问题还未弄清就提前逮捕。当时军统的“四一大会”即将举行，叶翔之将此案作为大会献礼。结果这个和尚坚不承认，又无实证，只好把他送出重庆了事。

抗战期间，戴笠在重庆搞过几个贪污案，原因是国民党内部有人对他不满。戴笠为了杀鸡吓猴，排除异己，通过这几件贪污案大作文章，以此来美化自己的形象，讨得蒋介石的欢心。

这些案件中最轰动一时的是中央银行运输处处长林世良贪污案。此事起因于孔祥熙与宋子文的矛盾。孔祥熙为人吝啬，戴笠向他要钱未能到手，而宋子文则处处满足戴的要求。于是，戴笠乃对孔祥熙的重要骨干林世良下手，抓住把柄后即上报死刑，但蒋介石迟迟不批。戴笠乃有意泄露消息，各报争相发表，尤以《商务日报》抨击最烈。戴拿着报纸找蒋介石说舆论沸腾，难平民愤，蒋介石才下令枪决林世良。

另一件是杨全宇贪污案。杨囤积大米被重庆邮检组发觉，证据确凿被抓。杨全宇时任成都市长，是陈公博的旧属，没去投降

日本。但蒋介石认为杨不是嫡系，既然碰上戴笠的刀口，也批准枪决了。

还有一件是兵役署长程泽润案。程泽润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西安事变后蒋、何结怨，蒋介石随时都想削弱何应钦的实力。适军统得知程有褒何贬蒋的言论，蒋介石听了很是忌恨，派军统深入调查。以后就演出了一场蒋介石亲赴兵役署察看新兵转运站，怒打程泽润，以至将其枪决的闹剧。程泽润之死，有人为之惋惜。

此外还有直接税局高秉坊贪污案。

以上案件除杨全宇一案外，都发生在叶翔之主持渝特区时期。

渝特区在抗战期间隐蔽较好，有多层的庇护机构，是一个纯以情报为业务的机关。按照军统局的规定，情报活动一律使用化名，局本部、区、组均各有化名，局本部各处亦各有化名，一见化名便知来的是何种业务。戴笠本人下达指示也用化名，他在重庆局本部办公室就曾用“金水”的化名，外出则用“马行健”的化名，下边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戴笠的指示。

渝特区的化名还分为单日用、双日用两种，共有十多个化名，每月轮换一次。我记得的化名就是：江挽澜、海涛、许剑锋、汪振声、江克难、叶镇宇、薛品尧、郑浩然、吴平涛、钟敬慈等。这些化名多半是围绕“金水”二字在变化。上报情报时，渝组有规定的表格，原报人均用化名。情报类别、来源人等项必须写清楚，从来源人即可判定情报的可靠程度。

区下达给组及各组下达给每个情报员的指令，一律是用私函形式，上下款都是化名。所以只有内部的人才能看懂，外人不易察觉，这样便于保密。

稽查处、警察局及其它公开机构

军统掌握了一些公开机构，有的是戴笠先前就控制或建立起来的，有的是中途夺过来的。军统活动历来就有公开和秘密的两套班子，并有一条原则：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早期的渝组控制了侦缉队，又用侦缉队来掩护渝组的活动，便是公秘配合在重庆活动的刍型。

以后情况不同了，大批的公开机关被戴笠控制在手中。渝特区在重庆控制的公开机构有：

（一） 重庆市警察局

国民政府尚未迁川前，军统渝组即已控制了重庆市警察局的侦缉队，并使其骨干军统化了。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政府迁渝但尚未将重庆定为陪都前，军统便开始设法控制重庆市警察局。其时刘湘虽让出重庆，但他在重庆的残留力量仍然很大，市长李宏锟就是刘湘系统的人，不过这些人已倾向国民党中央势力。重庆市警察局长王秉璋是刘湘临走时委派的，他与刘还保持着一定关系。

军统迁渝后，把南京内政部第一警察总队开到重庆，驻扎在歌乐山一带。后来警总要求扩大管辖区，竟至形成在一个市内有两个不同系统的警察局分庭抗礼的局面。那时重庆市尚属四川省管辖，此事闹到省主席王缵绪那里亦无法解决，因王即不敢得罪蒋介石，也畏惧地方实力派。直到重庆定为陪都后，提高了警察局的规格，军统方面才利用这个机会调走了王秉璋，由徐中齐接任局长一职。推荐徐中齐的原因，一是当时戴笠还拿不出象样的人选，二是戴本人在黄埔系的资历低，还想取得头几届老同学的支持。

徐中齐为四川叙永人，黄埔五期，奥地利维也纳警校毕业生，一九三八年底前后出任重庆警察局局长。军统另派东方白为徐的助手，因那时没有副局长的建制，东方白任局长帮办兼督察处长（当时警察局只设有这一个处，其它均为科）。

王秉璋当局长时，复兴社便打进去了一些人，又拉出来一些人。徐中齐当局长后，居然撇开了复兴社的人，对各方面的关系亦搞得不好，最后被调走，由成都市警察局长唐毅接替了徐的职务。军统在警察局内部以东方白为首的原班人马不动，并增加了一些力量。

唐毅原是刘湘手下的谍报股长提升起来的，法政学堂毕业，会写文章。他曾向蒋介石写过一份长报告，将四川每个军阀的言论、态度、对蒋介石的忠实情况与不利行为一一作了汇报，并提出了一些如何加强对四川的控制的建议，颇为蒋所重视。

在调走徐中齐时，戴笠竭力提名唐毅。唐毅并非黄埔系，所以多次向戴申请要求加入军统，戴说："你已经是军统了，还参加什么？"唐毅多次主动参加军统局本部星期一举行的纪念周，听戴笠讲话，积极向戴靠拢。而戴之所以不让唐正式参加军统是恐怕得罪黄埔同学，唐毅因之自称是"半个军统"。

后来因黄埔同学反对，唐毅亦被撤职，换上的又是徐中齐。因徐中齐上台后不大听戴笠的话，军统又以徐伙同连襟曾英贪污而将徐撤职，再次换上唐毅。

从一九三八年徐中齐当上重庆警察局长，到一九四六年这八年时间中，不论是徐中齐或唐毅当局长，东方白这个实权派总是稳坐泰山。抗战胜利后东方白调升贵阳警察局长，他所遗督察处长一职由军统指定梁尔恭（原行政科长）担任。

抗战期间重庆市警察局虽然没有全部为军统所掌握，但因警

察局在行政上属市政府领导，军统便把它作为一个情报组对待，定名为“渝警组”，组长东方白。警察局有责任对渝特区的活动进行掩护，按渝特区的要求每月汇报情况，并规定了情报数字。这条线一直拉到下面，它采用的情报组织番号是“渝校第一教室”至二十多个“教室”，每个分局为一个“教室”，十八个分局为十八个“教室”，再加上侦缉大队、警训所等等，共计二十多个。对这些“教室”都要下达情报指标，上交督察处，并在督察处设了一个调查股来承办具体事务。

警察局的侦缉大队由于早就与渝组关系密切，它除掩护渝组外，也被编为一个“教室”，这个大队的队长人选由军统指派。

渝特区成立后，侦缉大队在警察局领导下的主要业务是搞偷盗等刑事犯罪为主。一九四五年初重庆发生一件血案，闹得满城风雨，缘由中韩文化协会餐厅违章用电，电力公司用户科派工人胡世合等前往断电。该餐厅部经理多次阻挠，并辱骂和毒打电力工人，餐厅交际经理田凯竟开枪打死了胡世合。

田凯是重庆有名的流氓，在较场口被人称为“九幺十八凯”的打手，原为刘湘手下李根固的谍报员，在义字袍哥充三排。田凯又是侦缉大队一队队长何玉崑的拜把兄弟，并在侦缉队当“编外队员”。但田凯在堂堂陪都开枪杀人，自然为社会所不容，一时民怨沸腾，罢工罢课迭起。何玉崑叫田凯逃离市中区暂避风头，并由义字袍哥大爷冯什竹出面要求唐毅保护田凯不抵命。但市长贺耀组却认为不杀凶手难平民愤。

此时戴笠得到渝特区关于胡世合事件的详细报告，他迫于舆论压力，同时又考虑到田凯并非军统“同志”，又非侦缉大队正式队员，竟持枪横行，恐被误会为军统人员所为。因此，戴笠立即在叶翔之送来的书面报告上批了：“逮捕归案，依法惩办。”八

个大字。

叶翔之拿到批示后，令何玉崑交出田凯，与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会商后，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审判，将田凯枪决。

贺耀组及电力公司等单位对胡世合事件做了善后处理，召开了追悼会，并对其家属进行抚恤。胡世合的追悼会成了一个针对军统的控诉会，对联很多，场面很大，使军统感到很为难堪。不久，军统将何玉崑关押并解除其职务。

（二） 军事委员会特检处

主要业务是航检、邮检、电检、电监等，几经变迁才完全军统化，该处首任处长朱世明、末任处长李肖白均为军统分子。该处后来为了搞“机关侦防”添设了几个外勤侦防联络站，除了在邮电检查方面和侦防任务外外，它也要向渝特区上交情报。所以这个处除其本身业务直属上一级军事行政单位外，同时也是渝特区的一个情报组。

（三） 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稽查处

该处在戴笠的计划中既是掩护地方军统秘密单位，又是军统在地方的合法行动机构。除了个别地方，四川各地都是如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各地的“示范处”，最早成立，是由戴笠一手筹划起来的。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成立后，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在总部之下的两个单位实行系统化。一个是政工部门，由贺衷寒的政工系统派人担任；一个是稽查处，由戴笠的军统系统派人担任。

重庆的稽查处设在市中区石灰市。当时虽有一些市民知道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但对军统局本部所在地“濑庐”并不清楚。因该处大门朝罗家湾，后门朝大马路，都没挂招牌，后门进出车子多，人称“军委会停车场”。渝特区更不易为一般人所知。但人

们都知道稽查处的大名，一听“石灰市”就毛骨悚然。

抗战期间稽查处机构庞大，卫戍总司令部下达编制八十余名，实际超编一倍，超编者由军统局本部发粮饷。稽查处下面有个特务队，专门吸收“跑二排”的，大都是社会上的流氓和地痞。田凯便是这类人物的典型。

稽查处设正、副处长各一名，正、副督察长各一人，办公室秘书一人。下设三至五个科、二至三个外勤组，主要是社会侦察组和党政情报组。另有一个侦察大队（下设分队），一个特务队，特务队的任务主要是搞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稽查处在小龙坎、青木关、一品场、朝天门等地设了几个大所，大所之下又有分驻所（又叫哨）。在江津、綦江、涪陵、合川等地也设有所，并在水陆交通要道都设有关卡。

先后任过稽查处长的人有赵世端、廖公劭、陶一珊、何龙庆等人，赵世端任期最长。先后任过党政情报组组长的人有肖志坚、刘骏民、雷禾村等。

稽查处是渝特区的主要掩护机构和行动机构，渝特区分析情报后认为应该采取行动的，就由稽查处执行。稽查处经手的几桩主要案件如下：

逮捕马寅初。马寅初是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多次发表演说抨击“四大家族”。蒋介石下令逮捕，由稽查处行动，关押在息烽集中营，后释放。

逮捕骆宾基。骆宾基是著名进步作家，丰都适存女中教员。一九四五年元月，骆及另一同事由丰都乘船到重庆，该地稽查所认为他们要跑，就在船上将他二人及送行者全部逮捕。后经孙伏园（时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王亚明等人营救获释。

此外还有搜查黄炎培和《国讯》杂志社等。

戴笠是以暗杀和绑架起家的，但在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有所收敛。他在重庆枪杀罗世文、车耀先，在息烽枪杀张露萍等都是秘密搞的，公开抓人杀人很少。但他在陪都之外就不一样了，如在江津、荣昌大抓进步人士，连陈独秀也成为监视对象。

三十年代在上海被选为“电影皇后”的胡蝶由香港逃至桂林时，中途失落了行李，认为是杨惠敏所为，到渝后即向戴笠哭诉。戴笠为了讨好胡蝶，不问清红皂白下令稽查处密捕杨惠敏，又把杨关在渣滓洞看守所，拖了几年也不闻不问。杨惠敏其人，即淞沪战事中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献旗的女童子军，不明不白吃了几年官司。

当时重庆《南京晚报》得知此一“花边新闻”，即在二栏刊出。殊知次晨即有几名带枪的彪形大汉（其中一人是稽查处分队长周定元）上门质问该报发行人张友鹤，闹得鸡飞狗跳方才罢休。

（四） 兵工警务处

主要负责各兵工厂的警卫和稽查，每厂设一个警稽组。处长张师以后为廖宗泽。

（五） 航空委员会政治调查科

航委会政治部主任系军统派简朴担任，故在部下设有调查科，与渝特区联系。

（六） 交通巡查处

处长张炎元。

（七） 五区公路警稽组

组长陈旭东。

（八） 特别警卫组

专门负责蒋介石安全，兼搞情报活动。

（九） 中训团警卫组

组长王兆槐。

（十） 人民动员委员会办公室

下设情报股，由秘书长金玉波负责。

以上这些公开机构，基本上都是双线领导，渝特区只要情报。按军统规定，凡是军统人员不论职务高低、干何工作，都要为情报工作出力，并接受当地秘密单位领导。重庆当时是陪都，公开机构多，但不管行政上级是谁，均要与渝特区秘密挂钩，递送情报。

渝特区对本单位专业情报人员下达的情报定额很高，每人每月二十条以上。一般公开机关组也要求人平十条。军统每年要搞情报竞赛，渝特区以单位得过第一名，个人取前十名，叶翔之得过个人第二名。

结束语

抗战期间蒋介石有个规定，只有各地卫戍总司令部（地方为警备司令部）才能发“传票”，同时指定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下的稽查处为合法逮捕机构（法院、警察局只能对民事案件行使逮捕权）。这样一来军统大权在握，与中统经常发生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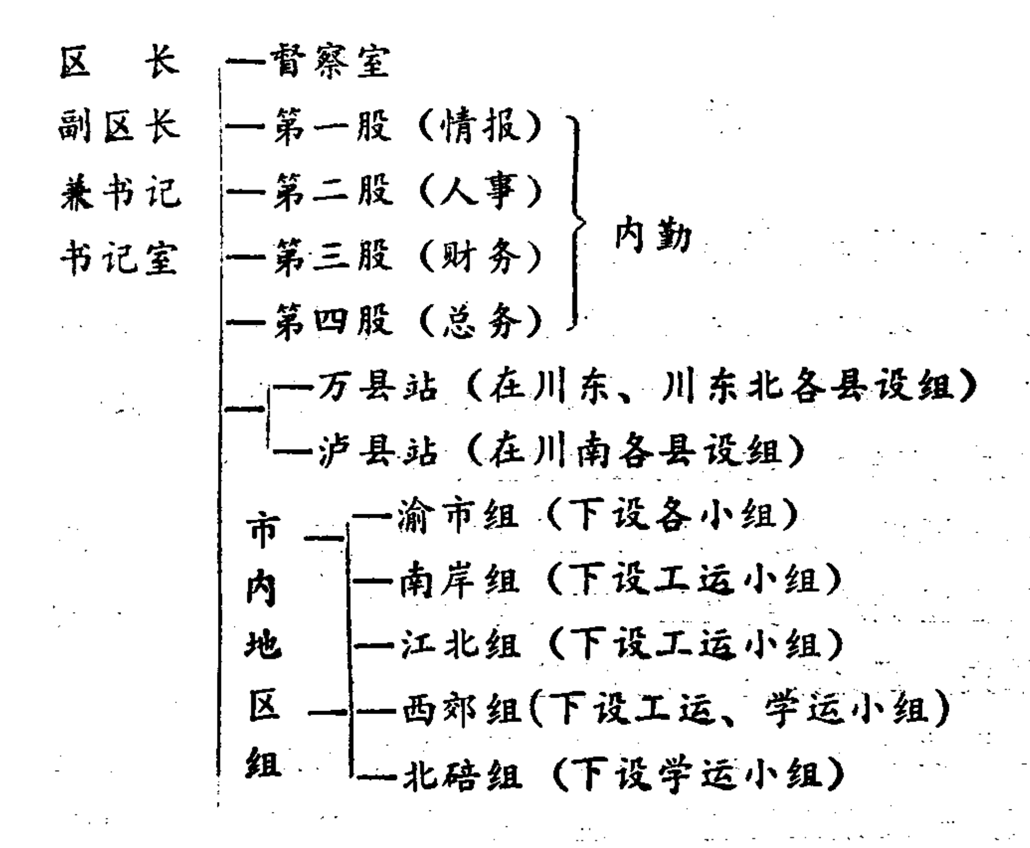
按规定中统不能捕人，但中统人员均有持枪工作证，因此照样抓人。中统在重庆的“实验区”下设有行动科，后台老板又是陈立夫、陈果夫，因此戴笠多少要礼让几分。

当时要进行政治性逮捕，必经蒋介石同意才能行动。但有些逮捕蒋不知道，一问戴笠也说不知道，便认为是中统干的，但中

统也不认帐，使戴笠感到难处。后来弄了一个会报，结果也解决不了。军统认为这是中统故意制造事端，因为社会上一有人失踪，民众都把眼睛盯着军统，算在军统的帐上。费巩教授失踪后，渝特区及稽查处都曾派人侦察寻找，军统没有干，中统也不承认。据军统贵州站的情报说，费巩教授赴渝时，有中统行动人员跟踪随行。以后又问中统，中统仍然否认。窥此一斑，可见军统、中统一直勾心斗角。

此外，抗战期间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还有宪兵特高组和侦缉队；卫戍总司令部的“第三组”；第一区警备司令部的谍报股。这些组织是各行其事的，它们活动范围较小，因为不在军统范围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渝特区组织机构示意图



- 渝特区联系的直属军统的秘密组
  - 特别组
    - 特一组（监视跟踪）
    - 特二组（邮检窃听）
    - 特侦组（专案工作）
    - 特别工作组(内线工作)
  - 公开单位的情报组
    - 重庆市警察局
    - 重庆市侦缉大队
    -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
    - 兵工署警务处
    - 特检处
    - 缉私处
    - 禁烟督察处密查组
    - 水陆交检处
    - 航委会政治部调查科
    - 貨运局
    - 内一警
    - 特警组
    - 公路局警稽组
    - 特务团
    - 人民动员委员会办公室
  - 经济情报组
  - 特别侦察组
  - 外事侦察组

重庆抗战大事记

肖 用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了回顾重庆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研究重庆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学术界提供资料和线索，我们编撰了《重庆抗战大事记》。

因为历史学界和党史学界已经出版、发表过反映抗日战争全貌的《中国现代史大事记》（抗日战争部分)、《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抗日战争部分）、《抗日战争大事记》，以及即将出版的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活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所以，《重庆抗战大事记》以国民政府及其重庆地方政府的活动为主要线索，适当兼及其它方面，以免重复。

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方面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三五年

一月十二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由主任贺国光率领，到达重庆。

二月十日 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主席刘湘，委员甘绩镛、刘航琛、郭昌明、杨全宇、邓汉祥、谢培筠，民政厅

长甘绩镛、教育厅长杨全宇、财政厅长刘航琛、建设厅长郭昌明，秘书长邓汉祥。

二月十五日 中央银行四川分行成立。

三月一日 四川省政府宣布，从本日起，川中各军月饷，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收统支。这是为打破防区制，整理四川财政采取的重大步骤。此前省政府已督令各军交还防区内的行政和财政。

三月二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由汉口首次飞抵重庆。三月四日他宣称："四川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

三月五日 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立。这是国民政府为统一四川金融币制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三月六日 蒋介石致电四川省主席刘湘，嘉勉川政统一完成

三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由重庆赴贵阳、昆明、成都、峨嵋，四月十日返回南京。

六月十五日 川黔公路正式通车。

六月二十四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张必果任重庆市长。

七月九日 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往成都，十三日正式办公。

八月 国民政府责令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整编川军。由参谋团组设点验委员会，分赴四川各军点验。在此基础上，按全国陆军番号，将川军整编为陆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第二十二军（军长王缵绪）、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新编第六师（师长李家钰，旋扩编为第四十七军），共六个军一个师。

参谋团成立川黔公路监理处，开发四川交通。

十月三日 奉国民政府之命，参谋团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下简称"重庆行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次年三

月，贺国光升任副主任，代行主任职责。

一九三六年

重庆行营成立江防要塞建筑委员会，分别建筑宜昌、重庆间要塞。

三月十三日 重庆市公安局发表全市人口统计：全市共有七四，三九八户，三三九，二〇四人，其中男性为一九五，七二〇人，女性一四三，四八四人。

四月十一日 重庆市长张必果病死，四川省政府任命李宏锟代理。

六月十日 成渝铁路工程局移渝办公。

一九三七年

三月二十一日 成渝铁路正式开工。

四月十四日 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奉命到成都与刘湘会谈，要求川军让出重庆，停筑防御工事；十六日，刘湘接受；随后刘湘军撤出，中央军进驻重庆。

六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电重庆行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设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以再次整顿川军。该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主任委员，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第六路军总司令刘湘为副主任委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唐式遵、杨森、潘文华、王缵绪、孙震、李家钰、范绍增、向传义、董宋珩、郭勋祺、许绍宗、张邦本、徐源泉、夏斗寅、李蕴珩、嗣浑元为委员，大体网罗了川康军队高级将领。

七月六日 何应钦在重庆行营大礼堂主持川康整军会议开幕

式。根据会议精神，川康各军于八月十日以前整编完成，计有：

(一)川康绥靖主任直辖部队(辖三军、两独立师、七独立旅)；(二)二十四军；(三)四十一军；(四)四十五军；(五)四十七军。

七月七日 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芦沟桥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成立专门机构，组织沿海沿江工矿企业内迁工作。

七月 四川省政府拟订《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

七月十日 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刘湘电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各省市军政长官，请缨抗战，主张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共赴国难。

八月一日 日本驻渝领事槽各连二率驻渝日侨二十余人离开重庆。

八月四日 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电呈国民政府，请速颁布抗敌令，并厚恤华北抗敌阵亡将士遗族。

八月二十六日 刘湘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大家集中精力，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为民族抗战而效命。

九月一日 川军出川抗战部队分东北两路同时出发。抗战时期，川军先后调入抗日前线共有六个集团军及部份独立师旅，约占国民政府抗战兵力五分之一。此外，还调出二百五十七万壮丁参战。一九三八年九月，四川各界集会，定“九一”为川军参战永久纪念日。

同时，重庆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重庆行营委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为重庆防空司令。

九月十五日 川军出川抗战本年共需四八〇万元，计由中央、中国银行借到二百万元，重庆金融界绅商垫支二八〇万元。

十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题为《国府迁渝

与抗战前途》的讲话。

十月 四川省政府颁布《四川省抗战时期中心工作提要》。

十月十八日 重庆市江巴两县各界民众在夫子池举行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

十一月九日 刘湘奉命离开成都赴南京，请示抗战事宜等。后转至汉口，病重住院。

十一月十六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登永丰舰，次日启碇西上。到宜昌后，换乘民生公司民风轮，继续上驶。

十一月二十日 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代表全川民众竭诚欢迎。

十一月二十五日 国民政府以重庆高级工业中学（大溪沟学田湾）为驻渝府址，改建完成。

十一月二十六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达重庆。重庆军政当局及各界代表十余万人前往码头热烈欢迎，盛况空前。

十二月一日 国民政府在重庆大溪沟新址开始办公。

十二月七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迁渝后的首次执监委员、常务委员联席会议。

十二月 四川省主席刘湘、建设厅长何北衡、工业专家胡光镳先后到达汉口，向愿意迁川的各厂矿企业解说四川资源、设厂环境，以及四川急需的工矿行业。

一九三八年

一月一日 国民政府改组行政院，蒋介石辞行政院长兼职，孔祥熙、张群继任正副院长。

一月三日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重庆忠烈祠公祭四川先烈。

一月　四川省政府决定：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由重庆市市长、江北县县长、巴县县长、重庆市商会会长、省建设厅驻渝代表、建筑专家、工业专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代表组成。规定：凡迁川工厂厂址地印契一律免收附加税三成(后减收五成)，并协力解决运输问题。

一月十六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一月二十日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在汉口病逝。二十二日，国民政府任命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兼任四川省主席。张未到职前，由王缵绪代理。

一月二十八日　由于刘湘逝世，川军动荡，蒋介石电川军将领及重庆行营，予以慰抚。并相继特予安顿刘湘直辖将领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以及其他川军将领。

二月四日　刘湘灵榇运抵重庆。九日移送成都。十四日，国民政府追赠刘湘为陆军一级上将，明令国葬。

三月四日　川康绥靖公署改组。国民政府任命邓锡侯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任副主任。另任刘文辉为重庆行营副主任。

三月二十三日　台儿庄战役开始。四月六日，战役结束，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

四月一日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闭幕。会议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四月十七日　迁川工矿厂家在重庆成立迁川工厂联合会，选颜耀秋、庞赞成为正副主任委员。

六月九日　国民党驻武汉党政军机关开始撤退。党政机关移往重庆，军事机关移往湖南。

七月六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

八月一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组四川省政府，接受张群辞职，调任重庆行营主任；王缵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八月二日 重庆举行防空大隧道开工典礼，隧道共分七段，可容四万余人。

八月四日 国民政府驻汉口各行政机关全部迁移重庆。

八月二十二日 日军下令攻占武汉。

九月九日 重庆行营为整理四川财政在重庆举行谈话会。

九月十五日 《中央日报》由长沙迁重庆出版。

十月一日 《扫荡报》重庆版发刊。

十月二十五日 汉口失守。三日之内，武汉三镇全部陷落。

《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同日在重庆出版发行。

十月二十八日 国民参政会迁到重庆后，举行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十月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机房街七十号设立，原联络处撤销。

工矿迁川暂告段落。据统计，迁入四川的工矿企业共计二百四十五家，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川东重庆巴县一带，包括来自上海、汉口、南京、杭州、无锡、香港、青岛、天津、石家庄、郑州、长沙等地的钢铁、机械、电器、化工、纺织、食品等行业。

十月二十八日 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及四川主要军政官员联名电请蒋介石驻节四川。十二月八日，蒋介石于南岳军事会议以后，从桂林飞抵重庆。

十二月十八日 汪精卫自重庆出逃昆明，转往河内，二十九日发表“艳电”，叛国投敌。

一九三九年

一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决议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

一月十日 日本飞机十一架首次轰炸重庆。十五日，日机二十七架再度袭渝，投弹五十八枚，炸毁房屋二十余栋，炸死一二四人，炸伤一六六人。

一月 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书记周恩来，常委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

二月一日 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移渝办公，委员长重庆行营奉命结束，另设委员长行辕于成都、西昌，由贺国光、张笃伦分任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在重庆行营原址办公，张群任秘书长。

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议长蒋介石提议，设立川康建设期成会。期成会成立以后，又组织视察团，于三月底分赴各地视察。

二月二十六日 重庆各界举行献金竞赛。

三月四日 重庆市政府为疏散人口，由社会局发布《告民众书》，敦促公务人员眷属、老弱妇孺、一切不必留在市区之团体、住户、商店、工厂、堆栈仓库，立刻自动疏散。四月十日，成立疏建委员会，着手开辟火巷。

四月二十四日 重庆物价评定委员会成立。

五月一日 根据国民党中央《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国民政府于晚七时在重庆军委会广场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宣誓大会。会后就地举行火把游行。

五月三日、四日 “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五月三日下午一时，日机三十六架飞临重庆上空，投弹百余枚，大梁子、苍坪街、左营街、新丰街、陕西街等地被炸起火，死伤市民近千人。五月四日，日机再度狂轰重庆，炸死市民四，四〇〇余人，炸伤三，一〇〇余人，炸毁房屋一，二〇〇余栋。市民死伤流离，目不忍睹。两日之中，驻渝的英、法、德使领馆均无幸免，人员亦有伤亡。为此，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祺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五日，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救济难民，并统制公私船舶车辆疏散市民，三天之内，共疏散二十五万余人。

五月十二日、二十五日，六月九日、十一日，七月六日，九月三日 日机数度空袭重庆，被中国空军和地面炮火击落六架。

五月五日 国民政府命令：重庆由四川省政府直辖乙种市改为行政院院辖市。

五月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由市内迁至化龙桥龙隐路红岩嘴大有农场。

五月十五日 贺国光就任重庆市长。

五月 因日机连日轰炸重庆，各报出版发行困难，国民党当局下令各报停止单独发行，由十家报纸共出“联合版”。

七月一日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在成都成立。

八月十五日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成立。秘书长龙文治。

同日 重庆香港间无线电话正式通话。

九月九日至十八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重庆举行。川康建设期成会根据《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制成《川康建设方案》，由国民参政会议长兼川康建设期成会会长蒋介石提付大会，决议通过。

九月十九日 由于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战，国

民政府决定，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

九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十月一日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一次大会。议长康心如。

十月三日 蒋介石飞赴成都，兼理四川省政。十五日，发表《告四川同胞书》。十七日，飞返重庆。

十月 国民参政会内的中间党派参政员梁漱溟、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在渝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十一月十二日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重庆举行。

十二月五日 由于重庆市长贺国光另有任用，国民政府任命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二处处长吴国桢继任重庆市长。

十二月二十六日 行政院第四四五次会议决议通过新勘定的重庆新市区地界。

一九四〇年

一月四日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抵达重庆。

四月一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四月二日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召开。

四月二十日 重庆市总工会成立。

五月至十月 日本空军乘四川夏秋两季，晴朗无雾，倾其全部精锐，组成袭川部队，从五月到十月，对四川作长达六个月之久的疲劳轰炸，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目标。

五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 日机五百五十余架次轰炸重庆，炸毁民房四百余栋。日机被中国军队击落击伤六十余架，中方损失十余架。

六月六日、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 日机一，一〇〇

余架次轰炸重庆，炸毁房屋一，〇〇〇余栋，英国总领事馆全部被炸毁。敌机被击落击伤二百余架，中方损失十余架。

六月三十日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通电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轰炸重庆的罪行。

七月一日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在重庆召开。

七月 日机四〇〇余架轰炸重庆。重大等教育文化机关损失惨重。

八月 日机六五〇余架飞袭重庆。二十日，滥炸重庆商业及居民住宅区，市民死伤极其惨重，国民政府特拨赈款一百万元。

九月六日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

九月十七日 行政院决议组织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详细规划重庆建设事宜。

九月 日机四〇〇余架轰炸重庆。十三日，中国飞机三十六架与日本飞机六十六架在重庆上空激烈空战，中方被毁十三架，伤一架，损失惨重。

十月一日 行政院通过《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该会直隶行政院，由孔祥熙任主任委员，周钟嶽、杨庶堪为副主任委员。当日，重庆各界三万余人举行庆祝陪都建立大会，晚上举行火把游行。

十月十五日 重庆各界举行反轰炸大会，发表宣言，声讨日本暴行。

十月二十五日 日机三十三架袭击重庆，炸伤泊于长江南岸的美国军舰杜杜伊拉号和太古轮船公司的万象、万流两轮。次日又轰炸市内贫民棚户区，损失惨重。

十一月十三日 行政院第四九〇次会议决定，接受蒋介石辞去理兼四川省主席一职，任命张群兼任，并任成都行辕主任。

一九四一年

一月十三日 四川省第一次行政会议重庆区会议召开。

二月一日 军政部发布全国各省市防空设施统计情况：重庆市有防空壕十五个，避难室十九个，防空洞六六四个，掩体三十八个，可以容纳二二三，六九五人。

二月九日 奉行政院命令，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定九月六日为重庆陪都建立纪念日。

二月十三日 重庆市政府通知：重庆浮图关已于最近由蒋介石改名“复兴关”，并刻石于关右。

二月十四日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及市政府，奉命疏散市区人口二十万。从三月十四日起执行。

三月一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决定，继续设立川康建设期成会。中共参政员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拒绝出席会议。

三月十九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主席黄炎培。

三月二十五日 全国粮食管理局制定《重庆市食米统购统销办法》。

五月一日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四次大会开幕。

五月 日机六批三百余架次袭渝，集中轰炸重庆市区，炸毁房屋七百余栋，死伤数百人。英法使馆全部炸毁。

六月五日 日本飞机首次夜袭重庆。由于傍晚以后进城人数甚多，加以隧道通风不畅，以至秩序混乱，发生拥挤。当晚，发生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伤数千人。

六月七日 蒋介石下令惩办主管防空人员，将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革职留任。

七月二日 任命贺国光任重庆防空司令。撤销谢元模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职务。

六月 日机一百七十余架次袭击重庆市区，市民死伤损失惨重。美国大使馆全部炸毁。

六月二十五日 国民政府续定重庆市为《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施行区域。

七月 日机五百余架次袭击重庆市区，陪都损失惨重。苏联大使馆部份被炸，美舰图图拉号被炸伤。

夏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重庆成立。

八月八日至十四日 日机数百架次不分昼夜，以不到六小时的间隔，对陪都重庆施行"疲劳轰炸"，市内饮水、灯光全部断绝，人民断炊失眠。

八月三十日 蒋介石在重庆南岸的黄山官邸被炸。适蒋正在其间召开军事会议，房屋部份被毁，卫士伤亡六人。同日，浮图关下的国民大会堂被全部炸毁。

十月一日 重庆各界举行陪都建立周年纪念大会。

十月十四日 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招待中外新闻界人士，报告陪都整建计划。宣布：陪都重庆在抗战时期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后亦将为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因此，陪都建设以贯彻战时和平时两重性为原则。

十一月十六日 纪念郭沫若五十大寿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大会在重庆举行。

十二月八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此后，日本空军因全力对付美国，故对四川重庆的轰炸袭击大为减少。据

统计，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重庆数百次，炸死九，二一八人，炸伤一三，九〇八人，分别占全省被日机炸死炸伤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一和百分之五十三。

十二月九日 国民政府发布文告，正式对日宣战。

十二月十一日 粮食部统计：四川省完成本年度田赋征实定额百分之八十，计九五六万余石。

十二月十二日 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在重庆召开。（前两次在成都召开）

十二月十四日 重庆市举行国际文化团体扩大反侵略大会，拥护国民政府向轴心国宣战。

十二月三十日 "精神堡垒"在重庆都邮街广场竣工。此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等四单位联合建立。全高七丈七尺，共分五层，顶悬国旗及各种标志。

一九四二年

一月一日 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在重庆两浮支路中央图书馆举办第一届陪都建设展览会。

一月十六日 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在重庆成立。

二月一日 川康兴业公司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该公司旨在"吸收民间游资，从事生产，开发矿藏，以利抗战大业"。董事长张群，官股理事顾翊群、卢作孚等十四人，商股董事钱永铭、刘航琛等十二人。另各有官商股监察人六人。三日，董事会、监察人就职，并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

二月十五日 中国第一个滑翔机场在北碚落成。

二月十六日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陈仿先辞职，杨公达继任。

四月三日　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首次在渝公演。

四月四日　中国第一个跳伞塔在重庆两路口落成。

五月一日　国家总动员会议在重庆成立。五日，颁布《国家总动员法》。

六月十四日　重庆各界庆祝“联合国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盛赞重庆“象征中国不屈不挠之意志与决心”，“成为联合国家所为振奋之精神象征”，“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

八月六日　国民政府委员杨庶堪在重庆南岸大石坝寓所逝世。杨庶堪，四川巴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四川省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广东省长等职。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十一月二十二日，杨庶堪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所举行。

九月九日　重庆市举行庆祝首届体育节大会。

十月二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由成都飞抵重庆，受到热烈欢迎。次日，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十一月十七日　四川省主席张群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报告川省施政情况。

十二月八日　国民政府任命贺耀组为重庆市长。免去吴国桢市长职务。十六日，举行交接典礼。

十二月十七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限制物价办法》。

十二月二十日　重庆市社会局令饬重庆盐业、食油、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同业公会，以上民生重要必需品，一律以当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价格为标准，从新议定价格，一星期内呈核，以作正式颁布之依据。

一九四三年

一月十一日　中英、中美新约分别在重庆、伦敦、华盛顿签

字。

二月二十三日 国民政府公布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参议员、候补参议员名单。议长康心如、副议长李奎安。

三月三日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

同日 重庆市政府管制蔬菜市场。

三月十五日 重庆至宝鸡公路通车。

三月十六日 三青团重庆支团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开幕。

三月二十九日 三青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

同日 辛亥“三二九”革命先烈纪念日（黄花岗起义）。上午，重庆各界召开纪念大会，到遗爱祠公祭先烈；下午，在中央公园举行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奠基典礼。

四月十日 重庆昆明间无线电传真开放。

四月十一日 重庆市政府调整限价办法：米煤等八种主要日用品继续限价；其他日用品改为议价；非日用品暂缓议价。凡议价物品，由物价评议会议定，报社会局审核。物价评议会改组，由市商会、工会、参议会、市党部及主要同业公会组成。

四月二十二日 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参议员、候补参议员名单。议长向传义、副议长唐昭明。

五日九日 重庆区专科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开幕。

六月一日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开幕。

七月一日 重庆粮价重新调整，每石米上涨一百四十至二百六十元，面粉亦相应上涨。

七月九日 四川省重庆区行政会议开幕。十三日，蒋介石到会致训词。

七月十五日 杨沧白先生纪念堂由原重庆府中学堂旧址改建完成，次日，举行揭幕典礼。

八月一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山洞双河街官邸逝世。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八月七日　四川各界在成都公祭林森。

八月十三日　重庆银楼业公会评定黄金价格：售出每两一二，四〇〇元，收进一〇，四〇〇元。

八月十四日　重庆市警察局发表户口统计：全市共一五五，五四九户，八八五，四八〇人。其中男性五四八，一五三人，女性三三七，三二七人。

八月二十日　川江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及船员工会联合会在重庆成立。

九月六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开幕。十三日，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十月十日，蒋介石宣誓就职。

十一月四日　重庆市党政联席会议决议筹建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前在中央公园奠基者为总碑，另拟分建邹容、张培爵纪念碑。

十一月七日　重庆布匹、食盐限价。白宽布由每尺一，三五〇元提为二，六五〇元；其他各色布匹另加漂染费用。食盐每斤提为十六点七元。

十一月十七日　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葬于重庆山洞双河街官邸之前。

十一月十八日　蒋介石夫妇离开重庆飞赴开罗与罗斯福、邱吉尔举行开罗会谈。十二月一日，返回重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培爵烈士纪念碑在重庆市炮台街沧白堂外举行奠基礼。当日，炮台街命名为沧白路，新生路命名为邹容路。

十二月三十日　重庆市各界在罗汉寺公祭十一月二十日在桃源战役中牺牲的川军一五〇师师长许国璋。

一九四四年

一月十日　前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烈士公葬典礼在荣昌卧佛寺墓园举行。

二月十日　重庆市黄金价格上涨，，每两售出已达二〇，五〇〇元。

同日　三青团重庆支团部正式成立。该部所辖重庆及川东四十县分团，有团员二六，三〇〇人。

二月二十二日　重庆雾季将过，空袭堪虞，警察局特定从三月一日起，按户劝告市民自动疏散，并定期强制执行。

三月一日　陪都体育场命名典礼在浮图关新建场址举行。体育场包括四百米跑道运动场、司令台、二十五公尺游泳池、足球场、篮球场。运动场内可容观众六万人。

三月五日　重庆市政府发表重庆人口数字，截至二月底止，共有一六四，四九〇户，九五〇，六一四人，其中男性五八九，四八九人，女性三六一，一二五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三，三六七人。

三月二十五日　据四川省政府公布，四川全省现有工厂一，三七七家，资本总额五七九，四六八，一九五元，每家平均资本四二〇，八一九元。主要分布在重庆附近，其次在成都、江北、乐山等地。

三月二十九日　邹容烈士纪念碑奠基礼在重庆南区公园举行。

五月十八日　交通部、四川省政府举行特种工程完工慰劳

会。特种工程包括成都附近的四个轰炸机场，五个驱逐机场。

五月二十二日 杨庶堪灵榇从南岸大石坝移奉朝天门码头公祭。三十日，在巴县东泉墓地安殡。

六月三日 行政院发言人称：重庆零售物价指数较一九三七年上涨四五〇倍。

六月十六日 美国超级空中堡垒B—29轰炸机从四川基地起飞，首次轰炸日本本土——八幡钢铁工业中心。

六月二十四日 川康经济建设服务社在重庆成立。张群为理事长，张群、徐堪、康心如、胡子昂、卢作孚为常务理事。该社旨在联合川康两省生产贸易金融交通等项事业，首求解除目前困难，进谋将来协调发展。

七月七日 四川省第五次行政会议重庆区会议开幕。

七月十日 国民党重庆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十四日闭幕。八月七日，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暨全体执监委员宣誓就职。

八月三十一日 行政院发言人答记者问：八月份重庆零售物价总指数较一九三七年上涨四四一倍。

九月二日 重庆市调整区以下基层组织，撤销镇公所，划全市为十八区，四〇八保，七，一七七甲。

九月八日 重庆市政府组织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九一八”以来，因日本侵袭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

九月十一日 经济部公布：截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底止，全国共有公私营工厂四，三四六家(已登记者)，在重庆的最多，达一，二二八家。在四川各地有七二七家，其他散处湘桂陕甘滇赣各省。

九月十五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

九月二十二日　三青团重庆支团部派员分三路出发，发动川东南各地学生青年从军。

十月一日　重庆各界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

十一月一日　重庆市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贺耀组市长兼主任委员。

十一月二十八日　日军攻入贵州境内，有直逼四川之势，重庆人心紧张。

十二月五日　日军攻陷贵州独山，全川震动。经中国军队猛烈反攻，八日，独山克复。

十二月十二日　据统计，重庆参军的知识青年达八，一二一人，超过分配指标三，○○○人，约占全川数额的百分之四十。

一九四五年

一月二十四日　据统计，截至一九四四年底，重庆共有公私银行七十五家。

二月十日　国民政府任命王缵绪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免去刘峙此职。

三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开幕。

四月十五日　重庆市物价不断跳涨，各业公会均采十日一议价的办法，议定后送主管机关审核执行。

五月五日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

六月　重庆发生霍乱。

八月九日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重庆市民，彻夜欢腾。

八月十一日　日本投降后，重庆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黄金、美钞、百货猛跌。出口货物涨而后跌。

八月十五日　中美英苏正式宣布，接受日本投降。

八月二十日 重庆市八半比期虽已渡过，但市面银根仍紧，金价续跌。

八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到达重庆，举行国共谈判。双方于十月十日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十一日，毛泽东飞返延安。

九月二日 日本签署投降书。

九月三日 国民政府下令，褒恤抗战时期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褒奖全体官兵；停止征兵免赋一年；分别检讨废止各种战时法令。

十月五日 重庆市出征军人家属互助联谊会举行大会，庆祝抗战胜利。蒋介石及征属代表数百人出席了会议。

十月十日 国民政府向抗战有功文武官员授勋。吕超、王缵绪、邓锡侯、潘文华等川籍官员，分别获得胜利勋章和忠勤勋章。

十月二十四日 重庆市政府决议编纂市志，以市长为主任委员。

十一月三日 四川省政府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令：拟定四川为全国建设实验区，以为全国示范。

十一月二十日 《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第八周年》。

十二月一日 新任重庆市长张笃伦就职。

十二月十二日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令重庆市政府，草拟重庆十年建设计划。随后，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都市计划委员会，于次年五月提出这一计划。

一九四六年

二月五日 蒋介石接见外国记者称：政府准备五月还都南

京。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陪都。

四月二十日 国民政府将于近期还都。为办理各机关在渝结束事务和还都事宜，以及与重庆党政军联系，特设“中央党政军机关留渝联合办事处”。二十五日，在军委会内正式办公。

四月二十三日 国民政府令：前因政府迁驻重庆而撤销的重庆行营，因政府即日还都，现予恢复。原设之成都行辕撤销，有关事务，并入重庆。特派何应钦为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兼代。三十日，重庆行营成立。

四月二十四日 陪都各界在军委会大礼堂隆重举行庆祝国府恭送主席胜利还都大会。蒋介石等国民政府官员、重庆市党政军官员、川籍国大代表、重庆市参议员、各机关团体代表六百人出席了会议。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致颂词，市长张笃伦献旗，蒋介石发表讲话。

四月二十五日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飞赴成都，二十八日返渝。

四月三十日 国民政府发表自重庆还都南京令。

同日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飞离重庆。当日到达西安，五月二日到达汉口，五月三日回到南京。五日，南京各界举行还都典礼。

一九四七年

八月 重庆各界建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该碑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动工，建于都邮街广场“精神堡垒”原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重庆抗战纪事
作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页数=421
SS号=10750754
DX号=
出版日期=1985年08月第1版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　　录